拉康研讨班 · 第十七期

精神分析的反面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1969—1970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七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反面》（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1969—1970）共13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Psychoanalysis Upside Down / The Reverse Side of Psychoanalysi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9年11月26日（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5
第2课 · 1969年12月17日.....30
第3课 · 1970年1月14日.....49
第4课 · 1970年1月21日.....79
第5课 · 1970年2月11日.....106
第6课 · 1970年2月18日.....129
第7课 · 1970年3月11日.....156
第8课 · 1970年3月18日.....186
第9课 · 1970年4月9日.....207
第10课 · 1970年4月15日.....240
第11课 · 1970年5月20日.....273
第12课 · 1970年6月10日.....299
第13课 · 1970年6月17日.....328

第1课 · 1969年11月26日（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再一次追问你们给予我的这份“到场相助”（assistance）[注]——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而言都是如此。尤其是今天：你们全都跟着我来到又一处讲课地点；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已经是第三处随我迁换到的地点。

> [注] 法语 assistance 同时可指在场的听众、出席，以及给予帮助。此处既说听众的到场，也说他们对拉康的支持。

不过，在继续这个追问之前，我不能不先说明自己为何会在这里，并向该感谢的人致谢。法学院愿意把场地借给我在高等研究学院的若干同事，并好意让我也加入他们之列，我因此才能来到这里。谨请法学院，尤其是其最高负责人、院长先生，接受我本人——我想也得到诸位赞同——在此表达的谢意。

也许公告已经告诉你们，我不会每个星期三都在这里讲课。倒不是说每个星期三这个场地都不向我开放；我只在每月第二、第三个星期三来这里，这样便把其余星期三空出来，大概用于其他工作。

尤其可以先宣布的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至少有一部分将另作安排……

也就是说，每隔一个月一次。我从下个月十二月开始，在十二月、二月、四月和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前往万森，带去的不是我的研讨班——先前那样公告是错的——而是另一回事。为了形成对照，并把差

别说清楚，我特意把它称作“四场即兴讲演”。我还给它们取了一个诙谐的标题，你们到已经张贴公告的地方自然会看到。

既然你们已经看出，我喜欢把某些提示悬置起来，我就赶紧借此卸下一个心结。它来自我曾经给人的一次接待；事后想来，那次接待不太友善。不是我有意如此，事情事实上却成了那样。一天，有个人——她也许就在这里，大概不会主动表明身份——在街上走近我；当时我正要登上一辆出租车。她为此停下轻便摩托车，对我说：

- “您就是拉康医生吗？”
- “正是，”我回答，“怎么了？”
- “您还会继续开研讨班吗？”
- “会，很快。”
- “在哪里？”

那一刻我无疑自有理由这样回答，她会相信我的。我对她说：“您到时就知道了。”

随后她骑着小摩托走了，发动得极其利落，我却愣在那里，又满心懊悔。[笑声]　今天我正想表达这份懊悔，向她道歉；如果她在场，但愿她原谅我。

说实话，这恰好让我们看到：无论怎样，一个人至少在表面上会被别人的“过分”惹恼，从来不是因为那份过分本身，而总是因为它正好撞上了他自己的某种过分。那时我在这件事上已经过度忧心，所以才会作出那种反应；我很快便发现它不合时宜。

好，我们就由此进入今年要带来的内容。我认为这个研讨班应当题为“精神分析的反面”。不要以为这个标题得益于时事，仿佛时事正要把若干地方“翻个底朝天”。

我只举一点为证：在一篇标明写于 1966 年的文字中，确切说，在我编成《著作集》时写下的、贯穿全书的几篇导言之一《论我们的前史》中——如果我记得没错，笔记也没写错，应在第 68 页——我已经明确提到，更准确地说，已经把我所谓的“话语”界定为“对弗洛伊德计划的反向重拾”。所以，这句话早在那些事件以前就写下了。

这是什么意思？

去年，我曾一再坚持把话语区分出来：它是一种必要结构，远远超出总带几分偶发性的言说。我说过——有一天甚至把它张贴出来——“我所偏好的，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注1]。

事实上，即使没有言说，话语仍完全可以存续。它存续于某些根本关系中；严格说来，这些关系若没有语言，若没有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建立起来的若干稳定关系，便不可能存在。在这些稳定关系内部，可以铭写某种远比实际言说行为更广、更深远的东西。

> [注1] 参见 1968—1969 年研讨班《从一个他者到另一个》，1968 年 11 月 13 日：“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是一种无言说的话语。”

相关知识卡 无言说的话语：书写支撑的结构

我们的举止乃至行动，无须这些实际言说，也会铭写在某些原初陈述的框架内。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经验、尤其在分析经验中重新遇见的东西又该如何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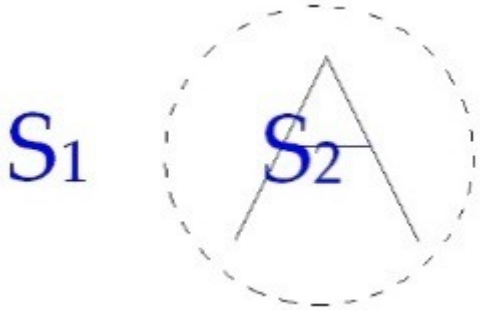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只因已经明确指到分析经验，才把它唤起：我们以超我面貌重新遇见的东西，又该如何理解？

确有一些结构。为了描述去年我用一种特殊方式强调的那个“……之形”中可以析出的东西，我们无法另作称呼；所涉及的是根本关系所造成的事，也就是我定义的“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的关系。



这就是根本关系。我以此指出：我们所谓主体的涌现正由这里产生，因为在这个场合，一个能指在另一个能指那里代表这个主体。

那么，这个根本形式应当怎样定位？如果诸位同意，我们今年立即把它写出来，不再像去年那样把它写成能指 S_1 的外在性；我们正要从 S_1 出发，在第一步中突出我们对话语的定义。



我把能指 S_1 写在这里，以显出它同这个圆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圆本身我只留下一道迹线。我原先在圆中标了一个大写 A，表示大他者的场域，现在先简化。

我们用 S_2 指称已经在那里的能指库。因为我们此刻站在一个起点上，要确定话语——被理解为陈述之地位的话语——究竟是什么；在这里，S_1 必须被视为介入者。它介入一个能指库，而我们绝没有权利把这个能指库看成散乱之物、看成尚未构成那个名为“知识”的网络。

首先被提出的是这样一个时刻：S_1 介入一个已经被界定、已经由知识结构化的场域，并在其中前来代表某种东西。其承底者（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就是主体。主体所代表的是一个特有的特征，必须同活着的个体区分开来。活的个体当然是它发生和留下标记的场所，却不属于主体凭知识的地位所带入的那个秩序。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因此，歧义点无疑就在“知识”这个词周围。今天必须把它着重标出；我想，我此前已经通过多条道路、小径、乍现的光亮和闪光，让你们的耳朵对此有所感觉。

去年我曾经——在此提醒那些记过笔记、或脑中也许还萦绕着这句话的人——把这种知识称为“大他者的享乐”。

这话颇为古怪；严格说，它从未有人讲过。如今它已不再新鲜，因为去年我已经在你们面前给了它足够的可信性，也已经围绕它说了一番而没有引来什么特别的反驳。这正是我预告今年要赴约的地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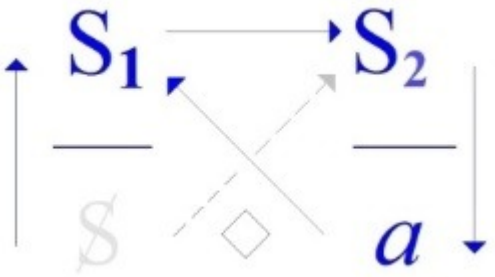
先补全最初只有两条腿的图式：



随后是三条腿：



再把第四条腿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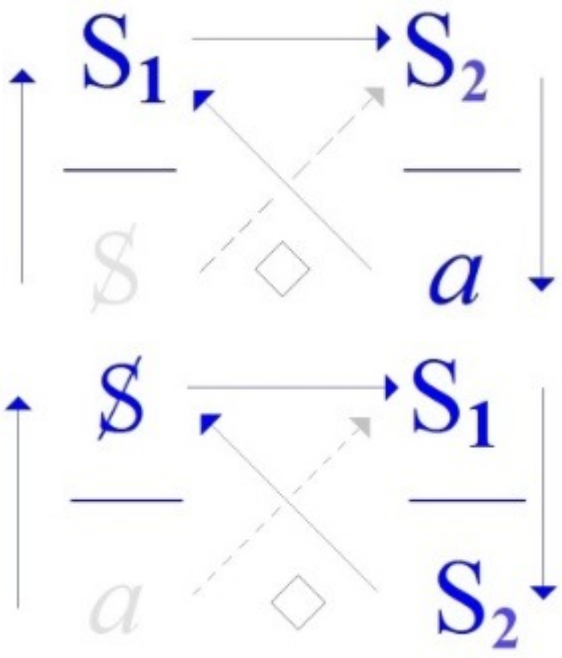
我想，此后我已经多次强调这一个，尤其在去年，因为去年的研讨班正是为此而设，我把它题为《从一个他者到另一个》。这里的小写“他者”却带着一个大写的 L，一个因声名而大写的 L；它就是我们在代数层面、在能指结构层面称作对象(a)的东西。

在能指结构这个层面，我们只须考察它怎样运作。只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再让整个系统作四分之一转，我们便可以自由观察它会产生什么。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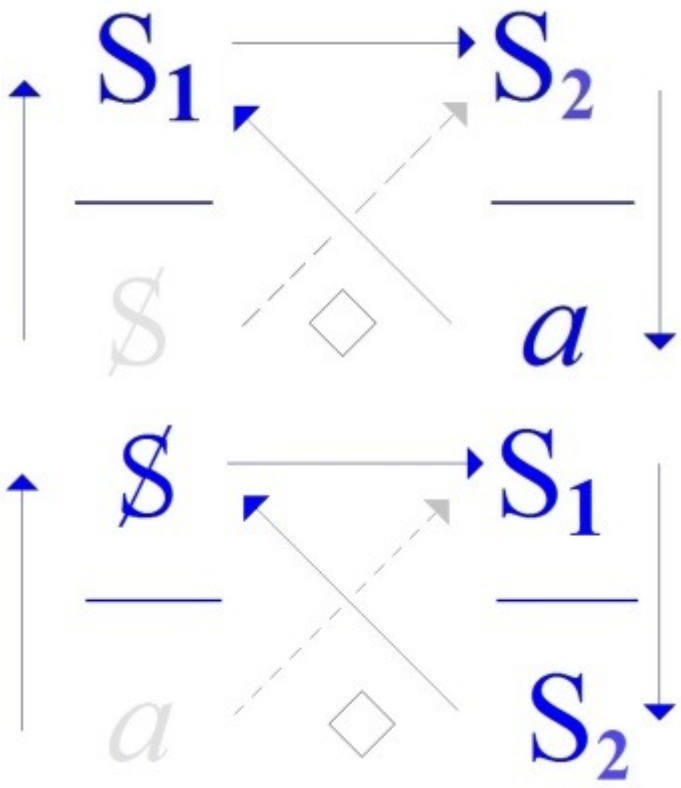
我谈这个著名的“四分之一转”已有很长时间，在许多别的场合都谈过，尤其自《康德与萨德》发表以来。我原是要让人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出，它并不限于所谓 Z 图式，其中另有理由，而不只是想象性再现的一次纯粹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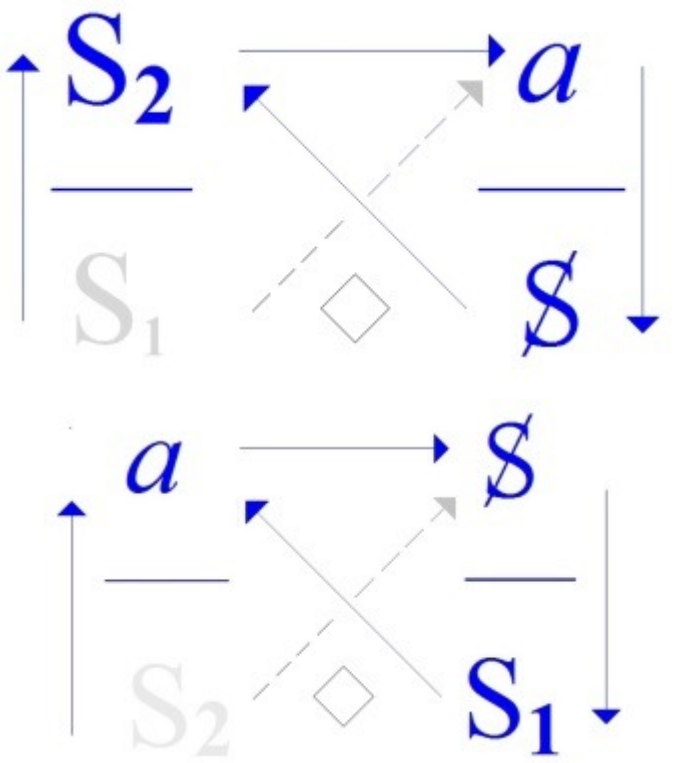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仔细看，如果这个代数中各字母的链条和次序确实不能打乱，那么经过我所谓四分之一转的操作，我们所得不会超过四种结构。左边写出的那一种，多少向我们显示了起点。

余下两种很容易在纸上迅速写出来。





这绝不只是为了规定一种装置；这个装置绝非人为强加出来的东西，也绝非某种脱离一切现实的观察视角。恰恰相反，它早已铭写在我刚才所说的现实之中：话语已经存在于世界，也支撑着世界——至少支撑着我们所知的世界。

正是在那里，这条象征链不仅已经铭写，而且构成那个世界的拱架。只要字母彼此可辨，我们用什么形状写它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显出一种恒定关系。

这个形式告诉我们：正是在 S_1 出现的那个点、那个时刻……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接下来展开的话语会告诉我们，那个时刻应当赋予什么意义：当 S_1 介入其他能指已经构成的场域——它们已经作为能指彼此衔接——并在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能指那里介入时，便涌现出 $\not{S}$，也就是我们所谓分裂主体。

我们一向强调，这条路径会产生一种被界定为“丧失”的东西；字母 a，即对象(a)，所标示的正是它。

我们当然也已指出从何处提取“丧失的对象”这一功能：从弗洛伊德的话语，从他说话存在者之“重复”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中提取。重复所涉及的绝不是随便一种生物性记忆效应。它同主体与知识的一条界限有关，这条界限名为享乐。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

因此，“知识是大他者的享乐”这个公式所关涉的是一种逻辑衔接。所谓大他者，当然只是在这样的限度内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大他者；是能指的介入使它作为一个场域涌现。

你们大概会说，我们又在原地打转：能指、大他者、知识；能指、大他者、知识……然而，恰恰是“享乐”一词让我们能够标出这个装置的嵌入点，并且无疑使我们……

离开真正可被辨认为知识的领域，转向界限，转向场外。弗洛伊德的言说敢于面对这一场外：他的一切衔接所产生的不是知识，而是混

乱；而他的言说正让我们从混乱中作出思考，并且由于这里涉及界限，让我们走出系统。

凭什么走出去？凭对意义的渴求吗？好像系统需要意义似的！系统一点也不需要。是我们这些软弱的存在需要意义；今年一路走下去，我们会在每个转折处重新见到自己的软弱。好，这里就有一个意义。

它也许不是真的。不过可以肯定，我们还会见到许多“也许不是真的”；这种说法的一再坚持，恰恰向我们提示真理的“辞职”（démission）——口误——真理的维度（dimension）。

再来看 Trieb 一词在精神分析的愚蠢中染上的歧义。人们不去把握这个范畴怎样衔接。它当然并非毫无前身，也不是此前从未用过；它的用法远可追溯到康德。然而，Trieb 在分析话语中的作用，理当阻止我们仓促地把它译成“本能”（instinct）。

不过，这些滑移的发生并非毫无理由。我们早已强调这一译法荒谬，但仍有权从中取得一点好处：不是为了认可“本能”观念，尤其不是在这里认可它，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弗洛伊德话语中的什么使它可以被栖居；也为了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栖居这套话语。

在通俗观念中，本能就是一种知识：人们说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有理由设想它产生的结果是生命得以存续。

如果我们赋予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以某种意义，把它视为生命运作的根本原则，即维持最低张力的原则，那么他后续的话语难道没有表明，有一种东西由某种经验的发展强加给了他吗？什么经验？分析经验，因为它是一种话语结构。

不要忘记，人们不是观察人的行为才发明了死驱力。死驱力就在这里，在你们与我所说的话之间发生的东西中。我说的是“我所说的”，不是“我是什么”。谈后者有什么用？凭你们的在场就看得出来。这份听众的在场并不替我说好话。[笑声]　它有时说话，而且多数时候占据我的位置说话。

不管怎样，我有理由在这里说点什么，原因在于我所谓“这场显现的本质”：随着我发言地点的变化，我吸引来的听众也先后不同。[即：1）巴黎十四区圣安娜医院；2）巴黎五区于尔姆街高等师范学院；3）如今巴黎五区先贤祠—索邦的巴黎第一大学。]

我一直很想在某处接上这一点。今天看来正是时候，因为今天我身处一个“更好之地”——也就是又多了一个地点。我要指出，地点一向有其分量，它塑造了我所说这场“显现”的风格。

说“显现”，也就让我有机会指出，它同“解释”一词的通常含义有关。借着你们的在场、为了你们并在你们之中说出的话，在我先前界定的每个地理地点上，都总已经被解释过了。

我还会回到这一点，因为它将在我今天开始使用的那些可旋转小四足图式中占据位置。先不让你们完全悬空：如果我要作解释，也就是把某件事钉定为一种解释……

这里的做法同分析解释的方向恰好相反，也让人清楚感到，分析解释本身怎样逆反“解释”一词的常识。

比如，要把我在圣安娜所说内容的“解释”钉定下来，我会说，最敏感、真正产生共振的那根弦，是哄堂大笑。

那里的听众当然以医务人员为主，也有一些不是医务人员。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断用一连串笑料穿插我的话语。十年间，这就是我的“显现”最鲜明的特征。直到我用一个季度分析诙谐之词，事情才开始变得尖刻；这又是一个证据。[笑声]

我不能沿着这条岔路说太久，这是个很大的插话。不过，我还得补上你们上一次离开我的那个地点对“解释”所作的规定。它的首字母缩写非常漂亮：E.N.S.；它围绕“存在者”（拉丁语 ens）打转。

一定要懂得利用字面上的歧义，何况 ens 还是法语 enseigner（教学）的前三个字母。正是在那里，人们发现我说的是一种教学。

在那以前，显然并不算教学，甚至不获承认；教授们，尤其医生们，为此很不安。它完全不像医学，这使人强烈怀疑它配不配叫教学。直到有一天，人们看见一群小伙子——就是《分析笔记》的那些人——在某个角落受了训练。早在那些笑料纷飞的年月，我就说过：在这个角落里，训练使人一无所知，却教得妙不可言。

他们这样解释我所说的话，自有其意义；那是另一种解释。至于分析解释……

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巴黎第一大学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法学院学生来，但说实话，这会很关键，真正关键。三个地点中，这一次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因为今年要做的是从反面来把握精神分析。也许这恰好会赋予精神分析一种“地位”，而且是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地位。不管怎样，它肯定一直同话语结构有极深关系。

如果法律不是话语建构现实世界[注]的场所，还能到哪里去触及这种建构？

> [注] 原文是小写形容词结构 le monde réel，即“现实世界”，不是名词化的 le Réel（实在界）。这里不用“实在世界”，以免在语法上把它直接等同于拉康三界之一的“实在界”。

所以我们待在这里并不比别处坏。我接受这份意外便利，不只出于方便；它也最少打乱你们往返的路线，至少对那些习惯去另一边的人如此。[巴黎第一大学在先贤祠广场，高等师范学院在于尔姆街，两处相距很近。]

我只不确定停车是否方便，不过于尔姆街还在那里。回到正题。

我们刚才谈到“本能”和知识，可以把它们放在比沙对生命的定义中理解：“生命，”他说——仔细看，这个定义极深，绝不是庸人之见——“是抵抗死亡的全部力量之总和。”

读一读弗洛伊德怎样谈生命对“涅槃倾向”的抵抗吧；他引入死驱力时，也有人用这个说法称呼它。

这种回归无生命状态的倾向，确实在分析经验——一种话语经验——内部呈现出来；弗洛伊德甚至说到了这里。不过，他说，使这个气泡般的生命得以存续的，是它只能沿着那些一度开辟、此后始终相同的道路回去。读那些篇章时，气泡这个形象几乎会自行浮现。

这不正是“本能”观念所包含的知识的真正含义吗？那条小径、那条道路已经被知道，它就是祖传知识。

这种知识又是什么？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在快乐原则、现实原则之外引入一部题为《超越快乐原则》的著作，但快乐原则并没有因此被颠倒。证据正是：知识使生命停在朝向享乐的一定界限上。

通往死亡的道路——这里谈的是受虐狂——无非就是所谓享乐。知识与享乐的这种原初关系，正是能指涌现时出现的东西要嵌入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把能指涌现的功能联结到这里。

够了！何必事事解释？难道连语言的起源也要解释不成？

谁都知道，要正确建构一种知识，就得放弃起源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们此处的工作只同今年必须展开的东西有关，也就是一种结构。

把这一点衔接起来，本身已经是多余、徒劳的意义探寻。先顾及我们自身是什么。

这里涉及一种享乐的接缝，而且不是随便哪一种。它无疑必须保持晦暗。这是所有享乐中享有特权的一种接缝，但并不是因为它是性享乐；恰恰相反，刚才说过，这个接缝所标示的是性享乐的丧失，也就是阉割。

正是在同这道性享乐接缝的关系中，弗洛伊德的重复寓言产生出一个根本之物，并使一个可以逐字书写的图式成形：

- 第一时刻，S_1 涌现；
- 它在 S_2 那里重复；
- 在关系 $S_1 \rightarrow S_2$ 中，主体由此涌现，而某种东西代表着一种丧失。为了理解这一点的歧义，刚才那番朝意义所作的努力仍有价值。

我还曾把这个“对象”称作分析中整个受挫辩证法围绕其组织起来的对象；去年，我又把同一个对象称为“剩余享乐”。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这意味着，对象的丧失也是一道裂口，是向某种东西敞开的洞。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享乐之缺”的表象。它位于知识的进程中；知识此刻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音，因为它从此是由能指划分节奏的知识。

它还是同一种知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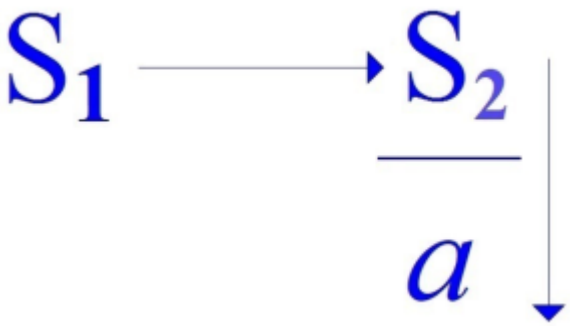
同享乐的关系，忽然由于一个仍然潜在的功能——欲望的功能——而被凸显出来。

也正因此，我把这里出现的东西衔接为“剩余享乐”；它并不来自强行突破或越界。

请诸位把围绕这场混乱的喧嚷稍微停一停！如果分析确实显示了什么……

我在这里要请那些并非只有巴雷斯所谓“尸体的口吃灵魂”的人作证：分析极其明确地表明，人并没有越过任何界限。悄悄钻过去不等于越界；看见一扇半开的门，也不等于跨过它。

我们还会重新遇见我正在引入的东西。这里不是“越界”，而是“闯入”，是某种属于享乐秩序的东西坠入场中：一份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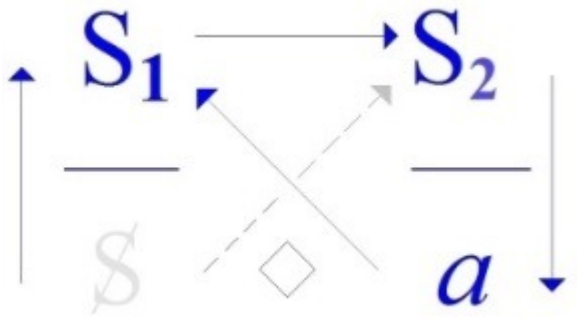
好，就连这份红利，也许也正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去年谈到剩余享乐时，我对你们说：在马克思那里，写在这里的 a 被认出在分析话语所衔接的层次——而不是别的话语层次——作为剩余享乐发挥功能。

马克思发现的，正是它真正在剩余价值层次发生的事情。当然，剩余价值并非马克思发明；只是在他以前，没有人知道它占据什么位置。它处在我刚才所说的同一个歧义位置：额外劳动、剩余劳动的位置。

“它支付的是什么，”马克思问，“不正是必须到某处去的享乐吗？”令人不安的是：如果它被支付，人们便拥有它，于是不必急着把它挥霍掉；而一旦挥霍，又会带来各式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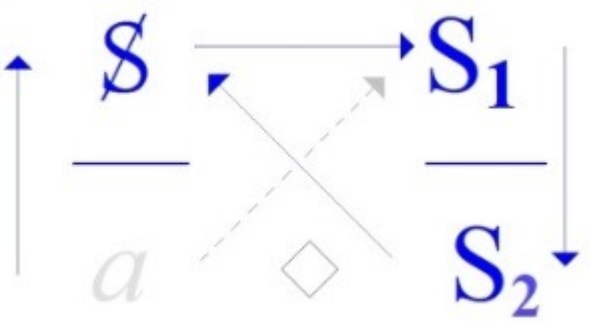
暂且把问题悬置。我正在做什么？只是通过定位这个有四条腿、四个位置的装置，开始让你们承认：它可以界定四种根本话语。

我首先给你们这个形式，并非偶然：



[主人的话语]

但没有什么规定我不能从别的形式出发，例如左边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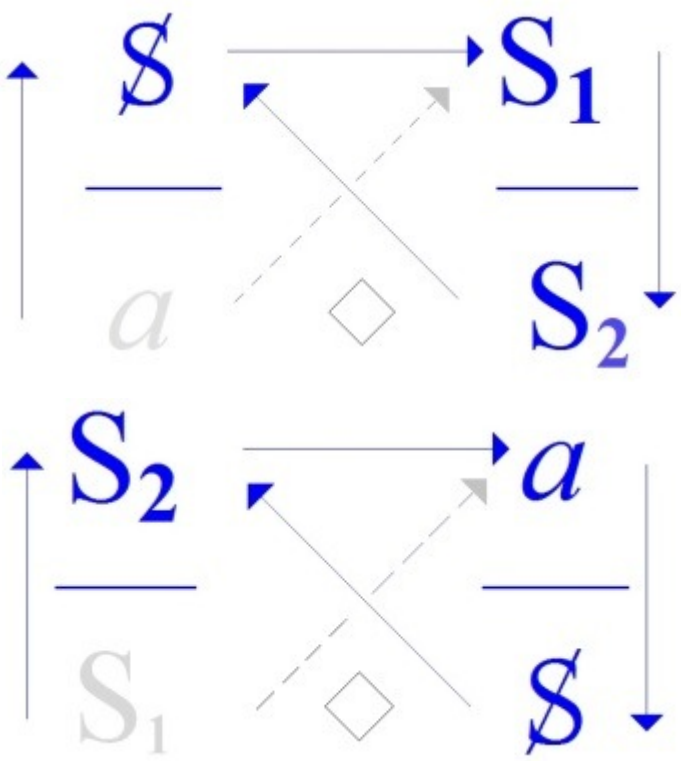
历史原因决定了第一种形式具有重要性。它从“一个能指在另一个能指那里代表主体”出发；在我们今年要讲的四种话语中，它将被特别钉定为“主人的话语”的结构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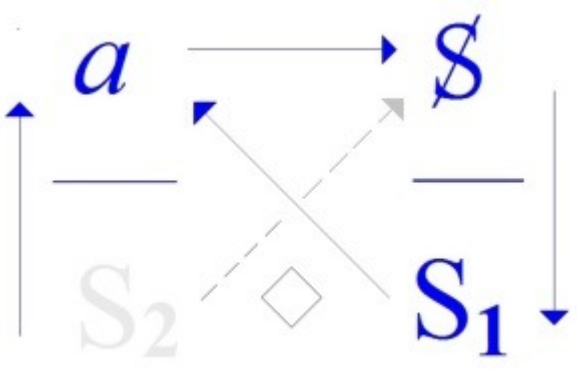
主人的话语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想不必再向你们复述。你们总体上都是经由所谓大学筛网选拔进来的，因此不会不知道：哲学谈的从来只有这一件事。

甚至在哲学只谈这件事、也就是用其名称称呼它以前——黑格尔在这里构成一个突出的节点，并给予了格外鲜明的说明——已经可以看出：某种与我们有关的东西在主人的话语场域中出现了。无论“话语”一词本身多么含混，这个东西都同话语有关，而且名为哲学。

我不知道今天能把要替你们钉定、标出的东西推进到哪里。提醒一句：如果真想把这四种话语走完，我们不能拖延。

另外几种叫什么？我现在就说吧，为什么不呢，至少吊一吊你们的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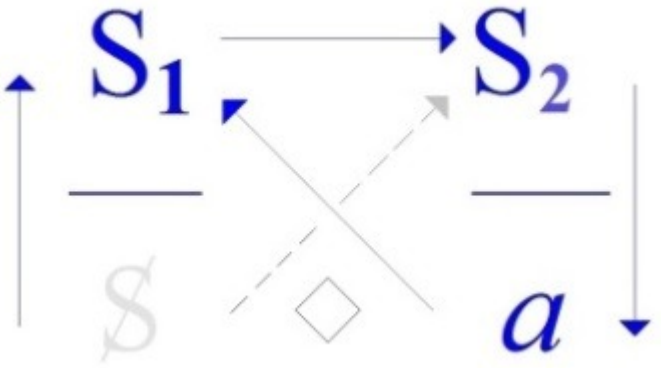




左边这个是癔症者的话语。眼下还看不出来，对吧？[笑声]　现在还不明显，我以后解释。

其余两个中，一个是分析家的话语；另一个嘛，我今天坚决不告诉你们。[笑声]　今天这样把名字说出来，只会引起太多误解。不过你们会看到，它是一种非常切合时事的话语。

好，回到主人的话语。我必须确立这里这个代数装置的命名所指，使它给出主人的话语结构。



这里的 S_1，简言之，就是能指，是主人之本质所依托的能指功能。你们也许还记得，去年我在另一边反复强调：奴隶自身的场域是知识，即 S_2。

读一读我们保存下来的古代证言，至少看看人们当时怎样谈这种生活，就不会有疑问。请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我说奴隶的特征是充当知识的承载者，这一点毫无疑问。

古代的奴隶不像现代奴隶那样仅仅是一个阶级，而是一项铭写在家庭中的功能；这界定了他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谈奴隶时，奴隶属于家庭，也更属于城邦，因为他掌握一种技艺性知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追问知识是否知道自身、是否可以从一套对自身完全透明的知识视野中奠立主体以前，必须先把原初的技艺性知识这一层清理出来。

而眼前正在发生、并赋予哲学以意义的事情……

这只是它赋予哲学的第一重意义，以后还会有别的意义。关于这件事，幸而借助柏拉图，我们留有一道痕迹。

必须记住这一点，才能定位它、把它放回原位。毕竟，如果折磨我们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也只能在于把东西放回原位。[参见“实在”的第一项定义：“总是回到同一个位置的东西。”]

哲学在其全部演进中标示的，就是主人通过操作从奴隶那里偷走、掠夺并抽离他的知识。

只要对柏拉图对话稍有一点实践——天知道，这十六年来我多么努力地让听众获得这种实践——便会看出这一点。

在这里，我所谓知识的两个面向追求什么？一面是同动物知识十分接近的技艺性知识；另一面是，这种知识在奴隶那里绝不缺少把它变成语言网络的装置，而且这个网络衔接得极为严密。

问题就在这第二层、这个衔接起来的装置：人们发现它可以传递，也就是可以从奴隶的口袋传到主人的口袋——如果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有口袋的话！

所谓 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的全部提炼工作，正是要找到一个位置，使知识变成主人的知识。这个词很有意思，不知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它意味着“把自己放到恰当位置”，同 Vorstellung 的构词方式相仿。

作为可传授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 的功能被明确规定下来。翻一翻柏拉图对话就会看到：它始终把资源全部取自手工技艺，也就是奴隶的技艺。

所要做的，是从这些技艺中提取本质，使它变成主人的知识。随后自然又出现一点反冲，我该怎么说呢……

也就是所谓口误、被压抑者的回返。

“可是，”某个人说——卡利马科斯也好，别的谁也好；我都说到哪里去了，请你们去看《美诺篇》——谈到 $\sqrt{2}$ 及其不可通约性时，有人说：“来，把那个奴隶叫来；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他知道。”

人们向他提问，当然是主人的问题；奴隶自然依照问题已经规定的答案作答。在这种退让、嘲弄的形式中，人物仿佛在煎锅上被翻来覆去。它仍清楚显出真正严肃的目的：奴隶知道。只有以嘲笑的迂回方式承认这一点，才掩住了真正发生的事——把奴隶在知识层次的功能夺走。

要让刚才的说法获得全部意义，当然还得考察奴隶相对于享乐的地位怎样衔接。我去年已经开了头；这会是下一步。

我当时讲的只是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不过大家都知道，其中有趣的是它如何否定通常的说法——享乐是主人的特权。简言之，这里涉及主人的地位。

这番导言只想说明，这个地位同我们有多深的关系。下一步值得把问题明确说出：当哲学的功能显现、揭露自身，并同时缩减为景观的一角时，这个地位同我们有多深的关系。

今年我给自己的时间比往年短，因此大概不能充分展开。无所谓，谁都可以接过这个题目，随意处理。

哲学的历史功能，就是这场提取和背叛：它压榨奴隶的知识，把它转化成主人的知识。难道如今涌现并支配我们的科学，就是这场操作的果实吗？仍然不能匆忙下结论；相反，我们看到并非如此。

全部智慧、全部借助二分法构成的 ἐπιστήμη，最终只产生了一种知识。严格说来，可以用亚里士多德本人描述主人知识的术语来称呼它：理论知识。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今天的弱义，而是亚里士多德赋予 θεωρία（theōria）的强义。

奇怪的是，直到有一个人放弃这套可以说来路不正的知识，并从 S_1 与 S_2 的严格关系中第一次提取出主体功能，事情才发生转变。我说的是笛卡尔；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会同意我这样衔接。

把奴隶的知识交给主人的尝试到此发生转折，继而重新出发。推动这次重新出发的，只是一种新的结构设定：陈述的一切可能功能都只能

由能指的衔接承载。这就是我今年提出的工作可以带给你们的一点洞见和闪光。

当然，不要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我刚才的说法，一旦被展示出来，至少足以揭去一种显而易见之物的眼罩：既然已经这样说了，谁还能否认，哲学从来就是一项为主人效力的魅惑事业？我们当然还会回来。

在另一端，则是黑格尔的话语，以及那件号称“绝对知识”的庞然大物。

如果从我刚才重申、并作为我们进路之原则的知识定义出发，“绝对知识”究竟能是什么意思？下次我们也许就从这里开始；至少，这是起点之一。

另一个起点同样重大，而且格外有益，因为精神分析家谈欲望时会说出一些真正令人窒息的荒唐话。精神分析若迫使我们死死守住什么，那就是：求知欲望同知识毫无关系。

我们曾拿“越界”这个淫荡的字眼取乐。必须作出一个彻底区分，而且它在教育学上有最终后果：引向知识的并不是求知欲望。

我想，这一点迟早会为话语本身提供根据。不过，归根到底还得提出一个问题：主人……

完成这场转移操作的主人——随你们怎样称呼它，姑且叫作把奴隶知识作一次银行式转账——想知道吗？他有求知欲望吗？因为直到不久以前，我们通常看到……

真正的主人——如今越来越少见——根本不想知道任何东西；他只想让事情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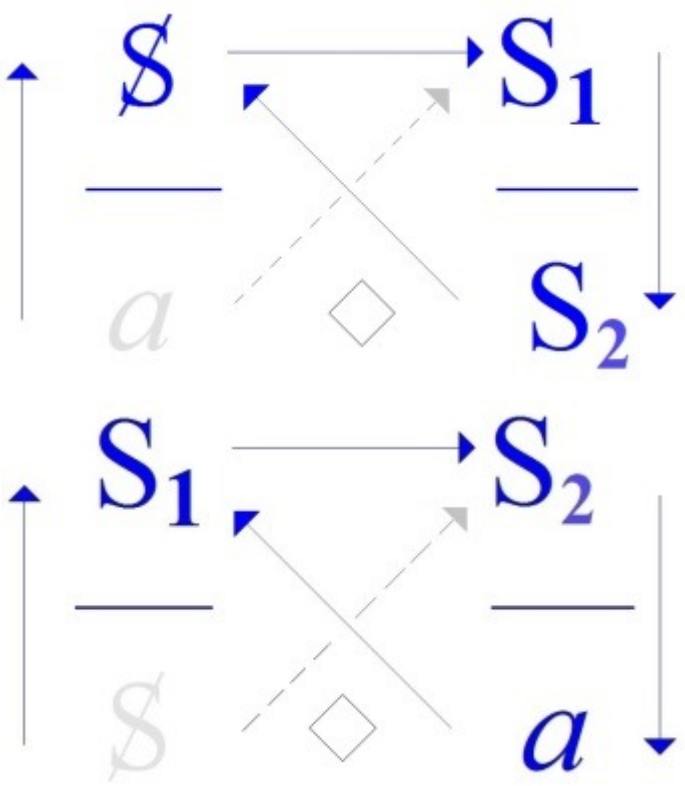
他为什么要想知道？有趣的事多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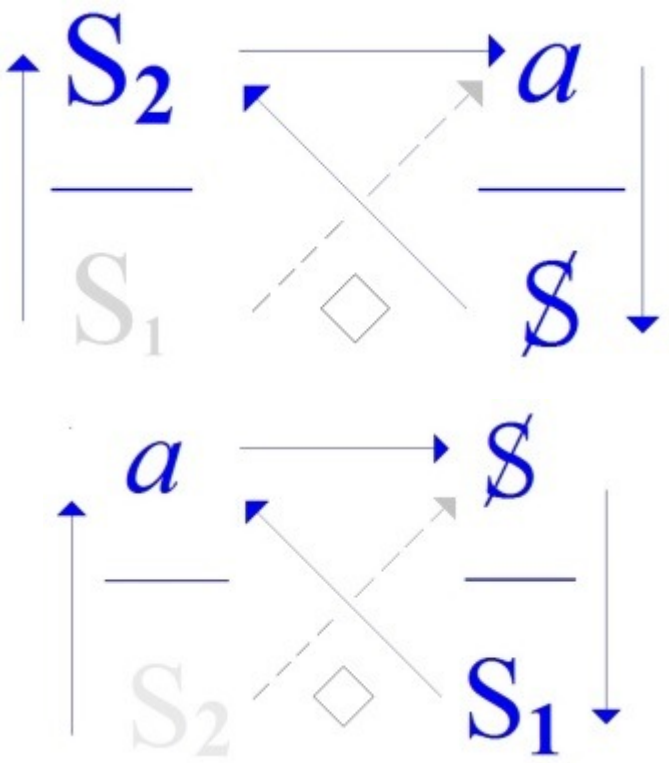
所以问题在于：哲学家到底怎样成功地把求知欲望灌输给了主人？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

这是一点小小的挑衅。

如果有人在下次课以前找到答案，请告诉我。

第2课 ・ 1969年12月17日





那么，把这四个公式放在这里作为参照，是有用的。

听过我第一场研讨课的人，应该在那里听我重申过这个公式：能指有别于符号，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代表……

当然，法语动词 représente（代表）在这里同时带着 représentant（代表者）和 représentation（表象）这两个词的重音；所以完整的说法是：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另一个能指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正因如此，显然这里涉及的不是“表象”，而是“代表者”。

由此，在同一次讲课中，我以为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说明我所谓的“主人的话语”。

就主人的话语而言，如果我们确实可以把主人归结为一个能指，这便意味着这个能指代表着某种东西——把它称作“某种东西”都已经说得太多了——它代表的是一个 x，而这个 x 正是此处有待阐明的东西。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说明主人究竟凭什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里必须有某种同意，这是毫无疑问的！

黑格尔在这里把死亡当作绝对主人的能指，这本身反倒是一个迹象：这个伪起源什么也没有解决。因为事情若要继续下去，谁都没有死：

- 主人没有死；归根结底，只有当他复活，也就是实际通过那场考验之后，才能证明他确实是主人；
- 奴隶也一样：他恰恰放弃了同那场考验正面相逢。

所以，主人功能之谜并不会立即显露出来。

我已经开了个头，也把这条路指出来；之所以指出它，是因为我们无须佯装现在才发现这条路。沿着它，所发生的不是建立一种无意识理论，而是发现某种东西；它使我们确信：并非任何知识只因是知识，便理所当然地作为知识知道自身。

因为，即便在最微小的精神分析经验中，我们所发现的也确实属于某种秩序——更确切地说，属于知识的秩序……

不是认识，不是表象，而恰恰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网络关系中，把一个能指——如果你们愿意，就叫 S_1——同另一个能指 S_2 联结起来。

我只能用这些仿佛粉末般零散的词语，借助一个比喻，让你们听出此处应当怎样重读“知识”一词。

正是在这种关系中，而且恰恰由于这种知识并不知道自身，那些看上去“知道”的东西才有了落脚点：它安安稳稳地把自己衔接成一个小主人，衔接成“我”，衔接成那个自以为颇知道一点的人。然而我们还是会不时看见，这一切失灵了；口误、绊跌的整个面向由此迸发，无意识也在其中显露。

分析经验还使我们走得更好、更远：在它的照明下，我们容许自己去阅读一部传记——只要我们有相应手段，有足够多的材料，可以证实这部传记相信了什么，证实它一步步相信自己曾经拥有怎样的命运，甚至有时还相信自己怎样给这份命运收了尾。

然而，一旦有了“知识未必知道自身”这个观念，我们就能读出：工作是在何种无意识知识的层面上完成的；这项工作交付出来的，才是所有那些自以为曾经如此之物的实际真理。若用大写 M 所标示的主人的话语图式来说，那在暗中运作的是奴隶的劳作；它构成一个尚未被揭示的无意识，并从这值得一谈的人生中交付出真正的真理——正是这些真理，曾使那么多迂回、虚构和错误涌现。

因此，知识被精神分析经验置于中心，置于受审的位置。

单凭这一点，我们便负有质询的义务，而且没有任何理由限制这份质询的范围。

说到底，知识无论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时刻——哪怕只是作为一种未来的希望——能够构成一个封闭总体，这个观念早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就已经显得可疑。

不过必须说，在那些怀疑论者那里，这份怀疑也许是从稍嫌低处着手的。我说的是那些在“怀疑论”尚且构成一个学派的时代以此自称的人。至于一个学派究竟能构成什么，我们今天只剩下极其贫乏的观念。

可是，归根结底，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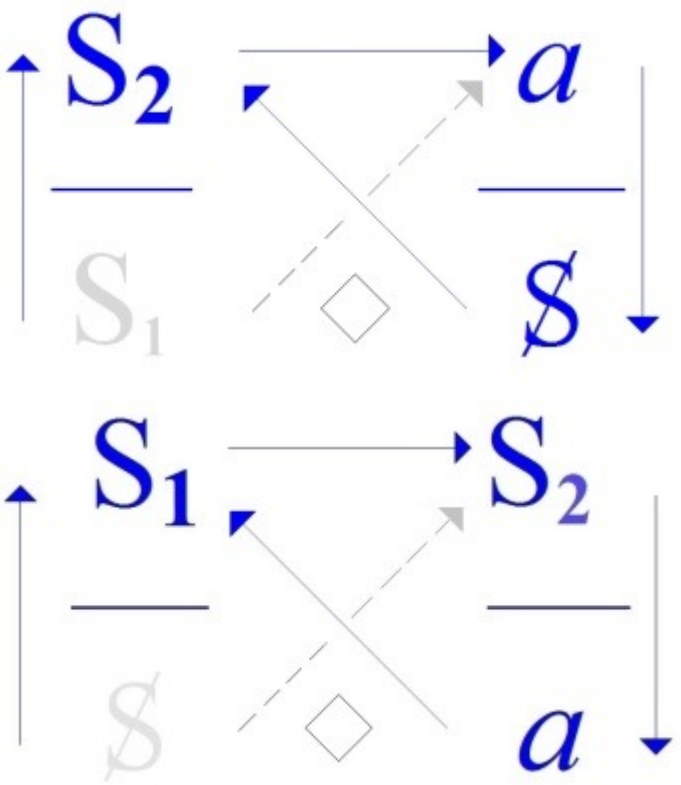
对于怀疑论者留下来的东西，也许最好这样判断：我们拥有的，可能只是其他人有能力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的材料；而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那些从根本上质疑一切知识、尤其质疑知识总体化的公式，究竟从何处出发。

知识能够构成总体——这个观念显示出，各个学派的影响其实多么有限。可以说，这个观念内在于政治本身。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

由身体提供的那个“整体”的想象观念，属于政治说教的一部分；政治说教依靠的是满足的“好形式”：形成一个球体。推到极处，还有什么比它更美？可又有什么比它更不开放、更像满足的封闭？

这个形象同满足观念的共谋，正是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每逢遇到一个结点时都会撞上的东西——我说的是经由无意识的路径把某种东西带到明处的工作。它是障碍，是界限；更确切地说，它像一团棉絮，我们在其中失去方向，发现自己被堵住。

必须知道，这个形象始终被政治利用。奇怪而独特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把自己的衔接建立在斗争、阶级斗争的功能上，却并未阻止某种东西从中产生；而它恰恰是眼下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主人的话语如何维持。



这里当然不是旧有结构意义上的主人的话语，即不是安置在大写 M 所指位置下的结构，而是左边那个由我冠以 U 的话语——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在那里，占据我们暂且称为“主导位置”的，正是 S_2。它的特征不是“万事皆知”（savoir de tout）——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而是“全是知识”（tout-savoir）：请把它理解为一种断言，即它除了知识之外什么都不是。日常语言把这叫作“官僚制”；不能说这里没有问题。

三星期前第一次陈述时，我之所以从那个起点出发，是因为在主人的话语最初形态中，知识是奴隶的份额。

所以我以为可以指出——很遗憾，上次一个小小的意外妨碍我重新谈到这里并补充若干说明——从古代主人的话语到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人的话语，所发生的变化涉及知识的位置。

我甚至以为可以说，哲学传统对这场转变负有责任。

无产者之所以可以被称作“被剥夺者”，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被剥夺了共同财产；这一点既为革命事业，也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正当性。但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归还给他的，并不一定是属于他的那一份。

如果资本主义剥削通过使他的知识变得无用而剥夺了它，而某种颠覆又把这种知识还给他，那么真正还给他的却是另一种东西：主人的知识。

所以，他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

留下来的，确实仍是主人的本质：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这才构成主人的话语之真正结构。

奴隶知道许多事情；但他知道得更多的是主人想要什么，哪怕主人自己并不知道——通常正是如此，否则他就不是主人了。

奴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他的奴隶功能。事情也因此运作起来，而且毕竟运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全是知识”移到主人位置这个事实，非但没有带来澄清，反而让问题——也就是真理——更加晦暗。

主人能指究竟从哪里冒出来？

主人的 S_1 正蜷伏在那里，显露出知识的新暴政那副硬骨头；我们也许曾希望在历史运动中让真理出现于这个位置，如今却已不可能，因为这个标记到了别处。

它必须由那些取代古代奴隶的人产出；而按照人们的说法，他们本身也是一个所谓“消费社会”的产品，也和其他产品一样可供消费。他们就是一度被称作的“人力材料”；某些人竟从这个说法里听出了温情，并为之鼓掌。这一点值得标出，因为它同样关系到我们。

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质询精神分析行动所涉及的究竟是什么。

我不会从两年前[注1]那个层面来谈。当时我曾希望把环闭合起来，却在“行动”这里中断了：精神分析家凭什么就位，又凭什么作为精神分析家被确立。

我会从经验的层面来谈：经验一旦在其明确界限内确立，其中的干预究竟如何。

如果存在一种不知道自身的知识——我已经说过——就应当把它定位在 S_2 的层面，也就是我所谓的“另一个能指”。

> [注1] 参见 1967—1968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

去年我已经充分强调过：这个“另一个能指”并不孤单，大他者——大写 A——的腹中装满了它们。

这个腹部如同一匹庞然怪异的特洛伊木马，为“知识总体”这个幻想提供了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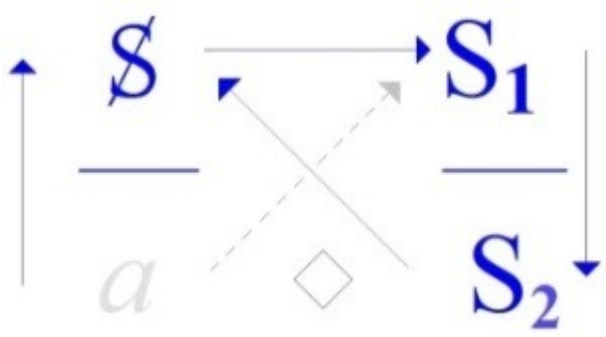
然而，它的功能显然意味着：必须有某种东西从外部前来敲击；否则里面永远不会出来任何东西，特洛伊也永远不会被攻陷。

分析家确立的是什么?

我常听人谈论“精神分析的话语”，仿佛这个说法真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们以一个话语的主导项为中心来刻画它，那么确有分析家的话语；但它不能同分析者的话语，也就是分析经验中实际说出的话语混为一谈。

分析家所确立为分析经验的东西，可以说得很简单：那就是让话语癔症化。换言之，它通过人为设定的条件，在结构上引入癔症者的话语，也就是这里用大写 H 标出的那个话语。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去年我试图指出，癔症者的话语本来就存在；无论精神分析是否出现，它都会存在。那是一种话语……

我以形象化的方式说这一点，是因为我给它配上了最常见的承载方式；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正由此而来：人类这个物种之中，所谓性关系构成了一场误解，而这种误解就建立在一条迂回曲折、处处绕行的路线上。

既然有了能指，我们便必须彼此听懂；而恰恰因此，我们彼此听不懂：能指本来就不是为性关系造的。

人一旦成为说话的存在，事情便糟了、完了。所谓交媾完美而和谐的性质，无论在哪里都无法从自然中定位出来。

自然呈现出无穷多的物种，其中大多数根本没有任何交媾。这显然说明，让它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球体——正如我刚才提醒的——在自然的意图中所占的位置何其微小。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件事在人这里之所以勉强运转，是多亏某个把它变得可能的机关；可是这个机关首先使它变得无解。

这就是癔症者的话语所包含的意思。癔症者如此勤于经营——假如我们把她写作女人……

当然，这并非她的特权：许多男人也接受分析，并且仅凭这一事实，他们也不得不经过癔症者的话语；这是法则，是游戏规则。问题在于，我们从中能为男女关系提取出什么。

因此我们看见，癔症者尽其所能制造出一个男人，一个由求知欲望推动的男人。

我在上一次研讨班提出的问题正由此产生：如果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主人逐渐剥夺了奴隶的知识，把它变成主人的知识，那么仍然神秘的是，欲望怎样来到了主人身上。因为——如果你们相信我——他原本大可以没有欲望；奴隶甚至在他知道自己可能欲求什么以前，就已经替他满足了。欲望究竟怎样来到他身上?

上次我的思考本来要落在这一点上；要不是从实在中冒出来的那件可爱的事……[笑声]

有人向我保证，那属于去殖民化的实在：一个住院者，过去在旧阿尔及利亚支援过我们，如今被安置到这里。你们也看到了，那真是一场可爱的胡闹。[笑声]

多亏此事，你们不会知道——至少暂时不会知道，因为我总得继续往前——我在哲学话语与癔症者的话语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亲缘关系；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哲学话语似乎以求知欲望鼓动了主人。

这里所说的癔症究竟可能是什么？

这里终究有一片不宜贸然采撷的领域。

如果有人喜欢让思路比演讲者所说的稍稍超前一点，不妨借此机会施展才能。我向他们保证，这条路至少在我看来颇有希望。

无论如何，为了给出一个比男女关系层面更宽的公式，我们只须读一读我写在这里的癔症者的话语。当然，我们仍不知道这里这个 S 是什么；但如果涉及的是她的话语，而且正如我所说，在男人那里它会通向一个由求知欲望推动的男人，那么所要知道的是什么？是她本人值什么价——这个正在说话的人值什么价。

作为对象(a)，她是坠落，是这一话语效应的坠落；这个效应的轮廓总在某处断裂。

推到极处，癔症者想让人知道的是：语言会在她作为女人所能向享乐开启的广度面前滑脱[注]。但癔症者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一点。

> [注] 当前 Staferla 转录写作 veut que l'homme sache, c'est en quoi de par le langage, de par ce langage qui dérape…，口述停顿使句法发生粘连；Seuil 整理本（1991，第 37 页）改作 veut qu'on sache, c'est que le langage dérape… Mais…。正文据整理本恢复句法主干，同时用"在……广度面前滑脱"保留 dérape sur l'ampleur 的空间性"打滑"意象，不把它简化成普通的"谈到"或"描述"。下一段才说明癔症者真正关心的是：那个名为男人的他者知道她在这一话语语境中成了何等珍贵的对象。

癔症者在意的是：他者——那个名叫男人的他者——知道在这个话语语境中，她变成了怎样一件珍贵的对象。

说到底，这不正是分析经验本身的根基吗？如果我说，分析家把主导位置交给了他者……

- 他在癔症者的话语中把主导位置交给他者，也就使分析者的话语癔症化；
- 他把分析者变成这样一个主体：这个主体被要求放弃除围住自己的四面墙以外的一切参照，并产出构成自由联想的能指——说到底，这种自由联想在整个场域中占据主人位置。

"随便说什么"怎么可能通向某种东西？除非已经确定：在那也许偶然冒出来的内容中，没有任何东西——只要它是能指——不关联于那种不知道自身的知识，而真正在劳作的正是它。

只是，分析者没有任何理由因此多知道一点。

如果分析家不发言，大量涌出的 S_1 会发生什么？当然可以发生许多事情。

倾听的分析家可以记录许多东西。一个“普通当代人”若毫不留意地说出自己能说的一切，我们便能从中编出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得到极多把钥匙。

如果把这一切录下来，甚至还可以事后把它构造成一台小型电子机器。

有些人确实抱着这种想法：他们造出电子机器，分析家仿佛只须从中抽出一张答案票，递给他们即可。[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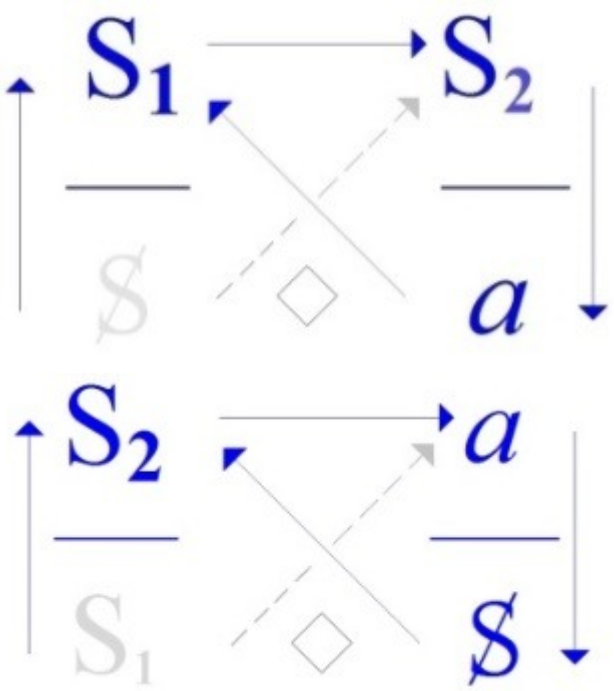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分析家的话语中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因为在分析经验中，分析家才是主人。

以何种形式成为主人？这一点当然要留待接下来的谈话。为什么是以 a 的形式？我这里只先标出来；我已经在别处强调过。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家这一边有 S_2，有知识。

这份知识，要么由他倾听分析者而获得，要么是已经获得的知识，也就是对某些可在一定层面上限定为分析技艺性知识的东西所作的定位。

不过，我们必须从这些图式中理解这一点——先前已经指出过：把 S_2 放在主人的话语中的奴隶位置，再把它放在“现代化主人”的话语，也就是大学话语的主人位置，这并不是同一种知识。



那么，在这里知识处于什么位置？处于黑格尔——这位最崇高的癔症者[笑声]——在主人的话语中为我们指明的真理位置。

因为不能说《精神现象学》是这样一回事：从据说在最直接的感觉层面上被把握的 Selbstbewusstsein（自我意识）出发，并认为一切知识从一开始便知道自身。若不是为了别的东西，何必写整部现象学？

可是必须说，我所谓这个话语的“癔症性”，恰恰在于它避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区分。这个区分原本足以让人看见：即便这段历史进程——其实不过是各学派的进程——最终真的抵达“绝对知识”，它也只会标示出某种东西的取消、失败和最终消散；而唯一推动知识功能的，正

是知识与享乐之间的辩证关系。“绝对知识”不过是对这一项的彻底废除。

任何细读《精神现象学》文本的人，都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那么，S_2 被放在真理位置，如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为知识的真理是什么？正好可以这样问：知识怎样能够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知道？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这是一个谜。

好吧，答案之一就是：“这是一个谜。”我还要举另一个例子，说明它也可以是什么。

两者有一个共同特征，而这正是真理的特性：真理永远只能说出一半。我们那位通俗版画中的亲爱真理若从井中现身，也总只露出半截身体。

我曾在意大利的一场讲座中谈到这一点。有人请我去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我应付得相当平庸；为什么呢？我在那里提到了奇美拉〔斯芬克斯〕；癔症者的话语之原初性质恰恰化身于她。

她向俄狄浦斯这个男人提出一个谜题。他那时也许已经有某种情结，但未必如此，而且肯定还不是后来以他命名的那个情结。他以某种方式回答，于是才成为俄狄浦斯。

奇美拉问他的谜题本来可以有许多别的答案：四条腿、两条腿、三条腿。他本可以说：“这是拉康的图式！”那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他说：“这是人。”甚至还特意说明：“是作为婴儿的人。”

- 婴儿从四条腿开始；
- 后来站上两条腿了吗?
- 或者又拿起第三条腿了吗?

这就是婴儿；与此同时，他像子弹一样直奔母亲的腹中！这确实就是人们有充分理由称作俄狄浦斯情结的东西。

不过，我想你们看得出谜的功能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一种半说，正如奇美拉只显露半截身体；而一旦谜底给出，她便会彻底消失。

作为真理的知识——这界定了所谓解释应当具有的结构。

我之所以长久坚持言说行为与陈述之间的层次差异，正是为了让谜的功能获得意义；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种功能。

谜真正说来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言说行为，而我把让它变成陈述的任务交给你们。你们尽力设法处理吧，就像俄狄浦斯那样；你们会承受其后果。这就是谜所涉及的事情。

不过还有另一件人们很少想到的事，我有时只是轻轻触到、拨弄一下。说实话，它以这种身份太经常地牵涉到我，反而使我很难轻松地谈它。

它叫作“引用”。

所谓引用，就是当你在一篇文章里或好或坏地向前推进，如果你恰好身处社会斗争中的合宜位置，忽然便引用马克思，加上一句：“马克思

说过……”如果你是分析家，这时你就引用弗洛伊德。这可是“至关重大”的！[笑声]

- 谜是言说行为——至于怎样把它变成陈述，你们自己设法；
- 引用则是：我摆出陈述；剩下的部分，你们会在作者名字里找到坚实支撑，而我把这份负担交还给你们。

这样非常好；它同作者功能那多少有些摇摇欲坠的地位毫无关系。

我们引用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我选择这两个名字并非偶然——是根据那个被假定的读者在某种话语中的参与来引用他们。

引用功能的重要性正在这里：它以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种半说。

它是一个陈述，而人们同时向你指出：只有当你已经参与某种话语时，这个陈述才可被接受；而且那是一种结构化的话语，处在黑板上这些完全根本的结构层面。

你们会注意到，这里正是唯一的关键点——不过直到现在我能把它解释清楚吗？——它使引用，也就是引用或不引用某位作者这件事，在第二层次上具有十足的重要性。

我要让你们体会这一点……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要用一个十分熟悉的例子。假设在第二步，我们引用一个句子，标出出处和作者姓名，比如保罗·利科先生。再假设我们引用同一句话，却把它署在我的名字下面。

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句话绝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意义。[笑声]

我希望这能让你们体会我所谓引用究竟是什么。

那么，谜与引用这两个层面，恰恰由于都参与半说，便为解释的介入提供了媒介，以及——如果可以这样说——它必须遵循的伦理。

实际运用解释的人会注意到：解释总是一半是谜，一半是引用。

- 谜应尽可能从分析者的话语织体中采来。作为解释者，你绝不能自行把它补全；若不撒谎，你也不能把它当作“坦白”。
- 另一半是引用，也就是从同一文本中取出某个陈述。这个陈述本身也许像一份坦白，但只要把它接回整个语境，你便是在召唤它的作者。

因为在分析话语的这一建制中，在作为转移之动力的东西那里，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尽管有些人以为自己从我这里听到了这种说法——分析家本人被放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功能上。

如果言说被如此自由地交给分析者——而他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这份自由——那是因为人们承认他可以像主人一样说话，也就是像一只八哥一样说话；而这会产生同真正主人那里一样好的结果，因为人们假定它将通向一种知识。

那个预先同意成为分析者种种思量之“产物”的人，为这份知识充当抵押品和人质；此人正是精神分析家。作为这种产物，他注定在终点被丧失，从过程里清除出去——我的意思是，他必须能够承担这个位置。

在主人的话语层面，仅从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运作中就已经清楚：主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因为奴隶预先满足的正是这个欲望。另一个问题则是，分析家取代的究竟是什么，才会释放出对“被假定知道的主

体”的投注运动；这个主体仅仅由于被承认为如此，便预先在分析家所在的位置上为所谓转移准备了肥沃土壤。

当然，人们太容易在这里看见“因得到承认而满足”的影子掠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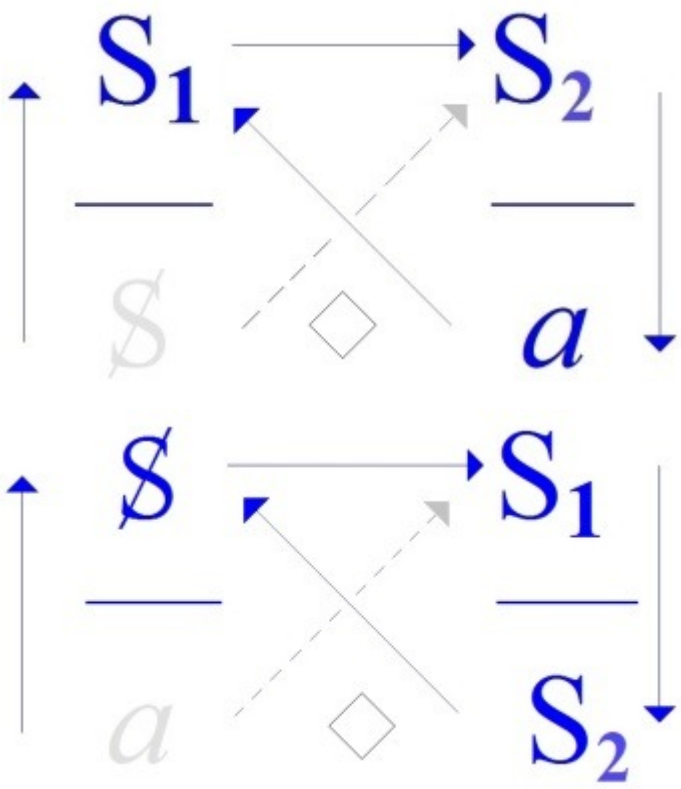
但关键不在这里。如果把这个主体假定为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甚至比癔症者更甚，因为对癔症者而言，这份知道是她行为的真理，却不是她存在本身——那么分析家便使自己成为分析者欲望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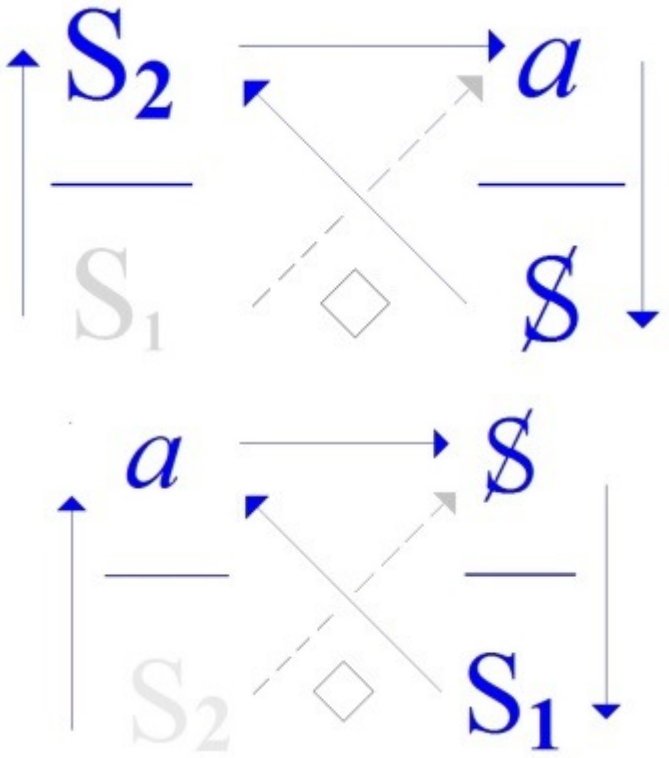
这份奇异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应把它看成一桩偶发事件，一次历史性的突现，仿佛它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并预示着后续？这条路也许会把我们带上一段漫长的绕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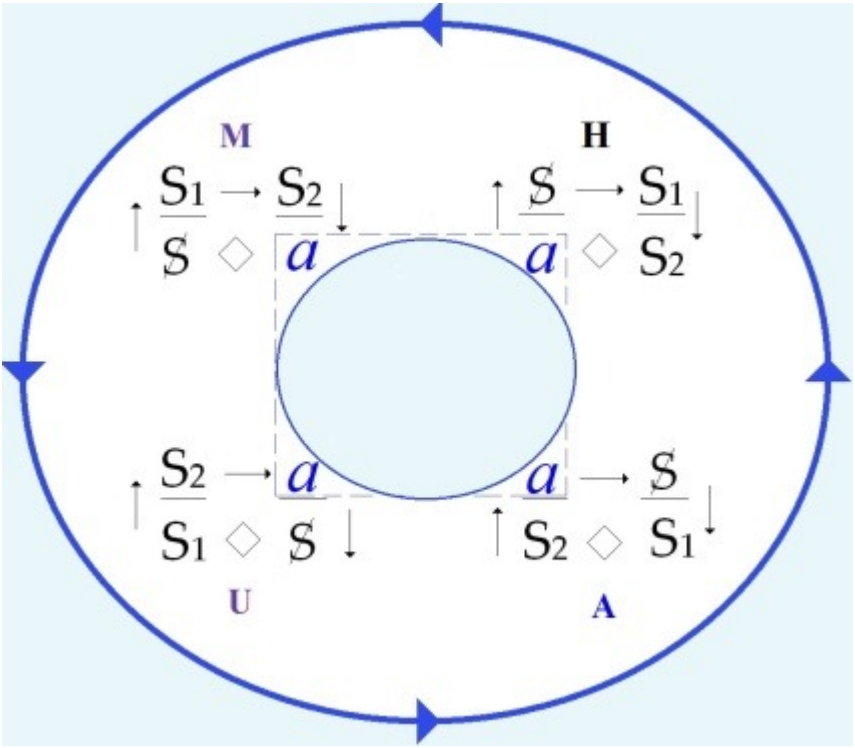
不过你们会注意到，这个功能早已出现；弗洛伊德偏爱援引那么多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尤其是恩培多克勒，并非没有缘故——你们知道这一点。

由于我知道两点钟这里还有别的活动，今后我都会像今天一样，在一点四十五分结束。我们约在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再见。

第3课 ・ 1970年1月14日




S2
a
S1
$
a
$
S2
S1



有人给我准备了红粉笔，很红的那种。

红色写在黑色上……[笑声]，看来不见得容易读清楚。

我画几副小眼镜，这样你们就能看见了。

无论如何，这些并不是新公式，而是我上次已经写在黑板上的公式；那时似乎没有引起同样多的抗议。

把它们呈现在这里是有用的。它们固然很简单，也很容易彼此推导——只须作一次循环置换，各项仍保持同一顺序——可事实证明，我们的心象能力还不足以弥补它们究竟有没有写在黑板上的差别。

那么，我们继续，继续我十七年来一直在这里做的事——“这里”也可能在别处，但总是在同一个时间：星期三十二点半。

正当人人都为进入一个新十年而欢欣时，值得再提起这件事；对我来说，这倒更是回头看看上一个十年给了我什么的机会。

十年前，我的两位学生以《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注1]为题，提出了一些出自拉康论题的内容。

这件事——天哪——是凭人们所谓的“君主之举”发生的。唯有君主能够作出自由行动；所谓自由行动，就是任意行动，而“任意”又是指不受任何必然性支配。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向哪个方向都没有任何必然性施加压力。那位君主——我的朋友昂利·艾——把“无意识”列入一次会议，也就是博讷瓦尔会议的议程，并把报告、至少其中一部分的撰写交给我的两位学生。

此后，这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凭据，而且说实话不无理由：它确实为某件事作证，即我的学生认为自己可以怎样接近一个团体，又怎样让这个团体听见某种东西。这个团体曾以某种禁令凸显自身，那禁令涉及我在这个饶有兴味的题目上可能提出的内容——所谈的不是别的，正是“无意识”；可以说，我的教学一开始便从这里起飞。

这个团体对我所陈述之物的回应和兴趣，通过某种东西表现出来。不久前，我在某篇小序里——记不起在哪里了——把它称作“未满五十岁者禁止入内”。

别忘了，当时是 1960 年。我们离真正质疑某种权威——尤其是知识的权威——还很远。我们如今更近了吗？这是个问题。

> [注1] 让·拉普朗什、塞尔日·勒克莱尔：《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载《现代》1961 年 7 月号，第 81—129 页；原为 1960 年博讷瓦尔会议报告，后收入 1966 年巴黎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的第六届博讷瓦尔研讨会论文集《无意识》。

相关知识卡 博讷瓦尔会议与《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所以，一旦宣布“未满五十岁者禁止入内”，这条禁令便带上了某些古怪特征。其中至少有一个特征，使它堪比某种知识垄断：这条禁令被原原本本地遵守了。

由此可见，那些愿意承担报告的人面对着怎样的工作：他们必须让相关的耳朵听见某种严格说来闻所未闻的东西。

至于“他们怎样做的”，如今由我来作一番梳理并不太迟。当时我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让那些完全没有准备的耳朵接触到这些内容，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对于我此前七年间所能衔接的东西，他们一丁点都没有接收。显然，那时不宜对正在从事这项开荒工作的人加入任何可能显得像挑错的东西。况且，其中确实有许多极好的要素。

如今要梳理这一点，还因为最近有一篇论文[注2]在法语区的边缘地带出现——我愿意说，是在人们英勇奋战以维护法语权利的地方；直说吧，就是鲁汶。有人在那里写了一篇论文，天哪，研究的是也许被不恰当地称作我的“作品”的东西。

那当然是一篇大学论文——别忘了这一点——所以必须提出一些采取大学形式的东西。首先显现出来的一点便是：我的作品不太适合这种形式。

> [注2] 阿妮卡・勒梅尔：《雅克・拉康作品研究》，答辩于鲁汶大学，1970 年以《雅克・拉康》为题由 Charles Dessart 出版；1977 年由布鲁塞尔 Pierre Mardaga 再版，1997 年出至第八版。拉康为该书作序。

相关知识卡 阿妮卡・勒梅尔《雅克・拉康》

正因如此，若要推进这样一篇大学论文，那么把已经带有大学性质、又曾协助承载所谓“作品”——仍然加引号——的东西定位出来，并非坏事。

博讷瓦尔报告的一位作者也因此被突出出来。以此为由，我当然不能不在序言中指出：必须分辨什么可能只是对我陈述之物的“翻译”，什么才是我严格说来真正说过的东西。

我为这篇即将在布鲁塞尔出版的论文写了一篇小序——显然，我的一篇序言能让它的翅膀轻快一些。天哪，在这篇序里，我不得不明确标出一个例子——这也就是它唯一的用处：

- 说“无意识是语言的条件”；
- 同说“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不是一回事。

我说的是：“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

那位“翻译”我的人受到这种风格、这种大学话语强加形式的塑造，所以只能作出另一种处理。个中理由若逐一细究，当然完全可以由严格

的大学动因来说明；这样讲下去会走得很远，今年也许会把我们带得相当远。我再说一次，正是严格的大学动因，使事情如此……

不论她是否以为自己在评注我，她都只能颠倒我的公式，也就是赋予它一种——必须这样说——同我所提出的恰好相反、甚至毫无同构关系的效力。

把我翻译成大学语言所特有的困难由此而来。凡以任何身份尝试此事的人都会感受到它；而我所说的这位作者，另一方面确实怀有极大的善意。

所以，这篇即将在布鲁塞尔出版的论文仍保有全部价值：它本身具有范例价值，也把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扭曲提升为范例——当具有自身法则的东西被翻译成大学话语时便会产生这种扭曲。至于那些法则，我必须说，我得亲自为它们开路；它们至少声称要给严格意义上的分析话语提供条件。

当然，这又受制于一个事实：正如我去年向你们强调的，我在这里从讲台上陈述，本身便包含误差的风险和折射的成分；从某个方面看，它因而落入大学话语的管辖。

这里有一种根本的悬空错位。我从某个位置说话，却绝不认同于这个位置。我向你们保证，我每次来这里发言时，所想的绝不是“我有什么要告诉他们的”，也不是“这一回我要对他们说什么”。

就此而言，我没有任何角色要扮演。教师的功能属于角色的秩序：那是一个必须占据的位置，而且无可否认，是某种威望位置。

我向你们要求的不是这个。更确切地说，我给自己强加了一项整理工作，并不得不把它交给这场考验。像任何人一样，若不是面对这片“耳海”——其中也许真有一双批判的耳朵——我无疑也会逃避这种整理。[笑声]

我必须面对它们，冒着那种可怕的可能性，就自己的行动路径作出交代；衡量这一切所依据的是：有某种“精神分析家”在场[注]。

> [注] 原文特意强调部分冠词 du（il y a du psychanalyste），不是在断言某一个精神分析家或某种已经确定的精神分析家类型“确实存在”，而是保留一种非定指的存在方式。下文随即把它落实为一种尚未得到合适规定的“精神分析家的位置”。

这正是我的处境。到目前为止，这个处境的地位从未以任何适合它的方式得到规定；它至多模仿许多已经确立的处境，同它们相似，结果在这里导向畏首畏尾的筛选实践：

- 认同于某一种人物形象；
- 采取某种行为方式，甚至成为某种人类类型，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迫使这种类型非如此不可；
- 遵守某种仪式，乃至采用另外一些措施。在更好的往昔，我曾把这些措施比作“驾驶学校”，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抗议。当时有一位同我很亲近的学生甚至提醒我：说实话，这恰恰就是任何投身分析职业的人所欲求的——像在驾驶学校一样，沿着预先安排好的路径，通过同类考试，拿到驾驶执照。

值得注意——我是说，值得记下来——的是，十年之后，我终究把精神分析家的位置衔接出来了。我以所谓他的“话语”来衔接它；姑且说，这是一种假设性的话语，因为今年提交给你们“检验”的，正是这种话语的结构究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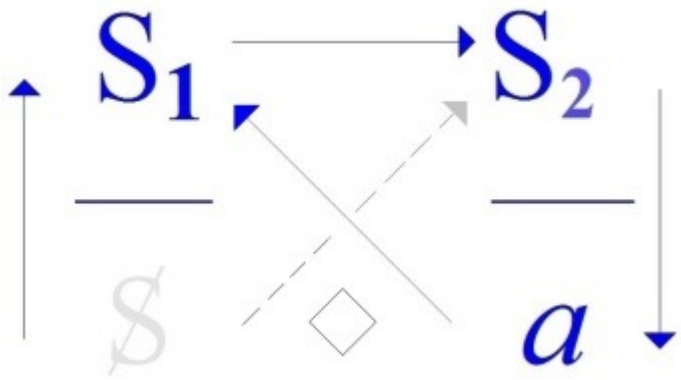
我把它衔接为：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在实质上由对象(a)构成。在我对话语结构的衔接中——这里涉及的是我们感兴趣的话语结构，是它在分析话语中抵达的根基层次——对象(a)恰恰指称话语效应中最晦暗、长期以来始终未被认识到，却又至关重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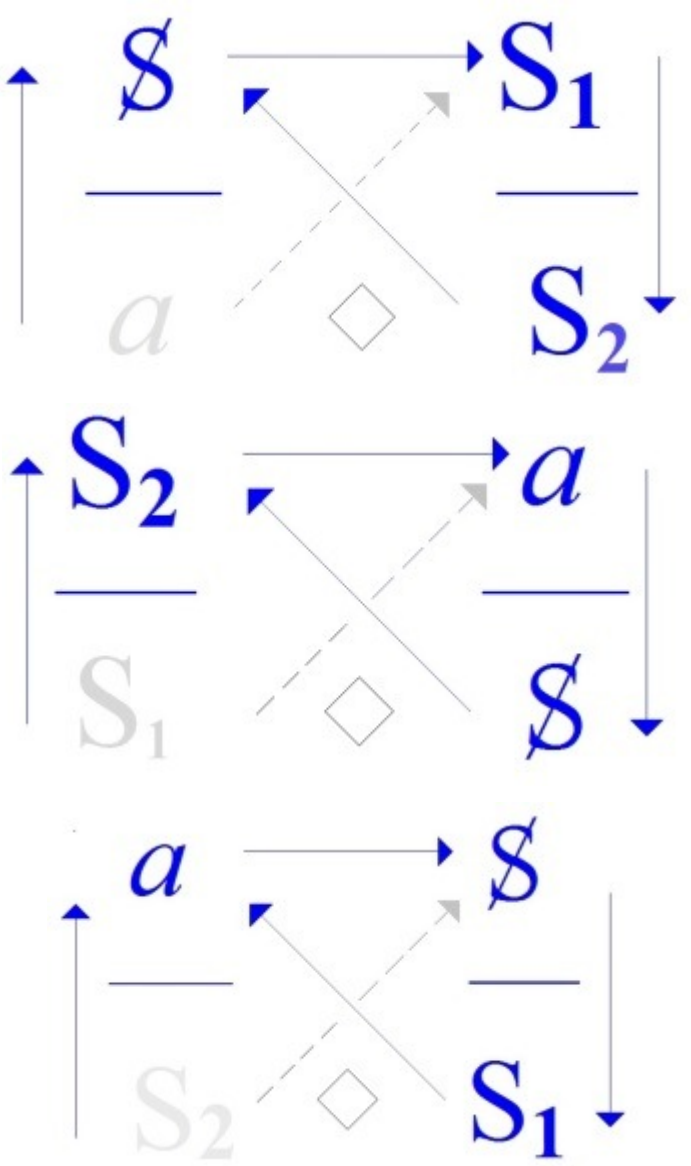
这里涉及的是作为弃置效应的话语效应；我马上会试着标出它的位置和功能。

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在实质上正是如此。

这个对象还以另一种方式被区分出来：它来到话语得以编排的位置，因为——如果可以这样说——主导项正从这里发出。

你们应当听得出，我使用“主导项”时有所保留。说“主导项”，确切地说，就是我最终用来区分每一种话语结构的东西：大学话语、主人的话语、癔症者的话语和分析家的话语，分别由这些根本项的不同位置来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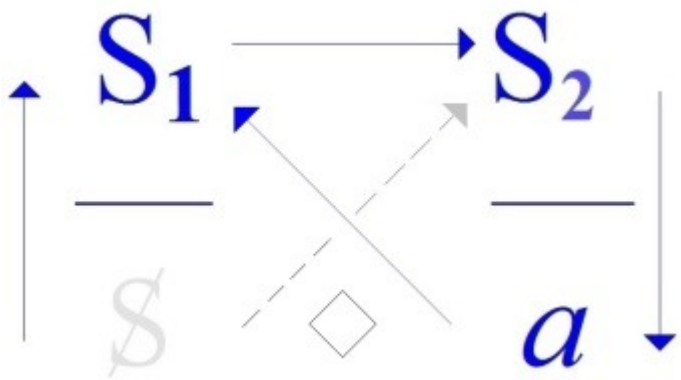




主人的话语、癔症者的话语、大学话语、分析家的话语。

我之所以称它为“主导项”，是因为眼下还无法给这个词添加别的含义；它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为这些话语命名。

“主导项”并不意味着支配性，仿佛这种支配性——这一点并不确定——会特别规定主人的话语。



举例说，主导项在不同话语中可以被赋予不同实质。在主人的话语中，S_1 占据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把它的主导项称作“法”，这个说法会有充分的启示价值，并足以开启若干有趣的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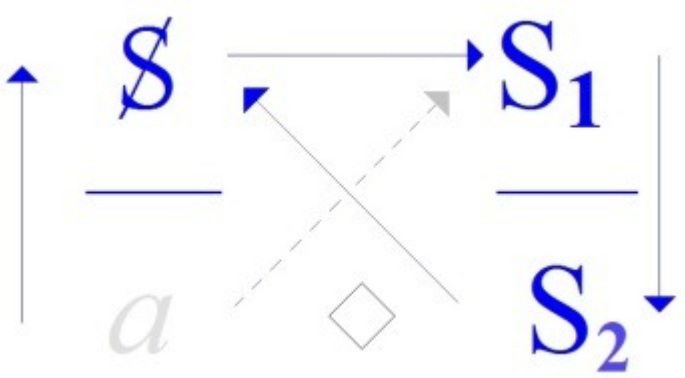
所谓“法”，让我们理解为被衔接出来的法：我们在它的墙内得到庇护，它构成法权；当然，不能认为它只是另一些地方以正义之名陈述的东西的同名物。

法借正义授权于自身，从而披上的外衣和产生的歧义，恰恰是我们的话语也许能让人更清楚地感受到真正动力之所在的一点：

- 我指的是那些让歧义成为可能的动力；
- 我指的是那些使法首先而且首要地铭写在结构之中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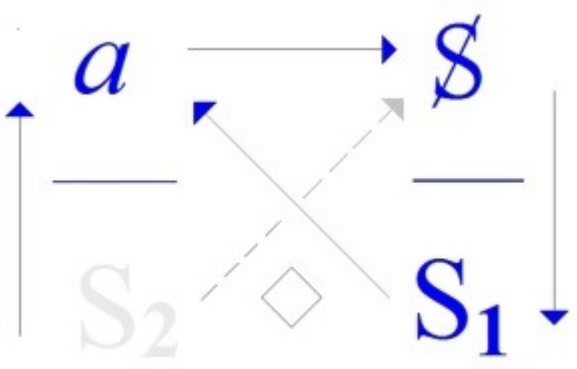
制定法律并没有三十六种办法。无论善意和正义的灵感是否鼓动法律，也许总有一些结构法则，使法永远还是“法”，处在我所谓主人的话语之主导位置。

在癔症者的话语层面，这个主导项显然以症状的形式出现；癔症者的话语正是围绕症状得到定位和编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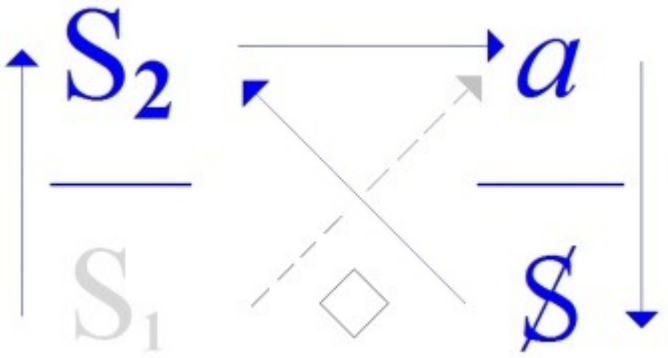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察觉：既然位置相同，也许正因此，在一种不能仅用“时代之光”来充分解释的光照下，这个主导位置——在这里是症状的位置，或某种因其效力而促使我们把它质询为症状的东西——到了另一种话语中仍是同一个位置。我们这个时代所看见的，确实正是法作为症状受到质疑。

我刚才说过，在分析家那里，同一个主导位置可以被占据，因为分析家本人必须以某种方式代表话语的弃置效应，也就是对象(a)。



这是否意味着，当涉及大学话语时，我们也能同样容易地刻画这个所谓主导位置，给它另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要让我们建立某种对应：法与症状之间的对应，乃至它们同弃置之间的对应——在精神分析行动中，分析家所注定的位置正是弃置。



恰恰相反，我们难以回答大学话语的本质、它的主导项是什么；这应当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探究。因为我在你们面前勾画的，正是我的思想在找到可靠支点以前，每逢我发问时所绕行、游荡、迷失的路径。

我们也许由此想到：在每一种话语中，至少找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完全可靠的位置——像症状在癔症者那里那样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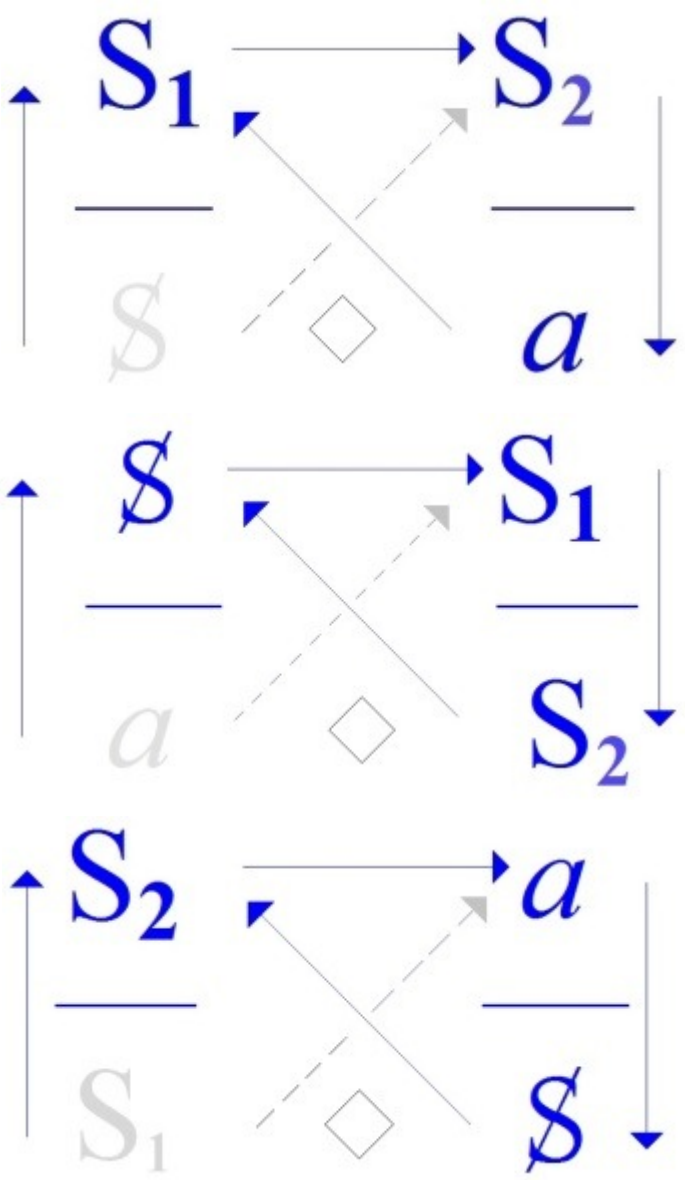
主人的话语中的 a 已经让你们看到，它可以同一个终项准确地辨认在一起：马克思那勤勉的思想终于提取出来的剩余价值功能，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实在的。这样我们已经有了两个项；或许只要稍微改动，把它们翻译得更顺手，便能移置到其他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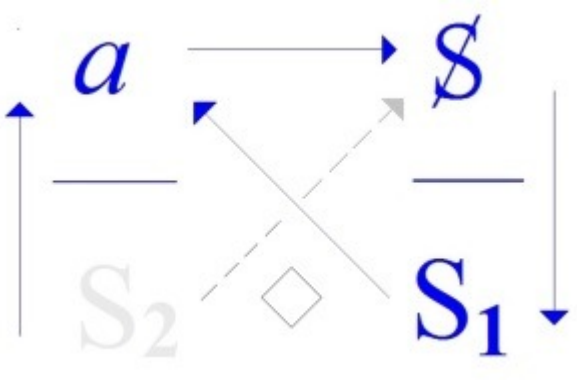
既然总共有四个位置要刻画，这里便形成了一个想法：也许四种置换中的每一种，都会从自身内部交付出最显著的那个位置；在一个无非名为“结构”的发现秩序中，这也许会构成一步。

无论你们怎样检验，这个想法都会让你们亲手触到一件乍看并不明显的事。

先不管我刚才提示的那个可能与我们有关的目的。试着在四个——姑且叫作“图形”——中各选一个位置，并强迫自己遵守这条规则：所选位置——上、下、右或左——在四个图形中各不相同。这样做，你们无法让……

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你们都无法让这四个位置分别由不同字母占据。


S1
S2
$
a
$
S1
a
S2
S2
a
S1
$



反过来试试，把游戏条件设定为：在四个公式中各选一个不同字母。你们同样无法让这四个字母分别占据不同位置。

动手试一试。只须拿一小张纸，或者使用一个称作矩阵的小网格，就很容易看出：组合数量如此之少，一个示例图便足以立刻把事情说明得完全清楚。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被设定为完全根本的能指联结，那么单凭这个事实，也恰好可以说明什么是结构。

只要以某种方式建立话语的形式化，并在这种形式化内部给自己规定几条旨在检验它的规则，就会遇到一个不可能性要素 *lozenge*。

这才是根基和根源，才是“结构事实”，也是分析经验在结构中所关心的东西。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一种——至少按其自称——很高的加工层次。事情从一开始便是如此。我们之所以必须同能指的操弄及其可能的衔接搏斗，正因为它包含在精神分析的既定材料中。

我的意思是，即便弗洛伊德的心智对这类加工如此缺乏——我会说——入门准备……

考虑到我们所知的弗洛伊德训练，那是一种“准物理科学”式训练：以物理学的最初进展、尤其热力学武装起来的生理学。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仍沿着经验的矿脉和线索前进，并在一个陈述上虽属第二阶段、重要性却更高的时期提出一个公式——毕竟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无意识的衔接阶段，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非逼着他这样做不可。

到了第二阶段，弗洛伊德已经确认无意识让我们能够定位欲望。这就是他的第一步的全部含义；它在《释梦》中不只是隐含着，而是得到严格衔接和展开。正是在《超越快乐原则》开启的这个第二阶段，弗洛伊德提出：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叫作——叫作什么？——重复的功能。

重复是什么？读一读他的文本，看看他怎样衔接。

使重复成为必需的，是享乐；这个术语被明确点出。

只因求取享乐采取了重复的形式，弗洛伊德才跨出了这里所涉及的那一步。

我们所关心的作为重复的东西，被铭写在享乐的辩证关系中；它严格说来逆着生命而行。

正是在重复的层面，弗洛伊德仿佛受到了强迫——而且正是受话语结构本身强迫——不得不衔接出那种夸张、那种近乎神话般的外推……

对于任何把无意识同本能逐字等同的人而言，这个外推至今仍令人震惊。弗洛伊德由此衔接出“死本能”：重复不只是生命所包含的循环

——需求和满足的循环——的功能；它还是循环之外的另一种东西，最终带走生命本身，使之回归无机状态。这个回归点当然不是一个视域点、理想点或图式之外的点；然而，严格的结构分析从享乐那里完美地指明了它的意义。

若从快乐原则出发，我们便知道：

- 快乐原则只是最低张力原则，是为了让生命维持下去而保持最低限度张力的原则。这证明享乐本身会越过它；快乐原则所维持的，正是享乐的界限。
- 事实、经验和临床的一切都表明，重复奠基于享乐的返回。弗洛伊德本人明确说出：恰恰在重复本身中会产生某种“缺陷”或“失败”。

我曾在这里指出，它同克尔凯郭尔的陈述有亲缘关系[注3]：凡是重复之物，正因为被明确地作为重复之物、被重复标记，就不可能不是相对于它所重复之物有某种“损耗”——随便是什么损耗，哪怕是速度的损失！

这里存在某种丧失。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从我此处概括的衔接开始，便坚持说：重复本身包含享乐的耗损。丧失的对象这一功能由此在弗洛伊德话语中产生。这是弗洛伊德的部分。

还应补充：弗洛伊德整篇文本明确围绕受虐癖展开，后者只是在寻求这种毁灭性的享乐这一维度中被构想出来；这一点无须再提醒。

现在来到拉康在这里带来的东西。

关于重复与享乐的这种辨认，我借用了“一元特征”的功能，并赋予它弗洛伊德文本没有标出的一种意义：

- 它是最简单的标记形式；
- 严格说来，它是能指的起源。

我提出了一项在弗洛伊德文本中既没有写出、也没有被看见的东西，而精神分析家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将其排除、回避或拒斥：我们分析家作为知识所关心的一切，都起源于一元特征。

因为精神分析从一个转折点出发：可以说，知识在这里洗去了所有可能造成歧义的东西……

> [注3] 参见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亦译《复演》）：《全集》第 5 卷，Tisseau 译，巴黎 Orante，1972 年，第 3—96 页；Robert Laffont“Bouquins”丛书 1993 年修订译本，第 691—767 页；Flammarion“GF”丛书第 512 号，Nelly Viallaneix 新译，1990 年。

相关知识卡 克尔凯郭尔《重复》

- 它不再被当作某种自然知识；
- 也不再被当作某种不知为何能在周遭世界中引导我们的东西，仿佛我们体内有某些味蕾，生来便知道怎样在那里辨明方向。

这当然不是说根本不存在类似的东西。

一位博学的心理学家在不算太久以前——四五十年前——写了一本题为《感觉：生命的向导》的书[注4]，当然没有说什么荒谬的话。然而，他之所以能这样陈述，恰恰是因为科学的整个发展使我们看见：“感觉”同它借以把握的那个所谓“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与生俱来的契合。

如果严格的科学加工，对视觉乃至听觉的质询，向我们证明了什么，那无非是某种我们必须照其本来样子接受的东西，连同它呈现时那个恰如其分的事实性系数：

- 光波中有我们完全感觉不到的紫外线——为什么感觉不到？——另一端的红外线也一样；
- 耳朵也是如此：有些声音到了某处便不再听见，而且看不出为何界限停在这里而非更远；
- 说实话，在这番照明下，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被准确把握，只能看见有若干过滤器，而我们只能靠这些过滤器设法应付。若相信功能创造器官，那么我们能尽力使用的也正是器官！

传统哲学为了说明思想机制而试图建立和推理的东西，同这里毫无共同之处。它沿着你们知道的路径，努力说明抽象和概括层面发生的事；它把一种被看作基础的“感觉”经过还原、过滤，才建立起整个说明：“Nihil fueri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等等；你们知道下半句：“……in sensu。”[注5]

我们所涉及的，会是这种主体吗？

> [注4] 亨利·皮埃隆：《感觉：生命的向导》，伽利玛出版社，1945 年。

> [注5] 完整拉丁文为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先存在于感觉之中。”此说常归于亚里士多德，经托马斯·阿奎那辩护，后来又为洛克采用。

相关知识卡 Nihil est in intellectu：感觉经验格言的来源 · 亨利·皮埃隆《感觉：生命的向导》

也就是那种以认识主体的名义推导出来的主体，那种从若干基础——其实是装置的基础，是我们很难设想能够弃而不用的生命器官——出发、以一种如今看来如此人为的方式构造出来的主体？

当我们讨论这种能指衔接时，涉及的会是它吗？我们在这里尝试拼读的最初几项，已经能够让最基本的项运作起来：正如我说过的，一个能指联结另一个能指。它们已经产生效应；这个效应首先就在于，能指只有按如下定义才能被操弄、才能有意义：它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主体，而不是别的东西。

我们无法逃避这个极度简约的公式：有某种东西在下方——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sub-jectum）——但我们恰恰不能用任何"某种东西"来指称它。它不可能是一个 etwas，某物；它只是一个"在下方"，如果你们愿意，就是一个主体，一个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甚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如此专注于认识观念的原初要求——它们全然不是构造出来的——可仅仅接近逻辑、仅仅把逻辑引入知识的回路，就迫使他严格区分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与任何 οὐσία（ousia）本身，也就是同任何本质区分开来。

所以，能指的衔接，就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我们从这里出发，赋予那场开端性的重复以意义，因为它是一种瞄准享乐的重复。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知识若在某一层面上受纯形式的必然性、书写的必然性支配和衔接……

它在今天导向某种逻辑；这种逻辑本身首先就是对书写的操弄。如果我们能用现代逻辑的经验来支撑这种知识，那么在分析临床中衡量重复的影响时，所涉及的正是这种知识。

换言之，我们看起来最纯化的知识——很清楚，我们不可能靠净化经验主义来提取它——正是从起点就被引入的知识。它显露出自己的根：在重复中，首先以一元特征的形式，这种知识成了享乐的手段；这种享乐恰恰越过了“快乐”一词为生命的通常张力所规定的界限。

为了继续沿着拉康走，字母 a 的代数式形式化在这里显出某种东西。刚才我们说有享乐的丧失；在这个丧失的位置，在重复所引入的东西的位置，我们看见丧失的对象这一功能，也就是我所谓的 a 涌现。

那么，这迫使我们接受什么公式？只能是：知识在最基本的层面劳作……

相关知识卡 Einziger Zug 与一元特征

——在一元特征强加自身的层面劳作。于是，劳作着的知识产出——这不会太令我们惊讶——一种熵。

顺便一提，“熵”可以写成 e-n-t-r-o。[笑声] 你们也可以写成 ɑ-n-t-h-r-o，那会构成一个漂亮的双关。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不管工程师们天真的心怎样以为，能量学根本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把能指网络铺到世界之上。[笑声]

我向你们挑战：无论如何试着证明……

无论如何，动手做一做，你们就会得到相反的证明：先背着八十公斤重物下行五百米，再把它沿接下来的五百米背回去，这两段合在一起竟然等于零，什么功也没有做。[笑声] 试试看！

可是，一旦把能指铺到上面，也就是进入能量学的路径，便绝对可以确定：没有做功。

好吧，那么我们看到某种东西出现，就不必惊讶了……

当能指作为享乐装置被引入时，我们会看到某种与熵有关的东西出现；因为“熵”正是在能指装置开始被铺到物理世界上时才得到定义。

别以为我在开玩笑！

你们无论在哪里建一座工厂，当然都能采集能量，甚至把它储存起来。工厂和其中投入运转、让一类涡轮机工作、最终把能量装罐的装置之所以能够制造出来，正因为它们遵循我正在谈的同一种逻辑，也就是能指的功能。

在今天，机器同工具毫无关系；从铁锹到涡轮机之间不存在任何谱系。证据是：你们完全可以正当地把画在这张纸上的一个小图形称作机器。

只差极小的一点：只须让墨水导电，它就会成为一台极其有效的机器。它为什么不能导电呢？标记本身不是已经在传导欢愉了吗？

如果分析经验关于幻想世界教会了我们某种东西——说实话，与其说分析已经接近了它，不如说人们似乎碰到了它，却完全不知道怎样脱身，只能诉诸“怪异”和“异常”——这正是“受虐主义”“施虐主义”之类专名标签的来路。

我们一旦贴上这些“主义”，就还处在动物学层面。

然而有一种完全根本的联结：在幻想本身的基础和根部——参见弗洛伊德的《一个孩子正挨打》——存在着我姑且称为“标记的荣耀”的东西，也就是皮肤上的标记；幻想从中产生的，无非是一个把自己认同为“享乐对象”的主体。

我所唤起的性实践——直说吧，就是鞭打，以防这里有人耳朵特别背——所用的“享乐”一词带有一种歧义。正是在这个层次、而且只在这个层次，留下标记的动作与身体之间的等价性才被触及。

是谁的“享乐对象”？是那个承载着我所谓“标记之荣耀”的女人的对象吗？这一定意味着“大他者的享乐”吗？当然，这是大他者进入她的世界的一条路径，而且确实无可反驳。

不过，标记同身体自身的享乐之间的亲缘，恰恰指明：自恋同对象关系得以区分，只是通过享乐，而绝非通过其他路径。

事情并不含糊。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有力地标明：归根结底，自我装置之镜像的真正承底和一致性在于，它从内部得到支撑；它只不过包裹着那个丧失的对象。享乐正是通过这个对象被引入主体存在的维度。

因为很清楚，如果享乐遭到禁止，那么它起初只凭一次偶然、一种可能性、一桩事故才入场。正常运转的生命体只会在快乐中呼呼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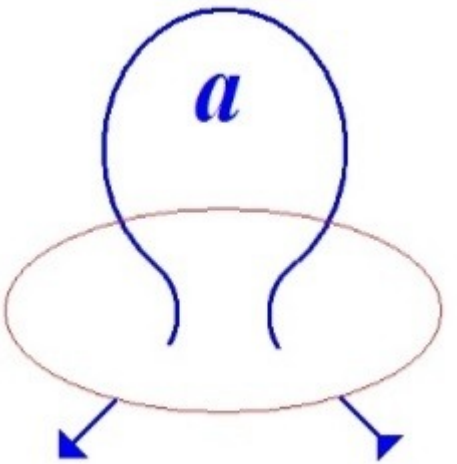
如果享乐引人注目，如果它得到一元特征和重复的裁定，从而被确立为标记，这只能起源于朝享乐方向的一点极微小偏差。即便在刚才所说的鞭打实践中，这类偏差也从不极端。

这里涉及的不是越轨，不是闯入一个被生命调节装置的磨合所禁止的领域。事实上，享乐只在熵的效应、在耗损中取得地位、得到标示。所以我一开始用 Mehrlust，也就是“剩余享乐”这个词来引入它。

恰恰因为从丧失的维度察觉到它，某种东西才必须——可以说——前来补偿。最初，那是落在某种不可名状之物上的负数；它撞击钟壁，在那里回响，造成享乐，也造成有待重复的享乐。

只有熵的维度才让这件事取得身体：存在一种有待收回的剩余享乐。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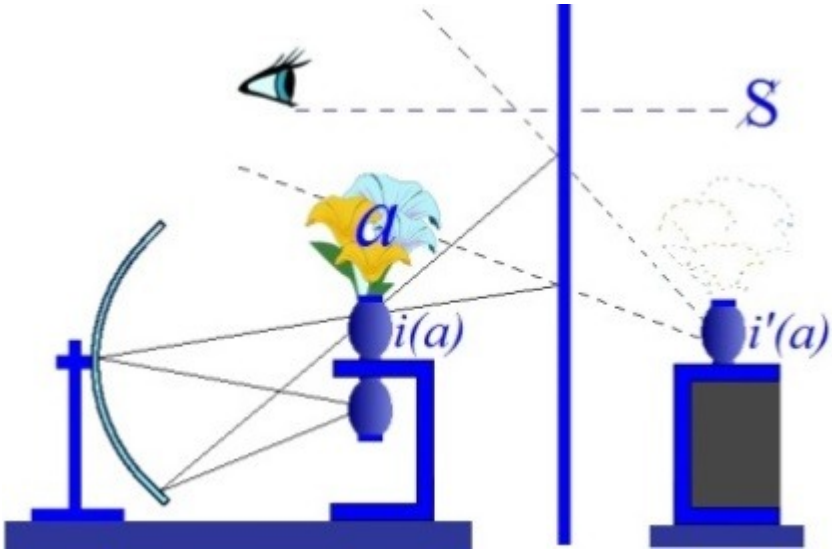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个维度中，劳作、劳作着的知识成为必需。这种知识无论是否知道自身，首先都归属于一元特征，随后又归属于所有能够被衔接为能指的东西。

由此出发，享乐的维度在说话的存在那里如此含混：他既可以把它理论化，也可以把生活在冷漠中奉为宗教——因为冷漠就是享乐主义

——但人人都知道，群体本身，正如弗洛伊德同一时期的一篇文章以 Massenpsychologie 为题所说，在群体中鼓动它、使它劳作并赋予它另一种知识秩序的，不是那些把 Innenwelt（内界）与 Umwelt（周围世界）调和起来的知识，而是剩余享乐本身的功能。

那就是空处和裂口。最初，一批仿佛预先适配、专为充当对象(a)之“塞子”的对象前来填补它。



整个经典分析实践无疑就在这里止步：它突出“口腔的”“肛门的”“窥视的”乃至“声音的”等不同名称，用它们把 a 指称为“对象”。

但 a 严格说来是这样一种东西：某种知识从一开始、从起源上就呈现出来，并归结为能指的衔接；a 正是由此产生。

这份知识是享乐的手段。我再说一次：当它劳作时，产出的就是熵；而这个熵、这个丧失点，是我们得以接近享乐的唯一恒定入口。

能指介入说话存在的命运，由此得到翻译、闭合和理由。

这同他的实际言说关系不大，而同结构有关。结构得以装配，是因为所谓“人类”——也许之所以如此称呼，只因他不过是语言的腐殖土[笑声]——只须把自己的言说接到这个装置上。

只用我这四个小符号，我刚才便让你们亲手触到：我们只须为一元特征添一个同伴，让 S_2 跟在 S_1 后面，就能从这个同样正当的能指那里定位出：一方面是它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它嵌入大他者的享乐、成为享乐手段的方式。

劳作从这里开始。知识作为享乐手段，产出一项具有某种意义的劳作；那是一种晦暗的意义，也就是真理。

如果我过去没有从不同角度处理这些项、给它们以照明，我当然不敢这样引入它们。但相当可观的工作已经完成：当我说知识在主人的话语中的原初位置位于奴隶一侧时，除了黑格尔，还有谁曾向我们表明，奴隶的劳作最终交付给我们的，正是主人的真理——而且无疑是驳倒主人的真理？

说实话，我们如今也许能够提出其他话语形式或图式，看见黑格尔构造中的裂口在哪里张开，又在哪里被强行封闭。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整个进路划定了某种东西——而且分析经验无疑更新了这条进路——那便是：每次唤起真理，都只能同时指出我们只可通过半说接近它。真理不能全部说出，因为越过它的一半，便再没有什么可说。

凡是能够说出的都在这里；所以，话语到此消止。

我们不谈“不可说之物”，不管这似乎给某些人带来多大快乐。

尽管如此，半说这个结点仍然存在。上一次我用例子说明，必须怎样突出它作为解释所特有的东西；我把它衔接为“没有陈述的言说行为”，或者“摆出陈述，却保留言说行为”。

我指出过，这些是解释特有的枢轴点、平衡点和重心。我们的推进必须据此从根本上更新真理的地位。

对真理的爱，源于真理的存在之缺；这个存在之缺也可以换一个名字：遗忘之缺。

在无意识形成物中向我们重现的，不属于存在的秩序，更不属于任何充实存在的秩序。

弗洛伊德在《释梦》最后几行谈到的那个“不可摧毁的欲望”是什么？当一切都在变化时，那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或使之屈服的欲望是什么？

遗忘之缺与存在之缺是一回事，因为存在无非就是遗忘。

对真理的爱，就是对这份脆弱的爱。我们已经懂得揭开这份脆弱的面纱；真理所遮蔽的，正是它，而它名叫阉割。

我本不该再作这些未免太书本气的提醒。[笑声]

可是在分析家那里，尤其是在分析家那里，人们以少数几个禁忌词为名，把自己的话语涂抹得一团糟；也恰恰因此，从来没有人看出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无能，而关于真理的一切都建立在这个无能之上。

爱脆弱之物，无疑正是爱的本质。正如我说过的，爱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也就是给予那个也许能修补原初脆弱的东西。

这样，爱的这个角色也同时变得可以理解，并露出一线……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固着与不可摧毁性

我不知道该把它更多地称为“神秘的”，还是“迷惑人的”；无论如何，在某种脉络中，人们一向把这个角色交给爱本身。

因为所谓“普遍之爱”——人们挥舞这块破布来安抚我们——恰恰被我们用来给真理蒙上面纱，甚至加以阻塞。

至于精神分析家被要求做什么，我上一次已经在话语中指出：当然不是归属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东西。人们惯常把我的话稍稍听偏，才以为我曾把转移奠基于此。

我经常强调：我们被假定知道的东西并不多。

分析家竖立起来的、分析所设立和确立的，恰恰相反。分析家对将要开始的人说：“来吧，随便说什么，这会很美妙。”[笑声]

正是将要说话的人被确立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说到底，这并不算太虚伪，因为在这个场合，他不能信赖别人。[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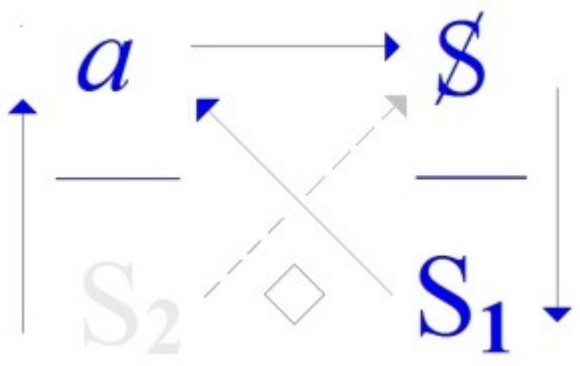
转移奠基于这一点：有一个家伙对我——我这个可怜的蠢货——说，要我表现得仿佛自己知道这里涉及的是什么。他可以随便说，这总会产出某种东西。

这足以引起转移。[笑声] 这种事可不是每天都有。

界定分析家的，是我一直以来所说的东西——只是从来没有人明白过，[笑声] 而且这也很自然，不是我的错。我一直说："分析，就是人们期待精神分析家去做的事。"

至于"人们期待精神分析家去做的事"，显然还应当设法弄清它的意思。它如此摆在眼前，唾手可得。我终究有这样的感觉……这是劳作……剩余享乐，是你们的事。"人们期待精神分析家去做的事"，正如我上次说过的，是让他的知识以真理的方式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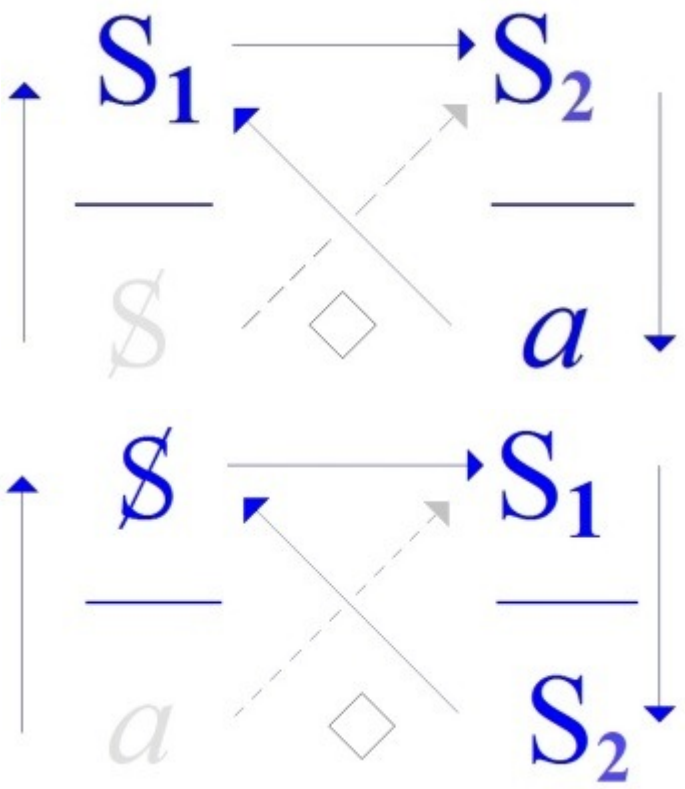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分析家才把自己限制在半说之中——我上次这样说过，之后还要回到这里，因为它会产生后果。我经常评注的公式"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正是向他，而且只向他发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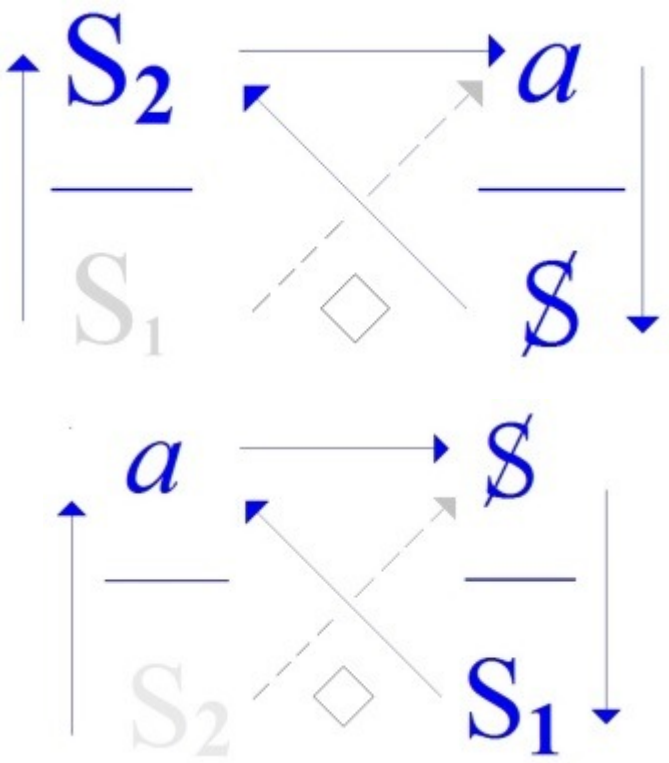


分析家若能占据左上方那个决定其话语的位置，恰恰因为他在那里绝不是为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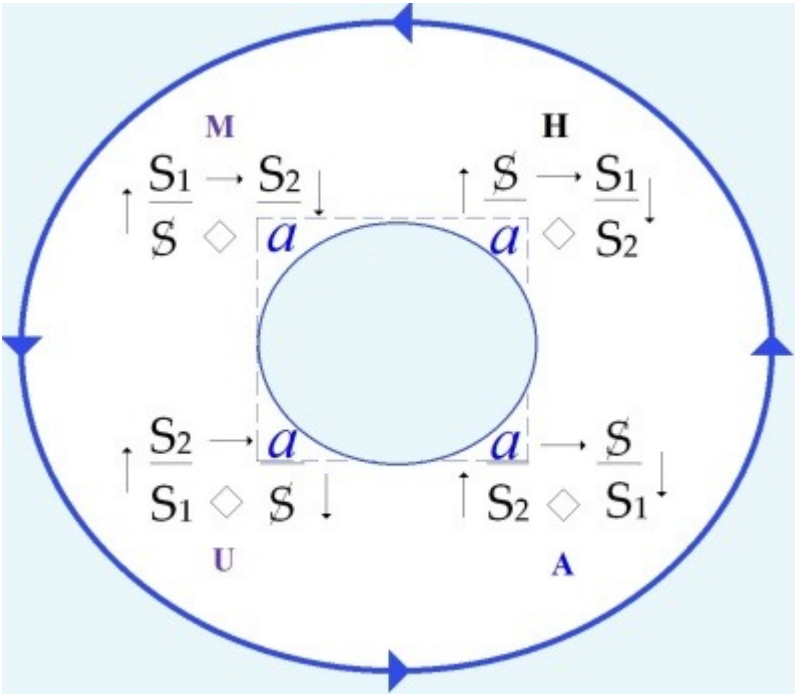
"在它曾经所在之处——剩余享乐、大他者的享乐——我，作为说出精神分析行动的我，必须来到那里。"

第4课 ・ 1970年1月21日





主人的话语、癔症者的话语、大学话语、分析家的话语。



在我们今年试图衔接的结构层面，分析家的话语为另外三种话语的旋转闭了环。我为那些偶尔才来这里的人再说一遍，它们分别叫作：

- 主人的话语；
- 癔症者的话语——今天我把它放在中间；
- 最后是此处同我们高度相关的大学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闭合了我刚才所谓的四分之一圆周错移——另外三种话语便由此得到结构——但这不意味着它解决了它们，也不意味着它能让人转到“反面”。它什么也不解决：反面解释不了任何正面。

这里涉及的是经纬、文本的关系；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织物的关系。

不过，这块织物仍有起伏，仍会兜住某种东西。当然不是“全部”，因为这个词……

它只在语言中存在，而语言恰恰显出其界限：即便在话语世界里，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全部”。或者照我的说法，更准确一点：“全部”本身会驳倒自身；它甚至依靠自身的用法必须受到削减才成立。

这样，我们便进入今天一项完全根本的探究；它最终要证明什么是“反面”。

法语 envers（反面）同 vérité（真理）、en vérité（实话说）押近音；从这个起点出发，确有某种东西值得强调。

“真理”一词离开这里以后并不好操弄。在逻辑、命题逻辑中，人们把它做成一个值，归结为对一个符号的书写和操作；通常用其首字母大写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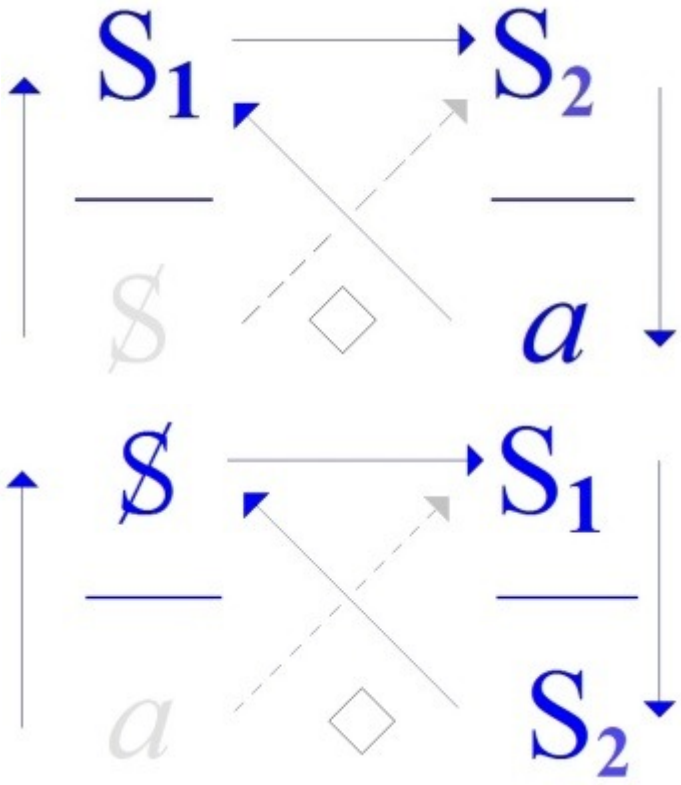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用法尤其无望；而它的健康作用也正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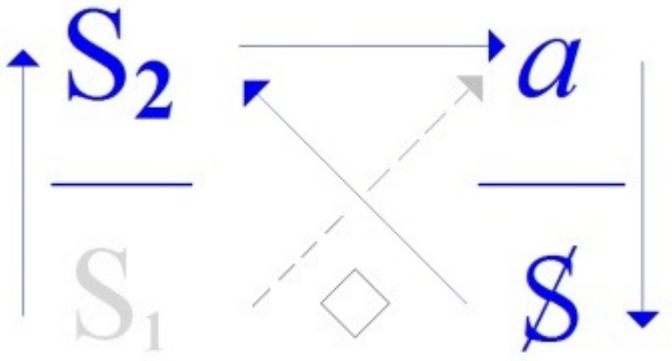
在其他所有地方，特别是在分析家那里——我得说，而且有充分理由，尤其在女性分析家那里——“真理”会引起一种奇怪的颤动。这种颤动近来推动她们把分析的真理同革命混为一谈。

我已经说过“革命”一词的歧义：在天体力学中，它同样可以指“回到起点”。正如我开头所说，分析家的话语相对于另外三种秩序——癔症者、大学、主人——所定位的三种结构，在某些方面确能完成这种返回。

正因如此，问题落在女人一边。这并非偶然：她们不像自己的伴侣那样被封闭在话语循环中。我们所认识的男人——雄性、阳刚者——是话语的造物；至少从可分析的东西来看，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定义他。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谈女人；但任何对话都只能在话语层面得到定位。

所以，被分析之革命美德所鼓舞的女人，在颤动以前不妨先对自己说：比起“男人”，她从我们所谓的某种话语教养中受益更多。





并不是说她没有这份天赋；恰恰相反，一旦受到它鼓舞，她便在这个循环中成为卓越的向导。

这正是癔症者的定义。也因此，今天我打破了平常的板书顺序，把她放在中央。

然而很清楚，“真理”一词在她那里引起这种特殊颤动，也绝非偶然。

只是，即便在我们的语境中，真理也并不容易接近。

它像某些鸟——我小时候听人讲过的那些鸟——只有在尾巴上撒盐才能抓住。当然，这并不容易。

我的第一本识字课本，开篇故事的题目是——这是真的，讲的正是这个——《半只鸡的故事》。

如果条件是必须在尾巴上撒盐，这只鸟也不比别的鸟容易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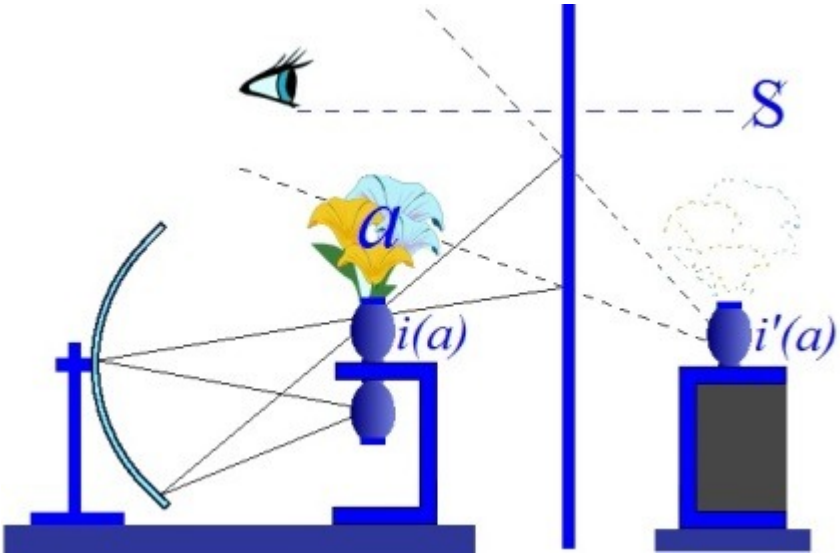
说到底，自从我开始衔接精神分析以来，所教的内容大可以题为《半个主体的故事》。

《半只鸡的故事》同半个主体的故事之间，真正的关系在哪里？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 正如大学论文会说的，那篇最初读物决定了我的思想发展；
- 另一边则是结构：对写下这篇故事的作者而言，半只鸡也许代表了某种东西，反映出对某事的预感。不是《巴黎的乡下人》所谓的“希分析”，而是对主体地位的预感。[注1]

可以确定的是，故事里还有一幅插图。图上那半只鸡以完好的一侧示人。我们看不到另一边，也就是切面；它大概正在那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右侧：没有心，却并非没有肝（foie），也并非没有信（foi）。[笑声]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真理隐藏着，但它也许只是一种缺席。

若果真如此，一切都方便了：只须好好知道一切有待知道的东西。

归根结底，为什么不可以？说出某件事时，无须再补一句“这是真的”。整个判断问题都围绕这里旋转。

你们知道，弗雷格用一条水平线写断定，又把它同确认其为真区分开来：在水平线左端加一条竖线，它才成为断言符号⊢。

> [注1] 路易・阿拉贡：《巴黎的乡下人》，伽利玛出版社“白色丛书”，1926 年。

相关知识卡 阿拉贡《巴黎的乡下人》

可是，什么是真的？天哪，就是已经说出的东西。说出来的就是句子。

句子无法由能指之外的东西承载；而能指并不涉及对象——除非像我稍后要谈到的那位走到极端的逻辑学家一样，设定对象只可能是伪对象。

对我们而言，能指并不涉及对象，而涉及意义。

句子的主体只有意义。

我们从这里出发进入一场辩证运动，称作 pas de sens。Pas 一词的全部歧义都在其中：既是“没有意义”，又是“意义的一步”。它始于胡塞尔造出的无意义句子：“绿色是一个为了。”

不过，如果是在用绿球和红球表决，这句话完全可以有意义。

这条路把我们带向存在的问题，因为存在依附于意义。沿着这条路，人们跨过了“无意义 / 意义的一步”，认为最具有存在的东西不可能不存在。

可以说，意义担负着存在；它甚至没有别的意义。

可人们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发现，这不足以压住存在的分量。

奇怪的是，无意义倒压得住：它顶在胃里。弗洛伊德跨出的那一步尤其表明，机锋、那种“无头无尾”的话正是典范。

这并没有让你们更容易把盐撒到它的尾巴上。真理飞走了；恰恰在你们不再想抓住它时，真理飞走了。况且，它既然没有尾巴，你们又怎么撒盐？

惊愕与照亮——参见弗洛伊德的 Verblüffung 与 Erleuchtung。

你们还记得，那则相当平淡的金牛犊对话[注2]，足以唤醒这头站着睡觉的小牛。到那时我们才看出，它可以说是“硬金”（d'or dur）。

从艾吕雅的《持续之艰难欲望》（Le dur désir de durer），再到弗洛伊德在梦的机制中提出的睡觉欲望——这无疑是最大的谜之一，却似乎没人注意。别忘了，他说的是 Wunsch zu schlafen，不是 Schlafenbedürfnis，不是“睡眠需要”；决定梦之运作的是 Wunsch zu schlafen。

奇怪的是，他随后又指出：一个把人叫醒的梦，恰恰在梦可能放出真理的那个时刻把人叫醒。

> [注2] 参见 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1957 年 11 月 20 日。

因此，人醒来只是为了继续做梦：在实在中做梦；更准确地说，在现实中做梦。

这一切都以某种无意义撞击着人。真理像本性一样疾驰返回；它跑得如此快，刚穿过我们的场域，便已经从另一边出去了。

我刚才说到的“缺席”，在法语中造成了一种古怪的混染。取 sans（没有），拼作 s-a-n-s；据说它来自拉丁语 sine，但这很不可能，因为它最初的形式大约是 s-e-n-z。我们发现，法律文本中用夺格的 absentia，才是 sans 末尾这个 *s* 的来源。

“无头无尾”（sans queue ni tête）——今天的陈述从开头便已产出了这个小词。

可接下来又是什么？Sans, sans，然后还是 sans——嘿，强有力！

这里所涉及的，不正是一种力量吗？它完全不同于想象潜能意义上的“潜在”；后者只是由于骗人才成为力量。这里的力量涉及意义中的存在，而意义不能被理解为充实的意义；它更是从存在那里逃脱的东西，正如那个被恰当地称为“机锋”的词中所发生的那样。我们同样知道，这总发生在行动中。

任何行动，重要的都是从它那里逃脱的东西。

分析引入“失误行动”，也同样跨出了这一步。说到底，它是我们唯一确知总会成功的行动。

这里展开着整场曲言游戏；我曾试图用“并非没有”（pas sans）来显出它的分量和重音。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
- 我们并非同真理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一定要在 intus，也就是内部找到真理吗？为什么不是在旁边？Heimlich – unheimlich?

每个读过弗洛伊德的人都记得这个词的歧义藏着什么：它不在内部，却仍唤起内部，因而给一切陌异之物加上重音。

各语言在这里本身就有奇异的变化。你们可曾注意到，英语 homeliness 的意思是“朴实无华”？它却同 Heimlichkeit 是同一个词。

它们的重音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德语 sinnlos 在英语里译作 meaningless；而翻译 Unsinn 的则是另一个词 nonsense。

人人都知道，英语词根的歧义会造成一些奇特的回避。

反过来，英语却奇怪而近乎独一无二地用 without 表示 sans：“带着……而它在外面”。

真理看起来确实对我们是陌异的——我是指我们自己的真理。

真理无疑同我们在一起，却不像人们愿意说的那样同我们密切相关。

我们能说的只有——我刚才正是这样说的——我们并非没有真理。这个曲言的意思归根结底是：真理虽在手边，我们完全可以不要它。

这样，我们从 sans（没有）来到 pas-sans（并非没有），又从这里来到 s'en passer（没有它也行）。

我要在这里作一个小小的跳跃，转向一位最有力地衔接出如下结果的作者：一项事业设定，只有写入某个命题的才是真理；它继而试图衔接，在知识本身……

知识由命题的基础构成——之中，究竟什么可以严格地作为真理运作；任何被提出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可以被说成真，并作为真得到支撑。

所涉及的是一个名叫维特根斯坦的人。

我能说他容易读吗？当然可以。试试看。

只要你们满足于在一个严格属于思量的世界中移动，不试图从中摘取任何果实——你们偏偏有这个坏习惯：极想从苹果树上摘苹果，哪怕从地上捡也行；对你们来说，怎样都比一只苹果也捡不到好。

只要你们强迫自己专注，在一棵枝条交错的苹果树下住上一阵，当然足以牢牢抓住你们的注意力。但这种居住仍有一个特点：你们无法从中提取任何东西，除非断言只有符合某种结构的东西才可以被说成真。

我暂时走出苹果树的阴影，甚至不把这个结构定位为“逻辑的”。不；正如作者明确断言的，它是“语法的”。

对这位作者而言，语法结构构成了他认定与世界等同的东西：语法结构就是世界。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包含构成世界的全部事实的复合命题才是真的。

如果我们选择在这个集合中引入否定要素，使它可以被衔接出来，当然便会有整套有待提取的规则，构成一门逻辑。

可是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这个“集合”是重言式的，也就是说，同下面这种说法一样愚蠢：

- 无论陈述什么，它“要么为真，要么为假”；
- 陈述它“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必定为真，但这也同时取消了意义。

他在编号为 6.54 的命题中总结说：“我告诉你们的一切”，也就是我刚才在这里陈述的一切，严格说来都是 Unsinn，也就是取消意义。

凡是能够说出的，都只能是重言式。

读者走过那一长串陈述——请相信我，其中每一条都极其引人入胜——之后，所要做的是越过刚才说过的一切，得出结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说，而一切可说的都只是无意义。

我也许过快地替你们概括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只再加一项说明：只有从维特根斯坦的观念和进路出发，一切才只能徒然地说，却仍然为真——那就是，“真”是“裸命题”（proposition crue）的属性。

我所谓裸命题，就是在别处——例如奎因那里——会被放进引号的命题；人们由此区分陈述和言说行为。我的图式恰恰建立在这项操作之上，但我仍毫不犹豫地宣布它是任意的。

因为很清楚，下面这个立场可以得到支持……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纯粹而简单的断定无须再附加任何确认符号。

断定本身便宣告为真。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维特根斯坦的结论？只能跟着他被带往的地方，也就是走向基本命题。一个基本命题无论为真还是为假，它的真假记号无论如何都必须确保……

复合命题的真。无论世界事实如何，甚至无论我们怎样陈述它们，话语总体的重言式才构成世界。

我们取语法上最简约的命题。斯多葛派早已依靠它来引入最简单的蕴涵形式，并非偶然。我甚至不走到那里，只取第一个分句。你们知道，蕴涵是两个命题的关系；“Il fait jour”（天亮了）正是最小形式：

- Il：中性、无人称；
- Il fait：它造成；在某些场合，也就是“事情是如此”。

维特根斯坦也确实只用事实来支撑世界：

- 没有任何事物不由事实的经纬支撑；
- 而且，事物无不是不可接近的；只有事实能得到衔接。

“天亮”这个事实，只有因为它被说出才成为“事实”。真——我必须在这里重新引入先前被我任意分开的维度——只取决于我的言说行为，也就是我是否在恰当的场合说出它。

真并不内在于命题；命题只宣告事实，也就是语言制造的东西。

我说这句话时若恰好天亮了，那么这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正是我的说出构成了这个事实。

但“它是真的”本身不是一个事实，除非我再明确补充：此外，它是真的。

可是维特根斯坦说得很好：我再加一句“它是真的”恰恰多余。然而，替代这个多余之物，我必须说，我确实得有一个说出它的理由；这个理由随后会得到解释。

我并不明说自己有理由，而是继续后面的推导，把“天亮了”整合进我的引导中——也许当作一个谬误，即便它是真的——借此让某个人相信，他会看清我的意图。

如果可以这样说，愚蠢之处在于把“天亮了”的语言造物孤立出来。

这是一种极其丰产的愚蠢，因为一个支点由此产生。准确地说，这个支点来自把我自己所依靠的原则推到最后结论：没有元语言。

除了形形色色的无赖行径之外，没有别的元语言——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指那些从“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推导出的古怪操作。

所有无赖行径都建立在这里：一个人想成为另一个人的大他者；而此人的欲望将在那里被描绘成形、被捕获。

所以，维特根斯坦式的操作无非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招架[注]，是对哲学无赖行径的一次识破。

> [注] Parade 可以指“游行、展示”，也可以指击剑中的“格挡”以及由此引申的“应对之法”。这里紧接着说对哲学无赖行径的“识破”，因而采用后一义；它不是一场公开展示。

读过维特根斯坦后，我们可以说：意义只来自欲望；真理只存在于上述欲望把自身缺失遮藏起来之处——它借此对自己所找到的东西装作若无其事。

逻辑学家一向只用所谓“实质蕴涵”那副悖论面貌使我们眼花，而没有任何光照能比这里更确切地显出其后果。

你们知道它是什么。人们只是最近才称它为“实质的”；它就是简单的蕴涵。最近之所以加上“实质”二字，是因为人们忽然揉了揉眼睛，开始明白蕴涵里有多么惊人的东西——我说的是某位斯多葛派所主张的蕴涵。

以下三种蕴涵确实都合法：

- 假蕴涵假：$F \Rightarrow F$；
- 真蕴涵真：$V \Rightarrow V$；
- 假蕴涵真：$F \Rightarrow V$。这一种同样不能排除，因为问题在于被蕴涵的项；只要被蕴涵的项为真，整个蕴涵也为真。

但这确有含义！把“蕴涵”一词稍稍错开，我们何不看见其中突出的东西？中世纪人对此非常清楚：ex falso sequitur quodlibet，从假可以推出任何东西。[注3] 假有时包含真，也等于说真可以从任何东西后面跟出来。

反过来，如果我们排斥真包含假，排斥真可以有一个假的后项——我们确实必须排斥它，否则命题逻辑无法作任何衔接——便会得到一个古怪结论：

- 真具有一个谱系；
- 它总能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真，并且再也不能从那里堕落。

这个提示如此奇异，又如此遭到我们整个生命——我是指作为主体的生命——反驳；单凭它，就足以质疑真理能否以任何方式被孤立为一种属性，归给任何可以被衔接成知识的东西。

> [注3] Ex falso sequitur quodlibet：“从假可以推出任何东西。”参见 1967—1968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1968 年 2 月 28 日。

相关知识卡 Ex falso quodlibet：爆炸原理

所以，分析操作以一种不同于维特根斯坦话语中所“化身”的方式进入这个场域。后者是一种精神病式的凶猛；相比之下，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它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非必需的逻辑概念——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们回到原则：真理当然同语言效应本身不可分离。

真理只能定位在它得以陈述的场域，而且只能尽其所能地在那里陈述。

所以，“无假便无真”这句话是对的；至少原则上如此。

可是，“无假便无真”——对不起，这是一句口误——“无真便无假”，这句话是错的。

我的意思是：真只能在所有命题之外找到。

说真理同语言效应本身不可分离，也就把无意识包括在内。

反过来提出——正如我上次提醒的——“无意识是语言的条件”，在这里取得了它的含义：它要求语言回应出一种绝对意义。

关于《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这篇报告，其中一位作者曾这样写[注4]：把一个 S 以横杠叠在它自己上面，从而标示一个意义绝对的能指。他对这条横杠的处理，同我的用法相比是任意的。

这里标出了某种极容易辨认的东西，因为只有一个能指能回应这个位置：那个“我”，既是超越论的，也是幻象性的。

> [注4] 让·拉普朗什：《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这就是最后的根本操作；它不可还原地保证某种东西。也由此可见，我用大学话语的衔接来指称它，并非偶然。

超越论的“我”，正是任何人以某种方式陈述知识时藏在真理位置上的 S_1，也就是主人的“我”。

同自身同一的“我”，恰恰构成纯粹命令式的 S_1；而在这个位置，“我”恰好隐退，因为命令式总是第二人称的。

可是，“理想的我”“掌控的我”，那个至少让某种东西——也就是言说者——同自身保持同一的“我”之神话，恰恰是大学话语无法从自己的真理位置清除的东西。

当然，任何哲学都不能被归结为这一点。从任何哲学的大学式陈述中——哪怕是勉强可以标作同它最对立的哲学，也就是拉康话语，如果那算哲学的话——“我治”（Je-cratie）都会不可还原地涌现。

对哲学家来说，问题一向更灵活，也更悲怆。

回想一下这里涉及的是什么。他们或多或少都承认了，最清醒的人更明说：他们想拯救真理。

这使其中一位走得相当远。他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拒绝走到这个结论：若把真理当作知识的规则与基础，便再也无话可说，至少再也不能说任何涉及真理本身的话。他要避开这块岩石；在这块岩石旁，作者确实接近分析家的位置，因为他把自己从话语中彻底清除。

我刚才谈到了精神病。

最可靠的话语同某种令人震动、只须感受其效应便显出精神病迹象的东西，竞争到如此程度；所以，一所大学——尤其英国大学——竟为它留出一个可以说“另处”的特殊位置，确实值得注意。

这是一个隔离的位置，而作者本人也完美配合：他不时退居一座乡间小屋，然后回来继续那番无情的话语。可以说，就连罗素《数学原理》的话语都被它驳倒了。[注5]

这位作者并不想拯救真理。他说：“关于它，什么也不能说。”

这并不确定，因为我们每天都同真理打交道。

弗洛伊德在一封我屡次引用的信中怎样界定精神病位置？恰恰用他称作 Unglauben 的东西：不愿知道涉及真理的那个角落里有任何东西。

奇怪的是，事情对大学人如此悲怆，以至波利策的话语……

> [注5] 法语 controuvé 意为“被驳倒、被证伪”。

《具体心理学的基础》[注6]——这是接近精神分析促使他写出的作品——成了一个迷人的范例。

一切都受这番逃脱努力支配：他清楚地感觉到，那里有一道斜坡，可以让他从彻头彻尾塑造了他的大学话语中露出头来。

这本小书后来重印为口袋本；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作者本人会赞同这次重印。人人都知道，鲜花沉重地覆盖在最初作为反叛呐喊的东西之上，对他构成了怎样的悲剧。

[注6] 乔治·波利策：《心理学基础批判》，1928 年；法国大学出版社“Quadrige”丛书 2003 年再版。

那些关于心理学、尤其大学心理学的尖锐篇章，奇怪地接上了另一番进路。我们可以说，他之所以看出那里有一道可以跨出的栏杆，并希望从心理学中脱身，关键在于他强调了一点——当时没有人这样做：弗洛伊德接近无意识形成物的方法，其本质是信赖叙述。

他把重音放在语言事实之上；说实话，一切原本都可以从这里开始。

我们不会走到说，在那个时代——这只是段小史——不可能有任何人……

……哪怕他是高等师范学校的 caïman，也绝不可能对语言学是什么有半点概念。[注7] 不过，他确实接近了那个动力；正是这个动力，让他对自己古怪地称作“具体心理学”的东西抱有希望。

这本小书必须读！必要时我会同你们一起读，有一天在这里把它当作另一场谈话的材料。可是我还有足够多的事情要说，不必在一件你们每个人都能看出其意味深长之奇异的东西上逗留……

这种奇异可以一步一步跟下去：正是由于想走出大学话语，他才无情地重新走了进去。

他会怎样反对弗洛伊德在理论推进中提出的那些陈述——我是说术语和机制？他只能说，那些陈述围绕着可以被孤立的事实，是形式抽象——这是他的含糊措辞。可这样一来，他便漏掉了自己认为心理学中

至关重要的要求：每一个精神事实都只有在保全他所谓“‘我’的行动”时才能被陈述；更准确地说，必须保全——原文就是这样写的——“‘我’的连续性”。

> [注7] Caïman 指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中持有中学教师会考资格、负责辅导学生准备该会考的教师，通常是年轻研究者；在文学研究中也泛指高师教师。

相关知识卡 Caïman：巴黎高师的教师俗称 ・ 乔治・波利策与具体心理学

我刚才说的那位报告人引入波利策这段小小的参照，无疑是为了安抚当时可能在场的听众。偶尔举出一位大学人，而且此人后来还成了英雄，总会显得体面；这是多好的机会。

可是，如果不借此证明大学话语相对于分析本身的不可还原性，反而只加以利用，那还不够。这本书见证的正是这场独特的斗争。

因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分析实践事实上非常接近他理想中勾画的东西——它完全在此前所有心理学之外；可他又只能落回对“我”的要求。

这当然不是说我自己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可还原的东西。

那位报告人[注8]用一句话把它打发掉，未免过于容易：无意识并不以第一人称衔接。

为支持这个说法，他用上了我的某些陈述，例如主体从大他者那里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但这当然不是充分理由。

我在别处确实说过，真理以“我”说话：“我，真理，我说话。”[注9]

> [注8] 指让・拉普朗什，参见 1960 年博讷瓦尔会议报告及本研讨班 1970 年 1 月 14 日一讲。

> [注9] 雅克・拉康：《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409 页。

只是，无论那位作者还是波利策，都没有想到：这里所涉及的“我”也许不可胜数；它无须保持“我”的连续性，也能让自己的行动增殖。

不过先放下这一点，它不是关键。

面对命题的这种用法，在分别以前，我们不妨让下面这句话呈现出来：“一个孩子正挨打。”[注10]

整个幻想确实由这样一个命题构成。我们能给它附加任何被称作真或假的东西吗?

我们在这里抓住一个无法从命题的任何定义中清除的典型事实：这个命题产生效应。产生什么效应？它由一个主体支撑；毫无疑问，但正如弗洛伊德立即分析的，这个主体被享乐分裂。

说它分裂，是因为陈述这个命题的人，同时就是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因“挨打”（geschlagen）而 wird、verdit、verdoie——“变成”、变绿、泛青。[注]

再多玩一下：这个“挨打而泛青”的孩子同“美德”调笑（badine vertu）；这些是“朝向你”（vers-tu）的不幸。无论句子怎样被说出，打他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名字。

“你打我”就是主体的这一半，句式把它同享乐联结起来。

主体确实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这意味着，他以大他者的享乐这一形式接收自己的享乐。幻想在这里接上父亲的形象，而最初同父亲形象联结的，是另一个孩子。

父亲享乐于打他，正是这件事给意义加上重音，也给那一半真理加上重音。

> [注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挨打——对性倒错起源研究的一项贡献》，德文《全集》第 12 卷，第 197 页；法译见《精神分析结果、观念与问题》第 1 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 年。

> [注] 拉康在这里连续借德语 wird 与法语 verdit、verdoie，以及 battu、badine vertu、vers-tu 的近音作文字游戏；中文无法同时复现这些音义关系，故在正文保留原词。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挨打》・维特根斯坦的“无意义”不是日常废话**

因为，认同于另一半——孩子主体——的那个人并不是这个孩子；除非像弗洛伊德那样重构出一个中间阶段。这个阶段永远无法由记忆以实体形式给出；正是在那里，那个把句子变成自己幻想之支撑的人，才是挨打的孩子。

我们由此回到一个事实：一个身体可以没有形象。因为父亲，或者任何在这里扮演角色、履行功能的大他者，提供了享乐的位置，却甚至没有被命名。

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形象的上帝；然而，除非作为身体，他仍不可把握。

什么有身体却不存在？答案是：大他者。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大他者，他便有一个身体；这身体无法从那位说出“我是我所是”的存在之实质中清除。这是完全不同形式的重言式。

事情正是在这里……

请容我在分别以前把它提出来——我要陈述一件在历史中如此显眼、却令人惊讶地没有得到充分强调，甚至全然没有被强调的事。经验已经证明，唯物主义者——我说的是他们最近一次、即十八世纪的历史性喷发——才是唯一真正的信徒；他们的上帝是物质。

是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比其他一切奠基方式更站得住脚。

但这对我们还不够，因为我们恰恰有逻辑上的需要——容我使用这个词。我们是由剩余享乐而生的存在，是语言运用的结果。

相关知识卡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我说“语言的运用”，不是说我们运用语言；我们才是语言的雇员，语言运用我们，而它正是由此享乐。

因此，上帝存在的唯一机会，就是“祂”——大写的“祂”——享乐，也就是“祂”本身即是享乐。

也因此，对最聪明的唯物主义者萨德来说，死亡所瞄准的绝不是无生命之物。读一读《朱丽叶》中部圣丰的言论，你们就会明白。

他若说死亡无非是不可抗拒地协作于自然的运作，那是因为在他那里，死后的一切当然仍然活跃，仍由享乐欲望推动；那是对他同样称作“自然”的东西的享乐。从整个语境看得很清楚，所涉及的是唯一存在者的享乐；它只须说：“我是我所是。”

相关知识卡 萨德在启蒙思想史中的位置

为什么如此？他为何感受得如此准确？

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他表面上是施虐者，因为他拒绝成为自己所是、拒绝成为自己宣称所是的东西。

他狂怒地呼唤一个交付于自然的存在，呼唤自然那不断有新形式重生的杀戮运作；这样做时，他无非看见自己无力成为别的东西，只能充当这份神圣享乐的工具。

这是理论家萨德。为何是理论家？也许我会在最后一刻，像平常一样，来得及告诉你们。

实践者是另一回事。你们从若干故事中已经知道，我们也有他亲笔的见证：实践者萨德只是一个受虐者。

面对享乐，这才是唯一机敏而实用的位置；因为耗尽自己去充当上帝的工具，实在累人！

相比之下，受虐者是一位细腻的幽默家。他不需要上帝；一个仆人就够了。

相关知识卡 萨德作品中的“自然”

他在一些自然是明智而有限的范围里，以享乐自娱。像所有优秀的受虐者一样——读一读他们就知道——他笑得很开心；他是个幽默的主人。

那么，萨德究竟为何是理论家？为何抱着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愿望？它完全不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里，而且他明明写了出来、明确标出了这一点。

生命碎片化成微粒；一些碎片经历种种最惊人的想象行动，被撕裂、切碎、肢解。要彻底终结它们，还必须给它们一次“第二次死亡”。

谁够得着第二次死亡？当然，我们够得着；我很久以前谈《安提戈涅》时便说过。

不过我是精神分析家，所以能看见第二次死亡发生在第一次死亡以前，而不是像萨德梦想的那样发生在之后。

萨德是理论家。为什么？因为他爱真理。他不是想拯救真理；他爱它！

他爱真理的证据就在这里：他拒绝真理。他似乎没有看见，自己宣布上帝已死时，反而高举了上帝；他为上帝作证，因为萨德本人只能借刚才所说的那些小手段抵达享乐。

爱真理为何会使人落入这样一个明显带有症状的体系？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里，一件事得到标示：真理把自己设定为语言效应的残余。语言效应从享乐中所能扯出的，只有我上次以一种剩余享乐之熵来陈述的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不是把真理看作话语之外的东西吗？

可它是什么？它是那份被禁止的享乐的姐妹。

我说“姐妹”，二者只在这一点上有亲缘：最根本的逻辑结构确实都接在这根从享乐中扯出的残茎上；反过来，我们也必须问，当代逻辑的征服回应着怎样的享乐？

例如，一个逻辑系统无论多弱，只有用不完备事实标出它的力量、标出它的界限，才能具有一致性。逻辑基础本身以这种方式显得裂开，它回应的是怎样的享乐？

换言之，这里的真理是什么？

我用 sororа 这种姐妹关系指称真理相对于享乐的位置，既非徒然，也非偶然。我们之后必须展开它，在癔症者的话语中把它陈述出来。

奇怪的是，就在最近，有人跑到美洲作了一场讲座，宣布一件人人早已知道的事：弗洛伊德同他的小姨子有一段人们既公开又含蓄地称作 an affair 的关系。

那又怎样？米娜·贝尔奈斯在弗洛伊德关切中的位置，早就为人所知。

再添几句荣格式流言，也丝毫改变不了这桩 affair。[笑声]

不过，小姨子的位置难道不正是为了……

我把你们留在这个问题上：人人都知道，俄狄浦斯禁忌把萨德同妻子隔开——正如宫廷爱情理论家一向所说，“婚姻中没有爱情”——那么，他难道不是因为所爱的是自己的小姨子，才如此热爱真理吗？

第5课 · 1970年2月11日

我们继续往前。为了避免一种可能的误解，我先给你们一条近似规则：一个话语以它公开承认想要掌控的东西作为参照；仅此一点，便足以把它归入主人的话语这一亲族。

这也正是我试图尽可能靠近分析家的话语时遇到的困难：它必须处在一切掌控意志——至少一切公开承认的掌控意志——的对立面。

我说“至少公开承认”，并不是说它必须把掌控意志藏起来；毕竟，重新滑回掌控话语总是很容易。

说实话，在教学中，我们正是从这里出发：从意识话语出发。它曾经恢复自己，而且每天都在无休无止地恢复自己。一位同我很亲近的人——当然是在精神病学界，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曾把它润色到最佳状态：综合的话语，掌控着的意识话语。

很久以前，我在《论精神因果性》的若干发言中回应的正是他。这些发言可以作证：远在我真正着手分析话语以前，我终究已经有了某种方向。当时我大致这样对他说：

“怎么可能不把这整个精神活动理解为一场梦？一天之中，我们成千上万次听见那条由命运与惰性、掷骰与惊愕、虚假的成功与未被认出的相遇拼成的杂种链条；它构成人类生活的日常文本。面对它，怎么可能把整个精神活动理解成梦以外的东西？”[注1]

所以，不要期待我的话语还有比“不自称握有解决方案”更具颠覆性的东西。

然而，没有什么比话语参照享乐的地方更加炽热。

> [注1] 雅克·拉康：《论精神因果性》，载《著作集》，第 160 页；原为 1946 年 9 月 28 日博讷瓦尔会议发言。原文完整表述为：“说实话，整个所谓‘精神活动’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梦；它难道不是一名医生的梦吗？这名医生成千上万次听见命运与惰性、掷骰与惊愕、虚假的成功与未被认出的相遇组成的杂种链条在耳边展开，而它构成人类生活的日常文本。”

话语始终触及享乐，因为它就起源于享乐；每当话语试图返回这个起源，便再次搅动享乐。它也因此反对一切安抚。

必须说，弗洛伊德维持着一种奇怪的话语；它同话语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最为相反。

话语的主体并不知道自己是正在维持这番话语的主体。

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这还说得过去；人们一向会设法补足这一点。

可是弗洛伊德说的是：他不知道是谁在说。

至于知识……

我想，我对知识已经强调得足够多，应该能让它进到你们脑子里：知识是被说的东西，是已经说出的东西。

好，知识自己说话；这就是无意识。

所谓现象学——不论这个名称用得多么含混——本应从这里攻击弗洛伊德。

为了反驳弗洛伊德，只提醒人们知识以不可说的方式知道自身，并不够。攻击必须落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强调任何人都能知道的事——

知识会一粒粒滚落，会被列举、被细分。麻烦正在这里：那串被说出的念珠，没有任何人在说；它自行展开。

相关知识卡 玫瑰经与念珠的结构

容我说，我本来想从这句格言开始。你们马上会看出我为什么退缩。

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先绕开了它；好在这一次，到现在十二点三十一分时已经绕完，不会再拖延我们谈话结束的时间。

如果我按照自己一贯的冲动，以突兀的方式开场，我本来要从它开始。正因为我想这样做，我才没有做；我要先驯服你们，免得你们受冲击。

格言如下。我希望它的显而易见会击中你们，因为弗洛伊德正是凭它……

尽管他进入观念交易世界时遭遇了许多抗议，终究强行确立下来的，是“弗洛伊德不胡扯”。[笑声]

这使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了某种优先地位。大概也围绕同一点，还有另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终究活得相当不错。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胡扯。

这一点可以从如下现象看出：反驳他们的人，总有很大风险滑进胡扯。他们扰乱那些想抓住他们的人的话语，经常把它冻结成一种学院式、循规蹈矩、落后而不可还原的递归。

但愿这些反驳者真会胡扯！那样他们反倒会接续弗洛伊德，进入某种秩序，也就是所涉及之物的秩序。

说到底，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偶尔把某人称作一个 con，一个蠢货？

这真有那么贬低人吗？你们没有注意到，说一个人是蠢货，往往反而意味着他没有那么蠢吗？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我们不太清楚他同享乐有什么关系；人们因此这样称呼他。[注]

弗洛伊德话语的可贵之处也正在这里：他够得上这个高度。

> [注] 本段反复利用 déconner（胡扯、犯蠢）与 con（蠢货）的构词关系；中文分别译出，无法完整复现词形回环。

他的话语尽可能贴近同享乐有关的东西——至少贴近到弗洛伊德本人所能抵达的程度。

把自己定位在话语涌现、乃至话语返回时在享乐附近绊倒的那个点，并不容易。

在这里，弗洛伊德有时显然会避开，抛下我们；他放下了女性享乐的问题。

据最新消息，吉莱斯皮先生——这位杰出人物以种种讨价还价的操作，在过去五十年穿越分析的不同潮流之间脱颖而出——在最新一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中流露出一种奇特的欢欣。据说，华盛顿大学对阴道高潮进行的若干实验，会为一个争论投下强光：[笑声]　在女人的发展中，一种最初被归结为男性享乐之等价物的享乐，是否具有首要地位。一位名叫马斯特斯的人和另一位约翰逊所作的研究，说实话并非毫无趣味。

可是，当我在那里看到……

我得说，我没有直接查阅原文，只看了几处引文——当我看到“较高的高潮”，即据说属于女人的高潮，被归入“完整人格”时，我不禁要问：人们使用电影摄影装置，把彩色影像收集起来，[笑声]　把摄影装置装进一个模拟插入阴茎的附件，从内部拍摄插入后围在它周围的阴道壁上发生的事；这个装置究竟怎样捕捉“完整人格”的视角？[笑声]

作为伴奏，这当然也许非常有趣，可以放在弗洛伊德话语允许我们推进之物的边缘来研究。但这正好显出　　déconner（胡扯）这个词的意思，犹如 déchanter（改变调子、幻想破灭）。你们知道 déchant 是什么：它是写在素歌旁边、边缘的对歌声部，也能唱，也能成为伴奏，但终究不完全是人们期待素歌给出的东西。

正因为这种对歌声部如此之多，我们必须以它粗粝的轮廓重新提醒一件事：弗洛伊德关于享乐的话语，作出了一次我可以称为“经济化约尝试”的东西。

他这样标记它并非无缘无故。直接把它说出来，你们马上会看见效果。

我以为今天应当在这里这样做；我希望这个形式会击中你们。它不会教给你们新东西，但会给出弗洛伊德发现的准确语调。

我们不会就这样泛泛谈享乐。

我已经说得足够多，你们应当知道：享乐是达那伊得斯的桶。一旦进入其中，便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它从搔痒开始，以汽油浇身燃烧结束。这始终都是享乐。

我从另一个因素入手；不能说它在分析话语中缺席。

你们若读一读那一期真正的五十周年文集，便能理解作者为何庆幸五十年来显出的坚固性。

我请你们亲自试试：从五十年中随便抽出一期，你们永远不会知道它出版于哪一年，因为它总在说同一件事，总是一样乏味。分析能把人保存下来，所以作者也总是同一批。[笑声]　只是由于疲倦，他们偶尔会缩减投稿；其中一位只写了一页。

他们庆幸这五十年终究证实了以下初始真理：

- 分析的动力是善；
- 随着弗洛伊德话语逐渐被抹除，这些年特别幸运地突显出一项发现的坚固与荣耀：所谓“自主自我”，也就是远离冲突的自我。

这就是五十年经验的结果：三位曾在柏林开花的精神分析家被注入美国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坚实自主的自我话语，无疑许诺着诱人的成果。

要返回主人的话语，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这也让我们想到，每一种越界尝试——而分析曾经确实是一种越界——都可能产生回返的、甚至可以说倒退的影响。

现在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你们很容易在某一页找到它；我已经说过，这是分析宣传的常见主题。英语叫 happiness，法语叫 bonheur，中文叫幸福。

除非以一种颇可悲的方式定义幸福：同所有人一样——“自主自我”归根结底也许就归结于此——否则必须承认，没有人知道幸福是什么。

可是，如果相信圣鞠斯特本人所说的话，从他的时代起，幸福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因素。[注2]

那么，我们也用一句突兀的话给这个观念加上身体。请你们记住，它处在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只有阳具才有幸福。

弗洛伊德以各种形式写过这一点，甚至天真地写道：没有什么享乐比男性高潮更接近完美。

然而，弗洛伊德理论的重音在于：只有阳具是幸福的，不是阳具的携带者。[笑声]

即使这个携带者并非出于奉献——可以说，是因为别无他法——把它带进一位被假定因自己没有阳具而悲伤的女性伴侣身体里，情况也一样。

分析经验明确教给我们：这位“阳具携带者”竭力让伴侣接受这份剥夺；他以此为名作出的爱之努力、细小照料和温柔服务全都徒劳，因为它们重新刺痛剥夺的伤口。

所以，这道伤口无法由携带者安抚它时得到的满足来补偿。恰恰相反，伤口由于那个被悼念之物本身在场而再次裂开。

这正是弗洛伊德从癔症者的话语中提取并揭示给我们的东西。由此才可以理解，癔症者象征着这份原初的不满足，提升那个未满足的欲望。我曾借一个最小实例突出这一点：在《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中评注的“美丽肉铺老板娘之梦”……

> [注2] 圣鞠斯特：“幸福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因素……如果所有人都未得到满足，任何人便不可能得到满足。”

相关知识卡 **圣鞠斯特、公共幸福与拉康的转述**

这位美丽肉铺老板娘的丈夫同她性交，而他是一个地道的金装蠢货。[笑声]　所以，她必须让他知道：他还想额外填给她的东西，她并不看重。也就是说，即便她拥有那个根本之物，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就是这样！

她没有看见——她的小小视野也有界限——若把丈夫的这个根本之物留给另一个女人，她自己反而会找到剩余享乐；而梦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她在梦中没有看见它，仅此而已。

另一些人看见了。

朵拉正是这样做的。她崇拜一位在自己视野中成为欲望对象的女人，以这个女人包裹自己。在病例中，这个女人叫 K 夫人；朵拉像崇拜德累斯顿圣母一样崇拜她，前往凝视她的画像。她以这种崇拜堵住了自己的阳具诉求。

因此我才说，美丽肉铺老板娘没有看见：归根结底，她若像朵拉一样，把恰恰这个对象留给另一个女人，自己便会得到幸福。

这些只是提示；还有别的解决方式。我指出这一种，是因为它最具丑闻性。

还有许多更精细的方式，能够替代这样一种享乐；这种享乐的装置——

——也就是社会装置——通向俄狄浦斯情结，并把阳具享乐规定为唯一能带来幸福的享乐；恰恰因此，这种享乐遭到排除。这严格说来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

所以，分析探究所关心的是：一种起源完全不同于阳具享乐的东西——被剩余享乐功能定位、可以说划上网格的享乐——怎样由剩余享乐的功能带来，作为对阳具享乐禁令的替补。

我只是在重提弗洛伊德话语中一些显著事实；我已经多次突出它们。现在我想把它们放入一个配置关系：不是放在中心，而是让它们同我试图给出的“话语与享乐的关系”处境相连。

我为此重提它们，并愿再加一个重音：改变你们心中也许仍附着在“弗洛伊德话语以生物性的性为中心”这个观念上的光晕。

我得衡量一下自己，并向你们承认：我不久以前才发现这件事。人们总是最看不见那些最显眼、摊在眼前的东西。我忽然问自己：“希腊语怎样说‘性’？”

最糟糕的是，我没有法希词典；这种词典本来就没有。倒也有些小词典，可都很难看。

不过，我找到了 γένος（genos）；它当然同“性”无关，因为还表示一大堆别的东西：种族、世系、血统、生成和繁殖。

随后，另一个词进入我的视野，但它的内涵完全不同：φύσις（phusis），自然。

可我们说“性”时所说的根本不是这个，重音完全不同。

把一部分生命体分成两类，这种划分带来的东西很可能包括死亡的闯入；因为那些不以有性方式繁殖的生命体，我的天，看上去并不怎么死。

这里突出的完全不是生物学参照。由此可见，在认为弗洛伊德话语突出“性”的功能，是在重提某种有机体主义、乃至参照生物学以前，必须极其谨慎。

我们在这里发现：带着我们赋予它的重音、使用秩序和意义扩散的“性”，来自拉丁语 sexus。

我们若说“相对于希腊语”，还应在其他实证语言中继续调查；但拉丁语 sexus 同 secare（切割）有非常明确的联系。

拉丁语 sexus 包含我最初突出的一点：整场游戏围绕阳具转动，而且只因为它是“阳具”。性关系中当然不只有阳具。

这个器官的特权在于，它的享乐可以被相当清楚地孤立出来。

若用激烈的词，它可以被构想成遭到排除；我不会把这一点淹没在象征主义里。

在构成性器官装置的整个场域中，它的这个性质非常局部、非常例外。

没有多少动物的交媾决定器官，能如此清楚地把肿胀与消退的功能孤立出来，形成一条可明确定义的所谓“高潮曲线”：结束以后，就是结束。

盖伦早已说过：Post coitum animal triste，交媾以后动物会悲伤。[注3] [笑声] 不过，这也不是必然的！

> [注3] 克劳狄乌斯・盖伦：《灵魂及其激情》，Les Belles Lettres，1995 年。完整格言为 Post coitum omne animal triste est, sive gallus et mulier：“交媾以后，所有动物都会悲伤，公鸡和女人除外。”

相关知识卡 Post coitum 格言的版本与归属

这句话终究标出了：他感到受挫！这里面有某种东西同他无关。

他也可以换一种态度，觉得事情很愉快。但贺拉斯认为它颇可悲；这证明他仍对希腊的 φύσις、对性欲据说会形成的萌芽保有若干幻想。

这样，事情才回到适当位置：弗洛伊德确实如此呈现它。即使生物学中有某件事能与之呼应，那也只是模糊相似，绝不是根；接下来我们会指出，它的根在话语中。

如果要向生物学领域挥手告别，并勉强找一个近似图像，说明一切怎样围绕以下赌注运转——一方没有，另一方则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某些动物物种中发生的事情大概可以给出一点想法。

我最近见到一些很漂亮的鱼——鱼应有的那种怪异。雌鱼大约有这么大，雄鱼则……[拉康用拇指和食指比出极小的距离。]

雄鱼前来附着在雌鱼腹部，而且附着得如此彻底，两者的组织再也无法区分：即便在显微镜下，也看不出一方的组织从哪里开始，另一方的组织到哪里结束。

它用嘴巴挂在那里，并从那里履行——如果还可以这样说——自己的雄性功能。

这样无疑大大简化了性关系问题：过一段时间，雄性归结为这个动物小囊袋中残留的东西，主要就是睾丸。

最后它疲倦了，吸收掉自己的心脏和肝脏；这些全都没有了。它就挂在那里，位于正确的位置。

问题是衔接出阳具排除在我们传统的人类大游戏——欲望——中处于什么地位。欲望同这个场域没有直接而近切的关系。

我们的传统把欲望设定为它所是：爱欲，缺失的呈现。

于是同样可以问：人怎么能够欲求任何东西？究竟缺少什么？

有一天，有个人说："别费力了，什么也不缺。看看田野里的百合，它们不织也不纺；它们才在天国里处于自己的位置。"[注4]

要说出这番真正具有挑战意味的话，显然必须正是那个把自己同这种和谐的否定辨认在一起的人。

至少，人们称他为"道"时，是这样理解和解释的。

他必须是"道"本身，才可能如此彻底地否认显而易见之物。总之，人们是这样理解他的。

> [注4] 《路加福音》12:27："你们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他自己没说那么多。若相信他的一名门徒，他说的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可是，人们把他变成"道"，恰好表明人们还是大致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认为，只有"道"能够如此彻底地否认自己。

确实，我们大可以把田野里的百合想象成一个完全交付给享乐的身体。

相关知识卡 福音书中的田野百合

它成长的每个阶段，都等同于一种没有形式的感觉——植物的享乐。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东西让它逃脱。作为一株植物，也许是无穷的痛苦。可是，除我以外，没有人拿这种事作梦。

动物就不同了；它拥有我们解释为“经济”的东西：移动的可能性，尤其为了取得尽可能少的享乐。

这就是所谓快乐原则：不要留在享乐的地方，因为天知道它会把人带到哪里——我刚才已经说过。

然而，有一件事：我们终究知道享乐的手段。

我刚才谈过搔痒与火烤。在这里，人们知道怎样做。

这甚至就是知识：原则上没有人想把它使用得太远，可它终究诱惑人！

弗洛伊德恰恰在 1920 年前后发现了这一点；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发现的折返点。

他拼读完无意识以后——我不相信有人能把它说成别的东西：“有一种衔接得完美无缺的知识，而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主体对它负责。”

当一个主体遇到、触到它时，那个正在说话的主体忽然遇到自己从未料到的知识，便会相当迷失。

这就是第一项发现。

所以，弗洛伊德必然对主体们说：“说吧，说下去，像癔症者那样做。我们要看看你们遇到的是何种知识，你们怎样被它吸进去，或者反过来怎样推开它；我们会看看发生什么。”正是在那里，他作出《超越快乐原则》这项发现。

这项发现就是：探索无意识时，决定我们所面对之物的根本项，是重复。

重复不是把已经做完的事情重新开始一遍，像消化或其他生理功能那样。

重复是一种标示，准确标示出一条特征。我从弗洛伊德文本中提取它，把它辨认为一元特征，那个“小竖杠”，书写的元素；这条特征纪念着享乐的一次闯入。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与 Thanatos 称谓 ・ 重复、移情与“把过去活在现在”

所以，快乐可以违反自身的规则和原则，可以让位于不快——未必是疼痛，无须说别的——而不快只意味着享乐。

生成、生殖器和生殖性被嵌入欲望，在这里显得与性成熟完全不同。谈性化过早当然有其意义；不过必须说，人类所谓的第一次性冲动，在这方面显然正如其名：过早。

这次冲动确实可能包含“享乐的游戏”，但在力比多与自然之间引入切口的，并不只是有机体的自体性欲。

除人以外，另一些动物也会给自己搔痒——例如猴子；这并没有把人带向一套很发达的欲望加工。

相反，这里有一种由话语赋予的优待。

问题不只是谈禁令，而是女人作为母亲的主导位置：说话的母亲，人们向她请求的母亲，发号施令的母亲；她同时确立了小小人儿对自己的依赖。

女人让享乐胆敢戴上重复的面具。

女人在这里以她所是的样子出现，成为化装舞会的建制。她教自己的孩子展示自己，把他推向剩余享乐，因为她——女人，像花一样——把根扎在享乐本身。

享乐的手段由此开启，而其原则是：孩子已经放弃了那种封闭而且与母亲相异的享乐。

所以，庞大的社会共谋必须嵌入进来，把我们在自然层面可以称作性别差异的东西，颠倒成器官差异的性化。

这场颠倒蕴含一个公分母：排除特属于男性的器官。

于是，相对于享乐，男性既是、又不是他所是。

女人也由此被产出为对象，恰恰因为她不是男性所是：

- 一方面，她是性别差异；
- 另一方面，她是他作为享乐所放弃的东西。

就是这样。在谈论《精神分析的反面》、精神分析在政治中的位置成为问题时，必须作这些根本提醒。

只有承认话语——而且不只是分析话语——都属于享乐，尤其当人们指望它完成真理的劳作时，才可能闯入政治。

说主人的话语包含隐藏的真理，并不意味着主人的话语藏匿自身。法语 caché（隐藏）具有词源上的长处：它来自 coactus，来自动词 coactare、coactitare、coactitacare。它意味着某种东西遭到压缩，仿佛叠印在一起，必须展开才能读出。

很清楚，主人的话语之真理对它自身隐藏。某位黑格尔曾衔接说，奴隶的劳作把真理交付给它。

可是，黑格尔的话语仍是主人的话语；它依靠一场替换：经由漫长的教化道路，国家取代主人，最终抵达绝对知识。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这个体系看来已经被马克思的若干发现彻底驳倒。我不是来评注马克思，也不会在这里加附录；我只指出：从精神分析的瞭望台上，我们很容易首先怀疑，劳动最终会产生绝对知识，甚至会产生任何知识。

我已经在你们面前提出过这一点，这里无法重讲；不过，请把自己放在这条轴线上，来把握分析的颠覆。

如果知识是享乐的手段——刚才我口误说成劳动——那么劳动是另一回事。

即便劳动由拥有知识的人完成，它或许会产生真理；但从来没有任何劳动产生知识。

对此提出异议的，是更仔细观察我们文化中主人的话语同某种新出现之物的关系。黑格尔认为，围绕主人的话语展开的是对绝对享乐的回避；现在，人们正从新出现之物出发重新审查这一点。绝对享乐之所以遭到回避，是因为社会共谋把孩子固定在母亲身上，使母亲成为禁令的特选座位。

另一方面，一种使所有真理都成为问题的知识形式化，不正提示了别的东西吗?

与其说奴隶的劳作带来进步——仿佛奴隶的处境有过一丝进步，事实恰好相反——不如说这里发生了一场转移、一场剥夺：最初铭写、藏在奴隶世界里的知识被夺走；主人的话语却不得不在它面前把自己强加进去。

主人的话语必须强加自身；但它也因此进入自己的反复断言机制，抓住自己进入话语时的丧失，并看见我们用“剩余享乐”标出的对象(a)涌现。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归根结底，主人要奴隶付出的只有这个。奴隶是享乐手段的唯一占有者；主人满足于让他交出剩余享乐这一小笔什一税。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奴隶本人会不乐意交出它。

可“主体—主人”的崛起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事情完全不同。他在一种宣称同自身相等的真理中确立自己；这正是我曾说过的“我治”（je-cratie），似乎也是主人的话语在其中开得最繁盛的文化里，一切断言的本质。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把知识从奴隶那里抽走——仔细看，这就是黑格尔一步一步追随的整部辩证法史。奇怪的是，他没有看见它通往哪里；当然，这是有缘故的：他仍处在牛顿发现的场域，还没有看见热力学诞生。

如果当时他能站到那些首次统一热力学场域的公式背面，也许就会在那里辨认出纯粹能指的统治——能指在两个层面重复，S_1，还是 S_1：

- 第一个 S_1 是堤坝；

- 第二个 S_1 在下面，是接住落水并带动涡轮的蓄水池。

能量守恒没有别的意义：它是标示主人权力的一件仪器的印记。

凡在下落中收集到的东西，必须同量保存；这就是第一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原理：能量守恒。

不幸的是，间隔中有某种东西消失。更确切地说，它不能回返，不能使起点恢复原状。这就是所谓卡诺—克劳修斯原理，尽管迈尔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原理：熵与能量降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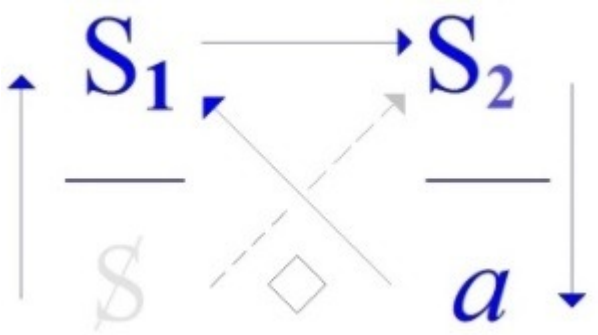
这种知识同一种话语的类比：那种话语在本质上把起点与终点置于首位，却忽略间隔中任何可能归属于知识的东西。

把这些纯粹数字真理、这些可计算的东西置于新世界的地平线上，难道单凭这一点，不已经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于绝对知识崛起的东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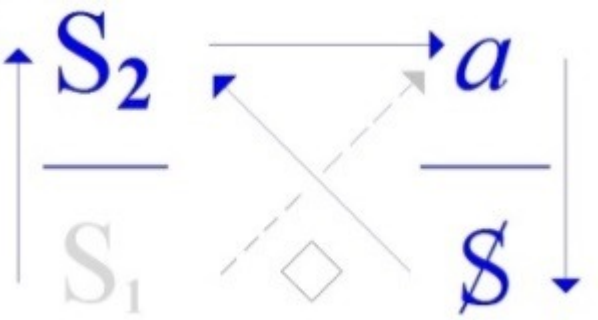
这不正是一种形式化的理想吗？在那里，任何东西都不再重要——因为能量无非就是被计算的东西；只要以某种方式操弄公式，总数永远相同。

这里发生了一次四分之一转：主人位置的 S_1 被一种格外新颖、在形式上完全可以归结为知识的衔接取代，即 $S_2 \rightarrow a$。

奴隶位置上出现的，并不是某种以任何方式插入知识秩序的东西，而更是知识的产物 a。



→



马克思揭露的是这场剥夺过程，却没有意识到秘密就在知识本身。他揭露工人如何被化约为纯粹的交换价值，劳动如何成为商品；剩余享乐被提升一个层级，变成一种不再是“剩余享乐”的关系，只以价值形式写入或从积累总量中扣除。积累之物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工人只是一个价值单位。

谨告那些被“单位”一词触动的人。

马克思以剩余价值揭露的，正是对享乐的剥夺。

然而，剩余价值又是剩余享乐的纪念物，是剩余享乐的等价物。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消费社会的意义在于：构成它的“要素”——那个被称作“人”的要素——会得到我们工业产出的任何剩余享乐的同质等价物〔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是一种赝品剩余享乐。

而且它确实能奏效：人可以装作有剩余享乐，这仍能留住许多人。

如果我要给你们一点作梦材料，指出我们这门科学以何种过程为其地位，而该过程又从哪里开始，我会建议你们找《萨蒂利孔》来消遣；我最近恰好重读过。

我觉得费里尼改编得不坏。他把 Satiricon 错拼成 Satyricon，多写了一个 y；这一点永远不能原谅。不过除此之外，还不坏。

只是，它不如文本。

它不如文本，因为文本是严肃的，不停留在影像上；在那里，人们看得出事情究竟如何。总之，它是区分主人与富人的好例子。

任何话语——哪怕最革命的话语——都有一个奇妙之处：它从不赤裸地说出事情，不像我刚才稍稍尝试的那样。总之，我已经尽力。

相关知识卡 剩余价值与剩余享乐

经济学家存在了这么久，我们由此看出他们对分析家多么有趣。分析若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确立另一个能量场，而它需要另一些结构。

如果你是麦克斯韦，大可以尽量统一热力学场和电磁场；但在引力问题上终究会碰到一块硬骨头。奇怪的是，所有人最初都从引力开始，不过这无关紧要。

至于享乐场——可惜它永远不会被称作“拉康场”，因为我肯定连勾画其基础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一些话值得说。

我偶尔翻阅一大批作者，其中一位姓斯密，写过一本名叫《国富论》的东西。

打开书一看，他在经济学家中还不是唯一绞尽脑汁的人；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其他人都在那里追问：国民财富是什么？

于是，人们努力定义使用价值——这终究应当算数——以及交换价值；这些又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人们相当为难。

惊人的是，没有任何人哪怕片刻间想到作一个说明——我都不要求他们停下来深究：财富就是富人的属性。

正如我有一天说，精神分析由精神分析家来做；这正是它的首要特征，必须从精神分析家出发。谈财富时，为什么不从富人出发？

这里也许会介入一件事。因为我得加快速度，出于课程安排的缘故，我必须在整整两分钟以后停下。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一项经验；它不特别属于分析家，人人都能去作。

富人——这非常重要——有一种属性。

他买。归根结底，他什么都买，至少买得很多。

我希望你们思考这一点：他不付钱。

人们以为他付了，只是因为会计上把剩余享乐变成剩余价值。

首先，人人都知道，他会很有规律地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名下。

剩余享乐并不流通；尤其有一种东西，他从来不付钱购买：知识。

因为，剩余享乐一侧发生的不只有熵这个维度。有人已经注意到：知识蕴含熵与信息之间的等价。

事情当然并不相同，也不像布里渊先生[注5]说得那样简单；但必须看见：富人之所以成为主人——我正因此请你们读《萨蒂利孔》——只是因为他赎回了自己。

古代世界地平线上的主人不是商人。看看亚里士多德怎样谈他们：他感到厌恶。

反过来，一个奴隶赎回自己以后，只因开始把一切都押上，才成为主人。

《萨蒂利孔》中的特里马尔基奥正是这样说的。

从他成为富人的时刻起，为何能不付钱便买下一切？因为他同享乐毫无关系；他重复的不是享乐，而是自己的赎身。

> [注5] 莱昂·布里渊：《科学与信息论》，1959 年；Jacques Gabay 出版社 2000 年版。

相关知识卡 **莱昂·布里渊《科学与信息论》**

他赎买一切；更准确地说，凡呈现在面前的，他都赎买。

他天生适合当基督徒，注定是“被赎回者”。

为什么我们允许富人收买自己？因为他给你们的东西参与了他的富人本质。

你们从富人、从一个发达国家购买东西时，以为自己只是——这就是《国富论》的意义——将会参与一个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

可是，在这笔交易里，你们丧失了赋予自己地位的知识。

富人顺手取得这份知识；恰恰因为他不付钱。

好吧，我们今天已经抵达界限：在必须清空这个房间以前，我所能说的界限。

我原想引入这样一点：在富人功能运作的层面——知识在那里只是剥削装置——剩余享乐、对象(a)重新发出声音时，可能发生什么？

分析家功能以某种方式给出了这场曙光。

下次我会试着向你们解释它的本质。它的本质肯定不是把这个要素重新变成掌控要素。

相关知识卡 莫泊桑《项链》

因为，正如我会向你们说明的，一切都围绕失败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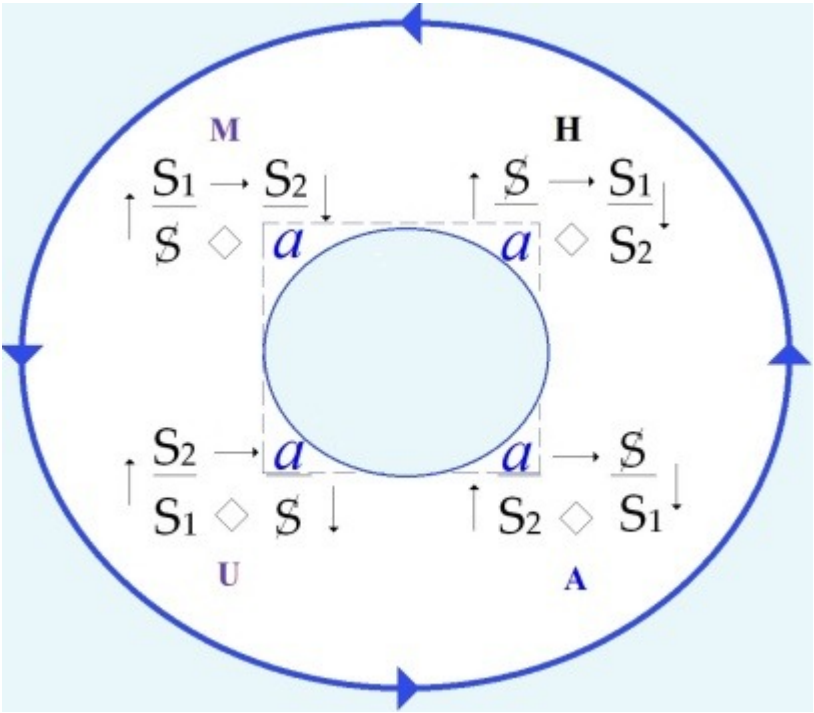
第6课 · 1970年2月18日

好了。现在你们应该开始看出：“精神分析的反面”正是我今年以“主人的话语”为题提出的东西。当然，这个命名并非任意为之；主人的话语在哲学传统中早已有了——容我这样说——自己的信用凭据。

不过，我试图提炼出来的主人的话语在这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重音：在我们的时代，借助我们在政治层面直接经历的事情，它几乎可以在一种纯粹状态中被分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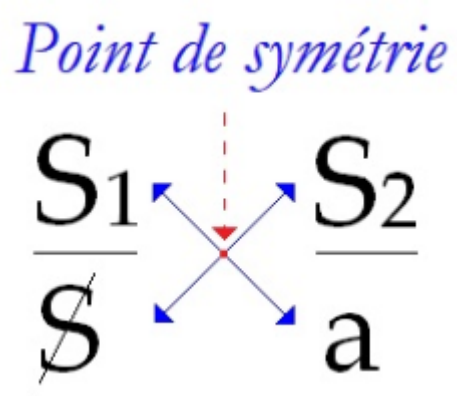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它把一切都包围在内，甚至包括自以为是“革命”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借助人们浪漫地称为“革命”——大写的革命——的东西，主人的话语完成了自己的革命；这里的“革命”取另一个意思，也就是转一圈而闭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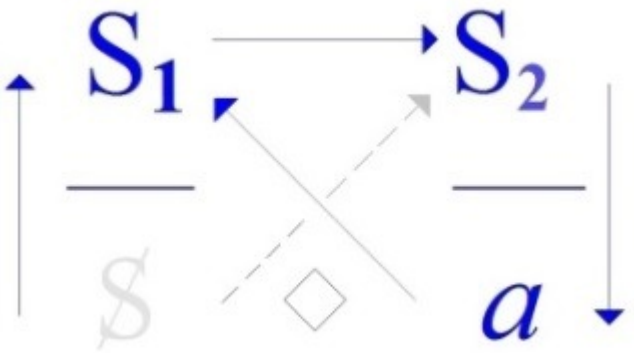
在这一凸显的地平线上——我承认，这多少有点格言式；但格言的用意本来就是以一道简单的闪光照亮某物——在这个地平线上，有一件事关系到我们，我是说你们和我：主人的话语只有一个对位，那就是分析家的话语，尽管后者仍如此不得其所。

我称它为“对位”，是因为它的对称——倘若存在一种对称，而它确实存在——不是相对于一条线，也不是相对于一个平面，而是相对于一个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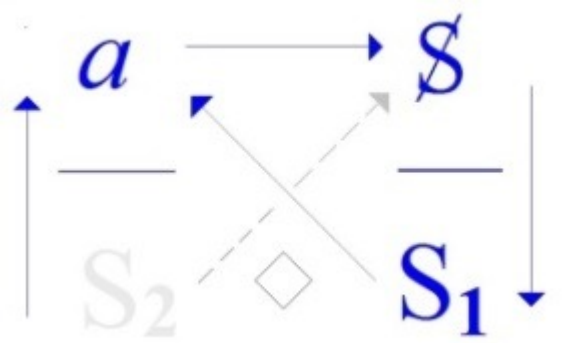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这一对称是由我刚才所说的主人的话语之闭合取得的。

也就是说，我没能重新写到黑板上的东西——因为这已经开始让我疲倦——就是那些 S 的排列：被划杠的 $\not{S}$、带下标的 S_1 与 S_2，以及 a。上一次我把它重新写了出来，希望你们多少还在纸上留着抄本。我没有时间再写一遍；毕竟我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完。这个书写足以显示那种关于一点的对称：分析家的话语恰好处在主人的话语之对极。就是这样。



↔



主人的话语 ↔ 分析家的话语

谈到精神分析话语，我们有时会看到某些术语被当作解释中的谱系主线，例如“父亲”。也会有人试图汇集有关父亲的主要材料。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以我们目前对精神分析的陈述与言说行为所能期待的水准来看，如果这项工作仍在发生学参照内部进行，就尤其艰苦。

一谈到父亲，人们便以为非得从童年、从认同讲起不可；于是论述真会陷入惊人的含混，甚至奇怪的矛盾。

人们会告诉我们，原初认同就是把孩子同母亲联结起来的认同；这看来的确不言自明。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弗洛伊德，回到他 1921 年题为《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的论述，就会发现，他明确把对父亲的认同称为原初认同。这当然十分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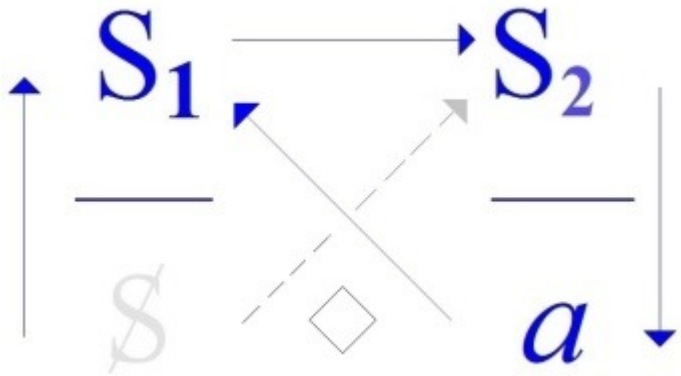
奇怪之处在于：弗洛伊德在这里指出，在最原初的层面上，父亲主持着最初的认同，确切地说，是因为他被特别选定为值得爱的那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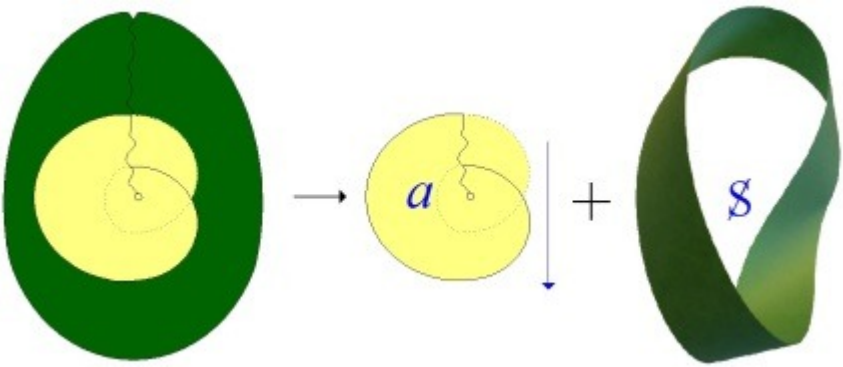
这无疑非常奇怪，而且必须同分析经验随后不断确立的全部内容对置，甚至可以说构成矛盾：分析经验确立的是孩子同母亲之关系的优先地位。

弗洛伊德的话语同精神分析家们的话语之间，竟有如此奇怪的不协调！这些不协调也许来自某种混淆。

我参照某些可谓原初的话语配置，试图建立一种秩序，正是为了提醒我们：若不记住某个前提，就绝不可能在分析话语中陈述任何有序的东西。

我们十分清楚，分析所提取的材料，是同处在分析者位置的人协作重建的结果；我们帮助他，或者说让他得以进入自己的分析历程。可是，在从这种重建中抽取任何东西以前，必须记住支撑整个重建、支撑以解释方式提供帮助之可能性的东西。我们努力以归属于主体的思想之形式，抽取那个在此情形中确实配得上“病人”之名的人所经历过的东西；这项工作即使有效，也不应让我们忘记：主体配置通过能指联结具有完全可以辨认的客观性。就在那个联结点——最初的 S_1 到 S_2 的联结点——名为主体的裂隙才可能敞开。





图式可写为：$(S_1 \to S_2) \to \left(a \downarrow + \not{S}\right)$。

能指联结的效应就在这里运作。不论某处是否发生那种被称作——未必称得恰当——“思想”的体验，这里总有某种依存于链条的东西产生，恰如它是思想一般。弗洛伊德谈无意识时，从未说过别的。

这种客观性不只诱发主体位置——作为防御焦点的主体位置——而且决定它。

好，我今天要提出、重新宣布的是：当主人能指向享乐的手段发出，而这些手段正是所谓知识时——稍后我会再谈这里的主人能指该如何理解——主人能指不只诱发阉割，而且决定阉割。

让我们从已经提出的主人能指出发。这是什么意思？当然，在起点处并没有某个天然的主人能指；所有能指多少彼此等价，因为每个能指都只凭自己同所有其他能指的差异、凭自己不是其他能指而起作用。

也正因此，每一个能指都能够来到主人能指的位置。确切地说，它可能承担的功能——我一向如此定义——就是为任何其他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只是，它所代表的主体并非单义：这个主体固然被代表，却也没有被代表。

在这个层面上，某种东西相对于同一个能指始终隐藏着。精神分析发现的游戏便围绕这里展开。当然，同其他任何发现一样，它也经过了某种准备：那是一种犹疑，不止是犹疑，而是黑格尔以“辩证法”之名维持的歧义。

黑格尔在开端处设定“主体把自己肯定为知道自身者”，大胆从Selbstbewußtsein（自我意识）最天真的陈述出发，也就是：每一种意识都知道自己是意识。

然而，他又把这个出发点同一系列危机、同他所谓的 Aufhebung（扬弃）编织在一起。结果是：这个本身作为主人之开端形象的Selbstbewußtsein，在最典型的他者的劳动中找到自己的真理。这个他者之所以知道自己，是因为他失去了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为了在通往享乐时保住这个身体，反而失去了它——换言之，这个他者就是奴隶。

我们怎能不试着打破这种黑格尔式歧义？分析经验让我们走上另一条尝试之路；为了把它把握得更紧，我们总得回到这项经验。最简单的出发点是：存在一种能指用法，它从主人能指同身体的根本分裂出发。这里说的正是刚才那个身体：奴隶失去的身体；从此，它不再是别的，只是所有其他能指铭刻其上的身体。

我们可以由此为弗洛伊德放在 Urverdrängt（原初被压抑）这个谜样括号里的知识绘出形象。这个词正是说：它无须经历压抑，因为从起初它就已经被压抑。

容我这样说，这是一种“无头的知识”，在结构上也是一个可以从政治上加以界定的事实。

从这里开始，一切被生产出来的东西——我取“生产”一词本义和完整的意义，也就是通过劳动生产——一切有关主人之真理的产物，亦即他作为主体所隐藏的东西，都会汇入这项知识：汇入它作为被分裂、作为 Urverdrängt 的状态；汇入它单纯存在、却无人明白的状态。

我希望这会在你们那里引起某种回响，尽管你们也许不知道这回响来自右边还是左边。它最初在我们所谓某些社会的神话支撑中形成结构；这些社会可以被当作民族志社会来分析，也就是不受主人的话语辖制的社会。

因为主人的话语始于主体占据优势地位：主体试图只靠一个极度缩减的神话来支撑自己——同自己的能指完全同一，即 $S = S_1$。

我上次由此指出，所谓数学在本性上同这种话语具有亲缘关系。在数学中，A 可以代表自身，不需要一番神话话语在其他地方为它规定关系。数学由此代表主人的知识，但它建立在不同于神话知识的法则上。

主人的知识作为一种完全独立于神话知识的知识而产生，这就是所谓科学。上次我用热力学作了简短说明，也进一步提到物理场的一切统一化。统一化建立在一个单位的守恒上；这个单位不过是一个常数，总能在计算中重新找到。

我甚至不说“量化”，只说计算：数字的操作被规定成，无论如何都要让这个常数在计算中出现。这就够了；唯有这一点支撑着所谓物理科学的基础——能量。

这也为科学提供了一种支撑，使它可以轻易接受如下前提：数学只有从“能指能够意指自身”这一点出发才可建构；你们第一次写下的 A，可以由再次写下的 A 来意指，即同一律 $A = A$。

然而，从能指的功能来看，这个立场根本站不住：能指可以意指一切，唯独不能意指自身。

数学话语若要开场，就必须不再受这条初始公设的规则约束——“能指可以意指一切，唯独不能意指自身”；让能指意指自身，正是对这条规则的违犯。

从这种原初违犯到能量学话语的建构之间，科学话语在逻辑中只靠两件事维持：把真理变成一场真值游戏，并从根本上回避真理全部的动力。

你们知道，命题逻辑的话语从根本上是同义反复的：它把复合命题排列成某种形式，使复合命题无论其基本命题取真值还是假值，都始终为真。

这不正是摆脱我刚才所谓真理工作之动力吗?

真正规定并区分分析话语的问题，恰恰是追问：这种拒绝、排除真理动力的知识形式，究竟有什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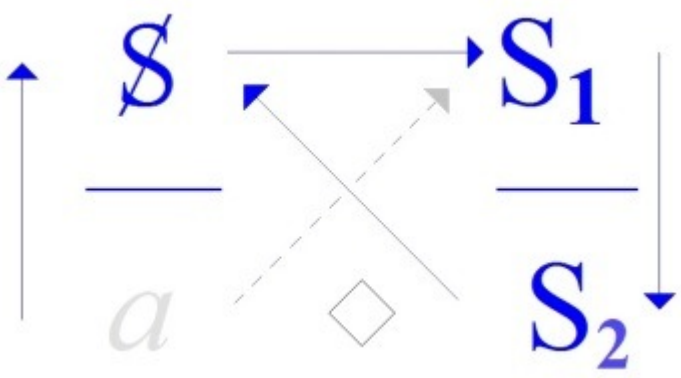
第一步的近似回答是：它用来压抑栖居在神话知识中的东西；但在排除神话知识的同时，它对后者便不再有任何别的认识。

相关知识卡 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与“要有光”

它只能以我们在无意识形态下重新找到的形式认识神话知识：一种脱节的知识，一种知识残骸。

从这项脱节的知识中重建出来的东西，绝不会以任何方式返回科学话语，也不会返回科学的结构法则。

我在这里同弗洛伊德的陈述有所区别。对于科学话语而言，我们在无意识中重新找到的这项脱节知识是异质的，即 a。



科学话语（癔症者的话语）。

它竟会强行确立自身，令人震动的正是这一点。

它之所以强行确立，恰恰因为我前几天用一句话说出的东西——看来我当时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它不胡扯”。无意识话语无论多么蠢，都会精确回应主人的话语自身的制度设立所牵涉的某种东西。

这就是所谓无意识。

它作为一个事实强加于科学。这门已经制成的科学，也就是人为制成的科学，固然无法否认在它看来是人工制品的东西。

只是，它恰恰不得成为主人的科学，不得提出工匠的问题；这个禁令使该“事实”愈发彻底地成为事实。[注]

> [注] 原文在 fait（事实 / 制成的）、factice（人为制成的）、artefact（人工制品）之间连续构词；中文只能分别译出。

上一场战争结束后不久，我曾接收三位来自多哥高地、在那里度过童年的人进入分析——那时我早已出生很久了。在他们的分析中，我找不到部落习俗与信仰的任何痕迹。他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也确实知道这些，但他们是从民族志学者的角度知道的。

考虑到他们的身份，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几位勇敢的年轻医生，试图挤进宗主国的医学等级体系。我们还处在殖民时代，当然知道一切安排都在把他们隔离开来。因此，他们在民族志层面对这些习俗与信仰的了解，差不多只是新闻报道的水准。

然而，他们的无意识依照俄狄浦斯的正规法则运作。换句话说，那是连同殖民法律一道卖给他们的无意识，是主人的话语所取的一种异域形式，是资本主义完全退行的一面，也就是所谓帝国主义。

他们的无意识不是童年记忆的无意识——两者在这里有所接触——而是其童年被回溯地置入我们的范畴中重新经历；请依照我去年教给你们的方式书写这个词：femme-il-iales。

我向任何分析家挑战：哪怕亲自前往实地，也请来反驳我。

精神分析不能用来进行民族志调查。还应当补充：这种调查若不参照科学话语，就毫无可能同本土知识重合；不幸的是，调查本身对这项参照毫无认识，因为它必须先把科学话语相对化。

当我说不能借精神分析进入民族志调查时，所有民族志学者想必都会赞同。可是，如果我再告诉他们：为了对科学话语的相对化稍有认识，也就是为了多少有机会进行一项恰当的民族志调查，我再说一遍，不是要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而是也许必须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倘若这种人存在——他们的赞同恐怕就少一些。

在这个交叉点上，我们提出：精神分析使我们得以设想的东西，正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展开，也就是话语同主体的利益相联。

马克思有时把它称作经济，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利益彻底商品化了。

商品同主人能指相联，所以只揭露这种联系并不解决任何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商品同这一能指的联系也没有减弱。

相关知识卡 多哥的殖民分治与法属托管

因此，现在要看清的是话语本有的功能。依照我先前的陈述，我们现在把它们完整写出来：主人能指、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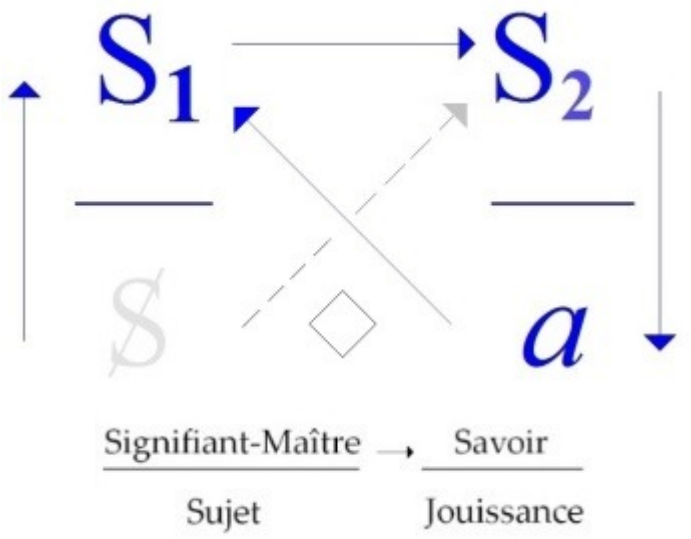
$$\frac{\text{Signifiant-Maître}}{\text{Sujet}} \rightarrow \frac{\text{Savoir}}{\text{Jouissance}}$$

一种话语的运作由这道分裂来界定，也就是主人能指相对于知识的区分。

请注意，凡是想进一步了解所谓“原始”社会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把这些社会写作不受主人的话语支配的社会。主人能指很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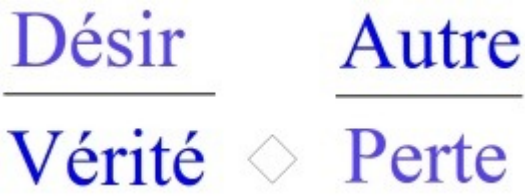
仍可在那里辨认，只是处在一种更复杂的经济中。有关这些社会的最佳“社会学”研究，正逼近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更可以庆幸：主人能指在主人的话语中的运作较为简单并非偶然；它完全可以借你们在这里看到的 S_1 与 S_2 的关系来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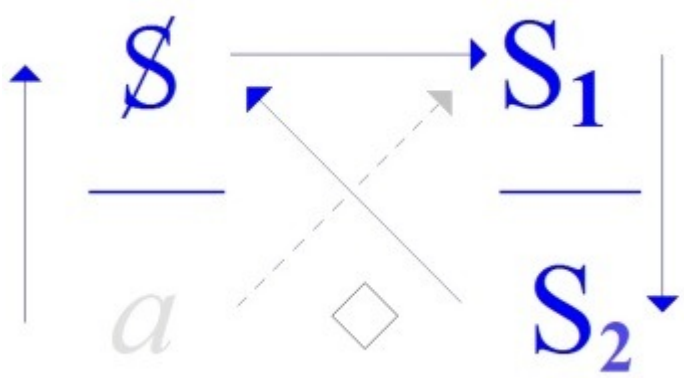


在这番话语中，主体恰好以它所携带的全部幻象联结于主人能指；而进入享乐则是知识的作用。

好，我今年提出的是：话语本有的这些功能可以占据不同的位置。它们在四个位置上的轮换界定了这一点。这里没有任何字母标出这些位置，只有它们所处的位置，例如“左上”“右下”。我到现在才略作说明，好让那些凭一点小聪明已经认出来的人也得到解释。比如：



左上是欲望；另一边是大他者的位置。我早先曾说：“人的欲望——那时我还满足于这种近似说法——就是大他者的欲望。”欲望下方是真理的位置；大他者下方则是损失发生的位置，确切地说是享乐的损失。你们知道，我们从这里抽取出剩余享乐的功能。



癔症者的话语。

癔症者的话语价值正在这里：它的优点是在话语制度中维持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主体怎样能够承受它”，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主体怎样不能承受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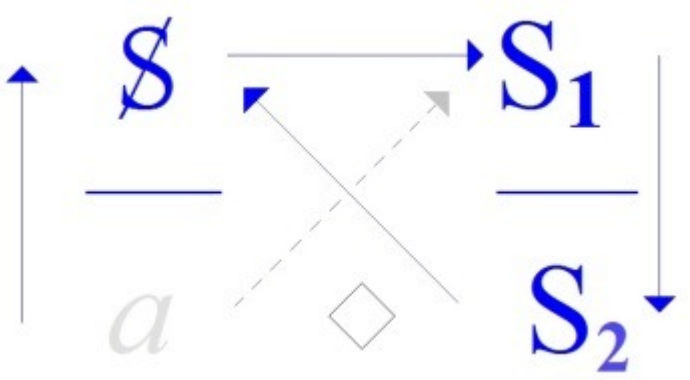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书写与神话变换

对于“主体怎样能够承受它”，答案是：让大他者发言，确切地说，让大他者作为被压抑知识的所在发言。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项真理：性知识在显现时，完全异质于它的主体。这就是弗洛伊德话语起初所谓的被压抑者。

然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单独抽取这一点，只会产生一种效果：为蒙昧主义辩护。难道那些同我们关系重大——而且关系绝不小——的真理注定晦暗吗？绝非如此。

我的意思是，癔症者的话语并不证明“低等者在下方”。恰恰相反，作为一组功能，它同赋予主人的话语那些功能没有区别。因此，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字母书写它：$\not{S}$、S_1、S_2、a。



癔症者的话语。

它只不过揭示了主人的话语同享乐的关系：在癔症者的话语中，知识来到享乐的位置。

癔症主体自身从主人能指那里异化；这个主人能指分裂了主体……

我刚才用了阳性的 celui，因为它代表主体——被主人能指分裂、拒绝把自己做成这个能指之身体的主体。

谈到癔症者，人们会说“躯体的顺应”。尽管这个术语出自弗洛伊德，如果沿着主人能指的效应来看，我们难道不应看出它十分奇怪，事情毋宁是对身体的拒绝吗？

癔症者不是奴隶。现在就依照这个主体最常化身的性别，称她为“她”吧：

- 她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某种罢工；
- 她不交出自己的知识；
- 可是她又揭开主人的功能，并且仍同它休戚相关。确切地说，她凸显大写的“一”之中属于主人的东西，同时又把自己作为主人欲望的对象从中抽离。

这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已经辨认出来的特殊功能，至少在我的学派领域中，它被称为“理想化的父亲”。

我们不绕弯子，重新谈多拉。[注1] 我只能假定，在场听我讲话的人都熟悉这个案例。还没有打开过这篇文本的人，太遗憾了！赶紧去读！

必须读《多拉》，并且穿过那些“迂回的”解释去读……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五篇精神分析：一个癔症分析的片段》（多拉），巴黎大学出版社，1970 年，第 1—91 页。

我有意采用“迂回”一词，这是弗洛伊德自己用来形容其策略安排的。阅读时不要忽略某种东西；我敢说，弗洛伊德以自己的偏见遮盖了它。

我插一句。无论你们是否记得原文，都请回去翻看。你们会发现一些在弗洛伊德看来不言自明的句子。

例如，一个姑娘遇到这种小麻烦——也就是某位先生突然扑到她身上——会自行处理；当然，“好姑娘”不会因此大闹一场。为什么？因为弗洛伊德就是这样想的。

还有更进一步的一句：“正常的姑娘”在别人向她献殷勤时不应感到厌恶。这看似也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接近多拉所揭示的东西时，我所谓的偏见确实这样运作着。

如果我们保留我一直试图让你们习惯的几个参照来阅读原文，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迂回”，你们会看到，连你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这样形容不正当。

弗洛伊德说明了多拉在爱情事务中的“策略”有着何等惊人的细腻与机巧：多重层面相互折射，穿过接连三四道防御而翻转。也许，这正好呼应了他在《梦的解析》中为自己的文本所作的命名，并使你们看出：这些迂回取决于某一种接近方式。

为什么不依照我今天开头提出的原则，试着赋予她的能指衔接所构成的主体情势某种客观性？为什么不从这里出发：父亲是整场冒险或不幸的枢纽，而他恰恰是一个被阉割的男人。我指的是他的性能力；很明显，他已经衰竭，病得很重。

在《癔症研究》的所有病例中，“一个被阉割的男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项象征性评定。请注意，病人或临终者终究只是他实际所是的那个人；若以他在一项并未实际履行的功能上有所欠缺来衡量他，严格说来，就是给他指定一个象征位置。

这等于忘记——或者更确切地说，含蓄地宣称——“父亲”终究不只指他实际所是的那个人。父亲是一个称号，就像“老兵”；也就是“曾经的生育者”。一个人如同一生都是老兵那样，直到生命终结都是父亲。

这意味着，“父亲”一词总含有某种尚具创造潜能的东西。正是相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象征领域中注意：父亲在癔症者的话语里扮演枢纽、主要乃至主人的角色时，恰恰从创造潜能这个角度维持着自己相对于女人的位置，即便他事实上已经无能为力。

这便规定了癔症者同父亲关系的特殊功能，也正是我们所谓“理想化的父亲”。

我们仍就事论事。我说过不绕弯子，所以直接采用多拉；请你们听完以后重读这个案例，看看我说得是否属实。

我在这里颇特别地称为“第三个男人”的 K 先生，他身上究竟有什么适合多拉？问题正在这里；尽管我早已说过答案。

为什么不直接依照主人的话语之结构定义来回答？适合多拉的是这个观念：他拥有那个器官。我说的是器官，听清楚了！

弗洛伊德精确地察觉并指出了这一点。多拉十四岁时，这个男人把她堵在一道门洞里；在她同他初次接触、或者说初次挂钩时，这一点起了决定作用。

这件事丝毫没有改变两家人的关系，也没有人想到要为此惊讶。依弗洛伊德之见，姑娘总会自行处理这类事情。

真正奇怪的是，有时她不再自行处理，反而要把所有人卷进来——不过那是在后来。为什么？

毫无疑问，使第三个男人 K 先生有价值的是他的器官，却不是为了让多拉从中获得幸福；可以说，是为了让另一个女人剥夺她对这个器官的享有。

多拉感兴趣的并不是珠宝，哪怕它毫不隐讳地暴露着；正如第一个梦所显示的——记住，这段为期三个月的病例记述，整个就是盛放两个梦的杯皿——她感兴趣的不是珠宝，而是盒子。两个梦中的第一个梦说的是“首饰盒”：珍贵器官的外壳，才是她享乐的唯一所在。

她很懂得如何独自从中享乐；童年手淫在她那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多拉》病例并未告诉我们这种手淫的具体方式。它很可能同我所谓流动、淌出的节律有关，其原型就是遗尿。多拉的病史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症状在较晚时候受哥哥诱发；哥哥比她大一岁半，直到八岁仍有遗尿，而多拉后来在某种意义上接替了他。

遗尿十分具有特征性；可以说，它是孩子在想象中取代父亲——恰好作为无能的父亲——的印记。

我请所有处理过儿童及这一插曲的人作证；人们相当经常因此请分析家介入，他们可以从经验中作出检验。

再加上对 K 夫人的理论性凝视——容我这样说——它在多拉面对德累斯顿圣母像、目瞪口呆地停留时充分展开。K 夫人懂得维持理想化父亲的欲望，也懂得“容纳”它——拉康在这里玩弄词义——并由此剥夺多拉的对应项，使这个对应项在她的把握中受到双重排除。

整个情结由此成为同一种享乐认同的标记，而这享乐正是主人的享乐。

顺带一提，别忘了人们曾把遗尿类比于野心。

不过让我们确认：K 先生送礼的条件，就是礼物必须是盒子。他给她的无非是首饰盒；珠宝则是她自己。

至于他自己的珠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毫不隐讳——就让它到别处安身，而且要让人知道。由此才有那场决裂；K 先生说“我的妻子对我什么也不是”时，我早已指出这场决裂的意义。

的确，在那个时刻，大他者的享乐向她呈现，而她不要它。因为她想要的是作为享乐手段的知识，却要让知识服务于真理，服务于她所体现的主人之真理。她以多拉的身份体现着这项真理。

把这项真理说到底，就是：主人已被阉割。

如果唯一能够代表幸福的享乐——我上次把它定义为完全封闭的阳具享乐——支配着主人；请留意我恰恰使用了“主人”一词，那么这种享乐只有把主人排除在外才能支配他。否则，主人怎样能够建立同知识的关系？知识掌握在奴隶手中，而这种关系的收益，就是强行逼取剩余享乐。

同样，第二个梦标明：象征父亲确实是死去的父亲；人只能从一个空无、断绝交流的地方抵达他。

回忆一下梦的结构。多拉收到母亲的通知：“愿意就来吧。”

这仿佛回响着 K 夫人过去对多拉说的话：请她前往那个地方；在那里，即将发生她同 K 夫人丈夫的决裂，以及我们谈过的全部戏剧性事件。现在，母亲说：“愿意就来吧，你父亲死了，人们正在安葬他。”

至于她怎样抵达那里——梦里始终不知道她借何种方式抵达——她来到一个地方，还得询问："那位先生，也就是我父亲，真住在这里吗？"仿佛她自己不知道！

那套公寓是一只空盒子，已被人遗弃。那些邀请她的人已经离开，去了另一边的墓地。在那里，多拉轻易为父亲找到一个替代物：一本厚书，也就是字典；人们在字典里知道、学习有关性的知识。这清楚地标明，即使越过父亲之死，她所在意的仍是父亲所生产的知识——不是随便哪种知识，而是有关真理的知识。

这就足以为她构成分析经验。因为弗洛伊德帮助她取得这项被她珍重的真理——这也正是弗洛伊德把她维系在自己这里的原因——她会获得一种满足：使所有人承认这项真理，承认父亲同 K 夫人的真实关系，也承认她自己同 K 先生的真实关系。

其他人试图埋葬的那些插曲完全真实，而多拉是它们的代表。让它们得到承认，对她已足以体面地结束这场分析；即便弗洛伊德似乎对结局、尤其对她作为女人的命运并不满意。

这里还可顺带提出几条并非无谓的评论。有些东西总被当作隐喻。例如，弗洛伊德在释梦时停下来提醒我们：一个梦若要双脚站稳，仅仅代表主体面对当前处境的一项决定或一个强烈愿望还不够。

以首饰之梦为例：大火构成威胁，多拉必须离开现场。弗洛伊德还需要某种童年欲望来支撑这个梦。

对我们重要的是他采用的参照。人们通常把它当作修辞上的雅致：决定的企业家——当然就是作决定的人——要靠一位资源已有积累的资本家，归根结底是靠拥有力比多资本的资本家，才能让这项决定付诸行动。

听过我刚才所说的内容以后，这个比喻不是很有趣吗？我说过资本家同主人功能的关系，说过积累过程同剩余享乐之在场性质迥异……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剩余享乐之所以在场，正以排除那种肥厚的“享乐”为条件——也就是简单的享乐、在赤裸性交中实现的享乐。儿童欲望的力量，不正从这里取得吗？面对作为欲望之因的对象，它获得一种积累的力量。儿童尚未成熟，被排除在他人所谓“正常”享乐之外，力比多资本恰恰因此积累起来。

这一点突然赋予弗洛伊德关于资本家的比喻以特有的重音。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以清醒的勇气，使多拉的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那么，他在留住病人方面的笨拙表现在哪里？

请读那几行文字。弗洛伊德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不知该如何称说的骚动，坦白说，既动人又悲怆：也许，只要对她表现出更多兴趣——天知道他确实对她有兴趣，整篇病例足以作证——他就能让她把这项探索推进得更远；而依他自己的承认，他的引导并非没有错误。

幸好他没有这样做！我的意思是，面对他所感受到的多拉的要求——爱的要求——弗洛伊德没有以给予关注之满足的方式，像人们惯常所做的那样占据母亲的位置。

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这项经验后来改变了他的态度，我们是否也应把另一件事归因于它？弗洛伊德仿佛垂下双臂，灰心地发现，他为癔症者所做的一切最终只通向他贴上“阴茎嫉妒”标签的东西。

具体展开来说，就是女儿责备母亲没有把她生为男孩；也就是把某种东西以挫折的形式转移到母亲身上。就其能指本质而言，这东西赋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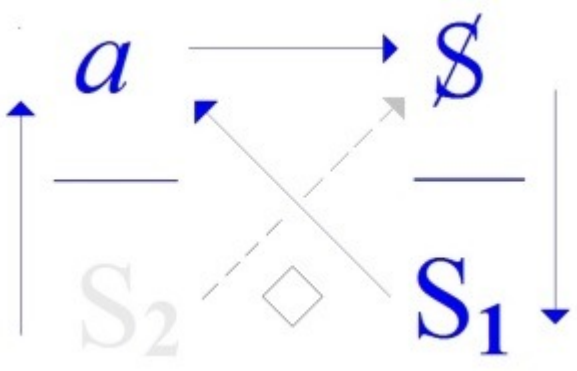
癔症者的话语相对于主人的话语而言的位置与活的功能，并分成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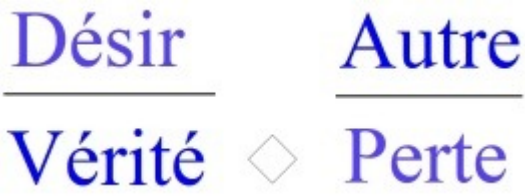
- 一方面，是理想化父亲的阉割；它交出了主人的秘密；
- 另一方面，是剥夺：主体——无论是否为女性——承担“被剥夺”这种享乐。

可是，弗洛伊德为什么会错得这样远？如果相信我今天的分析，他明明只须把送到手边的东西吃下去。

他为什么用一个神话——俄狄浦斯情结——取代自己从安娜、埃米、多拉这些金口中收集到的知识？

俄狄浦斯情结充当一种“自称真理的知识”。它位于那张尚未写出的图式中，也就是分析家的话语图式：某种知识 S_2 被置于我刚才所谓真理的位置。





确实奇怪的是，人们没有更早看清：如果所有解释都转向给予或不给予满足、回应或不回应要求，总之，转向以要求日益回避欲望的辩证法——一种必须为恒常对象作担保的转喻滑移——那大概正因为俄狄浦斯情结严格说来根本无法使用。事实上，谁会使用它？在一场分析中，引用这个著名情结究竟占什么位置？

我请在座所有分析家回答：学院的人当然从来不用它；[笑声]　我学派的人固然稍微努力一下，却什么也得不到，结果同其他人完全一样。[笑声]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它严格说来无法使用！唯一的例外，是粗略提醒人们：母亲会阻碍把任何对象投注为欲望之因。

分析家谈论所谓“复合父母”时作出的惊人臆造，只意味着一件事：建造一个窝藏享乐的大写　A，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上帝；值得同它玩一场剩余享乐的“双倍或归零”。这种运作就是所谓超我。

啊，我今天真是格外款待你们！[笑声]

我以前还没有处理超我这件事，自有我的理由：我至少必须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去年讲过的“帕斯卡赌注”才会变得可操作，并且证明超我恰恰是——也许有人已经猜到——我开始说出如下内容时所衔接的东西：拿来换取永恒生命之机会的生命、生命、生命，这段暂时的生

命，就是 a；但只有当大写 A 没有被划杠，也就是当它浑然为一时，这场赌局才值得。

可是，“复合父母”并不存在：父亲在一边，母亲在另一边。

同样，“主体”也不存在；它也分成两半，或者说被划杠。我的图式以 $(\not{S}, \not{A})$ 标出的对言说行为的回应，正指明这一点。由此便必须严肃质疑：人是否还能用剩余享乐同“永恒生命”玩“双倍或归零”。

求助于俄狄浦斯神话，确实有某种惊人之处；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

我原想今天让你们感受到弗洛伊德这里有多么惊人。

哪怕只看最后一篇《精神分析新论》：他仿佛相信，把宗教排除在一切可接受的地平线之外的问题已经得到裁决；相信精神分析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相信自己说完如下内容便已了结宗教——宗教的支撑无非是孩子童年时求助的父亲，孩子知道他在某种意义上“全是爱”，会主动迎向并预先消除孩子可能出现的不安。

当我们知道父亲功能实际是什么时，这难道不奇怪吗？当然，弗洛伊德呈现给我们的悖论不止这一端。

他把父亲关联于某种原初享有全部女人的享乐，这个想法也很奇怪；因为众所周知，一个父亲勉强只够一个女人，而且还不能吹嘘！

父亲同主人只有最遥远的关系——我说的是我们熟悉的、实际运作着的父亲。归根结底，至少在弗洛伊德面对的社会中，是父亲为所有人劳动；他负责照管我刚才所说的 femme-il。

这难道还不够奇怪，不足以让我们提出：弗洛伊德事实上——即使并非有意——保存下来的，恰恰是他指出的宗教中最实质的东西，也就是“全是爱”的父亲这一观念？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这正是他在我刚才提到的文章中，从三种认同形式里分离出的第一种：[注2] 出于纯粹的爱而认同父亲。父亲就是爱；世上最先应当去爱的就是父亲。

弗洛伊德以为这种东西会使宗教蒸发，然而它却奇异地存续下来。他用这个拼合得古怪的父亲神话保存的，正是宗教本身的实质。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1921 年。

当然，我们还会回到这里，但你们已经能够看出问题的关节：这一切最后通向谋杀的观念——原初父亲就是被儿子们杀死的父亲，随后某种秩序从对这位死去父亲的爱中产生。

可是，这个说法有着巨大的矛盾、巴洛克式的繁复和多余的累赘；它似乎无非是在防御某件事。远在弗洛伊德选定这个神话、从而把那些真理缩窄以前，纷繁的神话早已清楚说出了这件事：真正要遮掩的是，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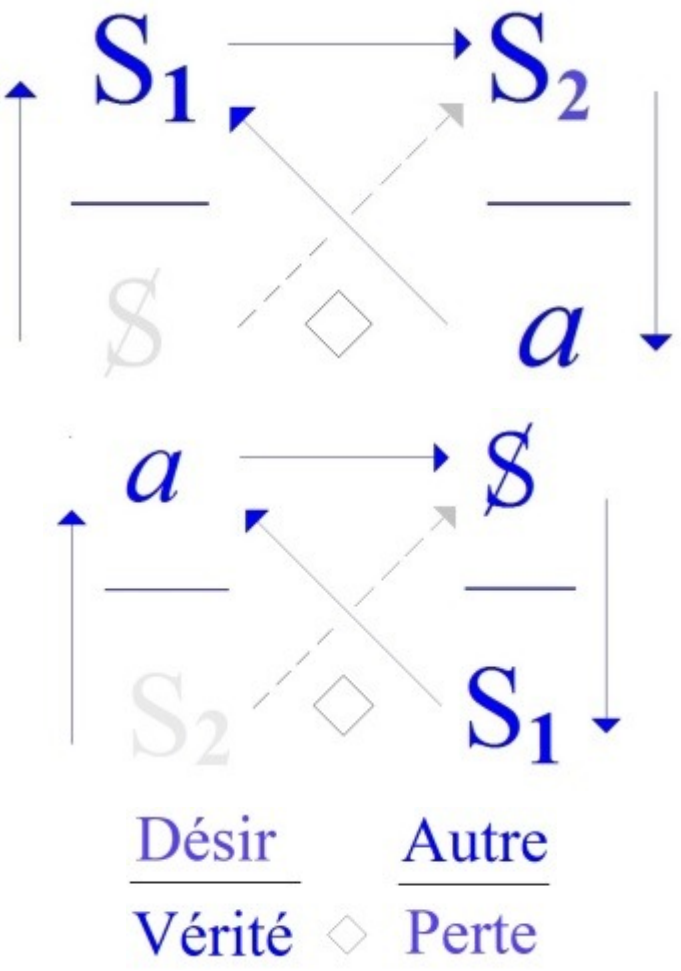
父亲一旦进入我们正在辨明方向的主人的话语领域，从起初就是被阉割的。这就是弗洛伊德赋予父亲的理想化形式。

这一点被完全遮蔽了。可是，即使癔症者经验所提供的不是直接陈述，至少那些配置本应在这里更好地引导弗洛伊德。

在分析本身的层面上，俄狄浦斯情结本应提示：一切都必须重新质疑；所需的知识必须能够在真理的位置受到质询。这正是我们今年试图向你们逐步展开的目标。

第7课 ・ 1970年3月11日

我将试着为你们表述分析话语。有一点值得注意：种种迹象使它乍看便显得同主人的话语相近；但更确切地说，分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主人的话语之真理受到了遮蔽。



主人的话语　分析家的话语

我借 S_1、S_2、$\not{S}$ 与 a 这几个衔接要素在四个位置上的分布，使几种话语相互关联时可能产生的连贯性得到支撑。很清楚，我称作真理的位置，只有在考察来到这个位置的衔接要素如何运作时，才显出自身的区别。

这并非真理位置所独有；其他位置也一样。

举例说，我们至今只把这些位置叫作“右上”“左上”等等，这种定位当然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需要在运作的等价层面上加以命名。

例如，主人的话语中的 S_1，可以说同大学话语中前来运作的 S_2 全等或等价。为了固定你们的想法——至少固定一下心理调焦——可写成 $S_1(M) \approx S_2(U)$。

这个位置将被称作秩序的位置，或者说命令的位置。

它也是真理的位置，因为在我那些所谓“四脚”小图式中，真理潜伏在它下方；这确实构成一个问题……

在主人的话语层面，这个潜伏的位置只能容纳被划杠的主体 $\not{S}$。说实话，初看并没有什么迫使我们把主体划杠；因为在起初，还有什么不会安安稳稳地把自己设定为同自身同一呢？

我们会说，这正是被“主人化”的话语原则——不是说话语受到掌控，而是写成“主人—化”。作为被做成主人的话语，它自以为单义。

精神分析跨出的那一步，恰恰是让我们设定：主体并非单义。

这里有一个典范公式。两年前，我试图衔接“精神分析行动”时提出了它；[注1] 那条路中途搁浅，同其他一些路一样，永远不会再被拾起。这个有力的择一公式是：“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只要把它引入主人的话语，它立即显得醒目而富于回响。

不过，要证明它，我们必须在别处把它生产出来；只有在那里，它才不言自明。

它必须在癔症者的话语之主导位置自行产生，我们才能确知：主体被置于“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所表达的 vel（择一）面前：

- 我思之处，我不认得自己，我不在那里；这就是无意识；

> [注1] 指 1967—1968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

- 我在之处，我显然迷失了。

事实上，这样呈现并没有让我们直接看见；更准确地说，它显示了为什么这件事在主人的话语层面长期晦暗：主体恰好处在一个因其结构而遮蔽主体分裂的位置。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一切可能的言说来到真理的位置时会怎样吗？

我说，真理只能以半说陈述出来；我给你们的范型是谜语，因为真理总这样向我们呈现。

相关知识卡 拉丁语 vel、hic 与 nunc

当然，真理并不是以问题状态出现。谜语以致命危险的名义逼迫我们作答。

我们早已知道，真理只有对管理者才是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这句话曾被谁极其鲜明地说出，人所共知。[注2]

真理被迫采取的半说形式是一回事，主体借机掩藏自身分裂则是另一回事。

主体的分裂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如果“他不在之处，他思”；如果“他不思之处，他在”，那么他确实同时在两个地方。我甚至要说，Spaltung（分裂）这个公式并不恰当。

主体之所以分有实在界，恰恰因为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换个更准确的形象——这个形象绝非偶然——我会把主体比作电子：在波动理论与粒子理论的交界处，电子呈现给我们；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同一个电子同时穿过两个相隔的孔。因此，我们用主体之 Spaltung 表示的秩序，不同于真理的秩序；后者只在半说中陈述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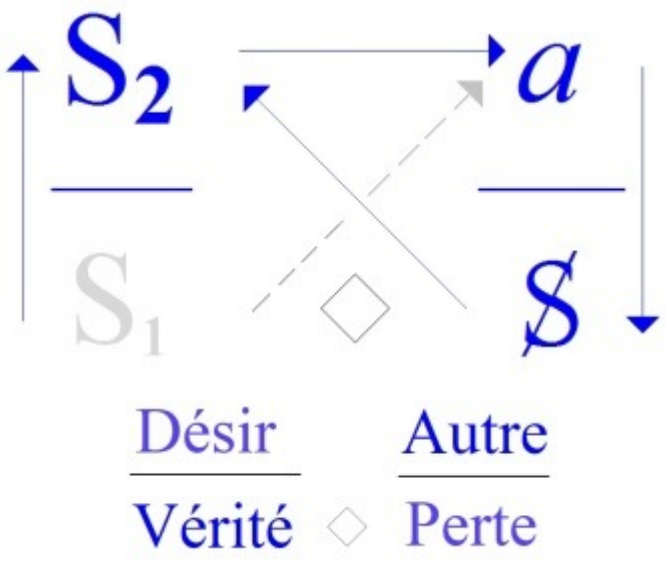
这里出现了一点必须强调：定位一种话语的每个公式，都带有真理只能以半说呈现所产生的那种两可——我们稍后会在另一个意义上重新采用这个词——因此，每个公式都能取得截然相反的意义。

> [注2] 本丢・彼拉多审问耶稣时，被囚犯的回答弄得不知所措，问道：“真理是什么？”参见《新约・约翰福音》18:37。

相关知识卡 彼拉多的“真理是什么？”与《约翰福音》18章38节

我有意标作“大学话语”的这番话语，究竟是好还是坏？

大学话语多少显出了自己会在哪里犯错；而它的根本配置同样显出科学话语依靠什么得到保证。



大学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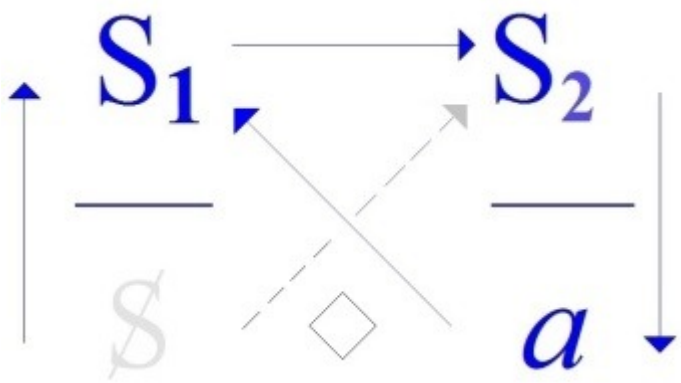
请在那里辨认 S_2：如我们的写法所示，它占据大学话语的主导位置。我已经告诉你们，知识来到秩序、命令的位置，也就是主人最初占据的位置。

而在它的真理层面，没有别的，只有主人能指 S_1 本身；它运作着，承载主人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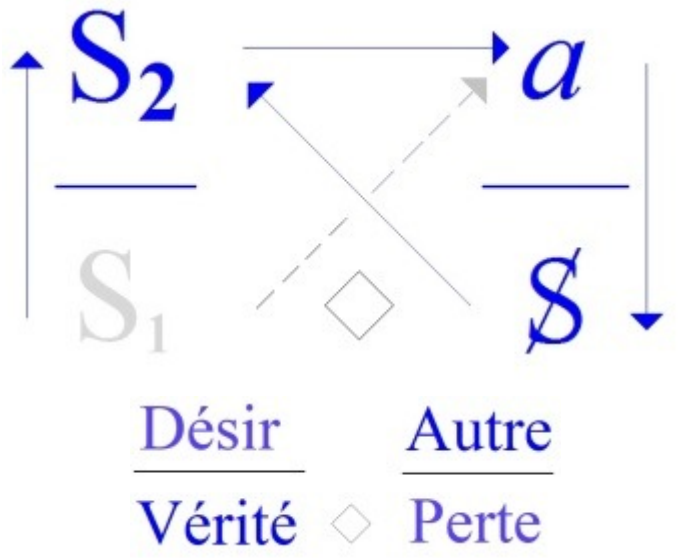
这正说明，思考这些问题的头脑曾经有过一段犹疑。高斯就是一个标志：他的笔记显示，他已经接近后来由黎曼提出的命题，却选择不把它们公布出来——“不能再往前走了”。

如果一项知识——哪怕只是纯逻辑知识——会动摇某种既有的安稳状态，为什么要让它进入流通？

显然，我们早已不在那个阶段。变化来自所谓“进步”本身，来自我描述为四分之一圈的翻转：知识 S_2 从奴隶层面的原初位置移出，仿佛发生了变质，成为纯粹的主人知识，受主人命令统辖。



→



主人的话语 → 大学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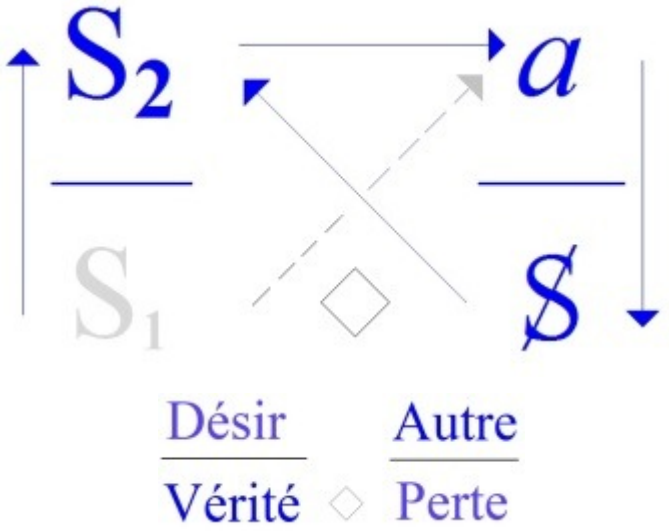
今天还有谁会以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为名，哪怕片刻设想阻止科学话语的衔接运动？事情已经摆在那里，也显出我们会走向何处：从分子结构走到原子裂变。

符号游戏通过内容的翻转和位置的组合变换，促使理论尝试接受实在界的检验；它在揭示不可能的同时，从中迸发出一种新的力量。谁还能片刻以为，这一运动可以停止？

人不可能不服从占据科学真理位置的命令："继续。向前。继续知道得越来越多。"

正因为主人能指 S_1 占据这个位置，关于它可能遮蔽什么的一切问题——"继续知道"这项命令的 S_1 因占据这个位置而含有什么谜——也就是有关真理的一切问题，严格说来都被碾平了。

真正成谜的是：在那些胆敢自称"人文科学"的领域里，"继续知道"的命令显然引起了一阵骚动。



同所有其他四脚小方格一样，始终是在大他者位置上的那一项工作，目的是使真理涌出；这正是劳动的意义。不论谁处在这里，只要他不工作，话语就无法运转：

- 在主人的话语中，这是奴隶的位置；
- 在科学话语，也就是大学话语中，则是 a—学生的位置——这里的 a 取大他者之意。我们可以玩弄一下这个词，也许会给问题换一副面貌。

刚才，在物理科学层面，我们看见学生受命“继续知道”。在人文科学层面，我们看见某种也许需要新词命名的东西。我还不能确定这个词是否合适，只凭初步接近、直觉和音响，我把它叫作 astudé。

如果我能让这个词进入词汇，成功的机会大概比当年试图替“拖把”改名更大；astudé 更有存在的理由。在人文科学层面，学生觉得自己是 astudé。

他之所以是 astudé，因为同所有劳动者一样，他必须生产某种东西。

相关知识卡 Astudé、alèthosphère、lathouse 与 soyousent

说实话，我的话语有时会激起同它相关的回应。这并不常见；偶尔发生，还是令我高兴。

我来到乌尔姆街高等师范学院时，恰好有些年轻人开始谈论“科学的主体”。其实，我在 1965 年那一年度的第一次研讨中，已经把它作为对象。

“科学的主体”这个题目切中要害，但显然并不顺利。他们挨了一顿敲打；有人向他们解释，所谓科学的主体并不存在。

他们原以为能在弗雷格话语中 0 与 1 的关系这个尖锐点上，使科学的主体涌现；人们却向他们证明，数理逻辑的进展已经可以把科学的主体彻底化约——不是把它缝合，而是让它蒸发。

然而，astudés 的不安同另一件事并非无关：他们仍被要求用自己的皮囊构成科学的主体。据最新消息，这在人文科学领域似乎造成了一些困难。

于是，一门一方面根基如此稳固、另一方面又显然如此具有征服性的科学——征服到足以自称“人文”，大概因为它把人当作腐殖土 humus〔话语 H、U、M〕——会引发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终究让我们重新落到脚上，并触及如下事实：在真理的位置上，人们放入了纯粹的命令，也就是主人的命令。

不要以为主人本人始终在那里；留下来的是命令。范畴命令“继续知道”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在场。用帕斯卡的话说，我们全都“登上了”科学话语这条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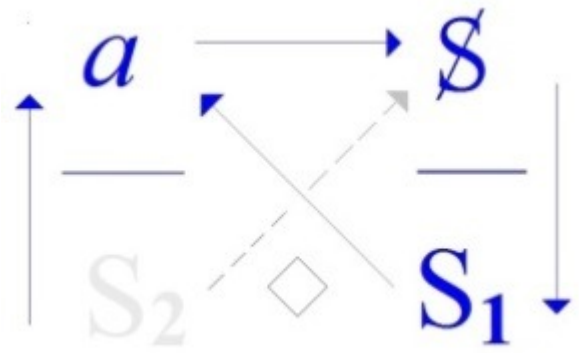
可是，半说仍由此得到证明：谈到人文科学的主体，没有任何东西站得住。

如果你们以为我的话暗示应当给科学踩刹车，以为回到高斯的态度也许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谁知道这种想法会不会从某个落后的小脑袋里冒出来？

这种归咎完全可以恰当地称为反动。我必须点明，因为在某些我讲话时并不倾向于往来的圈子里，人们未必不会从我的话中作出这种推论。

还必须充分领会：我所作的任何澄清，都丝毫不含“进步”的观念——如果这个词暗示一种圆满解决。

真理涌现时所产生的解决作用，有时令人欣喜，有时却造成灾难。没有理由认为真理必然总是有益的。当一切都证明相反时，还想象这种事，真得是鬼迷了心窍。



分析家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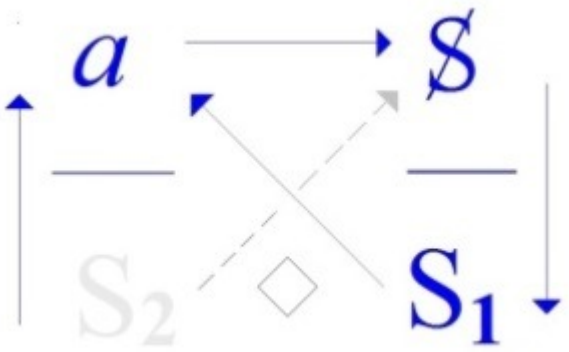
总之，在所谓分析家的位置上，也就是对象(a)自身来到命令的位置时——这在现实中不大可能，甚至是否有一个分析家知道这一点都成问题——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设定：对象(a)同主体眼中作为求知欲之原因的对象(a)完全同一。分析家把自己作为靶点，呈给精神分析这项荒谬的操作；这项操作沿着求知欲的踪迹展开。

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们，求知欲并非自然如此。人们发明“认识论驱力”这个名字；我们还得看看它会从哪里涌现。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主人不可能独自发明这种欲望，必须有人把它强加给他。分析家也并非从来就是显而易见的存在，而且如今也不再由

他激起求知欲；他只是把自己作为靶点，呈给任何被这种格外成问题的欲望咬住的人。

我们还会回到这里。眼下，让我们先准确标出所谓分析家的话语之结构，如你们在这里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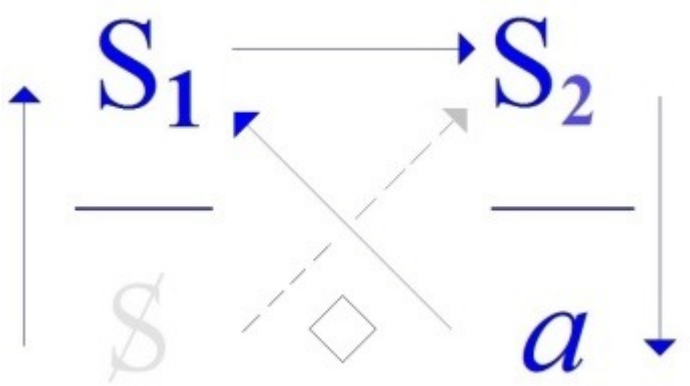


分析家的话语。

分析家对主体说：“来吧，说出——像人们常说的——一切掠过你脑中的东西。不论它们多么分裂，不论它们多么明显地证明：要么你并不思，要么你根本什么也不是，都不要紧；你生产出来的东西总会被接纳。”

这很奇怪。以后我们要逐一点明原因；现在已经可以勾勒如下：结构上方横线存在一道很强的联结，一种根本关系。简要地说，就是主人的话语同奴隶相联的 $S_1 \rightarrow S_2$。

- 因此——黑格尔如是说——奴隶经过时间会向主人证明主人的真理；
- 也因此——马克思如是说——奴隶一直忙于酝酿主人的剩余享乐。



为什么这份剩余享乐应当归给主人？这当然正是被遮蔽的地方。

马克思那里遮蔽的是：剩余享乐应当归给主人的原因。主人放弃了一切，首先放弃了享乐，因为他把自己暴露在死亡面前，并始终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在黑格尔的衔接中，这一点很清楚：主人固然剥夺奴隶支配自身身体的权利，却——这算不了什么！——把享乐留给了奴隶。

如果主人在这一切中稍作努力，让一切运转，也就是下达命令，那么很清楚……

我想当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但重要的事怎么重复都不嫌多。正是这样，享乐重新回到主人触手可及的范围，并显出自己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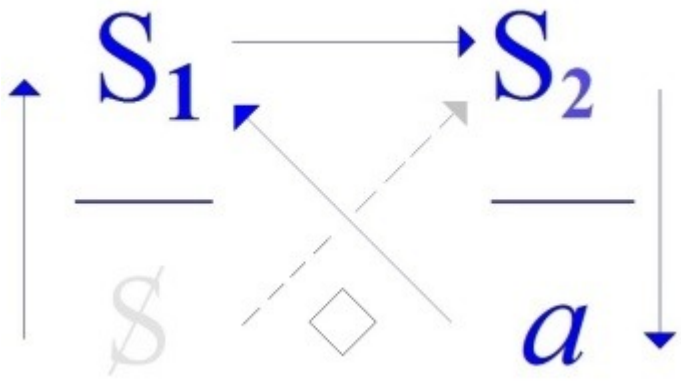
主人只要履行自身功能，就会失去某种东西。至少正因为有所失，一部分的享乐必须返还给他；这正是剩余享乐。

如果主人经过时间，没有凭那股执意自我阉割的狠劲把剩余享乐计入账目，没有把它变成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奠定资本主义——马克思本会看出：剩余价值就是剩余享乐。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资本主义已经奠定，也不妨碍剩余价值的功能及其毁灭性后果得到极其准确的指认。可是，要真正克服它，也许至少必须知道它衔接的第一个时刻。

即便在“一国社会主义”层面把生产资料国有化，只要不知道剩余价值是什么，也不等于已经终结了它。

因此，剩余享乐还向我们显示：在主人的话语层面——它毕竟就位于那里——成为主人这类人的欲望之因 a 的东西，同构成真理的东西之间没有关系。主人照例对此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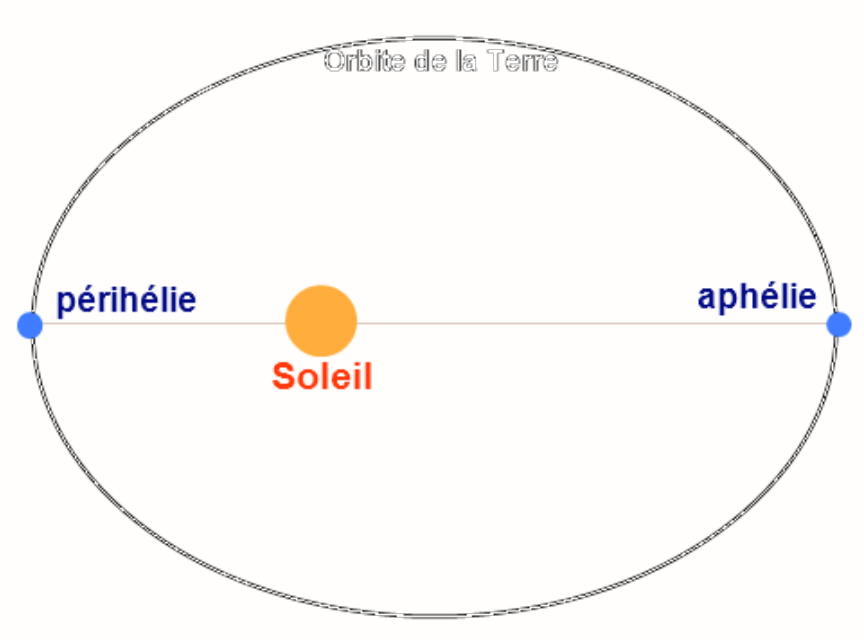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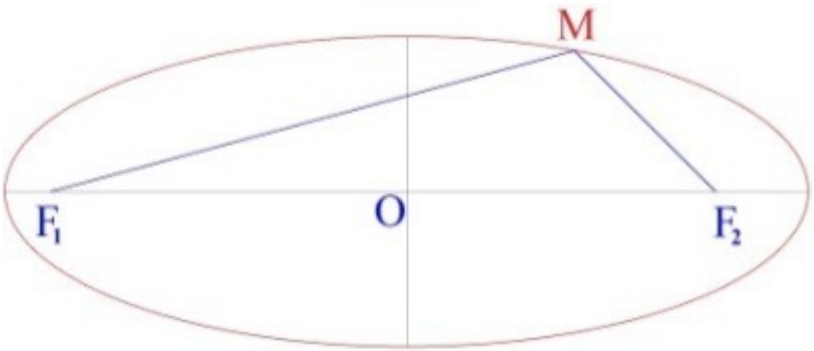
因为在四格图式的下层，二者之间有一道屏障 ◊。

在主人的话语层面，这道屏障马上就可以叫出名字：它就是享乐，因为享乐从根本上受到禁止。人只能从中舔取一点点享乐；幻想公式是 $a \lozenge \not S$。

这里的“产物” a 无法抵达被禁止的享乐；它借阳具性的重新发动 $a \to S_1$ 擦过洞 ◊ 的边缘，只舔取一点享乐。

参见《再来》1973 年 1 月 16 日关于牛顿万有引力之“它落下”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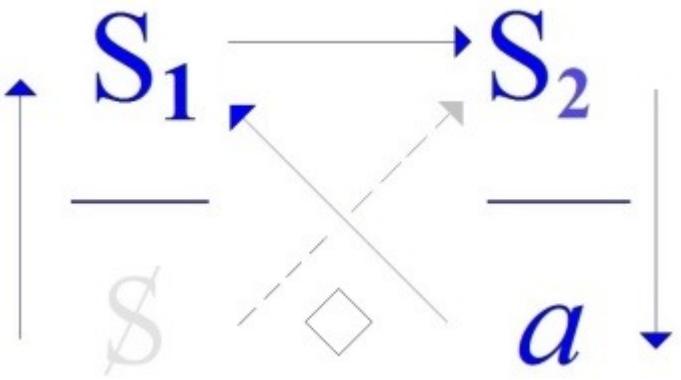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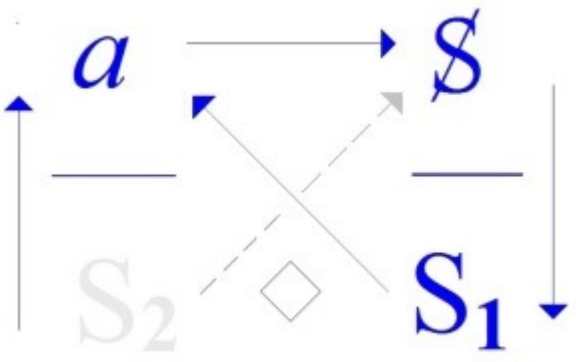
要把话说到底，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它怎样具体体现，不必再搅动那些致命幻想。

这个对主人的话语作出规定的公式，其有趣之处在于：只有主人的话语使我们在别处标作幻想的衔接不可能成立，也就是 a 同主体分裂的关系 $a \lozenge \$$。

主人的话语在根本起点上排除幻想。说实话，这正是它从根基上彻底盲目的原因。



↔



主人的话语 ↔ 分析家的话语。

我们将会看到：在别处，特别是在分析家的话语中，幻想以完全均衡的方式展开在一条水平线上。它能在那里显现，这使我们对主人的话语之根基多知道一点。

无论如何，回到分析家的话语：处在真理位置的是知识，也就是现有 S_2 的全部衔接、一切可以知道的东西。它是在我的写法中被放在那里；我没有说在实在界中。

换句话说，在分析家的话语中，“能够知道的东西”受邀在真理的领域中运作。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感觉，这同我们有关。

我绕道谈到当下并非无缘无故。知识以所谓现代科学的形式展开一场难以容忍的疾驰；我们纵然看不远，也许仍能由此感觉到：如果“依真理质询知识”这句话在某处有机会取得意义，那么至少只要我们信任这座小转盘，它就只能在分析家的话语中取得意义。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顺便说一句，这也使我有理由提出：既然有一次，我正要谈“父之名”时，人们多少堵住了我的嘴，那么我以后再也不谈它！

这听上去像是淘气、不太友善。谁知道呢？甚至有些科学狂热者会说：“继续知道！怎么回事，你必须说出你对父之名的所知！”

我不会说出自己对父之名的所知，因为我恰恰不属于大学话语。

我是分析家的一个 a，[笑声] 一块预先遭到弃置的石头。即便我在分析中成为房角石，只要从扶手椅上起身，我就有权出去散步。[笑声]

事情也可以倒过来：“匠人弃置的石头成了房角石”，[注3] 也可反过来说，房角石可以出去散步，不是吗？[笑声]

甚至，也许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让事情改变：房角石一旦走开，整座建筑就会垮掉！这对某些人颇具诱惑。好吧，别开玩笑了。[笑声]

我只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谈父之名。它所处的位置，毕竟正是知识发挥真理功能的层面。在这里，即便知识同真理的关系对我们仍很模糊，我们也严格地注定只能以半说陈述任何东西。要清楚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充分感到它的分量。它意味着：当我们在这个秩序、这个领域，以某种方式说出一部分东西，另一部分便因这个言说本身而变得绝对不可化约、彻底晦暗。

所以，归根结底存在某种任意性；人可以选择要照亮什么。我不谈父之名，便有机会谈别的东西。它不会同真理毫无关系，但不同于涉及主体时的真理。好，这只是一个插句。

当知识来到真理位置，也就是来到分析家的话语中，会发生什么？我想，你们不必等我现在才说便应想到。来到这里的东西有一个名字：神话。

> [注3] 《诗篇》118:22：“匠人弃置的石头，已成为首要的房角石。”

相关知识卡 “匠人弃置的石头”与房角石

人们并没有等到主人的话语充分发展，在资本主义话语中吐露最终秘密、同科学奇异交配以后，才看见这一点。它一直清楚可见；至少，当我们谈最初的真理时，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些。

这项真理终究同我们略有关系。科学让我们放弃它，只留下命令“继续知道”，而且是在某个同你自身所关心之事颇不协调的领域里继续知道。是的，真理的位置由神话占据。

如今，人们已把神话做成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我的意思是，关于神话最严肃的论述，都从语言学出发。

我当然要强烈建议你们查阅朋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文集《结构人类学》，[注4] 尤其是第十一章《神话的结构》。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同我所说完全一样的陈述：真理只能由半说支撑。

他把神话素称为“大单元”。第一次严肃考察这些大单元时，他写道——这并非我要强加给他的说法；我要逐字读出他写下的话：

“不可能把若干关系群连接起来……”这里说的是“关系束”，他正这样定义神话。“这种不可能性被如下断言克服——或者更确切地说，取代：两个相互矛盾的关系是同一的，因为每一个关系都像另一个一样——像另一个一样！——同自身矛盾。”

总之，半说是一切真理之言说的内在法则，而神话把它体现得最好。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还停在这里就宣布完全满意。总之，精神分析话语中典型而核心的神话，正是俄狄浦斯神话。我想你们都能回答这一题。

俄狄浦斯神话的使用在长期研究神话的人那里引起的反应，颇为有趣。人们当然不是等到亲爱的朋友列维-斯特劳斯带来典范性的澄清以后，才开始热切关注神话的功能。

> [注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普隆出版社，1958 年；或 Pocket 第 7 号，1974 年。

在了解神话的圈子里，即便人们未必依我刚才的方式定义它，哪怕最迟钝的操作者也很难不看出：谈论神话所能说的无非是，真理显现在严格对立的事物交替之中，必须让它们围绕彼此旋转。

从有世界以来，人们建构了各种东西，甚至包括你们愿意举出的那些更高级、更精致的神话，例如阴与阳。围绕神话，人可以大肆胡扯；因为那里恰恰是胡扯的领域。而我一直告诉你们，胡扯就是真理，二者完全同一。

真理允许人把一切说出来。只要排除相反面，一切都是真的。

不过，事情如此仍会发挥作用。

至于弗洛伊德使之运作的俄狄浦斯神话，我可以告诉不知道的人：神话学家听了往往发笑，觉得这种做法极不恰当。为什么要赋予这个神话特权？

第一次严肃研究已经表明，俄狄浦斯神话远为复杂。列维-斯特劳斯也恰巧不回避检验，在同一篇文章中给出了完整的俄狄浦斯神话。由此可见，问题完全不是要不要同母亲性交。

不久以后，一位完全称职的神话学家也作出有趣的反应。他出自正统学派、正统脉络；这条脉络从博厄斯开始，恰好汇流到列维-斯特劳斯。这个人名叫克罗伯。[注5]

克罗伯曾写书猛烈抨击《图腾与禁忌》，二十年后却又写了一篇东西。看来这件事一直刺挠他、困扰他：他把《图腾与禁忌》骂得一无是处，后来又看着这种批评蔓延，连最普通的学生都以为自己可以跟着合唱；这一点他终于忍受不了。

于是，他指出俄狄浦斯神话终究必有其存在的理由；那里确有某种东西。虽然他说不清是什么，但总之那里有一块硬骨头。

他没有再说更多。不过，在他批评《图腾与禁忌》以后，我们仍须承认，这本书的构成——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希望我今年讲它——是人能想象到最曲折的东西之一。

我倡导回到弗洛伊德，并不妨碍我说《图腾与禁忌》十分曲折。恰恰因此才必须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终究是一个会写、会思的人；如果文本这样曲折，必有理由。

> [注5]　　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图腾与禁忌：一种民族学的精神分析》，载《文化的性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2 年，第 301—309 页。

相关知识卡 克罗伯对《图腾与禁忌》的两次评议

我不会再补一句“《摩西与一神教》就更别谈了”；恰恰相反，我们要谈它。

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们，我终究在依次安排事情。我不能一开始就铺这样一条路——当然，整条路都是我自己铺的，没有人帮助我——我先得让人知道《无意识的形成》或《客体关系》究竟是什么。[注6]

如今，人们也许以为我只是在弗洛伊德周围翻筋斗；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好，让我们多少试着抓住弗洛伊德那里俄狄浦斯神话的情况。今天不会讲完。你们也看到了，我并不着急；我凭什么累坏自己？我就这样同你们谈，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再看我们磕磕绊绊能走多远。

> [注6] 《无意识的形成》，1957—1958 年研讨班，巴黎，瑟伊出版社，1998 年；《客体关系》，1956—1957 年研讨班，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 年。

我要从结尾开始，立即让你们知道我的目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先亮出底牌。

原来我并不打算完全这样讲，但至少会很清楚。

我丝毫没有说俄狄浦斯毫无用处，也没有说它同我们的工作毫无关系。它对精神分析家毫无用处，这倒是真的！不过，精神分析家未必真是精神分析家，所以这一点证明不了什么。

精神分析家越来越投身于一个真正极其重要的题目：母亲的角色。说实话，我早已开始接近这些问题。

母亲的角色，就是母亲的“钟情”。它绝对关键；因为母亲的钟情不是可以轻易承受、可以无动于衷的东西。它总会造成损害，不是吗?

想象一条巨大的鳄鱼；你就在它嘴里。这就是母亲，不是吗?

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突然合上大嘴。这就是母亲的欲望。

因此，我试着说明，让人安心的是那里有一块硬骨头——我就这样给你们说些简单的东西。[笑声]

那里有某种让人安心的东西——我略作即兴发挥，[笑声]——像一根石头做的坚硬圆柱，潜在地横在大嘴开合处，把它挡住、卡住。这就是所谓阳具；万一大嘴突然合拢，这根圆柱会庇护你。

这些东西我当年已经讲过，因为那时面对的是一群必须迁就的人——精神分析家！必须把东西讲得这么粗大，他们才会明白。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笑声]

我就在这个层面谈论父亲隐喻。我从来只以这种形式谈俄狄浦斯情结。

这多少应当有所暗示。既然我说它是父亲隐喻，而弗洛伊德呈现事情的方式显然并非如此！尤其是，他极其坚持那件事确实发生过，也就是那桩该死的杀死部落父亲的故事。

你们知道那出达尔文式闹剧：部落父亲——好像这种人曾留下哪怕一点踪迹。我们见过红毛猩猩，[笑声]　却从未见过人类部落父亲的一点踪迹！

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坚持这件事是真实的；他死死咬住这一点！他写整部《图腾与禁忌》，就是为了说事情必然发生过，一切都从那里开始——我们全部的麻烦，包括成为精神分析家的麻烦。

这真令人震动！至少应当有人对父亲隐喻兴奋一点，去做我一直希望别人做的事：每当我指出一个小孔、一条小路，便有人走上前去；我开始指路，他就替我踏出路径——但愿他甚至走在我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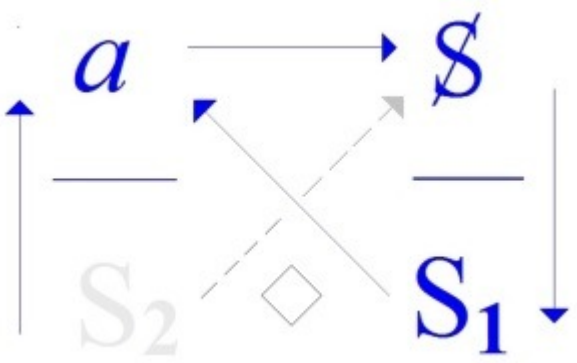
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所以，俄狄浦斯问题仍完整地摆在那里。

我要先作几条预备说明。你们看得出，我必须反复敲打这件事，因为它不能被轻轻带过。

分析实践中有一件我们真正熟悉、受过训练的事，就是显在内容与潜在内容的关系。这就是分析经验。

例如，对坐在那里的分析者来说，他的知识就是潜在内容。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让他知道自己在不知道的同时已经知道的全部东西。这就是无意识。

现在也许正该向某些精神分析家作一条有用的提醒：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潜在内容在另一边，也就是 S_1 的位置。



对分析家而言，潜在内容就是他将作出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我们在主体那里发现的知识……

相关知识卡 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书写与神话变换

而是添加到那项知识上、赋予它意义的东西。

我们暂时把显在内容和潜在内容放在一边，只保留这两个术语。

什么是神话？不要异口同声回答：“它是显在内容！”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显在内容，那就是神话！不过，这还不足以定义神话；刚才我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定义过它。

很清楚，如果我们依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技术把神话制成一张张卡片，把卡片叠起来，再观察它们怎样变化，便能看见两个神话如何组合。两个神话彼此的关系，恰好类似我的小装置转过四分之一圈。

这种操作会产生结果。无论如何，它同我的小装置一样是显在的；我写在黑板上的小字母并不潜伏。

那么，显在内容在那里做什么？必须把它交付检验。我们会看到，它经受检验以后不再那么显而易见。

让我们讲这段小故事吧；就这样推进，我尽力而为。弗洛伊德讲述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本没有被当作神话处理。

弗洛伊德引用索福克勒斯时，采用的是索福克勒斯的小故事，却减去了——你们马上会看出——它的悲剧性。

也就是说，他把作品限缩为：索福克勒斯的剧作揭示，一个人杀死父亲以后便同母亲上床。

杀父就是母亲的享乐，这里的属格应同时取客观与主观两种意义：人享用母亲，母亲也获得享乐；二者相联。

俄狄浦斯完全不知道自己杀死父亲，也不知道自己使母亲享乐或从她那里享乐，并不改变问题；因为这恰好是无意识的绝佳范例！

我想，我早已充分揭示“无意识”一词用法中的歧义。

- 作为名词，无意识确有支撑，也就是“表象的被压抑代表”；
- 作为形容词，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可怜的俄狄浦斯真是毫无意识”。

这里至少存在一个双关。

无论如何，即使这不妨碍我们，也仍须看看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

于是有了从索福克勒斯借来的俄狄浦斯神话；还有我刚才谈到的荒诞故事：原始部落的父亲遭到杀害。奇怪的是，后者的结果恰好完全相反。人们杀了把所有女人据为己有的老父亲。

这已经十分离奇：为什么所有女人都归他？那里终究还有其他男人，他们也许各有想法。

好，我们就从这里出发。

杀死那只老红毛猩猩以后，结果同俄狄浦斯神话完全不同：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我先放在括号里，因为它实在非凡——他们发现彼此是兄弟！

如果这能让我们对兄弟情谊略有所思，[笑声]　我就把它作为随口的想法交给你们；也许今年分别以前，我们还有机会回来谈它。

我们如此用力地主张大家都是兄弟，显然证明我们并不是兄弟。

即便面对同血缘的亲兄弟，也没有什么证明我们是他的兄弟；我们可能拥有完全相反的一组染色体。

所以，人们这样执迷于兄弟情谊——更别提自由、平等了，[笑声]——实在意味深长；终究应当看清它遮盖了什么。

我只知道兄弟情谊的一个起源——我说的是人类的，仍取腐殖土 humus 的 H、U、M——那就是隔离。

我们当然生活在一个一听见隔离就说“呸”的时代！如今到处都没有隔离，真是闻所未闻——至少读报纸会得到这种印象。

所谓社会——我恰恰不愿称它为“人类”社会；我保留自己的用词，留心所说的话，因为我不是左派。[笑声]　我只观察到：一切存在之物都建立在隔离之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兄弟情谊。

除此之外，任何兄弟情谊都无法设想，也没有丝毫基础——如我刚才所说，甚至没有丝毫科学基础。人们之所以成为兄弟，只因为共同受到隔离，同其余人分隔开来；而我们必须弄清这种隔离的功能，以及事情为什么如此。

然而，事情显然就是如此。长期佯装它不是真的，终究会造成一些麻烦。

我刚才说的正是半说！我没有告诉你们事情为什么这样。首先，因为一旦我说出事情如此，我便不能再说它为何如此。这就是一个例子。

无论如何，他们发现彼此是兄弟。人会问：这是以哪种隔离的名义？对神话来说，这个环节未免薄弱。

第二，他们齐心决定不许碰那些小妈妈。而且，妈妈还不止一位。既然老父亲占有所有女人，他们原本可以交换；他们只是同父兄弟，完全可以同兄弟的母亲上床。

似乎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图腾与禁忌》同通常使用的索福克勒斯参照毫无关系。

最荒唐的顶点则是《摩西与一神教》。摩西为什么非得被杀？弗洛伊德给出一个绝妙解释：为了让他在先知身上归来！

归来大概要经过压抑，就像记忆可以穿过染色体传递；我们只好承认。

我必须说，甚至琼斯这个蠢货所作的评论——弗洛伊德似乎没有读过达尔文——也说得对。[注7]

> [注7]　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巴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不过，弗洛伊德确实读过达尔文，因为《图腾与禁忌》那一手正建立在达尔文之上。

可以确定，《摩西与一神教》同弗洛伊德写下的其他一切一样，绝对引人入胜！如果你们是自由思想者，也许会说它无头无尾。好吧，以后再谈。

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次先知问题同享乐毫无关系。

我得告诉你们——也顺便指出，谁知道呢，也许有人可以帮我——我开始寻找一件支撑弗洛伊德陈述的小楔子：塞林在 1922 年出版的《摩西及其在以色列—犹太宗教史上的意义》。

塞林并非无名之辈；我已经弄到他的《十二先知》。这本书从《何西阿书》开始。

何西阿是一位“小”先知，却很大胆；据说，正是在他那里可以找到摩西遭杀害的痕迹。

我没有等到读塞林才去读《何西阿书》，但我这辈子一直没能弄到这本书；如今已经快气疯了，正翻遍整个欧洲寻找。法国国家图书馆没有，世界犹太联盟也没有。总之，它非常难找。

我想自己终究能弄到手。不过，如果你们中有人恰好把它装在口袋里，不妨下课时拿给我；我会还给他。[笑声]

无论如何，《何西阿书》里有一件事极其清楚。这部文本真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读《圣经》。我不能说自己在《圣经》中长大，因为我出身天主教家庭；[笑声]　我为此遗憾。不过，我也并不遗憾，因为如今——好吧，“如今”已经持续很久——每当读它，它都会给我疯狂的冲击。

那种家庭式谵妄、雅威对自己子民的种种告诫，一行同下一行彼此矛盾，真能使人头晕目眩。有一件事确定无疑：我们清楚看出它谈的是什么。凡同女人的关系都是他们所谓 Znout，也就是“律法之外”。这个词由 zaïn、noun、tav 三个字母组成。

我用很漂亮的字母写给你们看，不写成草体：



它的意思是“卖淫”。甚至在雅威对何西阿说话时，所谈的也只有这个：他的全体子民彻底卖淫了；而卖淫差不多就是周围的一切。

这很可能指向一个时代、一种语境：在那里存在分析话语探索主人的话语时所发现的东西——性关系并不存在。我已经向你们强有力地说过这一点。

我们大致可以想象，被拣选的子民身处另一种环境，那里存在性关系；这大概正是雅威所谓卖淫。

无论如何，如果在先知那里归来的是摩西精神，那显然不是一桩使人得以通向享乐的谋杀。

必须如实看待这些事情。整个故事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似乎从没有人提出这个反驳——它也许显得太直接、太愚蠢。况且，这并非真正的反驳；我们仍处在题目正中。只是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先知们归根结底从不谈摩西。我的一位最优秀的学生向我指出这一点；必须说，她是新教徒，所以比我更早熟悉这些经文。

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不谈弗洛伊德眼中那把钥匙：摩西的神同阿肯那顿的神是同一位，也就是一位“独一”的神。

你们知道，事情远非如此。雅威始终谈论其他神；他只说不得同它们来往，却没有说它们不存在。

他又说不可急着奔向偶像，甚至不可奔向代表雅威本人的偶像；金牛犊显然属于这种情况。人们等待一位神，就造出一头金牛犊；在当时，这再自然不过。

我们由此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即同真理的关系。

相关知识卡 金牛犊与“不可有别神”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真理是享乐的妹妹；我们还得回到这里。

可以确定的是，在“弒父—享母”这套粗陋图式中，被完全删去的是悲剧的动力。俄狄浦斯固然通过弒父获得自由接近伊俄卡斯忒的通路；但伊俄卡斯忒之所以被交给他，是由于民众的欢呼拥戴……

伊俄卡斯忒多少知道些内情，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女人不会毫无线索地安然处之。现场有一名仆人见证了整件事。后来人们在结尾重新找到这个仆人；他终究回过王宫。若他从未对伊俄卡斯忒说过一句“就是这个人干掉了你的丈夫”，那倒真奇怪。

无论如何，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俄狄浦斯之所以获准接近伊俄卡斯忒，是因为他战胜了一项真理的考验。我们会回到斯芬克斯的谜语。

如果《俄狄浦斯》的结局极其糟糕——以后还要看“极其糟糕”是什么意思，又到什么程度才叫极其糟糕——那是因为俄狄浦斯执意要知道真理。

我们由此看到：若要严肃处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参照，就不可能不在谋杀与享乐之间，引入真理这个维度。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一点十分清楚：只要看看弗洛伊德怎样衔接这个根本神话，就会发现，把它同俄狄浦斯归在同一个括号下实在牵强。摩西——天杀的摩西，此处真可以这样说！——同俄狄浦斯以及原始部落父亲究竟有什么关系？

其中必然存在某种显在内容与潜在内容之分。总而言之，作为今天的结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做的，是把俄狄浦斯情结当作弗洛伊德的一场梦来分析。

第8课 · 1970年3月18日

在座有一位听众认为应当回应我上次谈到的某种失望，我为此感谢她。当时我说，没有任何人——我说，没有任何人——给我这样一种快乐：

快乐，你们知道，就是最省力法则；有人沿着我开出的踪迹走到我前面，会给我这种快乐。

这位听众——我看见她在笑，她现在就在这里，何不说出名字：玛丽-克莱尔·布恩——给我寄来一份颇有意思的期刊抽印本。我没有读过她的文章，还是有理由可以自我辩解的。

这本期刊仿佛只因要置身于我的教学前沿才得以出版，名为《无意识》。我必须说，其中确有一些很好的文章。

只是，矛盾的是——也许正因为它至少在编委会层面以此作为授权原则——他们没有给我寄赠刊。

所以，当人们提醒我注意题为《父职》的第五期时，我先十分仔细地读了布恩的文章《弗洛伊德笔下的弒父》，[注1] 随后又读了朋友康拉德·斯坦的一篇文章。

谈到布恩的文章，如果她愿意，我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今天的释读文本。由此会出现一些问题，涉及她在《弗洛伊德笔下的弒父》中选择的道路。

说实话，我相信很容易看出：她 1968 年发表这篇文章时，其中没有任何内容越过或先于我当时已就俄狄浦斯情结提出的东西——我说过，那些推进十分谨慎。

> [注1] 玛丽-克莱尔·布恩：《弗洛伊德笔下的弑父》，载《无意识》第 5 期，1968 年 1 月，第 101—129 页；“难寻书库”2002 年再版。

还有另一种方法：今天我继续往前走，并指出，我迄今谨慎推进的内容已经蕴含这一步。

这样，也许以后相遇时，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获得更清楚的阐明。若今天只让你们悬在一篇文章的各个论点上，那篇文章尽管从多方面呈现出某种开放、某种提问，也可以说是在为下一步作准备，目标反而未必清楚。

我们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作选择。不过，如果她不明确表示今天应当评论她的文章，我就把发言机会留给她。

玛丽-克莱尔·布恩——“我不认为一开始……”

好，我想我们会采用第二种方法。

父亲之死的确似乎是一切言说的钥匙和敏感点；人人都知道，这不仅发生在神话层面，也关乎精神分析面对的一切。

布恩在文章结尾甚至暗示，很多东西都源自父亲之死，尤其是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据说精神分析会借它以某种方式把我们从律法中解放出来。多么伟大的希望！

我当然知道，人们正是在这个层面给精神分析别上一枚自由主义徽章。可是，说实话，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这正是我所谓“精神分析的反面”的全部意义。

父亲之死若呼应着那项以尼采为重心的陈述，呼应着“上帝已死”这则宣告、这条好消息，那么在我看来，它也绝不会把我们从律法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

最先提供证明的，正是弗洛伊德自己的言说行为。布恩在文章开头恰当地指出这一点；两次研讨以前我也说过：宣布父亲之死，同弗洛伊德自称的动机并不矛盾。他把这个动机说成对宗教的分析式解释：宗教本身建立在某种东西上，而他相当出人意料地首先提出——父亲是那个被承认为值得爱的人。

这里已经显出一个悖论；它使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略感为难：精神分析似乎宁可维持、甚至多少保存宗教领域。

我认为这里同样可以说，事实并非如此。

精神分析的锋芒确实是无神论，但必须赋予这个词不同于“上帝已死”的意义。因为一切都显示，“上帝已死”远没有质疑真正涉及的东西——律法；反而巩固了它。

我早已指出，老卡拉马佐夫说：“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被允许。”然而，从我们的经验文本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对“上帝已死”的回答应为：“上帝已死，从此什么都不再被允许。”

为了阐明我预告给你们的地平线，让我们从父亲之死出发——如果弗洛伊德确实把它说成享乐的钥匙，也就是被认同为母亲的至高对象之享乐的钥匙。

乱伦所瞄准的母亲——可以确定，弒父之所以进入弗洛伊德学说，并不是为了解释“同母亲上床”是什么意思。恰恰相反，正是从父亲之死出发，对这项被设为首要的享乐的禁令才建立起来。

说实话，涉及的不只是父亲之死，而是弑父——那位作者也把它准确写进自己提问的标题。依俄狄浦斯神话的陈述，享乐的钥匙就在这里。

如果仔细察看这则神话，就会发现它确实如此呈现。我说过，必须把它当作它实际所是的东西，也就是显在内容；所以首先要把它衔接清楚。

在弗洛伊德借用的悲剧层面上，俄狄浦斯神话清楚表明：弑父是享乐的条件。如果拉伊俄斯没有被清除——尽管俄狄浦斯在那场冲突以后是否会立即继承对母亲的享乐，尚不确定——这种享乐就不会发生。

可是，俄狄浦斯以弑父为代价取得享乐吗?

这里出现了最主要的东西。由于参照取自一则在悲剧中付诸行动的神话，这一点尤其鲜明。

俄狄浦斯解放了人民，使他们摆脱一个正在夺走最优秀者的问题；他试图回答那项以谜语形式出现的东西。谜语由斯芬克斯这个暧昧存在支撑；斯芬克斯把双重配置具体化，它同半说一样，由两个半身组成。

俄狄浦斯给出回答，于是——歧义就在这里——取消了真理问题在人民中造成的悬置。

这是否意味着，他给出的回答落入真理的陷阱？他当然不知道这个回答何等预先道出了自己的悲剧；而且，一旦必须作出选择，他回答“是人”，也许就已经落入陷阱。因为，究竟什么知道“人”是什么?

难道把人归结为如下过程，就已说尽一切？俄狄浦斯情形中的过程何等暧昧：先以四肢爬行，再用两条后腿行走——而俄狄浦斯及其整个家系恰好都“走不直”；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准确指出，Œdipe 就是“肿脚”——最后再借助一根手杖。

那根手杖纵然不是盲人的白杖，对俄狄浦斯来说仍必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第三项：他的女儿安提戈涅。

真理退到一旁，这是什么意思？是为了给俄狄浦斯留出返回之路吗？

他面对的第二场灾难更为巨大：不再只是斯芬克斯向自愿应试的人发问、从而逐一夺走人民中最优秀者；这场灾难以古代主题所谓瘟疫的暧昧形式，袭击整个民族。正因为俄狄浦斯执意面对它，弗洛伊德才向我们指明：真理问题对俄狄浦斯重新展开。

这个问题最终通向什么？就第一步近似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把它同阉割所付的代价关联起来。

这样就说尽了吗？不是“鳞片从他的眼前落下”，而是他的眼睛像鳞片一样落下。这样就说尽了吗？

我们难道没有在这个对象中看见：俄狄浦斯并不只是承受阉割；我宁可说，他被还原成阉割本身。作为对象(a)的一个特选支撑——他的双眼——从他那里消失以后，留下的正是阉割。

俄狄浦斯并非经由继承登上王位，而是由于被选作主人：他抹除了真理问题。要是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那么——你们已经熟悉我的陈述——主人位置的本质就是被阉割。

我们难道没有在这里发现一项虽受遮蔽、却已得到指明的事实：严格意义上的继承同样源自阉割？

如果儿子……

幻想总以一种颇为奇怪的方式指示它，却从未把它真正联结到弑父这个根本神话——如果阉割正是落在儿子身上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全部经验难道没有同样显示：儿子正由此依照恰当道路进入父亲功能？

这不正表明，阉割从父亲传给儿子吗？

既然死亡被呈现为起源，我们难道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种遮盖方式？分析家位置使某种东西得以涌现、得到经验；然而，死亡仍把阉割功能在主体进程中的根本特征遮盖起来，以某种方式用帷幕罩住它、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我们由此避免把问题推进到最尖锐之处；而分析家自身的位置本可以最终、严格地陈述这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

弗洛伊德最初在《梦的解析》中遇见父亲这个根本神话，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依他自己的说法……

康拉德·斯坦的文章对此作了出色阐明：[注2] 梦中显现出一个愿望，一个死亡愿望。斯坦精彩地批评了这一点：父亲实际死亡时，这些死亡愿望反而激增。

如果《梦的解析》确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源自父亲之死，那么这不也构成一项标记吗？斯坦再次回到这里并加以强调：主体自认应为父亲之死负责，这层罪疚背后隐藏的，恰恰是父亲永生的愿望。

这条路线也延续了分析心理主义置于中心的观点。它把如下陈述——

> [注2] 康拉德·斯坦：《凡人的父亲与不死的父亲》，载《无意识》第 5 期，1968 年 1 月，第 59—100 页；“难寻书库”2002 年再版。

——当作基本预设：儿童位置的本质，以一种全能观念为基础；正因全能，儿童自以为处在死亡之外。

可是，这种解释即便在一位并未因此放弃自身预设的作者笔下显得十分常规——这位作者恰恰还批评了有关儿童位置之本质的说法——我们仍必须从另一条道路接近死亡愿望。如果这些愿望覆盖、遮掩着什么，就应当问：此处被遮掩的究竟是什么？

更先一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我们要陈述的主体结构依赖能指的引入，而这项结构会把某种叫作“死亡知识”的东西置于首位？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阅读弗洛伊德对若干重要梦的分析。从著名的“请闭眼”之梦开始，横线下的“一只眼”带有歧义，弗洛伊德也把它呈现为一种择一。斯坦十分巧妙地把这点纳入自己的解释路线：以全能之名否认死亡。

不过，如果采用同一系列的最后一个梦来规定其意义——我当时就是这样做的——便会注意到，重音落在另一个梦上。那不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梦，而是一个病人的梦。梦的陈述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曾把它拆分到言说行为与言说内容两条线上加以分析。

这提醒我们只有两种可能：

- 要么死亡不存在，有某种东西继续存活；但问题仍未解决——死者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 要么死亡以后什么都没有；那么可以确定，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换句话说，没有人——至少活人没有——知道死亡是什么。自发形成并在意识层面陈述的产物，严格说来都在表示：死亡对任何人都不可知。

我当时强调，生命必然要求某种不可化约的东西不知道。我不会说“我们已经死了”，因为不能这样说；作为“我们”，我们并没有死，至少没有一同死去，我们正以此为立足点。必须有某种东西不知道“我已经死了”。

我确实已经死了，确切地说，是因为我注定要死；但正是以那个不知道的东西之名，我也不愿知道。

这使逻辑可以把“凡人”置于中心：“凡人皆会死”。这个全称的支撑正是对死亡的无知；也正因为这项无知，我们才误以为“凡人”真有某种意义。

每个人都由一个父亲所生；据说，正因为父亲已经死去，他——这个人——才不能享用本应享用的东西。

所以，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死去的父亲等同于享乐。可以说，是死去的父亲把享乐保存在那里。

弗洛伊德神话不再以悲剧及其精微弹性的层面陈述，而是在《图腾与禁忌》的神话陈述中，把死去的父亲同享乐等同起来。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结构运算子”。

神话在这里以实在的名义陈述自身，从而超越了自身。弗洛伊德坚持说事情真实地发生过，它就是实在：死去的父亲守管着享乐；享乐禁令从这里开始、从这里产生。

“死去的父亲就是享乐”向我们呈现为不可能本身的标记。

这正符合我用来规定实在范畴的术语。依照我的衔接，实在同象征界、想象界截然有别：实在就是不可能。

实在的涌现并非我们一头撞上的简单障碍，而是逻辑障碍：象征界中严格被陈述为不可能的东西，正是实在涌现之处。

在俄狄浦斯神话之外，我们由此认出一个结构运算子，也就是所谓实在父亲。甚至还可以说，它作为范式，也把“实在之父”提升到弗洛伊德体系的中心；它在弗洛伊德言说的中心安放了一个不可能的项。

这也等于明确指出，弗洛伊德的言说同心理学毫无关系。原初父亲没有任何可设想的心理学；他只被呈现为“享用全部女人的人”。我想，不必再重复上次对这个形象的嘲讽。这个想象倒是可以设想，可人们很容易看出：能够满足一个女人，通常已经相当不简单。

我们由此被送回完全不同的参照：阉割。既然我们已经把阉割定义为主人能指的原则，就必须重新定位它。今天结束时，我会更准确地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主人的话语向我们展示，享乐来到大他者那里，即 $S_1 \rightarrow S_2$；大他者才拥有享乐的手段。语言只有不断坚持，直至生产出一种损失，才能获得享乐；剩余享乐正从这项损失取得形体。

首先，语言——即使是主人的语言——也只能是要求，而且是必然失败的要求。

并非它的成功，而是它的重复，生成了属于另一维度的东西。我把它称作损失；剩余享乐在其中取得形体。

这种重复的创造开辟了一个维度，分析经验将来可以评判的一切都依此维度得到安排。它同样可以从原初无能出发，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儿童的无能；这远非“全能”。

如果精神分析让我们看出“孩子是成人之父”，必然有某种东西在某处充当中介。

这恰恰是主人的坚持：这份坚持最终从任何一个能指中生产出主人能指，我已经这样说过。

我当年提出“父亲是实在的”，是因为在说明客体关系同弗洛伊德结构的关系时，先谨慎地区分了阉割、挫折与剥夺的本质：

- 阉割本质上是象征功能，只能从能指衔接来设想；
- 挫折属于想象界；
- 剥夺则显然属于实在界。

由此可见，如果要规定这些操作的产物：

- 在阉割层面，首先成为操作对象的是阳具提出的谜；阳具显然属于想象界；
- 挫折总牵涉某种真正属于实在界的东西。不过，支撑要求的唯一资源，是想象那个实在之物理应归你；这并不理所当然；

- 剥夺则只能从象征界得到定位。因为对实在之物来说，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缺失：实在就是实在。可是，“某物缺失”这项至关重要的引入必然来自别处；没有它，我们自己就无法处在实在界中。某物缺失，正是主体最初的特征。

当年谈到三种操作的施动者，我虽然已经有所指示，却没有这样明确。

父亲，实在父亲——“实在父亲是不可能的”这个断言正是用来遮蔽一点：实在父亲无非是阉割的施动者。

“施动者”是什么意思？初看之下，我们当然很容易滑入一则幻想，仿佛父亲就是执行阉割的人。可是，弗洛伊德采用的各种神话形式都没有真正提供过这种观念，这点十分显著。

在第一个假设时刻，儿子们尚如动物，不能接近父亲占有的女人群；但据我所知，这并不等于他们遭到阉割。

阉割作为一项陈述、作为构成禁令之物的陈述，只能奠基于第二个时刻，也就是杀死部落父亲的神话。依神话自身的说法，它只来自众人共同同意——这项奇异的 initium（开端），上次我已经指出其可疑性质。

这里还必须留意“行动”一词。顺带说，如果我在《精神分析行动》中有关行动层面的陈述应当认真对待，[注3] 那么：

- 只有在一个早已充满能指作用、能指已经进入世界运作的语境中，行动才可能存在；
- 起初不可能有行动，尤其不可能有堪称谋杀的行动；这里的神话只能具有我所归给它的意义，即一项不可能的陈述；

- 行动不可能存在于这样一个领域之外：该领域已经衔接得如此完备，以至律法必然在其中获得定位。

只有参照能指衔接之效应的行动才是行动。它包含全部问题：一方面，任何能够衔接为主体之物，其存在本身都带有坠落；另一方面，立法功能已经先于主体存在。

这是否意味着，实在父亲作为阉割所在的功能源自行动本身？

恰恰是我提出的“施动者”一词，使我们可以把问题暂时悬置。

> [注3] 指 1967—1968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法语动词 agir（行动）在语言中有不止一种回响：

- 首先是 acteur（演员）；
- 还有 actionnaire（股东），何尝不可？它同 action（行动 / 股份）构词相联，也让你们看出，行动也许不完全是人们以为的东西；
- 还有 activisme（行动主义）；因为 activiste（行动主义者）严格说来并不把自己当作主动的主体，而是更愿把自己看成某种东西的工具；
- 既然谈到这里，还可以举阿克泰翁为例；只要有人知道它在《弗洛伊德的东西》中的意思，这会是一个好例子；[注4]
- 最后，还有最普通的说法：“我的代理人。”

你们大致知道“我的代理人”是什么意思：“我付钱让他做这件事。”甚至不必说成“我补偿他没有别的事可做”；人们会说“我给他一份荣誉”，佯装从他原本有能力做别的事情出发。

实在父亲作为阉割的施动者，必须在“代理人”一词的这个层面上理解。他替主人机构工作。

我们越来越熟悉这些代理功能。我们生活在一个知道它们运送什么的时代：廉价赝品、广告、必须售出的东西。然而，我们也知道，正是凭这些东西，社会才运转到今天这个地步；主人的话语在它赖以奠基的社会中充分展开，甚至达到顶峰。

这一点会鼓励我们继续……

> [注4] 《弗洛伊德的东西》，载《文集》，第 346 页：“也许是狄安娜……阿克泰翁追逐女神，罪孽过重；猎人啊，你化作的影子反把你捕获。任猎犬奔去，不必加快脚步；狄安娜终会按它们的价值认出那些猎犬……”

时间已晚，我肯定必须在这里稍作中断。先给你们留一个记号，也许以后会回来。这个点对我颇有价值，值得费力澄清。

既然我在“施动者 / 代理人”这一功能层面加上这样一个特殊重音，改天就必须向你们展示，引入“双面间谍”这个概念会引出怎样的发展。人人都知道，双面间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确定、最无可置疑的迷恋对象之一。

一再加码的代理人不只满足于替主人完成那桩小交易——那是每个人的角色。他以为自己接触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一切——我是说享乐层面的东西——同这张网的经纬毫无关系。

他心想：天哪，归根结底，正是这些东西在我的小差事中保护着我。故事很奇怪，而且会把我们带得很远！

真正的双面间谍，是那个认为逃脱网络经纬的东西也必须受到编排的人。因为，如果那东西是真的，编排也会变成真的；连最初那套明显由赝品构成的编排，也会随之变成真的。

这大概正引导着一个不知为何把自己安放到代理人功能上的人物。他是主人的话语中原型式的代理人，自命有权保存某种东西；一位作家以预言式话语勾勒了这东西的本质："墙是好的。"拉康在这里把作者说成亨利·马西斯。[注5]

名叫佐尔格的人——这个德文姓氏有"忧虑"之意，何等海德格尔式——设法混进纳粹特工中，成为双面间谍。[注6] 他替谁做双面间谍？替"人民之父"。你们都知道，人人寄望这位父亲把真实也妥善编排起来。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功能。我提到"人民之父"并非无缘无故；它同作为阉割施动者的实在父亲关系极大。

> [注5] 《墙是好的》实际为亨利·波尔多所著，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40 年；亨利·马西斯则是莫拉斯主义者、反德雷福斯派，此处被拉康称作"主人的话语中原型式的代理人"。
>
> [注6] 理查德·佐尔格（1895—194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在日本活动的苏联情报人员。参见戈登·威廉·普兰奇：《佐尔格网络》，皮格马利翁出版社，1997 年。

相关知识卡 《墙是好的》的作者亨利·波尔多 · 理查德·佐尔格与东京谍报网

因为，弗洛伊德有关著名的实在父亲的陈述，必然——我说“必然”，因为他别无选择，哪怕只因为他谈的是无意识——从主人的话语出发；而从这里出发，它只能把实在父亲构造为不可能者。

不过，我们终究认识这位实在父亲——好吧，所谓“认识”——他完全属于另一个秩序。

首先，大家通常都承认，是他工作，“养活自己的小家庭”。在一个显然没有给他多大角色的社会里，他即使是某种东西的代理人，也仍有格外和善的一面：他工作，还很想被爱。

这表明，把他做成暴君的全部神秘训诲，显然寄居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注7]

> [注7]　神秘训诲：教父向新入教者提供的神学与象征解释，用以说明入教仪式，尤其是洗礼与圣餐。

相关知识卡　Mystagogie：基督教入门礼后的神秘训诲

在实在父亲的层面，实在父亲只是一项效应、一种语言建构。弗洛伊德也一再指出，实在父亲没有其他的实在。

我没有说“现实”，现实是另一回事，也就是我刚才谈的东西。实在父亲无非是一项语言效应。

我甚至可以立刻再走一步，提醒你们：从科学上说，实在父亲这个观念根本站不住。

唯一的实在父亲就是精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没有人想到说自己是某一个精子的儿子。[笑声]

当然，人们可以用若干检测反驳我，例如血型、恒河猴因子之类。可是，这些都是新近才有的东西，同我们迄今所谓父亲功能毫无关系。

所以，精神分析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感觉自己正踏进危险地带：一名女人怀孕时，真正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不只是阿兰达部落才会提出这种问题。[注8]

为什么不能这样设想呢——我们有时确实有所怀疑：在一场精神分析中，分析家为什么不能是实在父亲？即便在精子层面上，[笑声]　他完全没有让女人怀孕；可是，病人最终成为母亲，毕竟同她和分析情境——我们姑且说得含蓄一点——的关系有关。

所以，要询问父亲的功能，不必成为阿兰达人。

> [注8]　参见马塞尔·莫斯与埃米尔·涂尔干：《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与洛里查人》，1913 年。

相关知识卡　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 · 阿兰达与洛里查民族志：斯特雷洛、莫斯与涂尔干

这也会扩展我们的思路：不必采用我刚才所举最炽热的分析参照，同一个问题照样会出现。

一个女人完全可以替丈夫生一个孩子，而孩子却是另一个人的——即使她没有同那个人性交；孩子恰好属于她本想让他成为父亲的人。她正因如此而生下这个孩子。

你们看，这样会把我们带进梦里；正可以这样说。不过，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把你们唤醒！

因为，如果我说……

弗洛伊德苦心构造的全部东西——当然不是指神话层面，也不是指在病人梦中认出死亡愿望——如果我说俄狄浦斯神话是弗洛伊德的一场梦，当然是因为分析家看来必须多少从梦的层面挣脱出来。

弗洛伊德引入的某种强有力之物为分析家指引方向；可是，分析家从遭遇中提取出来的东西，至今仍远未澄清。

上周五，我在“病人展示”中介绍了一位先生——我看不出为什么要称他为病人。他身上发生过一些事，以至于按技术人员的说法，他的脑电图始终处于睡眠波与清醒波的临界。人们从不知道他何时会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他就这样停在临界线上。

我眼中的全体分析家同事多少也是这样：[笑声]　精神分析诞生时的冲击、创伤使他们停在临界线上；于是他们拍打翅膀，试图从弗洛伊德的衔接中提炼出更准确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接近它。不过，他们必须看出：弗洛伊德把实在父亲的位置衔接为一种不可能——这点完全值得记住——因此，这个位置本身必然把父亲想象为剥夺者。不是你、不是他、不是我，而是整个结构使然。

我们不断遇见想象父亲，丝毫不奇怪；这是我们无法把握实在父亲所造成的结构依赖。

实在父亲被严格排除，只能作为阉割的施动者存在。而阉割绝不是任何自我心理学化的人都会给出的那种定义。

听说不久前，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中，有人已明确走上把精神分析变成众所周知的心理教育学那条路，竟说：“对我们来说，阉割只是一则幻想。”

不，绝非如此。阉割是实在的操作，由能指——不论哪个能指——介入性关系而引入。它规定父亲为我们所说的不可能之实在，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现在必须弄清，这项不是幻想的阉割究竟是什么意思。

由此当然得出：

- 欲望之因只可能是这项操作的“产物”，即 $\mathcal{S} \Diamond a$；
- 幻想支配着欲望的全部现实，也就是律法。

至于梦，人人现在都知道，它无非是要求，是获得自由的能指不断坚持、跃跃欲试、反复跺脚，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把全能父亲安置在欲望之原则上的观念，已经被癔症者的欲望充分驳倒。弗洛伊德正是从癔症者的欲望中提取自己的主人能指；不要忘记，他由此出发，而这始终停留在问题中心。

弗洛伊德自己承认了这一点。这句承认尤其珍贵，因为有一头母驴把它收集、重复下来，却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问题是：“一个女人想要什么？”

是“一个女人”，而不是随便哪个女人。只要提出问题，就已经意味着她想要某种东西。

他没有说：“女人想要什么？”因为没有什么表明“女人”一定想要什么。

我不会说她适应一切情况；她反倒被所有的 K 弄得不适：Kinder（孩子）、Küche（厨房）、Kirche（教堂）。但还有许多其他 K，例如 Kultur（文化）、Kilowatt（千瓦）、Kulbute（翻筋斗）；再如某人所说的“生与熟”。她同样都能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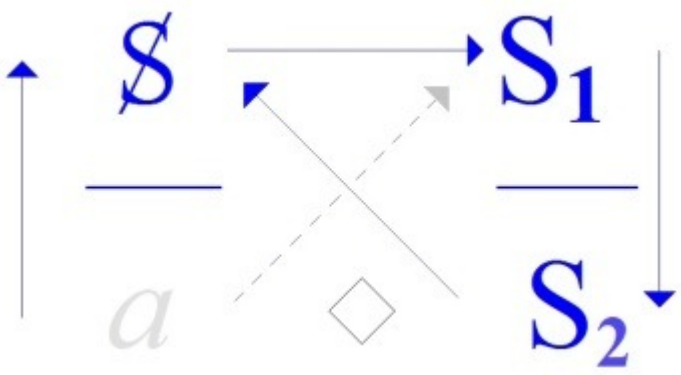
可是，一旦你们问：“一个女人想要什么？”便把问题置于欲望层面。人人都知道，对女人而言，把问题置于欲望层面，就是询问癔症者。

癔症者想要什么，这十分清楚……

我这是说给那些没有这项天职的人听的；看来在座这样的人不少——她想要一个主人。

这再清楚不过，甚至必须追问：主人这个发明是否就从这里开始？这会优雅地闭合我们正在勾画的路径。

她想要一个主人。它就位于右上方的小角落，不必换别的名字：



癔症者的话语。

她要大他者成为主人，懂得许多，却不能懂得太多——不能多到不再相信，她才是他全部知识的至高奖赏。换句话说，她要一个由她统治的主人：她掌权，而他不治理。

弗洛伊德正从这里出发；这里的“她”就是癔症者。你们必须清楚看出，癔症者未必由某一种性别规定。只要问“某某想要什么”，你们便进入欲望的功能，并把主人能指引出来。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女人想要什么”一语的出处

弗洛伊德生产了若干主人能指，又用……

当然，它也用来堵住某个东西——又用“弗洛伊德”这个名字盖住它。

“父之名”不论是谁的名字，都是一个堵头；有人竟会把任何谋杀观念同这个层面上的堵头相联，我对此很惊讶。分析家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也不是因为虔敬弗洛伊德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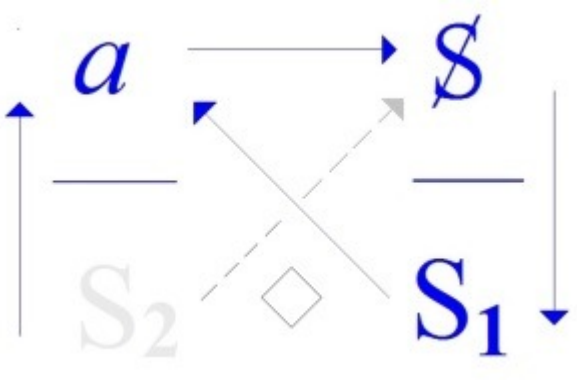
他们只是无法摆脱弗洛伊德的主人能指。与其说他们依恋弗洛伊德，不如说他们依恋若干能指：无意识、诱惑、创伤、幻想、自我、本我，以及你们愿意列举的任何东西。

他们绝不肯走出这个轨道。在这个层面，他们没有任何父亲要杀。

人不是能指的父亲；充其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成为父亲。这里没有问题。

真正的动力是：享乐把主人能指——人们总想把它归给父亲——同作为真理的知识分隔开。

我们下次重聚时会从这里继续。采用分析家的话语图式，享乐跨出的那一步正位于这里，即 ◊：



它位于两项之间：

- 一边是不论以何种形式生产出来的主人能指 S_1；
- 另一边是作为真理而设立的知识 S_2 所支配的领域。

要如实衔接阉割究竟是什么，关键在于：不论人们怎样想，即使对孩子而言，父亲也是那个对真理一无所知的人。

第9课 · 1970年4月9日

我不知道这段分别的时间里你们做了什么；无论如何，希望你们多少有所利用。

至于我，我有一项发现。我要告诉那位很客气地向我表明自己是索邦大学 astudée 的听众：我找到了曾对你们谈过的塞林。我让人从哥本哈根把它寄来。作者名字拼作 S.E.L.L.I.N。

这就是 1922 年出版的那本小书。塞林后来又亲手作过若干撤回；弗洛伊德正围绕这本书，维持自己有关摩西遭到“杀害”的确信。

这本书的价值当然正在这里。据我所知，除了琼斯，也许再加一两名分析家，并没有多少精神分析家对它感兴趣。

显然，塞林的文本值得检验；因为弗洛伊德认为它分量十足，足以支撑自己的论证。

你们自然应当沿着这条路跟随我，把这项判断交付检验。这同我今年有关“精神分析的反面”的推进是一致的。

可是，我拿到这本书才五天左右。它的德文非常艰涩，远没有弗洛伊德的文本那样舒展。你们可以理解，尽管若干拉比——大大小小的……好吧，并没有小拉比，只有犹太人——愿意帮助我……

今天我还没有准备好作一份至少能让自己满意的报告。

另一方面，碰巧有人邀请我在广播中作答——这种邀请不是第一次，而且还会不断扩展。明确说，是比利时广播电台。一位说实话赢得了我敬意的人提出这项请求。

他叫乔尔让先生。他交给我一篇长文，至少证明一点：同许多人不同，他读过我的《文集》！

天哪，他已经尽其所能从中提取了一些东西。[笑声]　总的来说，这并非一无是处；其实我颇感荣幸！

当然，这没有增加我被录进广播节目的兴趣；那总要浪费许多时间。

不过，他似乎已安排好让事情尽量简短，我也许会答应。相反，他本人倒未必愿意接受我的方式。

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会给你们举三个例子——我认为最好不要任凭当下灵感，不采用每次面对你们时所作的这番开路。这里的开路得到大量笔记滋养；它之所以行得通，只因为你们看见我被它攫住。也许，这正是你们在场唯一正当的理由。

那是一只鸟吗？[外面传来口哨声，笑声]

可是，当你面对几万、甚至几十万听众时，条件显然不同。文本突兀呈现，得不到讲话者本人的支撑，可能造成其他效果。

尽管如此，我仍拒绝给出这些已经写下的文本以外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这意味着极大的信任；因为你们会看到，向我提出的问题必然落在两端之间：一端是已经建构起来的衔接，另一端是我所谓共同意识所期待的东西。

共同意识也意味着一系列共同套语，也就是古人——更确切地说，希腊人——用自己的语言称作 κοινή（koïné，通用语）的语言。

我不会马上把它译成法文，而要直接转写成 la couinée，它听来像吱吱叫！

我丝毫不蔑视这种吱吱叫。我只认为，它并不妨碍在其中产生某些骤然凝结的效果，恰恰把最突兀的话语引进去。就是这样。

相关知识卡 通用希腊语 Koine

所以今天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省下我平常的努力——相信我，给你们朗读这些文本，要比按惯常方式推进更加费力——我会同你们分享对其中三个问题的回答。

为了不再耽搁，我先衔接第一个问题：“据说，您在《文集》中断言，弗洛伊德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预先触及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研究。您能否解释这一点？”

我现在就回答；不过，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不是即兴作答：

“你的问题令我惊讶，”我说，“因为它切实相关，同我经常必须回绝的那些自称访谈的要求截然不同。它甚至具有双重相关性，或者说有两个层次。

第一，你证明自己读过我的《文集》；显然，许多人以为要听我讲话并不需要这样做。”

“第二，你选择的那条评论蕴含一种不同于大众媒介的信息方式。弗洛伊德预先触及索绪尔，并不意味着有一阵声音从前者传到后者。所

以，你一引用我，便让我在尚未决定回答以前已经作答；我所谓惊讶正是这个意思。

“从终点的术语说起。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生产出的语言学，同过去被这个名字遮盖的一切毫无共同之处。即便斯多葛派已经把钥匙握在手中，可他们拿钥匙做了什么！

“索绪尔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由一次切断建立起来，也就是放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横杠。差异由此取得优先地位，因为能指完全由差异构成；能指也依照一种自主性得到排列。以音位系统为例，这种自主性丝毫不逊于晶体效应的纯粹规律，而音位系统正是他们最初的发现成果。

“人们试图把这项成果扩展到整个象征网络，只承认网络能够回应的意义：作为效应的介入，可以；作为内容，不可以。这是由最初切断支撑的一场赌局。

“所指在科学上能否被思考，取决于能指场能否成立；这个场凭自身材料区别于科学取得的任何物理场。

“这意味着一种形而上学排除；应把它当作去存在的事实。从此，不再有任何意义可被认为不言自明。比如‘天亮时就会明亮’——斯多葛派早已走在我们前面，但我已经追问：这有什么用？

“即使不得不忽略若干重复用词，我仍把一切从作为对象的符号出发的学科称为符号学；这个名称正用来标记：从符号出发会阻碍对能指本身的把握。

“符号预设有一个‘某人’，并为他示意某物。正是这个‘某人’的阴影遮蔽了语言学的入口。

“不论怎样称呼这个‘某人’，都始终是一种蠢事。只须有符号，这个某人便会把语言据为己有，当成简单工具。对抽象而言，语言只剩一种支撑；对讨论而言，只剩一种手段；批评乃至思想的一切进步都作为附加品跟在后面。

“我得提前一步——把‘预先触及’一词从我转向我自己——引入我准备写作 l’achose 的东西：l' 加上 achose。这个书写要让人感觉语言学立场造成的效果：它不是进步，倒更像退却。

“我们恰恰需要这种退却，以对抗那个已经开始结盟、意图防止 l’achose 的蒙昧主义统一体。似乎没有人认出这个统一体围绕什么形成。

“在那个有‘某人’从万物中收集‘万物的印记’——signatura rerum——的时代，[注1] 人们还没有高估受过教育的愚蠢到敢把语言登记在‘交流’名下。

“回到交流观念，是为语言学所淘汰的东西保护后路；它遮盖其中通常只能事后察觉的可笑之处，也就是语言受遮蔽时只能以‘心灵感应’之名作为神话出现的东西。

“那种自夸不用话语便能传递的观念，只是思想的迷途小儿和乞丐。这个神话却仍能迷住弗洛伊德；他没有从中揭开那座奇迹之院的国王，而自己原本宣布要清理它。

“说‘奇迹’再合适不过，因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奇迹：人们以同一块木头进行‘心灵感应’和缔结契约。

“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契约、交流的喷涌和对话的许诺。什么？‘所有人——谁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都有一死。’啊，让我们因为被装进同一个盒子而同声共鸣吧！

“谈谈‘所有’——正该这样说！——谈谈所有人一起；不过，先把三段论者脑中非把苏格拉底拉进来的东西撇开。由此得出，死亡同其他一切一样得到管理，既由人执行，也为人执行；但在心灵感应问题上，人们并不站在同一边。电报传递着这种感应，每到岔路，主体便始终令人尴尬。”

> [注1] 雅各布・伯墨：《万物的印记》（De signatura rerum），格拉塞出版社，1995 年。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逻辑中的“若是白昼，则有光” ・ 雅各布・伯墨《万物的印记》 ・ L’achose：在自身位置上缺席的“物”

“这个主体难以被传达，正决定了语言学从何处取得力量。

“语言学甚至把诗人——是的，诗人！——也装进口袋。

“因为诗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

“——请允许我这样转述那位证明了这一点的人，也就是我的朋友雅各布森——被诗行吃掉[注]。那些诗行彼此自行找到安排，显然毫不在意诗人自己知道些什么。

“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一贯放逐诗人；也所以，他在《克拉底鲁篇》中热切关注词语这群小动物——它们仿佛只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对支撑语言学的最初步伐何等宝贵。不过，语言学取得推动力，终究来自语言脚步的绊跌，来自所谓言说。”

> [注] 法语 vers 在这里既是“诗行”的单复数形式，也是“虫子”ver 的复数。因此，mangé des vers 既说诗人被自行编排的诗行“吃掉”，也套用了死者“被虫子吃掉”的说法；下文又把词语称作“这些小动物”，继续了这层双关。中文正文保留与雅各布森形式主义直接相关的“诗行”义，另一层收入本注。

“主体并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尽管某种东西确实从安放主体的那张嘴里说了出来；他的行为笨拙也一样，人们把这些笨拙记在他脑子的账上，可他只有在脑子睡着时才得到脑子的帮助。这个器官的主体作用，看来仅仅在于调节睡眠。弗洛伊德把这一点揭示为无意识。”

“因为我以拉康之名走过世界，无非是为了衔接：无意识就是这个，不是别的。

“如今任何人只须读我，就能确认。任何依照这些规则进行精神分析的人都必须坚守它，否则便要付出坠入愚蠢的代价。

“所以，当我说弗洛伊德预先触及语言学，我只是在说一项必然结论。现在我释放这个公式：无意识是语言学的条件。”

“没有无意识的喷发，语言学便不可能走出大学以人文科学之名投在科学上的晦暗日光。

“即便鲍杜安·德·库尔特奈在基辅为它加冕，它大概也会一直停在那里。

“可是，大学还没有说出最后一句话。它会把这件事变成论文题目：《弗洛伊德的天才对雷蒙·德·索绪尔的天才之影响》——口误，费

迪南·德·索绪尔——并且论证在广播存在以前，后者的风怎样从前者吹来！仿佛大学不是一向无需广播，也照样能够震耳欲聋。

“为什么借用你的引文来问，索绪尔会比弗洛伊德本人更清楚弗洛伊德预先触及的东西，尤其是拉康的隐喻与转喻——索绪尔在那里‘生出’雅各布森？

“索绪尔始终没有走出自己在萨图尔努斯诗歌中破译的变位词，[注2] 是因为他知道其中真正的分量。无赖并没有使他变蠢；只因为他不是分析家。

“相反，在这个位置，大学自满披上的卑劣手法总能击中人。它仿佛给人希望，又把人直接抛进一个错误：为了牺牲我说过的内容来把自己做成作者，竟说‘无意识是语言的条件’，尽管我已经向有关的人反复强调：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

“这种手法已成为刻板套路，我想到仍觉好笑。另外两个人——只在一个早被大学化的杂种性质扼杀的学会内部使用——竟敢完全采用我用来对立付诸行动与表演行动的术语来定义二者，只把我归给其中一个的特征调换到另一个身上。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此前无人说清的东西据为己有。”

> [注2] 参见让·斯塔罗宾斯基：《词下之词》，伽利玛出版社，1971 年；弗朗西斯·冈东：《危险的建筑》，彼得斯出版社，2002 年。

相关知识卡 斯塔罗宾斯基《词下之词》与索绪尔变位词研究

“如果我现在倒下，我留下的作品只会是这些从教学中选出的残片；我用它们抵挡所谓信息——说信息会传播它，已经把一切都说尽了。

“我在一场非公开讲话中陈述的东西，仍然改变了共同的听觉，甚至给我带来一个人数惊人而稳定的听众群体，以此作证。

“我记得一个年轻人曾满怀困惑地问我。他听过我在一群‘党’的人面前发表《欲望的辩证法与主体的颠覆》；作为唯一误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很不自在。

“我十分和善地——和善，一如既往——在《文集》中紧接这件残片，点出了当时回应它的惊愕：‘您真的以为，’他问我，‘只因为您说出某件事、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母，就可以期待它产生结果吗？’”

“可是，这场演练确实产生了效果，我有证据。单凭紧随其后的那件残片，我的书便获得一项权利；作为那次会议动机、原本必须消化掉的福特基金会资金，竟同时不可思议地干涸了。

“扩散出去的效应不是言说的‘交流’——这是对你说的——而是话语的位移。

“弗洛伊德没有得到理解，包括他自己；因为他想让人听懂。他的弟子给他的帮助，还不如这种扩散。没有这种扩散，历史的震荡就仍是谜，例如五月事件：那些试图使它们臣服于某种意义的人迷失了方向，而那里的辩证法只显得可笑。”

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还不疲倦，我要宣读自己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你们会看出它十分重要：

“语言学、心理学和民族学共有结构概念。乔尔让先生问，能否从这个概念出发，设想有一天建立一个共同领域，把精神分析、民族学与语言学集合起来？”

我这样回答。我认为，这个回答比前一段印象主义式回答更加重要：

“‘结构’一词标记语言效应的进入。从这里出发，把结构做成个人或集体的功能，便是在预设结论；它假定结构依托于某种存在——不论自我还是适应性的认识有机体——而这又会牵出我刚才谈到的‘某人’。

“依照这种设想，某人会通过结构向自己表象构成实在的关系；这里的‘实在’是拉康提出的范畴。

“我们恰恰从相反方向出发：现实中已经临在的，不是前景中的关系，而是在语言中取得形体的关系公式。现实在这里不是范畴，而是给定。我们从这些公式出发，追踪它们产生的效应；这项效应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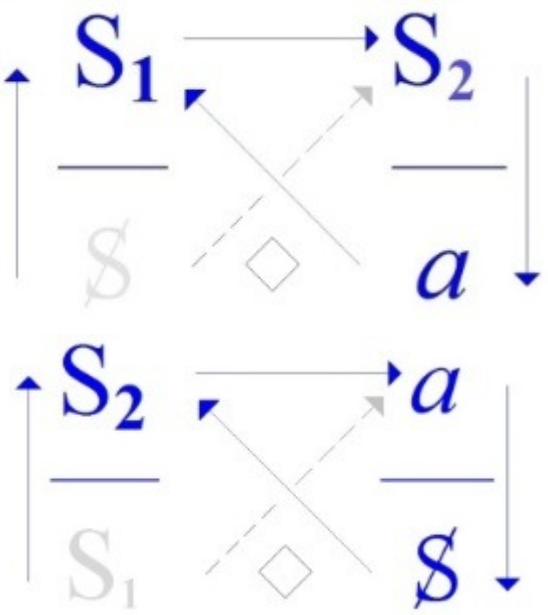
“所以，一种话语无须假定任何人取得共识，便能支配现实；因为话语自己规定差异，在陈述的主体同言说行为的主体之间筑起屏障。”

“没有什么比这更不沾唯心主义。另一方面，也无须把结构主义者圈养起来，除非你想让他们背负存在主义遮盖——我没有说造成——的腐烂遗产。

“任何人都必须依据结构定位自己；无论如何，他会从中受益。

“你们已经可以预感到我对那项集合的回答——记得吗，‘精神分析、民族学，还有什么……语言学’——也就是你提议的共同领域。

“附带说明：语言的特殊性使结构落入上述晶体效应。把这种特殊性称作‘任意’，是索绪尔的一次口误。他固然出于不得已，但也因此更加容易绊倒；因为他从大学话语出发，而我指出，大学话语窝藏的正是支配着主人的话语的能指 S_1——任意性的能指。”



主人的话语　大学话语

“谈到象征界时，身体不是一个隐喻。因为对天真意义上的身体来说，所谓象征身体是一项决定因素：前一个身体借纳入后一个身体而把后者做成身体。由此留下非物体者，标记前一个身体在纳入以后的时间。

“必须公正地说，斯多葛派懂得用‘非物体者’这个术语标记象征界如何依附身体。

“我要说的非物体者就是函数——不是主体的函数……”

相关知识卡 坡的《失窃的信》

“而是使数学成为现实的函数；具有同样效应、使拓扑成为现实的应用；或者广义上使逻辑成为现实的分析。

“然而，结构只有被身体化以后，才生产情动，不多不少。情动只从存在的衔接取得；存在只有事实上的存在，也就是在某处被说出的存在。

“由此可见，对身体来说，死活都是第二位的。

“谁不知道我们据以确定人类言说存在的临界点？那就是埋葬：一个物种由此确认，死去的身体同其他物种相反，仍保留活着时赋予它身体性质的东西。

“Corpse（尸体）是一项不会变成腐肉的残余：言说曾居住其中、语言曾使之身体化的身体。

“动物学可以从个体自称构成生命之存在的主张出发；但只须把研究推进到珊瑚群体层面，它就不得不削减这项主张。

“认真看待身体，它首先是能够承载标记的东西；这项标记把身体排列进一个能指序列。身体一经标记，便支撑一种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关系；即使身体躲避这项关系，也仍在支撑它。

“远在任何日期以前，‘少一’就指示拉康用大写 A 标记的大他者位置。从这项‘少了的一’出发，外排为内侵铺好床位；这就是能指本身。

“因此，并非一切血肉都能随行。只有符号通过否定而加以烙印的血肉升为云层；身体同它们分离，这些云层成为享乐高处的水，沉重如雷，重新分配身体与血肉。”

相关知识卡 坡的《失窃的信》 · 造礁珊瑚的骨骼与群体生长

“这种分配也许不那么可计数；不过，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古代墓葬正表现了我们最现代的逻辑所衔接的‘集合’。

“骨骸这一空集是不可化约的元素；享乐的工具——项链、酒杯、武器——作为其他元素围绕它排列。与其把享乐重新塞进身体，不如列举更多子元素。

“我让结构活起来了吗？我想已经足够，足以对据说结构会同精神分析结合的领域宣布：你说的两门学科并没有任何特别注定要同精神分析结合的东西。

“语言学可以规定精神分析的材料，甚至规定其操作装置；却把使操作真正生效的来源留成空白。我曾把它衔接为精神分析行动，并以为由此能照亮不止一种其他行动。

“一个领域只能由运算子支配。无意识可以像我刚才所说，成为语言学的条件；这并没有给语言学丝毫把握无意识的力量。

“我亲自有过这种经验。我曾请法国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为一份由我发起的期刊撰稿，阐明它的起点。期刊名叫《精神分析》；在我看来，题目本应更加明确，以提醒那些轻率对待它的人。

“我希望语言学家能在反义词问题上推进一步；弗洛伊德引入这个问题，我当然并不惊讶。可是，如果语言学家只能提出：为了让所指舒适自在，必须在反义中作出选择——看来他确实只能做到这些——那

么，说阿拉伯语、经常同这类词打交道的人，要回答这个命题恐怕就像应对蚁群骤起一样困难。

“民族学一边也有同样的屏障。”

相关知识卡 造礁珊瑚的骨骼与群体生长

“一名调查者若任由自己的本土女信息人向他讲梦中风月，又把这些算作所谓田野调查，便会有人把他叫回来守规矩。

“这样作出审查的人——他们如此称呼——即使是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我也不会认为他在轻蔑我的园地。

“如果田野被无意识泡软，会走向哪里？无论人们怎样做梦，它都不会产生钻探效果，只会形成一滩我们自酿的水。因为调查依定义只限于收集知识，而我们拿来喂养调查的，只能是自家酒桶里的知识。

“不要期待一场精神分析会清点塑造主体的神话，只因为他在多哥或巴拉圭长大。精神分析依照制约它的话语运作；今年我正从反面定义这番话语。所以，我们只会得到留在自身话语中的神话：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

“谈到神话分析的材料，请听列维-斯特劳斯说，它不可翻译。必须正确理解：他的字面意思是，不论用哪种语言收集神话，它们总能自行受到分析，理论化为若干‘大单元’——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再由一场最终的神话化将它们衔接起来。

“这里很容易出现一种‘共同层面’的幻象，仿佛它对应我所谓精神分析话语的普遍性。尽管提出证明的人正是列维-斯特劳斯，也不要受骗；因为精神分析并不借神话素的游戏运作。

“精神分析只能在某一种特殊语言——可以称为实证语言——中发生。即使分析过程中使用翻译，这一点仍保证我那句公式：没有元语言。”

“语言效应只从语言的晶体中产生。它的普遍性，只是随着一种话语在其中移动而重新找到的拓扑；这番话语的特征，是神话学在其中受到极端化约。

“我要不要再补一句：依列维-斯特劳斯的衔接，神话——也就是唯一能从民族学方面激起你问题的形式，我对乔尔让说——拒绝了我在《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中推进的一切。

“神话既不借隐喻运作，也不借任何转喻运作：它不凝缩，而是解释；它不移置，而是安放，即使只把帐篷顺序换一换。它只组合那些沉重单元；为确保成对项在场而作的补充，显出了某种知识的分量。可是，这项知识恰恰被自身结构的出现摧毁。

“所以，在精神分析中——无意识中也一样——男人对女人一无所知，女人对男人也一无所知。性的东西卷入能指激情的神话点，被化约为阳具。

“这个点在别处看来不断倍增，尤其迷住大学学者，因为它恰好从大学话语中缺失。民族学正由此招募新手。”

相关知识卡 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书写与神话变换

“这里显出一种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以各个领域的恩宠装点自己。啊，既然没有一所大学本身就是族群，那就把一个族群做成大学。

“由此产生那场定义田野的冒险：在田野里，把一种本质上不通过书写传递的知识写下来。既然绝望于永远看不到最后一个类别，就重新创造第一个类别吧——也就是分类中回响的那点知识。

“作为黑格尔的对位，我会说：‘教授只在黎明回来。’你们知道猫头鹰和黄昏的故事。[注3]

“我还要保持同样距离，说明自己同结构的关系；因为你的问题牵涉精神分析。

“首先，不要借口我前所未有地定义了能指，便以为符号不关我的事！恰恰相反，符号是我的第一件事，也会是最后一件事；只是必须绕这条路。

“我曾揭露一种隐含的符号学；只有它的混乱才让语言学成为可能。不过，我们仍必须重建符号学，而且仍用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把名称从旧符号学转给一门有待建立的符号学。

“如果像拉康所说，‘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不是代表所指，而且不是为另一个主体——那么，它怎么会落成符号？依逻辑学家的记忆，符号总是为某人代表某物。

“我想到佛教徒。为了让刚才提出的关键问题——能指向符号的坠落——活起来，我会采用这句格言：‘无烟不起火。’”

> [注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开始飞翔。”伽利玛出版社，1989 年，第 45 页。

相关知识卡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作为精神分析家，我得到符号的提醒。如果符号向我标出有待处理的某物，我知道——因为我在能指逻辑中找到了打破符号诱饵的办法——这某物就是主体的分裂。

“分裂源于大他者制造能指；所以，能指只有在自身作为‘一’却只是大他者之‘一’的条件下，才能代表主体。”

“这项分裂回荡着主体面对性知识时所受冲击的种种遭遇。这项冲击必然是创伤性的，因为它预先注定失败；理由我已说过：能指不能给性关系提供取得形体的公式。

“所以我陈述：不存在性关系。言外之意是：它不能在结构中写成公式。

“分析家作出解释时，让一个能指闯入那个某物。我已经费尽二十年力气，告诉他不要把某物当作‘东西’，因为它是裂隙，而且是结构的裂隙。

“不过，他若要把它做成‘某人’，结果完全相同；因为这会通向人格，通向垃圾偶尔赞颂的‘完整的人’。

“无意识哪怕最微小的记忆，都要求在这个位置维持‘某二’。弗洛伊德还作了补充：任何其他结合都不能满足它，只有逻辑上写作‘要么一，要么另一个’的结合。

“既然能指从这个分配点转成符号，那么眼下必须紧急给它找来的‘某人’在哪里？这就是 hic（此处）的难点；只有成为精神分析家、而且是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它才会成为 nunc（现在）。”

相关知识卡 拉丁语 vel、hic 与 nunc

“人人都知道，很快所有人都会成为拉康派；我的听众群是前兆，[注4]所以精神分析家们也会成为。

“只须我所谓对象(a)升到社会天顶就够了。我们的话语掏空对象(a)，又未能生产它，从而引起焦虑；对象(a)正借这项效应登顶。分析家的话语只生产 S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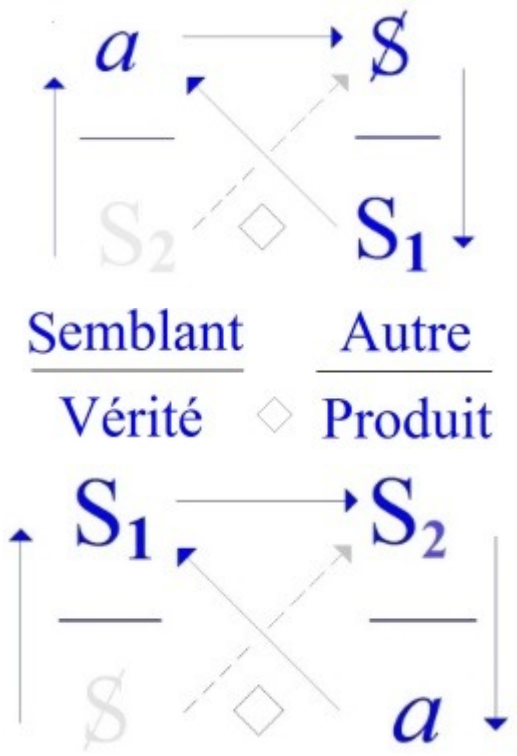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能指正借这种坠落落成符号；在我们这里，这点已显而易见。当人不知该向哪位圣人许愿——换句话说，再没有能指可以煎炒，而你们知道，圣人正供应这种东西——人就随便买点什么，尤其是一辆汽车，

用它表示自己领会了自身的无聊；这无聊正是对大他者之物的欲望所产生的情动。

“这些没有说明对象(a)是什么；因为它只能依每个人的分析尺度推导出来。这也解释了，尽管精神分析家从我的研讨班取得它，仍很少有人操作得好。”

> [注4] Prodrome：疾病或不适的先兆；也指预示某个事件的先行迹象。

“所以我会用寓言说话，也就是为了让人偏离熟路。

“仔细看一看‘无烟……’这句话——容我这样说——也许人会跨出一步，看出这个‘无’正向火发出符号。

“它所示意的东西符合我们的结构。自普罗米修斯以来：一缕烟更像是符号 a；它指向一个主体 $\$$；主体由火柴这个第一能指 S_1 代表，面对火柴盒这个第二能指 S_2。奥德修斯登上一片陌生海岸时，首先从烟推测那里并非荒岛。

“所以，我们的烟是一个符号。为什么不是吸烟者的符号？不过，让我们说它指向‘火的生产者’，这样更符合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愿望。

“可是，奥德修斯是否给出了这个‘某人’，还值得怀疑；因为他也正是‘无人’（$ουτις$，outis）。无论如何，他是无人，那位愚蠢的波吕斐摩斯正因此受骗。[注5]

“然而，吸烟者宿营并不是为了向奥德修斯发符号，这显而易见；它提醒我们，符号原则需要更加严格。

“它还让我们顺带感觉到，把世界看成现象会在哪里失足：符号由此制造出物自体，而物自体又只能向 νοῦς（nous，理智）发符号……”

> [注5]　波吕斐摩斯典故见荷马《奥德赛》、奥维德《变形记》等。奥德修斯自称“无人”，使被刺瞎的波吕斐摩斯求救时只能说“无人伤害我”。

相关知识卡　奥德修斯的“无人”之名

“也就是向‘至高的某人’发符号，而且始终是智慧的符号。这显出你们的理智源于何等贫乏：一旦假定一切都在发符号，就必须有‘来自某处的某人’、‘来自无处的某人’在幕后操纵一切。

“让这帮助我们把‘无烟不起火’同‘无神便无祈祷’放在同一步上，以听见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奇怪的是，森林大火并不显出吸烟者粗心入睡时所指向的某人。

“还必须有阳具式的欢欣——精神分析说，人以原初排尿回应火——我们才会走上这条路：‘霍拉旭，天地之间能够构成主体的材料，还不止你们的知识所想象的对象。’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的视角中，生产者本可针对产品品质，而不是向主人，追问自己遭受的剥削。当人们认出那种使人说‘这才是个人物！’的剩余享乐，便会走向一种也许比肉体更适合党的辩证材料；众所周知，党善于充当历史的保姆。”

相关知识卡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天地之间”一语

“如果精神分析家的‘通过’得到澄清，他就可能成为这个人物。”

这就是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第三个问题如下：“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一种可能衔接，是否就是雅各布森在语言学层面、您在精神分析层面同样赋予隐喻与转喻的特权？”

我不向你们宣读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它不仅冒失，而且令我厌烦。

关于我是否从雅各布森那里借来隐喻与转喻，已经有过太多含混言辞。我第一次提出它们时，终究以为听众中有几个人知道雅各布森是谁！他们十五天后才发现，因为我讲完自己的东西以后提到了他。

于是有人说：“看吧，这就是拉康，他不引用雅各布森。”

后来，他们读了雅各布森，才发现我更加没有理由引用他，因为我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于是又说：“啊，拉康颠覆了雅各布森，把他扭曲了！”

好吧，这些终究只是轶事。

第四个问题：“您说，无意识的发现带来第二次哥白尼革命。这可真令人心潮翻涌！[笑声]　　无意识怎样作为一个关键概念，颠覆一切认识论？”

好，我们就谈这个，然后下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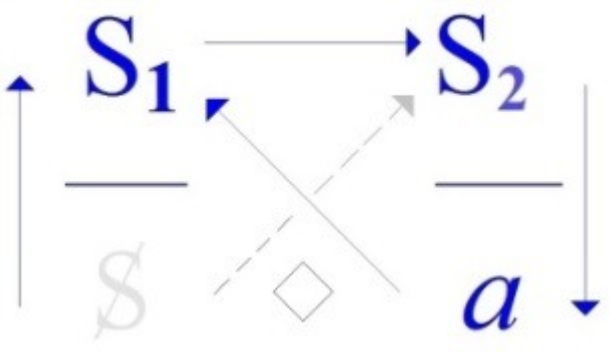
“你的问题正在搔动希望，其中还染着‘吓唬我吧’的色彩；[笑声] 这是我们时代赋予‘革命’一词的意义所激起的希望。

“可以注意到，这个词在政治中转而承担超我功能，又在思想的荣誉榜中扮演理想角色。”

“我要指出，在这里玩弄这些回响的不是我，而是弗洛伊德。我已经说过，只有结构切断能够抵抗回响的衰减；我说的正是这些回响。只有结构切断，能赋予‘革命’一词完整意义。”

“何不从一项讽刺出发？人们把革命记在天体运行的账上，而天体运行并没有完全给出革命的音调。把太阳重新安放到太阳系的中心，究竟有什么革命性？”

“听过我今年衔接的主人的话语以后，人可以发现，它恰好在那里闭合自身的革命。主人的话语借科学的回路、借我已经证明是其目标的 $\varepsilon\pi\iota\sigma\tau\acute{\eta}\mu\eta$（épistémè，知识），返回以太阳为形象的绝对主人能指这个起点。”



“在共同意识中，日心说就是一切都围绕太阳旋转。

“我特别喜欢格洛丽亚刚才的打字错误。她今天早上把 héliocentrisme（日心说）打成 hégocentrisme——*h.é.g.o.*——我觉得妙极了！这意味着一切运转圆满，不必再细看。

“难道我要把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政治傲慢记在伽利略账上？

“相反，古人发现了某种辩证用法：地球相对黄道倾斜所产生的表象，光与影的图像，适宜于清楚衔接的话语。我会用‘光心说’同日心说对立；前者远没有那么具有奴役性。

“弗洛伊德从哥白尼那里采用的隐喻……”

相关知识卡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如果你们记得弗洛伊德的文本，他给这个隐喻附加的，与其说是颠覆效果，不如说是坠落效果。它真正瞄准的是中心主义本身，确切地说，是心理学早已接受的主张。这项主张在弗洛伊德时代未受触动，在我们时代仍然如此：意识自称能够清点自己在表象领域拥有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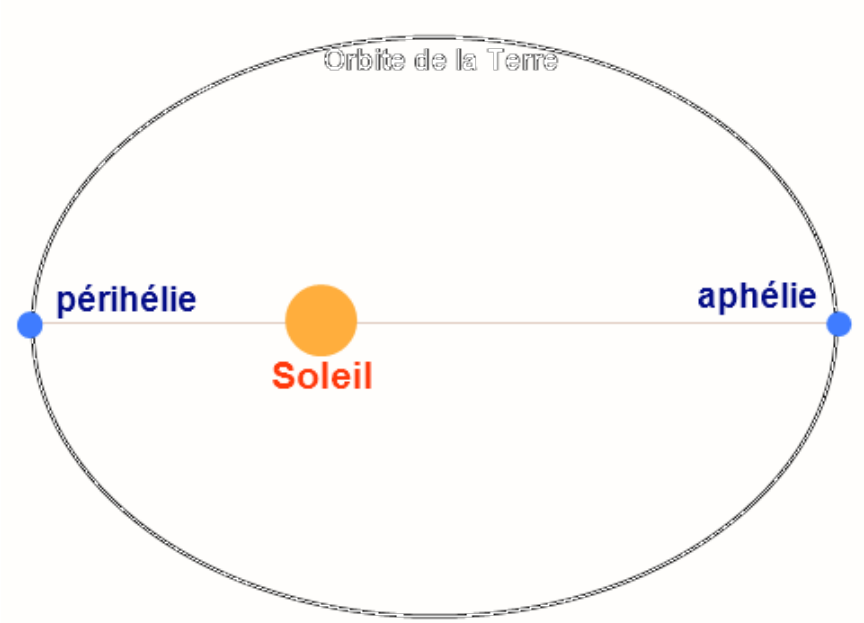
“读弗洛伊德便会看出，这个包罗一切的形象完全不在乎拓扑要求，仅仅因为它对此一无所知；隐喻瞄准的正是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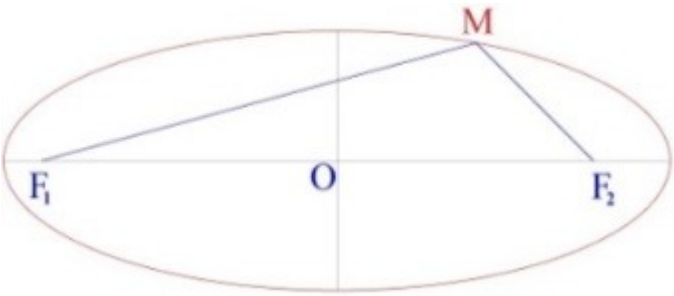
“深入这则隐喻，人们才会遇见它的切中要害；我正因此重新采用它。

“因为，回到哥白尼革命写入历史的文本，就会看出其关节并不在中心的改变。顺带一说，哥白尼本人最不关心的正是这一点。”

“一项逐渐把自己定位为想象性的认识，围绕着什么转——恰恰不能用‘转’这个词——围绕什么产生引力效应？同科瓦雷一起阅读开普勒探索历程的记录，答案十分清楚：它要挣脱圆形由于最完美、所以唯有圆形适合天体运动的观念。”

“引入椭圆轨道，就意味着它既朝向由主人天体占据的焦点 F_1，也朝向另一个焦点 F_2；后者既空又暗，天体在那里减速。”





“伽利略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不是椭圆——它似乎没有特别吸引伽利略——也不在审判风波；我刚才指出，那里的争点乃至应该站哪一边都很暧昧。

“他的重要性在于，使物体下落研究迈出最初几步；椭圆将由此得到照明。

“我的意思是，如果历史中有一件事能够——尽管以最晦暗的方式——说明我给结构下的定义，那就是牛顿最终放在物体下落这个问题之钥匙上的公式 $F = m_1 m_2 / d^2$；它永久解释了星体的路径。

“因为这也意味着，在实在界每一点、也就是每一个质量元素中，吸引力公式本身都在场；它是二次方程。

“我们已经成功地把这一点压下去，不再思考；把牛顿同时代人确实感到的惊讶与丑闻抛到脑后：世界的每一点在每一刻，都收到通知，要对远至世界尽头、所有参与其中的质量作出回应并受到吸引。

“是否需要提醒：引力场以极其微弱而区别于物理学采用的其他场，例如电磁场；而且，它仍抗拒那项几乎已经实现的场统一理想。

“无论爱因斯坦的修正怎样构成向‘先验感性论’的返回——我依康德意义使用这些词——其织理是空间弯曲，其根据是传递的必然性，而光速有限也不能取消这种必然性；牛顿革命终究凭不可思议而得到确立。牛顿自己以‘我不虚构假设’承认这一点；它证实我的公式：不可能就是实在。

“无须强调，登月舱着陆月面所用的还是同一个公式，只是这次以装置实现。因此我指出，当下现实具有非宇宙性。

“这些丝毫不是要把牛顿放在结构主义之首，甚至不是把他记在结构账上；而是首先指出，我们的科学在‘精确科学’领域已经衔接了‘推测科学’领域所提出的问题。”

相关知识卡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 康德的物自体与先验形式

“其次，我要强调一种可以称为不可教化的形式；它在认识论中具体表现为心理学。

“如果像人们声称的那样，康德的动机是依照牛顿革新一门所谓宇宙论，为什么康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衔接牛顿生产的关系公式——这个闯入实在的东西？

“相反，康德需要的物自体无非是心理学；它在那里得到陈述，同沃尔夫甚至兰伯特那里完全一样。

“纽约小集团不顾弗洛伊德革命，径直带回的‘自主自我’也一样。

“让我们照亮这盏有关自我与心理学的灯：物自体，就是世界对自身的认识。这项认识的形式被定义为先验，毫不奇怪；因为依照这种设定，世界是总体。”

相关知识卡 康德的物自体与先验形式

“然而，这些形式同牛顿方程及由此推导的加速度有什么关系？

“纯粹理性或实践理性不能在这里显出超越自身器官性质的东西，毫不奇怪。作为器官，它们同其他器官一样，从内在受到镜像化；犹如旋转体，它们属于直观几何，完全没有革命性。

“我要在这里指出，法国革命无论用多大的 R 装点自己，如今仍会被化约成夏多布里昂所谓回到主人。我们那场伟大的、自己的革命，在配得上历史学家之名的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加速旧制度意识形态的进程；在泰纳看来，则是应当谨慎收治、直到自行平息的疯狂。更不用说那场意在取消革命资格的修辞狂欢。

“如果马克思没有为革命提供结构上的资格，事情便会如此。马克思以资本主义话语为革命提供动机，发现剩余价值在这番话语中遭到拒斥，却因此激活阶级意识，使列宁完成的政治工作、那次付诸行动成为可能。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弗洛伊德的分析从不同于隐喻的方向重演哥白尼。

“弗洛伊德在无意识中发现一项知识的介入。知识逃离意识，不受意识清点，却仍明确显示为得到衔接、得到结构化——我说，像一门语言。它只能从自己留下的效应来设想，却又不意味着其中有任何‘懂行者’，这里的‘懂’有双重意义……”

- “不是像工匠那样懂行；工匠同自然共谋，并且同自然一道出生；
- “也不是像意识那样认出自己；意识使人相信，不存在一种不知道自己正在知道的知识。”

“这就是所谓无意识知识。我暂时不立即予以确认，但看来又是‘不可能’把它逐入实在界。只要它存在，就足以取消简单认识的幻象；幻象仍会存续，却只是不断受到反驳的海市蜃楼。”

“认识是自然功能。在这里，认识只有通过同这项知识相关的一连串反转所生产的去自然化，才得知自己。

“最初的反转作用于这项知识本身：它在那里生产能指压抑这个格外突出的否定形象；还要加上可表象性条件，而能指事实无论多么物质，都抗拒可表象性。

“随后，以一项明确衔接的反转返回的，是无意识针对这些效应可能被解释为意义而作出的否认——这正构成它的价值。我强调‘否认’一词，在弗洛伊德那里对应 Verleugnung。

“因此，无意识只在无意义、确切地说 nonsense 中欢欣。再往前，它只以躲避同自然相遇的方式分有自然。”

“我只为无知者备案，提醒这些所谓拉康陈词；它们之所以列入《无意识的形成》标题，得归功于我。我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我在这里没有衔接神经症。

“如果必须补全这些陈词，就要拒绝从一个可设想的主体出发理解无意识知识的坚持。弗洛伊德给出他所谓‘判决’——记住他的原话：排斥并定罪的判断。依照我的说法：这项知识遭到象征界的拒斥，便在幻觉的实在中重新出现。

“为了准确固定这些术语，我不得不花费多年，在那些每天经历这些事情的人脚边打滚，却没能把他们从足够可表象、足以让他们继续睡觉的梦中拉出来。

“他们只须担心自己可能醒来、开始相信我的现实，就会把我逐出那些象征享乐。

“所以，我回到高等师范学院的实在。E.N.S.，也就是 ens、存在者——如果愿意，可以加一个 g，写成高师的 étang（池塘）。第一天，我就真的被命令声明：我赋予这一切怎样的‘存在’。”

相关知识卡 橡胶手错觉、幻肢痛与镜箱疗法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看来不恰当；我不认为自己欠听众任何本体论。

“我训练他们习惯我的‘逻辑’（logie），也就使缺少‘本体’（onto）显得羞人。我早已把全部 onto 一饮而尽；[笑声] 我在这里的回答足以作证。

“我不绕弯，也不以森林藏树：存在只诞生于存在者说出自己时生产的裂隙。

“这个公式把作者降到以行动为手段的位置。

“因此，存在者需要时间说出自己。这项‘需要时间’，正是存在从无意识中召唤我们的方式。

“每当‘将需要时间’时，作出回应的正是存在。

“但听清楚：我决意利用自己语言的晶体折射能指、分解主体。”

“Y faudra le temps——得花时间。我是在对你们说法语，对吧？希望……不是说悲伤。

“Faut du temps 中‘将需要’的东西，说出了我起步时谈的裂隙。”

“我玩的是‘将需要的东西’这个短语。有一本提醒比利时人避免比利时用法的语法书——我很看重这本书——虽然不建议如此使用 faudra，却承认这种用法。”

“否则，这本语法书便没有履行职责。

“倘若‘差一点’便到了那里，peu s’en faut 中这个‘一点’正向你们证明：法语的 falloir（必须）确实从缺失走向必然。

“与此同时，estuet——人们当时这样说：est opus，在此情形中说 est opus temporis（需要时间）——可以说沿着古法语的河口漂流而去。

“反过来，falloir 返回裂隙，而且并非偶然：它返回虚拟式的模态、返回失效，例如 à moins qu’il faille…（除非必须……）。

“在无意识的衔接中，应在哪个层面找到言说同存在的系结？可以确定，赋予它织理的时间不是一段想象流程；不如说，这织理是织物，由只意指其中洞孔的结组成。

“这个层面没有‘自在’，除非是从中坠落的某种受虐主义。”

相关知识卡 falloir 的词源与 estuet

“精神分析家正接续这一点：他把它转交给一个‘某人’，由这个人支撑‘需要时间’，支撑到所需的时间为止，使存在者在说出自己时，让某种东西成为存在。

“你们知道，几个月以前，我试图引入精神分析行动的巨大分量。[注6]

“由精神分析家接起的这个‘某人’，正是未来存在得到规定之处；它取决于‘某人’怎样界定通向真的道路。

“斯多葛派曾经这样做，而且同他们的立场颇为一致……不，对不起，我跳过一小段——我累了。

“只有一种知识能够为‘真’充当中介，那就是逻辑。逻辑只有把真与假做成纯粹能指——字母 V、F，或者所谓值——才迈出正确的第一步。这是斯多葛派所为，同他们那种政治化受虐主义的道德颇为一致。”

> [注6] 指 1967—1968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

“希腊人拒绝力学，阻断了通向数理逻辑的道路；只有从数理逻辑出发，纯由织理构成的真才得以建立。

“因此，斯多葛派不断受到怀疑论者骚扰；悖论的是，怀疑论者的批评只能由自然之真的假设支撑，尽管他们把这种真看成不可抵达。

“精神分析经验恰恰反驳这一点：每个人都从中学会，所谓自然之真被化约为织理之真所允许的享乐。

“在精神分析中，某人用来介入的间隔，只能由书写同言说之间的距离表现。

“逻辑只有依靠书写才能维持，也就是所谓数理逻辑。怀疑论者若看见，它竟为并不空洞的断言取得不可驳倒的真之保证，必会惊讶。例如……”

- “一个被定义为算术秩序的系统，只有确认自身不完备，也就是要求某些在别处得到验证却不可证明的公式，才能取得一贯区分真假的一致性……”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 “或者，不可证明者又从属于另一项证明；该证明独立于它的真值作出决定；
- “或者，存在不可判定者；它的衔接是，不可证明者甚至无法得到判定。

“无意识衔接文本的切断，必须从这种结构得到辨认：它们使某物坠落。

“我又要利用语言的晶体：拉丁语 falsus 意为‘已经坠落’，它把‘假’——其意义当然明确区别于同‘真’相反的假——同 faut du temps（需要时间）以及 faillir（失败）联结起来。因为 falsus 是 fallere 的过去分词，faillir 和 falloir 两个动词分别从这个词根的转折产生。

“请注意，我只用词源来支撑晶体般的同音效应。

“谈到解释时，假的维度也必须得到修正。解释恰好因为是假的，甚至落得不准，才会运作，使存在落在一旁。”

“不要忘记，在精神分析中，falsus 是存在处于验证进程中的原因。

“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他在这个领域能够掌握的无非布伦塔诺的支撑；这一点在《否定》一文中虽不醒目，却完全可以辨认。

“它已经足以指出，‘某人’的分量如何落在分析家一边；即使我没有把这条路推到纯粹的逻辑沉浮子那里。

“不过，弗洛伊德身上还多出一个我认为具有决定性的特征：他唯独信任那些犹太人；另一方面，必须注意，他以厌恶之名明确排斥神秘主义。

“这项独特信任是，他们不会在真理的地震中失守。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因为犹太人——弗洛伊德最后也同他们一样——从巴比伦归来以后的所有世纪，不论走到哪里都懂得阅读；他的道路就是米德拉什。我马上会告诉你们什么是米德拉什。

“希伯来民族拥有风格最富历史性、最反神话的书：《圣经》。他们从每个字母的脚部质询它，而且只凭这些字母……”

相关知识卡 米德拉什：犹太释经的文类与方法

“从词尾的一次屈折、一次位置调换的游戏、甚至一种未被视为预设的相邻关系出发，他们质询这部书，例如追问它未能说出的摩西童年。

“在这个间隔中，弗洛伊德如此清楚地看见假在运作；为什么他非得把父亲之死推进去，不能满足于——又一个晶体效应——时间的镰刀？”

相关知识卡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编者按：拉康于 1970 年 6 月在比利时广播电视台朗读了回答罗贝尔·乔尔让七个问题的文本；本讲只收录其中三个。全文以《广播讲话》为题，发表于瑟伊出版社《Scilicet》第 2/3 期，1970 年。]

第10课 · 1970年4月15日

安德烈·卡科

好，我不会说是我来给你们介绍安德烈·卡科教授先生。他是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五部——也就是所谓“宗教学部”——的研究主任；你们知道，我本人也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担任讲师。

我不会说是我来介绍他，因为我没有资格介绍他。倒不如说，是我来“介绍我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他的恩惠与好意，我完全依赖于他。确切地说，大约从我们上次见面的前两天起，我才动念要弄清一点情况，才开始接近塞林那本书所牵涉的问题。

我早已跟你们谈过这本书，你们应当知道它有多重要，对吧？

至于那些偶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我只说：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或者，照我说过的，像戒指恰好套上手指一样——使弗洛伊德得以支撑这样一个论题：摩西之死是一场谋杀，也就是说，摩西是被杀死的。

相关知识卡 塞林与弗洛伊德的摩西被杀假说

凭借卡科先生，我首先得以了解这本书在释经学中的位置：它置身于所谓“文本批评”的繁盛之中，而这门文本批评尤其从十九世纪起在德国大学里建立起来。

必须把塞林放回他的前人与后继者之间——在爱德华·迈耶和格雷斯曼[注1]之后，也在许多后来者之前——才能准确把握他造成了什么影响。这影响的尺度，就见于我终于弄到手的这部文本。上次我已经告

诉过你们，得到它颇费周折，因为这本书在欧洲确实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最后，经法国以色列联盟帮忙，我从哥本哈根收到了它。于是我可以把文本交给卡科先生过目。在我提出请求之前，他已是极少数不仅听说过这本书、还曾经亲手翻阅过它的人之一。

我们特别考察了文本中的一个要点：塞林如何让弗洛伊德得以安置某个显然切身相关的问题，不过两人的理由未必相同……您有什么要说的吗？……是的，未必出于与弗洛伊德相同的理由。

由于塞林的文本本身包含这一内容，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一个我极其无知的领域。你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不知道的东西有多少！幸好如此；否则，假如你们知道我不知道的一切，你们可就无所不知了！

我试着把从卡科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略加整理，实际做起来时忽然意识到：两种“知道”之间有极大的差别——

> [注1] Édouard Meyer：Histoire de l’Antiquité，巴黎，Paul Geuthner，1912－1926。Hugo Gressmann：Altorientalische Texte zum Alten Testament…，De Gruyter，1926。

一边是知道自己谈论的、以为自己能够谈论的东西；另一边则是我将用一个词来称呼的情形，这个词恰好能说明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做什么：我对你们讲话的方式将第二次发生断裂。

上一次，你们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甚至有人猜测，那只是为了让教室透透气；可我看效果不大。[笑声]

这一次却相反，我想你们会更有理由留下。因为今天我若再一次把卡科先生使我能够做的事情呈现给你们，方式将有所不同。

说到底，一想到必须处理希伯来字母，我就有所感触。上次我在读给你们的文本里插入了米德拉什（Midrasch）的定义：它本质上是与书写的一种关系，服从某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法则。因为，如我后来对你们说过的，它是一种口头介入与书写的关系：口头介入依托书写，并指向书写。

整个精神分析——我是说分析技术——都可以从这一参照得到某种阐明；它可以被看作一种我们姑且加上引号称为“解释”的游戏。自从有人谈论例如“解释的冲突”以来，“解释”这个词已经被到处滥用了。

仿佛解释之间真会发生冲突似的！解释至多彼此补充。解释所运用的恰恰是这一参照。要紧的是我上次告诉你们的 falsum：从中落下之物。这个词周围可以同时建立“坠落”与“假”的全部歧义；这里所谓“假”，是指真的反面。

我说过，在某些场合，解释之“假”也能发挥作用，使话语发生位移。[话语转换]

我想，我们今天能做的最好之事，就是把所涉及的东西传递给你们。在这个领域，对我而言，它绝不可能对应于一项知识，而更像我所谓的“摸清门道”。

我会在你们面前继续这一操作，继续试着摸清门道；我采用的形式并非虚构，而是提出那些必然无法穷尽的问题，也就是我这几天向卡科先生提出的同一批问题。

因此，我同你们处在完全相同的位置：都在试着摸清某项知识的门道，而这项知识恰恰就是圣经释经学。

还需要我告诉你们吗？卡科先生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五部的正式研究领域是“闪族宗教比较研究”。以我亲身的体会，在这个领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让你们感受到：塞林从《何西阿书》抽取文本时究竟怎样接近它——你们将看到他用了什么手法——怎样从中抽出一件他自己很想抽出来的东西。

他自有理由，而这些理由对我们很重要。在这一点上，卡科先生带给我的东西同样弥足珍贵。

我刚才谈到无知。要成为父亲——我的意思不仅是一个实在父亲，而且是实在之父——肯定有些事情必须以猛烈的方式一无所知。

在某种意义上，凡是不属于我上次试图在文本中确定的结构层次的东西，都必须一无所知；严格说来，这个层次由语言效应的秩序所界定。可以说，正是在那里，人“落到真理之上”——

这里的“之上”也完全可以换成“从真理中落下”。奇特的是，若把这一绝对参照考虑到底，我们可以说，谁若能守在这个位置上——当然，没有人真能守住——谁就不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当然并不是说出了某种专属于分析家、或者足以界定分析家的特征。

那样当然会把分析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你们已经快要这样反驳我了——降到所有人同一层次：“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这会是个错误。不能因为人人都在讲话，就认为人人都说出了某种东西。

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参照：知道自己嵌入了哪一种话语。到了极限，所涉及的可能正是那个多少带有虚构性的立场。

有一位恰好对应于这一立场。我会毫不犹豫地点出他的名字，因为对我们分析家而言，他似乎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关心希伯来历史究竟是什么，也必须关心为何精神分析也许不可能诞生在这一传统之外。

而诞生于其中的那个人，正如我已经向你们强调的，坚持说：为了推进他所发现的领域，他真正信赖的恰恰只有那些很早就懂得阅读、很早就依靠一部文本生活的犹太人——那就是《塔木德》。

那位——或者说那个——实现了猛烈无知这一根本立场的，有一个名字：雅威本身。

雅威对这个选民发出呼唤时的特征，恰恰在于：当他宣告自身时，他猛烈地无视一切已经存在的实践和关系，也就是那些早已繁盛的宗教所具有的实践与关系。我们必须说，这些宗教建立在某种特定类型的知识上——确切说，是性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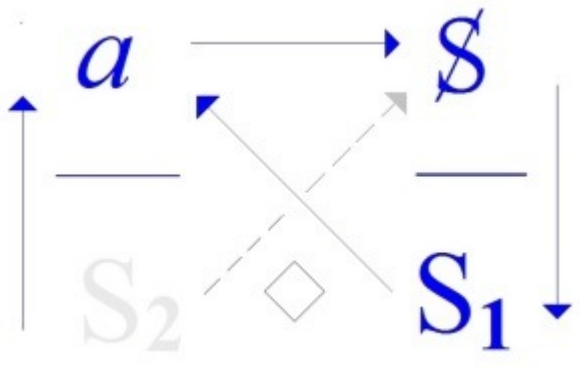
等会儿谈到《何西阿书》时，我们会看到，雅威正是以此为由猛烈斥责它们：那些把自然本身同超自然力量混合起来的关系，仿佛自然依赖于超自然力量。可是，我们凭什么断定这毫无根据？取悦巴力、使巴力反过来令土地丰饶的方式，难道就不可能对应于某种真正有效的东西吗？为什么不可能？

只因雅威出现过，并由此开创了一种特定的话语——今年我试着把它分离出来，作为精神分析话语的反面，也就是主人的话语——恰恰因此，我们对那些事已经一无所知。

分析家应当采取这个位置吗？当然不应当！

分析家——我接下来要说的，我曾在自己身上体验过——并不具有雅威身上那种令我们如此惊讶的猛烈激情。

从另一种视角，比如佛教的视角来看，雅威处在最悖谬的位置。佛教劝人净除三种根本激情：爱、恨与无知。可你们会看到——这正是这段独一无二的宗教显现最摄人的地方——雅威一样也不缺。爱、恨与无知，至少都是丝毫不曾缺席于他话语的激情。



分析家的位置显然与此不同——我今天不再用那个把对象(a)放在左上方的小图式写到黑板上。非常清楚，分析家的位置，也就是“分析中立性”唯一可能具有的意义，在于不参与这些激情。

正因如此，分析家始终处在一片不确定的区域，隐约寻找着怎样摸清那些知识的门道；而严格说来，他却必须摒弃那些知识。

今天所涉及的，正是从雅威同其人民的对话来接近问题：塞林脑袋里究竟可能发生了什么？同时也要看看，由此建立的相遇能向我们揭示什么——它使塞林的问题同弗洛伊德的探索相遇。

弗洛伊德的探索确实沿着这条线推进，但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他停在这里——

——他在这里失败；他把父亲这个主题做成一种神话性的结，而我现在要向你们展开的工作，其中一个目标恰恰就是处理这个结。他以此造成一条短路，说到底，是一次错失。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的梦；像所有梦一样，它需要被解释。尤其要看清位移效应在何处发生，而这种效应严格说来应当被理解为书写发生错位时可能产生的效应。

如果试着从弗洛伊德的论述中重建实在父亲，就会发现它严格地同仅仅涉及想象父亲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即对享乐的禁止；另一方面，恰恰被遮蔽的却是构成父亲之根本的东西，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阉割。方才我说在实在父亲的位置上有一种猛烈无知，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今天围绕塞林澄清若干问题以后，证明起来会容易得多。因此，请允许我先向卡科先生提出几个问题。

他当然很清楚——我已经用千百种方式向他表达过——在这一点上，我们问题的根本是：弗洛伊德怎样、又为什么需要摩西？

要弄清这件事，显然必须对“摩西”意味着什么至少有个大致观念。塞林的文本确实就以这个问题开头：Wer war Mose?——“摩西是什么人？”随后概述所有前人的意见，以及当时同他一起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所采取的不同立场。

有一点是肯定的：若不知道雅威从何时起已在那里，就不可能澄清这些立场。

如果雅威早已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而且这是一项我们能够确认的传统，情况显然就不同于另一种可能：这一传统是以回溯方式重建的，而重建者正是作为宗教奠基人的摩西；他在何烈山脚下

——更准确说，在何烈山上——领受了书写下来的律法石版，请注意，是“书写下来的”。

塞林的书严格围绕这个问题展开：Mose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israelitisch-jüd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摩西及其对以色列—犹太宗教史的意义》。

为什么塞林非得向我们呈现一个被杀的摩西？这是一个问题。我甚至不想自己来处理它，要把整个场地留给卡科先生。

可以肯定，这同摩西被视作先知这一事实紧密相关。

为什么摩西必须以先知的身份被杀？更准确地说，为什么塞林认为，摩西正因身为先知而遭受了殉道者之死？我想，卡科先生愿意先为我们澄清这一点。

安德烈·卡科

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谈论的人物。我们今天不是来解释《何西阿书》文本的——否则恐怕全年都得留在这里——而是要解释恩斯特·塞林对《何西阿书》提出的一种见解。

恩斯特·塞林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大学教授的典型。他生于 1867 年，学术生涯完全沿一条直线展开，始终在德国新教神学院担任旧约学教授。大约在 1920 年，他已经是柏林大学旧约学的正教授。

了解一点他的思想倾向或许并非无益。

塞林是十九世纪末德国新教——也就是福音派，不过今天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自由派——相当典型的代表。

在这一倾向看来，以色列宗教首先是一项道德教诲。人们总是强调启示中的伦理要素。

这些伦理要素确实可以找到；在塞林的时代，最通行的看法是——

——一方面，它们见于所谓大先知，如以赛亚、耶利米，也见于小先知，即十二小先知，其中最早的代表是阿摩司和何西阿；

——另一方面，这种道德启示见于《十诫》，尤其是《出埃及记》第20章所谓的“伦理十诫”，也就是你们熟知的十条诫命。

塞林并非唯一一位把十诫归于摩西本人的人。

那么，怎样把旧约启示的这两个顶峰连接起来？

塞林提出了一个近乎公设的命题：先知，尤其是留下著作的大先知，乃是摩西传统的继承者。他们继承了源自摩西的真正传统，也携带并传递着有关这位年老摩西——第一位先知——命运和生平的真实成分。

因此，既然我们正在谈何西阿，那么可以说，摩西与何西阿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

还有第二项因素决定了塞林在《摩西及其意义》中的思考，使他提出一个极为特殊的论点——我要赶紧说明，此前从未有人真正主张摩西之死，唯一的例外是歌德的一段文字。我不熟悉那段文字，塞林本人当时也不知道它。几年以后，塞林的一位同事卡尔·布德才指出，摩西之死的想法早已由歌德提出过。

那么，为什么是摩西之死？

容我倒过来介绍恩斯特·塞林的《摩西及其意义》。

这里有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事实：塞林写作这本 1922 年出版的书时，刚刚完成对十二小先知书的注释，其中自然包括《何西阿书》。这部注释也在 1922 年出版，收入名为 K.A.T.（Kommentar zum Alten Testament，《旧约注释》）的释经丛书，书名是 Das Zwölfprophetenbuch（《十二小先知书》）。

在这部《何西阿书》注释中，摩西之死连一分钟都没有被提起。他略过了后来在《摩西及其意义》中长篇讨论的段落，给出的解释全然不同。

当时，他还没有作出这项"发现"，还没有构想出摩西之死的假说。

所以我认为，是在完成《何西阿书》注释之后，塞林才回过头来得到这个想法；事实上，他是在思考另一件事时形成了这个想法。

相关知识卡 塞林与弗洛伊德的摩西被杀假说

那另一件事，是一段与《何西阿书》完全不同、但同样属于先知文献的圣经文本，即"第二以赛亚"：从《以赛亚书》第 40 章开始的部分，尤其是第 52 章末尾至第 53 章开头。

这是一位公元前六世纪先知的文集，其中谈到一位雅威的仆人，他所受的苦难具有替人民赎罪的价值。基督教传统以及新教释经传统都把这看作旧约启示的又一顶峰，因为它引入了救赎性死亡的观念；而在福音书或基督教文献中，受苦仆人的形象无疑被移置到耶稣这个人物身上。

这一点无可争辩。

由此你们可以看到：塞林多么看重摩西，又多么看重先知——

从何西阿直到同样身为先知的第二以赛亚——他把先知视为摩西的后继者和继承人，因而赋予他们极大的重要性。

我想，塞林作出了这样的发现：第二以赛亚笔下那位死亡具有救赎价值的受苦仆人，就是摩西本人。

从这里出发，他努力在更早的先知书中重新找出摩西之死的暗示。于是，他重新解释《何西阿书》的若干段落，好让它们"说出"——我强调，是好让它们说出——摩西之死。

何西阿是最古老的先知之一，也是先知传统、即有关摩西之真正传统的守护者。照塞林的说法，他用隐晦的字眼表达过摩西之死——而且隐晦到这些字眼里很可能根本没有这回事。

拉康：不是说它们不在那里，而是说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这样读过。

卡科：这些段落在塞林之前从未被这样读过，在塞林之后也没有人这样读过。

你们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一种很……姑且说，一种你们未必熟悉的研究类型。不过，看看塞林怎样操作也颇有意思，可以给我们一点概念。

不过，也不该苛责他。那个时代的释经者多少认为，抄写《圣经》的人不懂希伯来文。

我这样说有些粗糙，但归根结底就是如此。人们说："这是糟糕的希伯来文，所以必须校正。"

结果呢？他们拿起一个句子。句子往往晦涩难解，因为公元前六世纪的希伯来文——

——尤其是希伯来诗歌，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死语言。

公元初期拉比与犹太作者的注释，以及例如由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作成的《七十士译本》，其实并不比我们理解得更多。

而他们面对的往往还是同一份文本。

于是人们就说："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已经讹坏了。让我们校正它，把一个显得古怪的词换成一个人人熟悉的词。"

这样做有时会产生一种结果——而且通常如此——就是把《圣经》文本平庸化，让它说出贫乏无味的话；另一些时候——塞林就是这样——则让文本说出释经者恰好想让它说的东西。

拉康：《七十士译本》依据的文本，确实早于我们现在拥有的文本吧？

卡科：是的，更早。我们现存最古老的完整希伯来《圣经》手稿出自公元九世纪，而《七十士译本》无疑在基督纪元以前已经编成。不过，事情看来是这样……

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但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认为，《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译者眼前所见或耳中所闻的，常常与我们今天的印刷本《圣经》——马所拉文本，也就是传统的希伯来《圣经》——相同。只是有时他们不理解，于是便加以解释。

研究《圣经》的古译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要继续……

拉康：我真心认为，若您能让在座诸位对围绕几个真正关键词所作的这些“操作”形成一点概念，那会很重要……

卡科：那么，就我们关心的主题——塞林笔下的摩西——而言，必须从两类文本出发：

——《何西阿书》的若干文本；

——还有另一段文本，我先很快介绍，即《民数记》第 25 章。

这是一段非常奇特、极难理解的文本。在它被写定于《圣经》之前，无疑已经被古老传统反复改写。它叙述的，是你们知道的“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的偶像崇拜”：他们崇拜巴力・毗珥，事情发生在名为示亭的地方。这段文本非常难解。

容我再读一遍《民数记》第 25 章的结尾。我读的是译文；这段文字比较直白，任何译本都可以使用。

相关知识卡 《民数记》25章：非尼哈与祭司盟约

וַיֵּשֶׁב יִשְׂרָאֵל, בַּשִּׁטִּים; וַיָּחֶל הָעָם, לִזְנוֹת אֶל-בְּנוֹת מוֹאָב.

“以色列住在示亭时，民众开始同摩押女子淫乱。”

我跳过去，好吗？[笑声]

好，总之，我在文本中跳过去……[笑声]

况且这段文字实在极其……

会场中某人：审查！

וַיִּצְמֶד יִשְׂרָאֵל, לְבַעַל פְּעוֹר; וַיִּחַר-אַף יְהוָה, בְּיִשְׂרָאֵל ג.

“上帝的怒火向以色列燃起。”

וְהִנֵּה אִישׁ מִבְּנֵי יִשְׂרָאֵל בָּא, וַיִּקְרֵב אֶל-אֶחָיו אֶת-הַמִּדְיָנִית, לְעֵינֵי מֹשֶׁה וּ
וּלְעֵינֵי כָּל-עֲדַת בְּנֵי-יִשְׂרָאֵל; וְהֵמָּה בֹכִים, פֶּתַח אֹהֶל מוֹעֵד.

“看哪，以色列子民中有一个人”——这里出现了一段十分奇怪的话——“以色列子民中有一个人，当着摩西和以色列子民全体会众的面，把一名米甸女子带到自己的弟兄那里。”

וַיַּרְא, פִּינְחָס בֶּן-אֶלְעָזָר, בֶּן-אַהֲרֹן, הַכֹּהֵן; וַיָּקָם מִתּוֹךְ הָעֲדָה, וַיִּקַּח רֹמַח ז
בְּיָדוֹ.

“这时，祭司非尼哈……”——他是王国时代耶路撒冷祭司制度那位虚构的始祖——

וַיָּבֹא אַחַר אִישׁ-יִשְׂרָאֵל אֶל-הַקֻּבָּה, וַיִּדְקֹר אֶת-שְׁנֵיהֶם--אֶת אִישׁ יִשְׂרָאֵל ח
וְאֶת-הָאִשָּׁה אֶל-קֻבָּתָהּ; וַתֵּעָצַר, הַמַּגֵּפָה, מֵעַל, בְּנֵי יִשְׂרָאֵל.

“……非尼哈用矛刺穿了那名以色列男子和米甸女子的腹部，于是灾祸止息……”——究竟是什么灾祸并不太清楚，看起来大概是一场瘟疫，但我们不能确定，文本也含混带过——“……止息了这场为惩罚巴力・毗珥平原上的偶像崇拜而降下的灾祸。”

相关知识卡 《民数记》25章：非尼哈与祭司盟约

好。这段文本很重要，但还有另一个理由，我顺便指出：它为一支自称上溯到非尼哈的祭司王朝奠定了获选的依据。

非尼哈在此时得到一项“祭司之约”，也就是保证祭司职分在其世系中永久延续；这是对他怀着热忱惩罚那些在摩押平原犯罪的以色列人的奖赏。

וְשֵׁם אִישׁ יִשְׂרָאֵל הַמֻּכֶּה, אֲשֶׁר הֻכְּה אֶת-הַמִּדְיָנִית--זִמְרִי, בֶּן-סָלוּא: נְשִׂיא יד בֵּית-אָב, לְשִׁמְעֹנִי.

וְשֵׁם הָאִשָּׁה הַמֻּכָּה הַמִּדְיָנִית, כָּזְבִּי בַת-צוּר: רֹאשׁ אֻמּוֹת בֵּית-אָב בְּמִדְיָן טו הוּא. {פ}

可是从第 14 节起，又出现了另一条像是插入事件的信息：

“那名同米甸女子一起被杀的以色列男子名叫心利，是撒路的儿子；他是西缅支派的一名首领。那名米甸女子叫哥斯比。”

塞林的假说是：文本遭到了扭曲。人们试图抹去另一件事的记忆。

那另一件事就是：在摩押平原那个名叫示亭的地方，为了驱除降临以色列的灾祸或瘟疫而被处死的人，并不是那个名叫心利的西缅支派人物——别处从未提到过他——而是摩西本人！

相关知识卡 《民数记》25章：非尼哈与祭司盟约

那个人就是摩西；被遮蔽的正是摩西的救赎性死亡。

塞林还加了几项论据：娶了米甸女子的人，显然是谁？是摩西，因为传统说摩西的妻子西坡拉正是米甸祭司的女儿。

因此，这位米甸女子的名字也被掩盖了；人们把她叫作哥斯比，而不是西坡拉——若写成西坡拉，事情就太容易了。哥斯比是一个侮辱性的绰号，派生自表示“谎言”的词。

所以你们看，产生我们如今所读《民数记》第 25 章的祭司传统，照此说来是删掉了摩西，用那个名叫心利的填空人物取而代之。

可是，如果重建塞林认为真实的传统，这里叙述的就是摩西在示亭遭到杀害。

我把这些说法陈述出来，但必须再强调一次：塞林的说法完全武断。

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考察《何西阿书》的几个段落。其中有三段尤其重要。

第一段在第 5 章，即《何西阿书》5:2。这里必须说明：我放弃翻译这节希伯来文。我可以给你们读希伯来文，但老实承认，它无法理解；最诚实的译法只能是几个省略号。

我现在读一个法语译本，这是最近出版的译本之一，也就是所谓《普世圣经》。至少根据它所遵循的原则，它应当尽可能贴近希伯来文本。

好，先看《何西阿书》5:1：

> שִׁמְעוּ-זֹאת הַכֹּהֲנִים וְהַקְשִׁיבוּ בֵּית יִשְׂרָאֵל, וּבֵית הַמֶּלֶךְ הַאֲזִינוּ--כִּי לָכֶם א
> הַמִּשְׁפָּט: כִּי-פַח הֱיִיתֶם לְמִצְפָּה, וְרֶשֶׁת פְּרוּשָׂה עַל-תָּבוֹר.
>
> “祭司们，你们要听这话；以色列家，你们要留心；王家，你们要侧耳。本该由你们施行审判，可你们却成了米斯巴的陷阱、张在他泊山上的罗网。”

换句话说，多少就是“你们把人坑进去了”。

拉康：我们对米斯巴发生的事，难道不知道得更多吗？

卡科：哦，知道。这是在暗指一些事件……王政建立以前，米斯巴是一个聚会地点，也可以说是施行审判的地方。至于他泊山，情况就神秘得多。

接下来，我们这部号称尽可能忠实的《圣经》译本，把《何西阿书》5:2 译成：

וְשַׁחֲטָה שֵׂטִים, הֶעְמִיקוּ; וַאֲנִי, מוּסָר לְכֻלָּם ב.

“背信者挖了一个深坑。”

逐字来看，原文一共没有几个词，所以我把它们转写出来；在座若有人能读希伯来文，可以看：shahata settim he einikou。

——动词 he einikou：他们挖深了，他们使某物变深。

——settim 这个词被译作“背信者”，是 he einikou 的主语：“背信者挖深了，使某物变深。”这还勉强说得通。

——但对于 shahata，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名词，在句中的功能看不出来；它同动词词根 shahat 有关，而后者意为“宰杀、屠戮”。

现在来看它在塞林那里变成什么。我先读这个最新潮的译本：“背信者挖了一个深坑。”

这是误译。可以说“背信者挖了”，但不能说“一个深坑”。文本中没有“深坑”，因为这里混淆了 shahata 与 shahat：一个带 tav，也就是强调辅音，另一个带普通辅音。文本里并没有“深坑”。

塞林把它写成：shahat hasshitim he einikou。这样便得到：“他们挖深了一个坑”，或者“示亭的坑”——这里 shahat 带 tav。

于是，《民数记》25:1　的示亭又回来了；按照塞林的假说，那里正是摩西被杀的地点。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例子。

事情还没完；如果不至于令你们过分厌烦，还得考察塞林为支撑其假说援引的另外两段文字。

下一段是《何西阿书》9:7 – 14。

《何西阿书》第 9 章稍微容易一些；至于刚才《何西阿书》5:2 那节，坦率说，我目前不会翻译。

也没有必要勉强翻。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词像注释所说的那样让人联想到屠杀；有人“挖了”，或“背信者挖了、挖深了”，但我们不知道挖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文本是否已经讹坏，还是仅仅因为我们再也无法理解它；《七十士译本》的译者同样不理解。

所以，第二段是《何西阿书》9:7 – 14。

相关知识卡　《民数记》25章：非尼哈与祭司盟约

《何西阿书》9:7 – 8

> בָּאוּ יְמֵי הַפְּקֻדָּה, בָּאוּ יְמֵי הַשִּׁלֻּם--יֵדְעוּ, יִשְׂרָאֵל; אֱוִיל הַנָּבִיא, מְשֻׁגַּע אִישׁ ז הָרוּחַ--עַל רֹב עֲוֹנְךָ, וְרַבָּה מַשְׂטֵמָה.
>
> צֹפֶה אֶפְרַיִם, עִם-אֱלֹהַי; נָבִיא פַּח יָקוּשׁ, עַל-כָּל-דְּרָכָיו--מַשְׂטֵמָה, בְּבֵית ח אֱלֹהָיו.

这段文字似乎在说先知怎样遭人蔑视：

> “惩罚的日子到了，清算的日子到了。以色列要知道！先知发了疯，受灵的人陷入狂乱，因为你的罪行重大，因为你遭受的攻击猛烈。
>
> 以法莲的守望者同我的上帝在一起，那就是先知。
>
> 人们在他走过的每条路上给他设下陷阱，甚至在他上帝的殿中攻击他。”

第 7 节谈到一位先知。我想，差不多所有人都认为——这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解释——何西阿以这种方式指称自己，说自己怎样成为同时代人怨恨或鄙视的对象。

而塞林一看到“先知”这个词，立刻扑上去：这就是摩西。

接着看他怎样处理同样不容易理解的第 8 节。我再把《圣经》原文放在一行，塞林的改写放在另一行：

> Tshofe Ephraïm im elohaï. Navi pah iahoush al kol derekhai. [集合名词]
>
> “以法莲的守望者同我的上帝在一起；先知是张在他一切道路上的陷阱。”

这是一个没有系词的名词句。到了塞林那里，它变成：“以法莲望向先知的帐棚。”

言下之意，是要去害他。塞林调换了两个词，又把 elohai（“我的上帝”）变成名词 ohel 或其复数 ohelaï，即“帐棚”或“帐棚们”。

再往后，在同一章的下一节里，他又找到了“示亭”。第 8 节末尾有一个词 mastema，意思是“敌对者”：

mastema bebeit elohav——“一个攻击者、一个敌对者，在他上帝的殿中。”

这同刚才“道路上的陷阱”构成平行。

《何西阿书》9:9

הֶעְמִיקוּ שִׁחֲתוּ, כִּימֵי הַגִּבְעָה; יִזְכֹּר עֲוֹנָם, יִפְקֹוד חַטֹּאותָם. {ס} ט

第 9 节又有 he einikou——

——随后又出现我们方才见过的词 shiheitou。我们的译本译作：“他们深深陷入败坏。”也就是说，he einikou 是“他们把某事做得很深”；shiheitou 是“他们败坏了自己”。

塞林则把 mastema 读成 hasshitim，还是同一套故事，又回到《民数记》25:1 的示亭；he einikou 是“他们挖深了”。他保留 shiheitou 的辅音，却不读 shiheitou，而读作 shahato。

Shiheitou 是第三人称复数动词，意为“他们败坏了自己”；shahato 则是一个带第三人称阳性单数后缀的名词，意为“他的坑”。

于是得到：“在示亭，他们挖了他的坑。”当然，是摩西的坑！

事情还没完。接下来这段《何西阿书》文本，在塞林那里也许谈不上更有说服力，但至少比前几段受到的解释没那么牵强。

它位于《何西阿书》第 12 章末尾、第 13 章开头。这里无可争辩地谈到了摩西，并且称摩西为先知。

我读一下结尾：此前说的是族长雅各，随后过渡到摩西。

拉康：无论如何，把 elohim——也就是“上帝”——变成 ohel——“帐棚”——这件事很引人注目，因为其他现代注释者也作过同样的改动。

卡科：是的，有可能。不过你知道，采用这类方法的不只塞林一个。只是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而别人没有从中得出如此大胆的结论。

《何西阿书》12:13

וַיִּבְרַח יַעֲקֹב, שְׂדֵה אֲרָם; וַיַּעֲבֹד יִשְׂרָאֵל בְּאִשָּׁה, וּבְאִשָּׁה שָׁמָר יג.

“雅各逃往亚兰平原。”

这是在暗指《创世记》第 29 章。

> “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同一个名字再次出现——“为了一个女子服役”——也就是为了拉结——“为了一个女子作了羊群的看守者”——字面上说，他“看守”，即 shamar。
>
> “可是，上主借一位先知使以色列从埃及上来；又借一位先知，使以色列得到看守”——mishmar。

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把上帝借摩西所作的事，同雅各为了得到妻子所作的事并置比较。

第 13、14 节构成一组十分优美而且有意为之的平行体；两节都以同一个词结束：一边是动词 shamar，另一边是 mishmar。

这里可以肯定，第 14 节所说的先知 navi 就是摩西；是他使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这并非摩西唯一一次被称为先知，不过在《何西阿书》这一段以及《申命记》的传统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我们也知道，《何西阿书》同稍晚的《申命记》之间确实存在联系。

接着是第 15 节：

הַכְעִיס אֶפְרַיִם, תַּמְרוּרִים; וְדָמָיו, עָלָיו יִטּוֹשׁ, וְחֶרְפָּתוֹ, יָשִׁיב לוֹ אֲדֹנָיו טו.

你们会看到，塞林对这段文字采取的自由，并没有使他的解读比他从第 5 章和第 9 章得出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Hirahis Ephraïm tamrourim——

——这里“以法莲”是主语：“以法莲激怒了……”然后是 tamrourim。这个词很麻烦，可以理解成：“以法莲苦涩地激怒了……”它显然是一个复数名词，却可以作副词使用，意为“以苦涩的方式”。这个词中肯定含有“苦涩”的词根。

拉康：这是一个罕见的词吗？

卡科：是，是，很罕见！

Vdamav alav iatosh v’herfato：“他将把他的血倾倒、抛回到他身上。”Iashiv lo adonav：“他的主将把他的羞辱归还给他。”

这一节不容易，但仍然可以理解：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以 tamrourim 的方式使某人受苦，也就是“苦涩地”使某人受苦。这里必须补一个宾语；他所折磨的很可能是他的主，即 adonav。这是本节最后一个词，但可以——希伯来诗歌中常常如此——作为两个半行共同的成分。

《普世圣经》译作：“以法莲使上帝遭受苦痛。”

接着看下一句：yitosh，“他要抛回”；主语很可能是 adonav，即“他的主”，也是后半节两个动词共同的主语：“他的主要把他的血抛回到他身上。”

“把某人的血抛回到他身上”是一项固定的法律用语，表示刑罚。

然后是 iashiv lo，“他将归还给他”：主要把 vherfato——以法莲的羞辱，即他犯下的可耻行为——归还给以法莲。

也就是说，主要为他的可耻行为向他施以报应。

《何西阿书》13:1

כְּדַבֵּר אֶפְרַיִם רְתֵת, נָשָׂא הוּא בְיִשְׂרָאֵל; וַיֶּאְשַׁם בַּבַּעַל, וַיָּמָת א.

按照塞林的处理，这是前一段论述的延续。Kedabber 是“当……说话时”；kedabber Ephraïm reuteit 是“当以法莲说话时，reuteit……”

Reuteit 是个难词。字面上说：“在以法莲的说话之际，当以法莲说话的时候，reuteit……”这个令人惊讶的名词在整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意思是“战栗”。

我们的理解是：当以法莲说话时，reuteit——那就是恐惧、战栗。

这是一项省略表达，但在希伯来诗歌、乃至一般的古老闪族诗歌中完全可以设想。这类表达极度简练，没有一个多余的词。

“以法莲一说话，便是恐惧与战栗。”

再看 nasa hou eb Israël。动词 nasa 意为“承载、抬起”：“他在以色列中抬起。”有时它也可以省略某个成分，例如 nasa kol 是“抬起声音”，也就是再次表示“说话”。

于是整句是：“以法莲说话时，便有恐惧；他抬起了……”天知道是什么，也许是抬起头，也许是抬起言说……“在以色列中”。

接着是 13:1b：vaiahisham baBaal vaiamot——“可是，他因巴力而犯罪，于是死了。”

第 13 章这一节的意思相当清楚：从前，以法莲是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但他因巴力而犯罪，于是死了。

现在来看它到了塞林那里变成什么。

情况相当复杂，因为他不只差不多每两个词就校正一个，还改变整节经文或半行诗的位置！

首先，他对 reuteit 下手。这个词在他看来很古怪；确实如此，因为它在整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一个词若只出现一次，人们就容易怀疑它仿佛没有存在的权利。

于是，他径直把它读成 torati——“我的律法”：“当以法莲说‘我的律法’时……”

顺便说，这项校正五年前还被图尔奈神父（Tournai？）在一篇文章中重新采用。他沿用了塞林的校正，尽管这样改实在没有必要。

塞林又把 nasahou eb Israël 读作 nasi。这算一项小改动，于是得到：“他在以色列中是一位首领。”

更重要的是，他把第 13 章经文改过以后换了位置，移到前一句之后；换句话说，他把 12:15b 放到 13:1a 之后。

连同其他几处校正，结果如下。我读的是塞林的译文：

> “可是，我借一位先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又借一位先知，使以色列得到看守。”

这一句大致还是希伯来文本。

“以法莲激怒了他，使以色列苦涩。”

塞林把 13:1a 接在这里：

“只要以法莲说‘我的律法’……”——Ephraïm torati，以此取代 reuteit——“……他就是以色列中的首领。”——nasi hou eb Israël，以此取代 nasa hou eb Israël。

接着是 13:1b。塞林不知为何把这个动词译作“他赎了罪”，原义却是“他犯了罪”。

“他因巴力赎了罪，并且被杀。”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查。他把仅仅表示“他犯了罪”的 iesham 倒转为“他赎了罪”，即“他因巴力赎了自己的罪”。

他又把 iamot——“他死了”——改换元音，读成 iumat——“他被杀”。

这里所说的当然就是摩西！

现在我们回到 12:15b 的半行；塞林又作了校正。他把第三人称的 yitosh——“他将把自己的血倾倒、落回到自己身上”——改成：

“我要使他的血落到你身上！”

希伯来文本说的是以法莲的血；在塞林的解释中，它却成了摩西的血！

“我要使他的血落到你身上，还要向你追讨他所受的羞辱。”

也就是说，按照塞林的看法，《何西阿书》12:14 至 13:1 这段经文说的是摩西遭到谋杀，而上帝将向以色列人追讨此事。

但你们看，塞林究竟凭借何等的手段——没法用别的词来称呼——才让《何西阿书》的文本说出某种它肯定从未想说的东西；除塞林以外，无论古代译者还是现代注释者的整体，从未在《何西阿书》中读出这种东西。

我认为，在《摩西及其意义》中，这正是把握这位释经者之方法最典型的地方。

当然，关于《以赛亚书》的仆人仍可讨论。其中确有一些特征可以被理解成暗指摩西，这一点无可争辩。只是我觉得塞林过分高估了这些特征。

同样，他大做文章，还想在“第二撒迦利亚”的一个人物身上看到暗指摩西被杀的痕迹——如果我没记错，是《撒迦利亚书》第 13 章，那里谈到一个被刺穿的人。那肯定不是摩西；总之，这一点含混而模糊。

现在你们看到了：塞林可以把自己的解释挂靠在《何西阿书》的这三段文字上，也看到了他怎样操作。

再说一次，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当时通常允许人对文本采取这样的自由。由于塞林的权威，他的说法后来竟被一些不完全属于其专业领域的人认真对待。

拉康：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在你们手头有一页的那篇 1928 年文章里，塞林换了一种工作方法。他借助《七十士译本》处理文本，最终得出完全另一类型的校正。

卡科：塞林在 1928 年这样解释我们这段文字：

“我借一位先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又借一位先知”——当然就是摩西——“使以色列得到保护。”

这一点很好。

“每当以法莲说出争吵之言，以法莲便苦涩地激怒了他。”

这一次，轮到 reuteit……

拉康：——用另一种方式被摆弄。

卡科：……正如您所说，用另一种方式被摆弄。一次，他把它校正成“我的律法”；现在又变成“争吵之言”。这是塞林在 1928 年文章中最后一次校正，他绕过《七十士译本》里的一个词，走了一条不可思议的弯路……

是的，完全有这种可能；但这不意味着《七十士译本》的译者真的读到了这个词。

“每当以法莲说出争吵之言，人们就不得不在以色列容忍他。”

Anasahou——“人们容忍他”……“在以色列”。

这一次，塞林保留了动词 nasa。

“他因巴力赎了罪，并遭受死亡。”

“我要把他的血抛到你身上；至于他的羞辱，我要还报给你。”

这与他 1921 年的处理完全相同。

我还可以用更多时间研究塞林怎样操作，但那恐怕会令人厌烦。

在塞林的思路里，有一点从来没有说清：即便假定这些字形本身具有这种效力，从而复原出一段带有某种意义的文本，也从未说明这段文本——或者说，这种元音化方式——曾经可能被任何人理解。

因为，如果声称《民数记》第 25 章隐藏着“摩西被杀”这一事件，我们就完全处在含混之中……

拉康：——完全处在公设之中。

卡科：是的，就是这样。至少在塞林本人的思路中——我想他并没有引入无意识的范畴。

拉康：哦，没有！把示亭事件藏在一整套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不过，这个故事大概并非荒诞不经；只有当它真的取代了那件事时，它才会变得荒诞不经——在这里，塞林自己的思想层面有某种东西在摇摆，而这种摇摆完全无法维持。

我认为，此事的趣味显然就在这里：可以说，是要看清这种处理方式包含着何等非同寻常的潜伏状态。

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弗洛伊德为何在这里找到了支撑，或者说更加确信：有某种东西不顾一切意图而浮现出来，尽管这项记忆在其所处的层面必定遭遇强烈抗拒。

然而，有一点仍然非常奇怪：这件事居然由文字材料支撑，而且还能借助这些文字材料重新破译出来。

琼斯至少记载过一件事：据说——我要强调，这是一个“据说”——弗洛伊德曾经从塞林本人那里得到一项承认；琼斯提到过这项转述，即塞林终究并没有那么确定。

也就是您方才告诉我们的：在 K.A.T. 第二版中，他差不多又改动了……

卡科：在 1929 年版中，他放弃了我方才概述的 1922 年对第 5 章和第 9 章的释读。

至于摩西之死……

拉康：那么，他保留了第 12 章？

卡科：他保留了第 12 章，而且那里确实谈到摩西。

但另一方面，我想他已经不再把摩西之死的假说推到前台。因为他在研究第二以赛亚那位著名的“死去的仆人”——雅威的仆人——时所提出的摩西假说……

……他在 1922 年还支持，到了大约 1929 年便自行放弃。此后，他又两次改变对“仆人”的看法，最终彻底放弃：那位仆人不是摩西。

他也许保留了摩西曾经死亡的想法，却不再用它解释仆人的主题。

我在想，弗洛伊德是否受了塞林学术声望的影响……

拉康：我所疑惑的是，弗洛伊德究竟有没有非常仔细地读过……

卡科：哦，我想他读过。《摩西及其意义》写得清楚而严谨。

拉康：这倒完全是真的……

卡科：它是错的，但这一点是真的！[笑声]

拉康：可是，弗洛伊德并没有依托这整套论证中的任何环节。

他只是指出，近来有个名叫塞林的人提出了一项可以接受的假说：摩西可能遭到杀害。

他只用一条很短的注脚指出此事，除了文献出处再没有别的内容；注脚给出 1922 年那本小册子《摩西及其意义》的出处，仅此而已。

刚才我还指出过……其实直到现在我都忘了明确说：琼斯提到，塞林在 1935 年的一部著作中——也就是在我们自己能够核实的年代之后——仍然维持自己的立场。

卡科：是的。也许我能把那段文字找出来，再寄给您。

拉康：

听我说，如果直到现在，我让您为我们做这些事还没有过分占用您的时间——对此我要感谢您，大家也都应当感谢您——那么，为了我后面要讲的东西，我想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请您至少让我们形成一点概念，《何西阿书》本身有一种意义，同塞林告诉我们的东西全然无关。

《何西阿书》的要点——我们前几天谈过的 ish 这一用法——同……怎么说呢，同《何西阿书》的新意紧密相连。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这项新意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呼唤，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呼唤。

我希望听完以后，每个人都会去找一部小《圣经》；哪个译本都可以，至少亲自感受一下《何西阿书》的语调。

那是雅威向自己的人民说话时，一种跺着脚、充满斥责的狂怒；我在拿到塞林的书以前谈《何西阿书》时，已经指出过这种长篇话语。

我自己读《何西阿书》，从来没有读到任何哪怕远远类似塞林故事的东西。相反，我当时顺带提醒过你们：从头到尾，那些斥责以及对神圣卖淫仪式的指控有多么重要。

同这些事相对的，是另一种呼唤：雅威借此宣称自己是丈夫。可以说，一条本身颇为神秘的漫长传统由此开始。它的意义究竟应当如何定位，我自己也不觉得已经显而易见；例如，后来人们把基督说成教会的新郎，反过来把教会说成基督的新娘——这条传统从这里开始。可是，这种后来明确成形的意义，在《何西阿书》中还找不到痕迹。

这里用来表示“丈夫”的词，就是我们前几天一起看过的 ish。它也出现在《创世记》第 2 章：在那里，这位 ish 为自己的伴侣命名。

这不是第 1 章 27 节第一次叙述的那一位——在那里，上帝把他们创造为男与女——而是第二个版本。因为《创世记》中的事情总要重复两次。在第二个版本中，ish 给那个由他肋骨造成的存在——我所谓的部分对象——取名为 ishɑ。

真巧，只须加上一个 ɑ！

用 ish 表示“丈夫”，是否涉及一种——我会这样说——甚至更被剥除了性意味的东西……

卡科：Ish 根本没有性别标记。婚姻语境中的用法只是 ish 众多义项的一小部分；它总体上就是一般意义的“人”。

拉康：这并不比德语用 mein Mann 表示“我的丈夫”更奇怪；而法语的 mon homme 倒带有些口语色彩。

可是下一节中那个本可译为“我的丈夫”的称呼，却同对“巴力”一词的弃绝紧密相邻；因为 Baal 有时也能表示同样的东西：“主、主人”，而在“丈夫”这个意义上，它倒更名副其实。

卡科：不过，Baal 的确就是“主人”。

还可以看到它的阴性形式 Beoula，指处在丈夫权力之下的女子。

《何西阿书》中的这些词汇问题全都极其游移。他收窄词义，是为了让雅威这个 Baal 同作为偶像的那些 Baal 形成对立。

“我才是你的 Baal，所以你不必再追逐那些 Baal！”

拉康：

这里形成了一项极为鲜明的区分；可是经过数世纪的注释，它总体上仍然相当晦暗。

卡科：这就是婚姻隐喻。它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正因如此，后来才可能把《雅歌》作寓意化解读。是《何西阿书》使《雅歌》的寓意化成为可能。

我曾经想过，这里是否存在某种去神话化：也就是说，在闪族宗教中作为巴力配偶或妻子的女神，她的位置归根结底被转移到了以色列共同体身上。

有时，以色列几乎被描写成一位女神。

没有人明确这样说过，但这仍处在东方闪族宗教的思维框架内；在那里，人们无法设想一位没有自己女神的神。

先知宗教无疑以以色列取代了女神。

例如，《何西阿书》就是这种情况。

拉康：

好吧，我想时间已经不早，我们今天可以到这里。让我们感谢卡科先生。

第11课 · 1970年5月20日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桥下已经流过许多水。我说的是四月在这里的那次会面。

我不是说最近那一次——至少对你们中某些人来说，它发生在别处……

我是说，我们在先贤祠台阶上进行的那种交流。

说实话，隔了八天回头看，我觉得当时交换的那些话水准并不低；归根结底，它让我得以重申若干要点。既然有人提出问题，而且问题一点也不愚蠢，这些要点无疑值得澄清。

不过，交流一结束，有人陪我回去时，我的第一个感受仍是某种不相称。

即便发言者中最出色的几位——说实话，没有一个人的提问毫无道理——起初也让我觉得多少落后于某种东西。这种滞后似乎反映在下面这件事上：至少在那些还算不上问题、只是略带熟稔的呼喊中，人们用若干参照来安置我。

这些参照当然不必全部拒绝；第一个就是戈尔吉亚，据说我在这里不知怎样重复了他。为什么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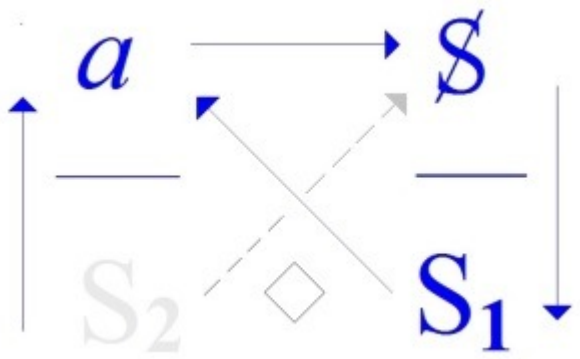
问题在于，提到这个人物的人把戈尔吉亚归入了“思想史”，而我们今天其实已很难衡量戈尔吉亚当时的效力。

可以说，退步正在这里；我对此颇感遗憾。因为“思想的功能”这个说法，把一整批彼此不同的样本统一起来：人们同这个或那个人拉开距离，再把他们统统圈进同一个括号。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些人物更不均质。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我们把他们想象成思想的代表，都不能因此把他们所组织的功能界定为同一个种类。

思想不是一个范畴；我甚至几乎要说，它是一种情动。不过，这并不是说，从情动这个角度看，思想就是最根本的东西。

只有一种情动——这一点严格构成了一个新近被引入世界的立场。我说，它是某种东西的结果；当我谈精神分析话语时，会把那东西的图式画到黑板上。



说实话，把它画到黑板上，同仅仅谈论它，完全是两回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万森露面——此后没有再去过，不过我说过还会再去——有人觉得非得对我高喊……

……真正占据会场的是一些现实的事情。有人提醒我，离我们聚会地点或远或近的某处，人们正在互相殴打；我们应当去想那些事，黑板同这个“实在”毫无关系。

错误恰恰在这里。我甚至要说，假如我们还有机会把握某种名为实在的东西，那只能在黑板上，不会在别处。就连我对它所作的评论，那些取得言说形式的话，也只同黑板上写下来的东西有关。

这是一个事实；科学这项人造事实已经证明了它。若只把科学的涌现记在某种哲学熬制的账上，就会大错特错——也许应当说“形而上学的熬制”，而不是“物理学的熬制”。至于我们的科学物理学为何恰好配得上“形而上学”这个称号，还有待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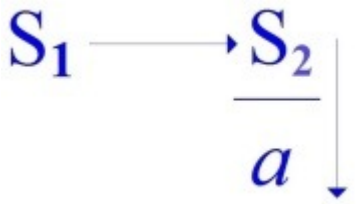
我认为，恰好可以从精神分析话语出发加以说明。它陈述的是：从这一话语来看，情动只有一种，即说话存在者被卷入话语的产物——因为这话语把他说话存在者规定为对象。

笛卡尔的 cogito 无疑由此取得典范价值，当然前提是我们重新检视它。我今天也许要再次迅速地做这件事。

说话存在者被话语规定为对象，由此产生这种情动。必须指出：这个对象不可命名。

我试着把它命名为“剩余享乐”，也只是一套命名装置。

某种话语效应造成的究竟是什么对象？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欲望之因；严格说来，它显现为存在之缺。



图式可写作行内关系 $S_1 \rightarrow \frac{S_2}{a}$。

因此，以这种方式被规定的不是任何存在者。

这类话语效应所作用的，当然可以是一个存在者，例如人，或一个活物；还可以补上“有性别而且会死”，然后大胆断定，精神分析话语谈的就是它，因为分析中总在谈性与死亡。

然而，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出发。如果确实有某种东西首先作为第一项事实显现为“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那么我们尚未到所谓“人”或“活物”的层次。

语言效应所涉及的不是任何存在者，而只是说话存在者：

——我们起初不在存在者的层次；

——而在存在的层次。

不过，这里必须防范一种幻象：一旦这样提出“存在”，错误就埋伏在旁，诱使我们把它同所有按辩证法组织起来的东西混同，也就是同存在与虚无的原初对立混同。

这个“存在”效应——现在给它加上引号——最初的情动，只在某种东西成为欲望之因的层次显现。我们通过这套装置的首项效应所圈定

的，就是分析家；分析家无疑是一个场所、一个位置，我试图用黑板上的几个小字母来圈定它。

分析家正是在那里被安置：被安置为欲望之因。

这是一个极其新颖、甚至悖谬的位置；某种实践无疑已经确认它。它的重要性，可以从它同主人的话语之间的根本关系来衡量：不是与后者拉开距离，也不是从高处俯瞰它，而是严格由后者开端。

也就是说，由于主体的一切规定——因而思想的一切规定——都依赖话语，某种东西由此呈现于当下。

在主人的话语里，确实涌现出一个时刻。若以为它处在“冒险”的层次，便完全错了。那种冒险终究仍是神话性的；只要停留在黑格尔现象学中，就还保留着神话痕迹，好像主人无非就是——什么？——最强的那一个。

黑格尔写下的当然不是这个。“冒死争夺纯粹声望的斗争”仍属于想象界。

构成主人的是另一件事，也就是我用别的说法称作“语言的水晶”的东西。

为什么不利用法语中的同音，把它写成 m’être——“对我而言存在”“我对我自己存在”？“主人—存在”的能指（signifiant-m’être）正从这里涌现。至于第二个词究竟怎样写，就由你们选择。

要开始说明这个独一能指如何凭借它同已经在那里、已经获得联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运作，我们只能设想：能指早已在场，我甚至会说，它一直已经在那里。

因为这个独一能指——也就是主人能指，你们爱怎样写就怎样写——若同它所统整的一项实践相联，那么这项实践本身已经由某种东西织成、编排。尽管能指联结尚未从中明确分离出来，它已经是一切知识的原则；起初，人们也许只能以技艺的形式接近它。

这项知识最初在场的痕迹，甚至还能在很远的地方找到；在所谓哲学传统中，主人能指同这项知识接合，已经长期摆弄过它。

不要忘记，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前，曾一度用什么支撑他的“我思”？正是用质询、怀疑我所谓这项被摆弄的知识来支撑；这项知识早已因主人的介入而被长期加工。

关于当前的科学，我们可以说些什么，才能为自己定位？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分成三层。我只因教学上的软弱才提出这三层，因为我终究不能确定你们能否跟紧我的句子：

——科学；

——其后是哲学；

——再往后，是某种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圣经》的诅咒形成一点概念的东西。

今年我用很长时间给《何西阿书》的文本留出位置——谈的是弗洛伊德如何依照塞林从中取材。最好的收获也许不在于质疑精神分析理论中那个我称为神话残余、名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东西，尽管这一方面当然也有收获。

假如需要某种东西，让一片据说统辖人类生活的神话性知识之海呈现于此——至于它是否和谐，我们又怎会知道——那么，雅威以“卖淫”之名诅咒的，恰好正是我所谓他的猛烈无知。

在我看来，这个侧面已经够用了，而且肯定优于通常诉诸民族志成果。后一做法本身藏着某种混乱，仿佛把搜集所得当作天然之物。可它们是怎样被搜集的？以书写搜集！

也就是说，它们被拆成细节、抽取出来，从此永远偏离那个据说要从中提取它们的所谓“田野”。

这当然不是说，这些神话性知识能把性关系的本质说得更多、说得更好。

精神分析所证明、并使性及作为其依存的死亡呈现于当下的方式是什么？关于性差异与死亡的联系，我们终究除了这种整体把握以外什么也不能确定。

精神分析使之呈现，意思是什么？它以一种我不会称作鲜活、而只会称作经过联结的方式表明：这个存在——无论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甚至不是“存在”——一旦被卷入话语，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表达性关系的联结。

性关系只以复杂方式得到表示；我们甚至不能说这些方式受到了中介，仿佛其中有某种 medium 或 media。这里有两项：

——第一项，是我所谓剩余享乐的实在效应，也就是对象(a)。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这个对象(a)替代了女人，男人才会欲望她。

——反过来，女人所面对的——如果我们真能谈论这件事——严格说来是她自己的享乐；这种享乐在某处被表征为男人的全能，而男人恰恰因为把自己联结为主人而显得有所欠缺。

分析经验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所谓男人，也就是男性，作为说话存在者，由于话语本身的效应、尤其由于主人的话语效应，严格地消失、消散了——你们爱怎样写"主人"就怎样写。

他只能以阉割的方式被写入。严格说来，阉割应当界定为对女人的剥夺：这里指的是那个假如能在某个相称能指中实现自身的女人。

对女人的剥夺——用话语的缺陷来表达，这就是阉割的意思。

正因为这件事不可思议，言说秩序才作为传话者设立了一个被构成为不可能的欲望；这个欲望把享有特权的女性对象做成母亲，恰恰因为母亲受到禁止。

这是对一个根本事实的有序装扮：在一种被界定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性结合的神话性结合中，不可能有任何位置。

我们从精神分析话语中把握到的，恰恰是：进行统一的"一"、作为全体的"一"，并不是认同所涉及的东西。

作为枢纽的认同、主要认同，就是一元特征，也就是被"一"标记的存在。

在任何存在者获得提升以前，一个独一的"一"以及承载这项标记的东西，已经使语言效应被安置下来，最初的情动也随之出现。

我写在黑板上的公式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件事。

某处有某种东西被分离出来：cogito 也只是用一元特征标记它。我们可以假定，“我思”中包含这项特征，以便说出“故我在”。

这已经标出了分裂效应：“我在”省略了“我被一标记”。

笛卡尔当然属于经院哲学传统；他以一项杂技般的转折从中脱身。作为一种涌现手法，这项转折一点也不应受轻视。

只有依据“我在”这个最初位置，“我思”才可能被写下。

很久以前，你们还记得我是怎样写的吗：“我思：‘故我在’。”“故我在”是一项思想。

若赋予它知识的特征，这句话会得到更好的支撑。这项知识并不超出那个被一所标记、独一无二的“我在”——被什么标记？被“我思”这个效应标记。

但这里仍有一项标点错误：ergo……很早以前我已经这样表述过，ergo 无非就是处在这场游戏中的 ego……它应当放到 cogito 一边：

“我思：‘故我在’。”

这样才赋予公式真正的分量：作为原因的 ergo 是“被思出来的”。

我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最简单秩序中的这项效应：语言效应在一元特征涌现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 cogito 并非普通三段论

一元特征当然从不孤单。因此，它会重复——而且每次重复都绝不相同——这一事实，严格说来就是秩序本身：语言在场、早已在那里、早已生效的秩序。

我们的首要规则，是不要追问语言的起源，哪怕只因为语言的效应已经充分证明了它。我们把这些效应推进得越远，起源就越发涌现。

语言效应具有回溯性，恰恰是因为它随着自身的展开而显明：严格说来，它就是存在之缺。

我在这里顺带指出一点——今天还要继续向前推进——只要把它写成下面这个行内连分式：$\frac{1}{1+\frac{1}{1+\frac{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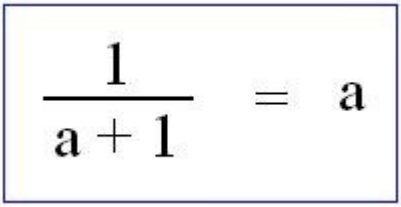
$$\cfrac{1}{1+\cfrac{1}{1+\cfrac{1}{1+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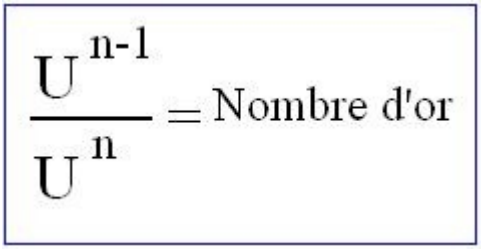
再让自希腊传统之初便在严格使用象征界时显现的东西，以最严格的形式在其中运作——也就是数学层面的东西——我们便来到欧几里得。

欧几里得是一项根本参照。他给出了此前从未见于留存文字的首项定义。当然，谁知道他从哪里借来了那项极其严格的比例定义？如果我记得不错，这项定义在《几何原本》第五卷；只有它为几何证明提供了真正的基础。

“证明”这个词有歧义，因为它总把图形中的直观成分推到前面，使我们忽略：欧几里得提出的形式要求乃是象征性证明。只有把不等式和等式分组排序，才可能以非近似而严格证明的方式确立比例；希腊词λόγος（logos）在这里所指的，正是“比例”。

很奇怪、也很有意思，而且相当有代表性：人们必须等到斐波那契数列出现，才以所谓“中项比例”把握这个比例。它就是我现在重新写出的关系 $\frac{1}{a+1} = a$。你们知道，我谈《从一个他者到另一个他者》时用过它[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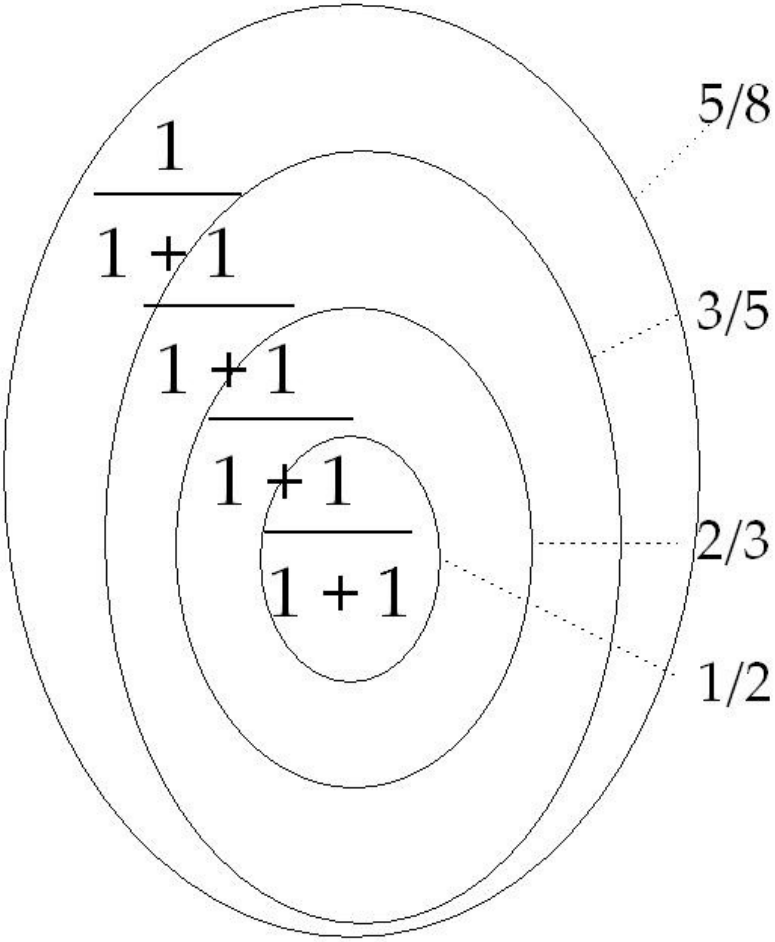
另一项写法是 $\frac{U^{n-1}}{U^n} = \text{黄金比例}$。

> [注1] 研讨班 1968 – 1969 年：《从一个他者到另一个他者》，巴黎，瑟伊出版社，2006 年；尤其参见 1969 年 1 月 22 日与 1 月 29 日两讲。

我使用过这个“中项比例”。浪漫主义至今仍把它叫作“黄金数”，还沉迷于在历代一切绘画或素描表面重新发现它，仿佛不能确定这一切只不过是……

只须翻开一本援引黄金数的美学著作便能明白：即使这个比例可以贴到画面上，也肯定不是因为画家事先画好了对角线；倒是某种说不清的直觉契合，使它总是——至少人们这样唱道——最和谐悦耳。

不过，还有另一件东西，其中的每一项都很容易把握：



图中依次给出行内比例 $\frac{1}{2}$、$\frac{2}{3}$、$\frac{3}{5}$、$\frac{5}{8}$。

相关知识卡 斐波那契数列、黄金比例与艺术传说

如果你们愿意，就从下往上计算。很快会看到，先得到 $\frac{1}{2}$，到这里得到 $\frac{2}{3}$，接着得到 $\frac{3}{5}$。

归根结底，这个比例处在斐波那契数列 $1, 2, 3, 5, \ldots$ 中；正如我当时提醒过的，每一项都是前两项之和。

把数列推得足够远，取相邻两项之比——写作 $\frac{U^{n-1}}{U^n}$，其中 $U^n = U^{n-2} + U^{n-1}$——这个比值就会趋向那项理想比例，也就是中项比例或黄金数。

由此可以得出：若把这个比例当作“我是一个一”的重复所产生之情动的图像，并从中读出情动，那么，造成情动的东西会回溯性地显现。我们可以暂时把这项情动写作等于 a，并且会知道，它就是我们在效应层面再次遇到的同一个 a。

一的重复所产生的效应就是这个 a；这里用一道横杠来标示它：

$$\frac{1}{a+1} = a$$

行内关系仍是 $\frac{1}{a+1} = a$。

横杠严格只表示：要使一造成情动，就必须越过某种东西。归根结底，正是这道横杠等于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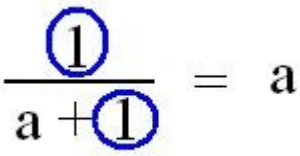
我们完全可以正当地把它写在横杠下面，作为这里被思考的效应；关系一经倒转，原因便从中涌现，这毫不奇怪。

原因正是在首项效应中，作为被思考的原因涌现。

因此，我们才会在数学运用的这次最初摸索中寻找某种东西。它对我们的兴趣不在别处，只在于它能更可靠地联结话语效应。

原因作为效应的反映、作为被思考之物涌现；我们正是在原因层次触及存在之缺的初始秩序。因为存在起初只凭一的标记得到肯定，随后其他一切都是梦。

尤其是把一梦想成包容一切的一、可以把某些东西统一起来的一。事实上，这里唯一能被统一的，只是这项对置和附加：把有关原因的思想，附加到一的第一次重复上。



图中仍以 $\frac{1}{a+1} = a$ 表示，但圈出了重复的一。

也就是说，这项重复已经要付出代价。它在 a 的层次设立了对语言的债：某种东西必须偿付给引入其符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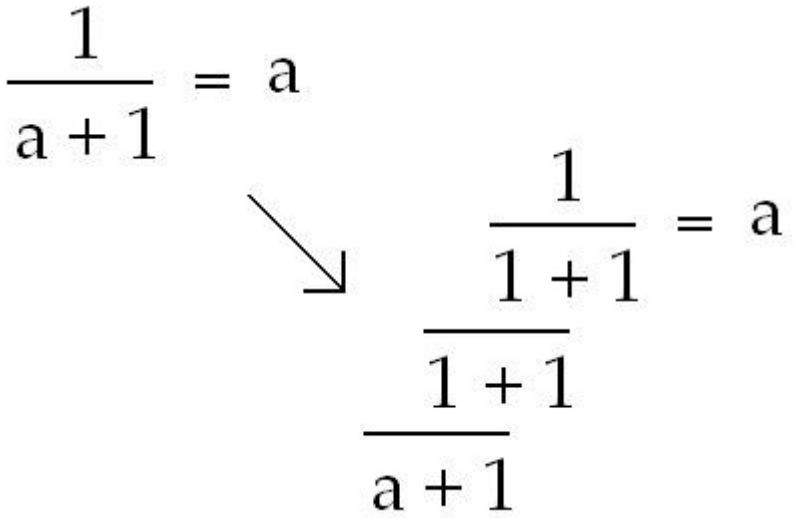
有一套命名试图赋予它历史分量，并从这里把它称作——

——严格说来，这不是今年才提出的，不过对你们来说，就算是今年吧——Mehrlust，即剩余享乐。

请注意，若要在这里重现这项无限联结，由于这里和那里的 a 是同一个，公式的重复当然不能是“无限重复”：现象学家总会犯这个错误，把它理解为在“我思”内部重复“我思”。

所涉及的只有一点：“我思”若是一项效应，就只能由“我在”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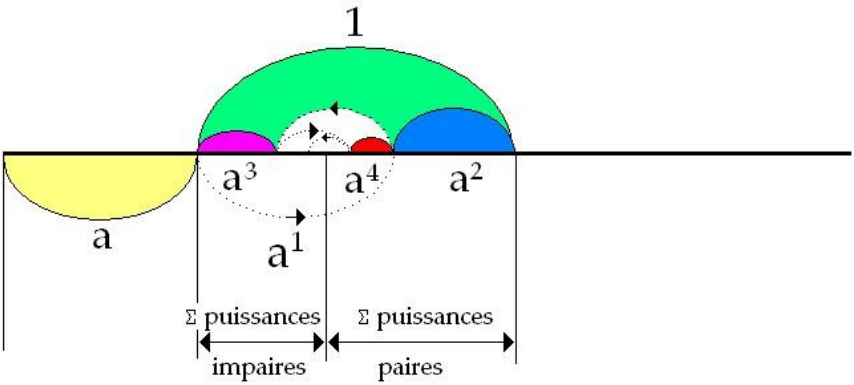
“我思，故我在”；“我是那个思者，故我在”；如此无限推进。你们会注意到，a 在这一数列中不断远离，而数列严格重现了黑板右边展开的诸个一的同一秩序：



图中把 $\frac{1}{a+1} = a$ 继续代入其自身。

只不过，最后一项会有一个对象(a)。请注意这件奇特的事：无论把下降推进多远，只要对象(a)继续存在，黑板上公式里的等式就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多重而重复的比例最终等于对象(a)的结果。

这表明，这个数列归根结底只标记了收敛级数的秩序——如果我没有弄错——其中最大的间隔因为恒定而得以维持，也就是始终为对象(a)。



图中以 $a, a^2, a^3, a^4, \ldots$ 标示各次幂，并区分奇次幂之和与偶次幂之和。

说实话，这只是一项局部联结；它当然不声称凭一项固定比例作出裁断，也不声称衡量数最初级显现——即一元特征——究竟具有多大效力。

它只是为了提醒我们：如今的科学可以说已经落到我们手上。我的意思是，科学如今以一种远远超出任何“认识效应”所能推测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世界中。

无论如何，不应忘记：

——我们科学的特征，并不在于它引入了对世界更好、更广泛的认识；

——而在于它使一些此前在我们的知觉层次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涌现到世界中。

人们试图围绕一套神话性的发生史来安排一切，借口是某种哲学沉思曾长期停留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什么保证我们的知觉不是幻觉？

科学并非从那里产生。

科学从欧几里得证明中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产生。不过，就连这些证明也仍然颇为可疑，因为它们还依附图形，并借用图形的自明性。

希腊数学的全部演变证明：把数本身的操作推到顶点的人才真正推进了事情。请看穷竭法；阿基米德那里已经用它预示了最终将抵达的关键，而对我们来说，关键恰好就是结构，即 calculus——微积分。

甚至不必等到莱布尼茨；他初次接触这项运算时还显得有些笨拙。早得多以前，只须在卡瓦列里那里重演阿基米德处理抛物线的壮举，它就已经启动。那已是十七世纪，但仍远早于莱布尼茨。

由此得到什么？

关于科学，你们当然可以援引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先在感官中”[注2]。可这证明了什么？

大家终究知道，sensus 同知觉毫无关系。

> [注2]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先在感官中。”一般归于亚里士多德。

相关知识卡 Nihil est in intellectu：感觉经验格言的来源

Sensus　在这里只是某种可以计数的东西；而计数很快就把它消解。因为我们的　sensus——例如从耳朵或眼睛的层次来把握——最后成为振动次数。

正因为我们借助这场数字游戏——

——才真正开始制造与我们的感官或知觉毫无关系的振动。那个据说从来就属于我们的世界，如今还是同一个世界，却已经被大量波充满；正如前几天我在先贤祠台阶上说的，就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无数波彼此交错，而你们毫无察觉。

作为某种东西的显现、在场与存在，这些波不容忽视；这某种东西就是科学。

因此，我们谈包围地球的大气层、平流层，或者谈一切你们愿意继续球层化的东西，直到我们能够捕捉粒子的最远处，就必须同时计入某种在当代远远越出这些层次的东西。

它是什么效应的产物？

与其说是一项知识经过自身筛选与所谓批判而取得进步，不如说是一次朝某种东西的大胆冲刺。人们通过一项机巧做到这件事；在笛卡尔那里，这项机巧无疑是——别人也会选别的例子——把真理的保证交给上帝：如果有真理，就让上帝负责，我们照面值接受它。

只凭这场并非抽象而是纯粹逻辑的真理游戏——

——只凭严格的组合运算，而且这套运算仅服从一个要求：规则始终必须以“公理”之名标示出来——

——只凭这场被形式化的真理游戏，一门科学就建立起来了；它同“认识”这一观念自古以来所含的预设再无关系。

那些预设就是二元极化、理想统一——人们想象认识具有这种统一。在其中，无论给两项穿上什么名字，例如 εἶδος（eidos，形式）与 ὕλη（hylē，质料），总能找到两个原则的反映与形象：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这个形象始终含混。

科学创造物展开的空间，从此只能被称作非实体、a-chose——带省字符的“非物”。这一事实彻底改变了我们唯物主义的意义。

主人——你们爱怎样写就怎样写——最古老的自负形象，就是男人想象自己塑造了女人。

我想，你们都有足够的经验，在人生某个转角遇见过这出滑稽戏！

形式与实体——再一次，你们爱怎样叫就怎样叫——形式与内容：科学思想必须摆脱的恰恰就是这则神话。

如果允许我用一枚略显粗糙的犁铧向前推进，只为——怎么说呢——把我的思想表达清楚……

这当然意味着，我假装自己有思想，因而已经堕落；因为问题恰恰不在思想。可是大家都知道，思想正是通过误解得到交流，那是当然的……那么，我们不妨来做一点“交流”，说说这项转变、这项转换究竟是什么。

科学借此显明自身不同于任何“认识论”。“认识论”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在科学这套装置的照明下——就我们能够把握它而言——我们才能确认，曾经被联结为“认识”的东西包含哪些错误、阻碍与混乱。

这些混乱确实不少，因为“认识”背后总预设着两个必须分开的原则：

——一项赋予形式；

相关知识卡 Python 3.13 的自由线程构建 · 米开朗基罗“石中天使”名言的出处

——另一项则接受形式。

因为科学恰好使我们亲手触及一件事——分析经验中的回响也印证了它。假如你们愿意，容我用这些粗略的宏大词语来说：当我谈男性原则时，话语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是，男性作为说话存在者，被要求为自己的“本质”给出理由——这里的引号带有讽刺意味。

随之而来的情动正是这项话语效应：男性接受对象(a)这项女性化效应，并且只有凭借它，才认出构成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其欲望之因。

反过来，在所谓“自然”原则的层次，它自古以来并非无缘无故总以女性参照得到象征——这里“象征”取其糟糕意义。这个原则指向的却是我刚才所谓非实体，是一种空。

我们若愿意，可以在极远、非常遥远的地方，给这项空投上一道女人的地平线；然而，所涉及的是未被赋形、确切说无形式的享乐。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位置：科学凭借它的“自运作”（opère-soi）前来建立自身。

因为，那个据说是原初的“我感知”（je perçois），必须由“自运作”取代。科学只诉诸能指联结，只从能指秩序取得支撑；正因如此，它从此前空无一物之处构造出某种东西。

相关知识卡 亚里士多德生殖理论中的质料与形式

如果我们想理解某件事，这里正是必须把握的关键。理解什么？理解人们怎样遗忘了这项效应本身。

随着科学借主人的话语发挥功能的场域不断扩张，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首先被规定为对象(a)；原因是，无论在哪一点，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一点。

刚才我谈到那些球层，是为了提醒你们：科学的扩张——奇怪的是，它在规定何为存在者方面也极其有效——用一连串力所能及命名的区域包围地球。

为什么不也给那些制造物所处的位置留出一份？——这里我又把意思强调得太过了——如果这些科学制造物无非是被形式化真理的效应，我们要怎样称呼这个位置？

我不能说自己必然为眼下提出的说法感到骄傲。不过，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有用；你们很快会明白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命名问题，因为所涉及的确实是一个已被占据的位置。由什么占据？

不妨说得粗糙些。刚才我谈到波，涉及的正是波：

——赫兹波或其他波；

——任何《知觉现象学》[注3]都从未让我们对这些波形成丝毫观念，也肯定不可能把我们带到那里。

> [注3]　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5年。

我们看看！它肯定不是“心智圈层”（noosphère）。你们想想：心智圈层里会住满“物自体”（noumènes）。

若有什么概念在这里应当退到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第二十五层背景之后，那正是这个。

如果把它叫作——你们也可以找到更好的词——真理圈层（aléthosphère），借用 ἀλήθεια（alētheia，真理）一词呢？我承认，这个说法毫无哲学情绪可言。

别乱了手脚：真理圈层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这里若有一只麦克风，你们就能接入真理圈层。

更妙的是，哪怕你们坐在一艘开往火星的小飞船里，仍然可以接入真理圈层。

甚至有一点绝对清楚、显而易见：我已经把两三个人到月球散步称作惊人的结构效应。请相信，就这项壮举而言，他们始终留在真理圈层里，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

就连那几个在最后时刻碰到一点小麻烦的人，大概也不会靠自己应付得那么好……我甚至还不是说他们同小机器的关系。也许他们靠自己也能脱险；但他们一直有那个人声的对象(a)陪伴，因此终究可以只说些蠢话，例如一切都糟透时还说一切顺利！[笑声]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要紧的是，他们始终留在真理圈层里。身处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意识到这一切，意识到所有充满其中的东西。

既然我刚刚谈了真理圈层，我们可以再引入一个词。

“真理圈层”听起来很美，因为我们假定：我所谓被形式化的真理，在它运作、在它“自运作”的层次上，已经充分取得真理的地位。

可是，在被运作之物、在那些四处游走的产物层次，真理一点也没有被揭示出来。

证据就是，那个人声以这种方式产生支撑你会阴的效应——容我这样说——却丝毫没有揭示它自己的真理。

所以，我们将借助同一个动词的不定过去时来称呼这些东西；一位著名哲学家提醒过我们，ἀλήθεια（alētheia）正是从那个动词而来……

……因为终究只有哲学家才会注意这种事，也许还要加上语言学家……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叫作 lathouses。[笑声]

世界正越来越多地住满 lathouses。你们好像觉得有趣，那我就把它写下来。

你们会注意到，我本来可以把它们叫作 lathousies，这样便能同 οὐσία（ousia）构成文字游戏；因为它们参与了 ousia，而 ousia 本身包含着全部歧义：

——ousia 不是大他者；

——不是存在者；

——处在两者之间；

——也不完全是存在，不过同它非常接近。

至于女性的非实体，我甚至愿意一路走到 parousia（临在）。

可是，至于你们出门以后会在人行道、每个街角、每扇橱窗背后遇见的那些小小对象(a)，在这批为了引起你们欲望而制造的对象的繁盛中——既然是科学在统治我们——请把它们想作 lathouses。

我很晚才发现——因为 lathouse 是不久前才造出来的——它同 ventouse（吸盘）押韵。里面有风，而且风很大：人声之风！

到了约会的尽头才发现这一点，颇为滑稽。倘若人类不曾那么频繁地借助上帝作传话者，以便相信自己同女人结合，也许我们很早以前就发现这些 lathouses 了！

无论如何，时间已经不早。这一小段涌现，是为了让你们对自己同 lathouse 的关系不再安心；每个人至少都要同两三个这类东西打交道，这是肯定的。

因为事实是，lathouse 的繁殖完全没有理由受到限制。

要紧的是弄清：当人真正同 lathouse 本身建立关系时，会发生什么。

理想的精神分析家，会是那个宣称自己实施这项绝对激进之行动的人；而观看他怎样实施，至少可以说会令人焦虑。

有一次，人们要给我“估价”——这属于仪式的一部分——我试着提出几件小事。他们一边给我估价，一边愿意假装关心我对精神分析家培养可能说些什么。

我提出……当然，现场完全漠不关心，大家忙着走廊里发生的事情……我提出，一场精神分析没有理由引发焦虑，因为我们处理的就是焦虑。

而且可以肯定：若存在 lathouse，它便表明焦虑——我正是从这里出发——并非没有对象。更好地接近 lathouse，理应稍稍让我们平静。

可是，如果有个人曾因自己的焦虑受到你照料，后来想要占据你所处的同一位置——无论你守住了这个位置、没有守住它，还是勉强守住它——事情又会怎样？

你怎样守住它、怎样没有守住它，为什么守住它、又为什么没有守住它：这将是我们下次会面的主题。

我还是把下次的标题告诉你们：继续由同样几个小图式支撑，我们要谈无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显然，要守住 lathouse 的位置，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过，不可能的不只这一件。还有别的事情也不可能；条件是严格理解“不可能”一词，也就是只从我们被形式化的真理层次规定它：在任何被形式化的真理场域中，都有一些真理无法得到证明。[参见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你们知道，我正是在这项不可能的层次界定实在。

如果分析家确实是实在的，恰恰因为分析家是不可能的。这是 lathouse 位置的一部分。

麻烦在于：要处在 lathouse 的位置，就必须真正圈定它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们更喜欢强调无能性。无能性当然也存在，但那是另一回事；我会向你们表明，它处在不同于不可能性的位置。

正因为这样……我知道，在座有些人不时会因为看见我——怎么说来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斥责、质问、厉声痛骂分析家而受到触动。

相关知识卡 “哥白尼式革命”的天文学边界

这些年轻人自己不是分析家，所以没有意识到，我这样做其实很友善；我是在向分析家发出小小的认可信号。

我的意思是，我终究不愿让他们经受太严酷的考验。当我暗示他们的无能性——它也是我的无能性——这表示在这个层次我们都是兄弟，只能各自尽力摆脱困境。

这样可以先驯服他们，然后我才会谈到分析家位置的不可能性……

第12课 · 1970年6月10日

眼下这个时节不适合接受漫长考验。

好吧，我们尽量把事情说得轻松一点。

我觉得事情拖得有点久了，就像人们常说的。

我甚至很想把它留在这里不再继续；不过，我还得给你们一点补充，用一道指向未来的小尖角，凸显我希望今年已经传递给你们的要点。

我的意思是，把若干稍显新颖的概念逼近一点，让你们隐约看见它们指向哪里。它们无疑带有一项印记——我总会强调这一点，同我在更实践层次工作的人也能确认——就是紧贴经验。

这些概念或许还能在别处派上用场，帮助理解眼下正在发生的某种事情。当然，事情正在发生时，我们从来不能确切知道它是什么，尤其当人们用一层层信息把它盖住时。

可大学里眼下确实在发生事情；各地都有人惊讶：这些学生被什么虫子咬了？我们的小宝贝、宠儿、文明的“心头肉”，他们到底怎么了？

说这种话的是那些装傻的人。他们拿钱就是为了装傻……

我所联结的分析家的话语同主人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如果真能指出一条道路，使人多少能够说明、听懂眼下发生的事——大家正竞相把它的分量说轻，不过是些失败、受压制的小示威，不是吗？今后，这种示威只会越来越多地在各个角落发生——如果我真能给它们一个动因，使它们得到理解，那么就在我觉得自己多少应当这样做的同时，

我更希望你们听清一点：只要我成功让你们听懂了什么，你们就可以肯定，我已经把你们骗得团团转。

这就是我今天想尽可能简单地联结之内容的界限。

有些东西我已经大胆操弄了一段时间；正因如此，多少能保证这番话语支撑得住。我操弄它们的方式终究完全野蛮，毫不犹豫。

其实，很久以前，我正是以此迈出这项教学的第一步：偶尔谈一谈实在。

这些年过去，渐渐冒出一句小公式：“不可能者即实在。”

上帝知道，我一开始并没有滥用它。我还曾经在你们面前提出过某种参照——当然，这项参照更常见——即真理。

不过，在把这些东西留给无辜者任意乱用以前，还有几项极为重要的说明必须提出。我的周围有时就很流行这种乱用；所以，我认为今天有义务作出若干说明。

八天前我去了万森，为的是简短表明我确实回应了那里的邀请。我在那里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上次在这里，我也已经提前告知你们，多少给你们一个良好开端。

这项参照绝不无辜；当然，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阅读弗洛伊德。

我们在《可终结的分析与不可终结的分析》中读到一段关于分析家的话。弗洛伊德指出，要求分析家具备过度的正常性或精神上的端正会是个错误，因为这样会使分析家变得过于稀少。

随后，他忽然写道：Und endlich ist nicht zu vergessen——“最后，不可忘记”——分析关系建立在 Wahrheitsliebe，即“对真理的爱”之上；das heißt auf die Anerkennung der Realität——对真理的爱，也就是承认 Realität。

Und endlich ist nicht zu vergessen, daß die analytische Beziehung auf Wahrheitsliebe, d. h. auf die Anerkennung der Realität gegründet ist und jeden Schein und Trug ausschließt.

“最后，不可忘记：分析关系建立在对真理的爱、也就是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并排除一切假象与欺骗。”

——《有限的与无限的分析》，第七部分，1937 年

即使不懂德语，你们也能认出 Realität，因为它直接摹自我们的拉丁语。

在弗洛伊德的用法中，它同 Wirklichkeit 竞争；后者有时也表达相同意思。译者不作深究，在两种情况下都一律译成“现实”。

这很有意思，让我想起一件小事：有一对人——尤其是其中一个——曾陷入一种近乎怒火冒泡的状态。

我还是得点名，这一点绝非偶然：他叫拉普朗什。大家知道，在我同精神分析界关系的种种曲折中，他扮演过某种角色。使他暴怒的是，另一个人——既然第一个已经点名，也把这个人说出来，他叫考夫曼——提出必须区分 Wirklichkeit 与 Realität。

第一个人因为被第二个人抢先提出这项确实首要而重要的见解，爆发出巨大激情；他对这项精细区分表现出的厚颜无耻的假蔑视，也颇为有趣。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对真理的爱”与现实承认 · 拉普朗什、彭塔利斯与皮埃尔・考夫曼

弗洛伊德那句话以 und jeden Schein und Trug ausschließt 结束：“并排除……”这里的主语是分析关系——“一切 Schein”，即一切假象；以及 Trug，即欺骗。

这样一句话非常丰富，因为紧接着几行，另一件事几乎立刻显现。尽管弗洛伊德顺带向分析家友善地致意了一下，文本归根结底却说：beinahe den Anschein——几乎真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 das Analysieren，即分析功能、分析行动……

说实话，它就是我曾用作一届研讨班标题的那个词[注1]……仿佛分析是三种所谓 unmöglichen Berufe——“不可能的职业”——中的第三种。

> [注1] 1967 – 1968 年研讨班：《分析行动》。

Unmöglichen 被放在引号里，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是在引用一句老生常谈。他在一部较早的著作里也引用过它，而且还提到自己早已说过。不过，没人很清楚他最初在哪里说过；也许我的查找并不完整，也许他第一次是在致弗利斯的信中使用。

在较早的那段话里，他把三种职业称作 Regieren、Erziehen 和 Kurieren ——

因为精神分析还是新事物，为了把分析列入这句俗语，弗洛伊德自然以分析替换通常所说的治疗。所以，三种“不可能”的职业——如果它

们真能叫职业——便是 Regieren、Erziehen 和 Analysieren：统治、教育和分析。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三个词同我今年分离出来、构成三种乃至四种话语之根的东西精确重叠、严丝合缝。

这些话语当然是一套能指联结，是一项装置；仅凭装置的在场与既有地位，它就在某种意义上支配、统辖可能偶然出现于其中的一切言说。

我曾经说过，我们所谈的是无言说的话语；言说事后才如其所能地安顿其中。

很久以前，我已经可以告诉自己：面对“发言”这种令人陶醉的现象，辨认它嵌入了哪一种话语，也许偶尔能让人不至于在发言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只是顺便说说，把这句话写在页边。可是，在“五月骚动”那种运用言说的风格中，我不能不想到：对象(a)有一位确定的代表，它所处的层次不是历史性的，而更像史前的——那就是家畜。就是这样！

相关知识卡 无言说的话语：书写支撑的结构

就这种情形而言，我想自己用的字母不完全相同。不过，在家畜的层次，对应于我们所谓 S 的东西非常清楚——驯养一只狗终究需要某种知识——那就是犬吠。

如果犬吠就是“发出声音”，人们不能不想到，S_1 在这里取得了一种意义。你们会看到，把它定位在语言层次并无反常。

大家都知道，家畜只被牵连在一种原始知识的语言之中，它自己却没有这种知识。

所以，它只能翻弄最接近能指 S_1 的东西：腐肉。

你们总归养过一只好狗——猎犬、看门犬或其他同你熟悉的狗——应当知道腐肉对它有多么不可抗拒；它们爱死这东西。

假如像匈牙利那位可爱的伊丽莎白·巴托里一样，偶尔帮忙肢解自己的女仆——处在某种地位上，这当然只是人能给自己的最微不足道的消遣——她只须把那些碎块放得稍微离地面近一些，狗马上就会满心欢喜地叼给她。

这是狗身上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如果你不总在午餐或晚餐时宠坏它，把它只因来自你盘子才喜欢的东西喂给它，它真正会叼给你的就是腐肉。

不过，必须注意：在一个更高层次，也就是另一类对象(a)的层次——我们等会儿会试着界定它，它还会把我们带回我已经说过的那个老astudé——言说完全可以充当腐肉。

无论如何，言说并不比腐肉可口多少。

这显然极大妨碍了人们把握语言的重要性。人们把这种没有其他象征价值的言说操弄，同话语本身混为一谈。

正因如此，言说从来不会无论何时、无论怎样都充当腐肉。

显然应当谨慎。归根结底，这些话的尖端与目标，是让我们惊讶，至少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主人的话语何以如此擅长维持统治？一个分

量总被低估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无论是否受到剥削，劳动者都在劳动。

劳动在人类存在的历史上从未得到如此崇高的地位。

相关知识卡 Astudé、alèthosphère、lathouse 与 soyousent ・ 伊丽莎白・巴托里：史料与“血浴”传说

如今，不劳动被排除在外。这是一项成功！

这正是我所谓主人的话语所做到的事。

为了实现它，主人的话语必定跨越了某些界限；说到底，它抵达了我曾试图向你们指出的那项突变——

——希望你们还记得；若不记得，也完全可能，我马上提醒你们——这项突变赋予资本家以及资本本身以风格。

所以，为什么——天哪——这一切并非偶然发生？

若以为某处有精明的政治家把一切该做的事都精确盘算好了，我们就错了；若以为这种人完全不存在，也一样错：他们确实存在！

不能肯定他们始终处在能够适当行动的位置，但归根结底，这或许并不那么重要。只要他们存在，即便处在别的位置，属于话语位移秩序的东西依然会传递。

于是我们提出问题：天哪，资本主义社会何以有这种奢侈，竟能允许大学话语松弛？至少照我向你们呈现的方式，大学话语只是这些变形之一，是相对主人的话语转过四分之一圈。

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因为我们必须问：若顺着这种明摆着提供给我们的松弛继续下去，是否会落进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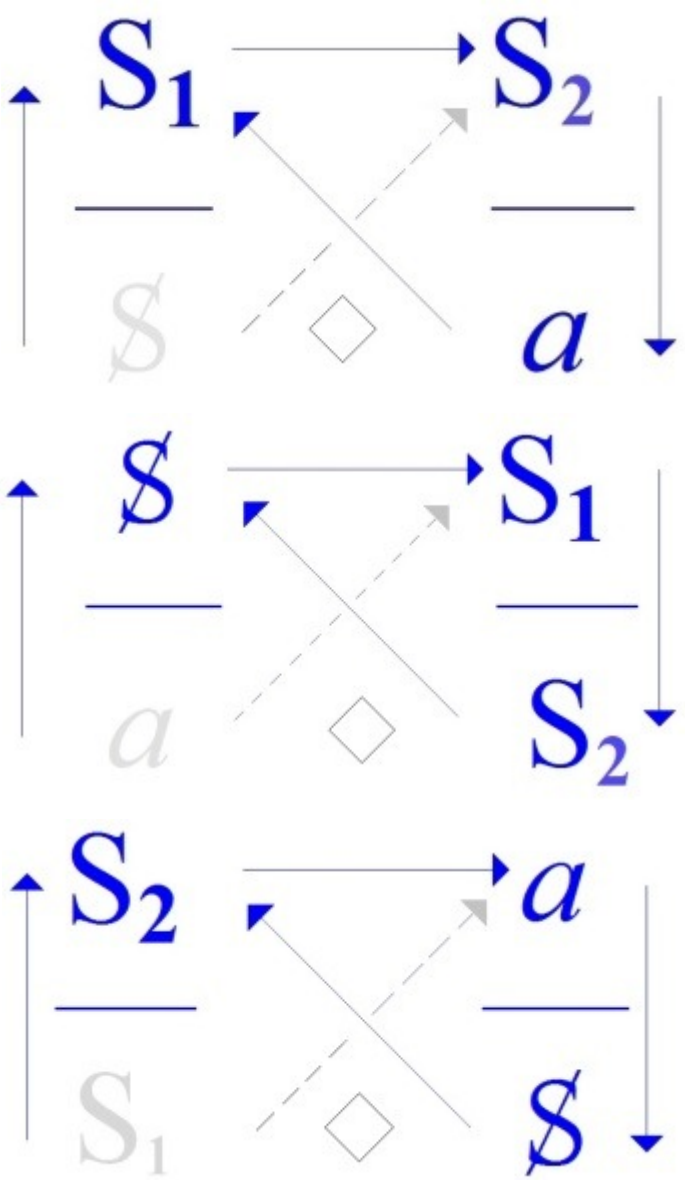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我早已把它写进一篇小文；有人特意约我为一份风格独特的报纸撰稿，因为只有它享有平衡与诚实的声誉，报纸名叫《世界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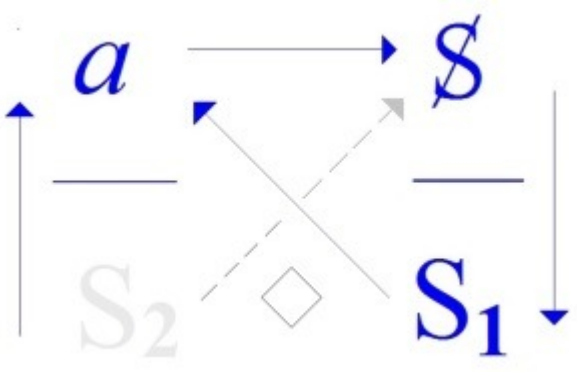
他们极力催我写那几页，主题是精神病学重组；我也顺带谈了一点改革之类的事情。尽管催得很急，那篇小文却始终没有刊出，这一点颇为醒目。以后哪天，我会把它当作拖在课尾的余篇读给你们听。[笑声]

当时，它的标题自然是《一项改革待在自己的洞里》。我谈的正是那个洞、那个旋涡般的洞；围绕大学的一系列措施，显然正要制造这个洞。

天哪，有些时候，人们在行动上可能会有所顾虑。为了正确参照我所谓若干基本话语的术语，人们不妨三思，不要急着利用刚刚敞开的路线。把腐肉运进这些走廊，责任可不小！

我今天引入的评论，正因这一点才必须得到联结。它们并不寻常，也不常见；它们像一套装置。人至少应当知道，它可以当作杠杆或钳子，可以拧紧，也可以按这种或那种方式组装。


S1
S2
$
a
$
S1
a
S2
S2
a
S1
$



以上依次是主人的话语、癔症者的话语、大学话语、分析家的话语。

好，这里有好几个术语。

我在黑板上只放这些小字母，显然并非偶然。这是因为我不愿放入任何看起来像所指的东西；我丝毫不愿授权那些所指。

仅仅把它们写出来，就已经多少是在授权。

我已经谈过构成这些位置的东西，也就是这些能指写入的位置。

我已经特别处理过施动者（agent）的问题，为的是强调法语赐予我们的幸运：施动者绝不一定是亲自行动者，而是使人行动者。

很明显，我们已经可以猜到，主人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一点界定：主人自己是否真的行动，一点也不清楚。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追究……其实，在我以前，已经有一个名叫黑格尔的人专门追究过它。

不过，我们必须仔细看他的文本。想到一点颇令人泄气：自从我谈起这件事以来，今天在座真正读过《精神现象学》的人，也许不超过五个。

当然，我不会要你们举手！

可悲的是，至今真正从头到尾读过《精神现象学》的人大概只有两位……我自己也得承认，并没有探遍每个角落。

我的老师亚历山大·柯耶夫当然无数次向我展示过它。还有另一位层次之高会使你们难以置信的人；他读《精神现象学》读得如此透亮，以至柯耶夫笔记中的一切——我读过这些笔记，还把它们转交给他——对他来说都完全多余。

不可思议的是，我反复指出《实践理性批判》显然是一本情色读物，比埃里克·洛斯费尔德出版社出版的东西有趣得多，却还是没有结果。

如果我告诉你们，《精神现象学》是一种疯狂的幽默，也不会更有效果！

可它确实如此，实在是最非同寻常的作品；不过，那是一种冰冷的幽默，我不会说是“黑色”的。

有一点可以绝对肯定：黑格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在做的，是施展障眼法，把所有人都套进去。当然，起点是他说的确实是真理。

要钉住黑板上的主人能指 S_1，没有什么方式比把它认同于死亡更好。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要在一场所谓“辩证法”中表明——用他的话来说——

——这是顶点，是“死亡”这个词的功能在思想中登场并上升到顶点——这头蛮兽进入《精神现象学》的游戏，归根结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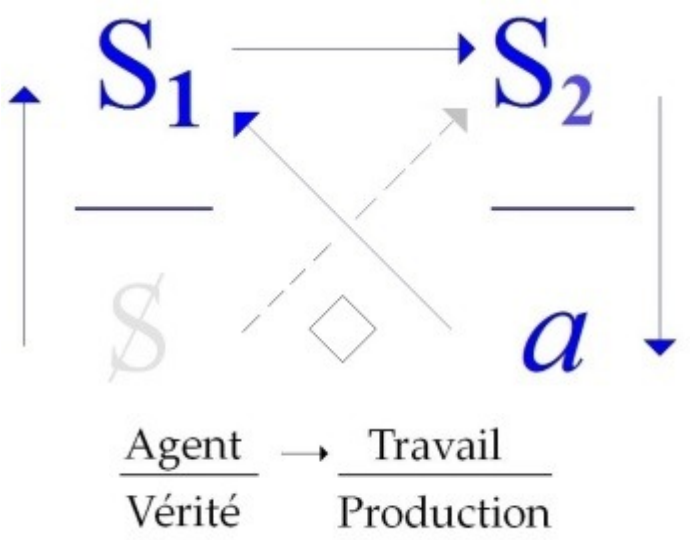
它绝对迷人，轰动人心。

我们可以直面地读出他所联结之物的真理——当然，条件是让自己被这部文本捕获；因为我要联结的，恰恰是真理不能被直面地读出。

所以，他所联结之物的真理是：同实在的关系，而实在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完全看不出为了谁……为什么！抱歉——为什么会有一个主人从“冒死争夺纯粹声望的斗争”中出现——人们这样说，他本人也这样说——又为什么会由此产生这套奇怪的初始配置。

而最妙的是，他竟然有办法把这件事讲通。当然，这是在一种历史观里：它把精神游戏的主导阶段与组合依次安排在一条绝非空无的线上，直到黑格尔本人，直到所谓哲学思想。

结果，这一切被倒转为：奴隶凭借自己的劳动赋予主人以真理，把主人推到下方；奴隶借助劳动——请注意，起初是强迫劳动——抵达历史的终点，即所谓绝对知识。



角色位置可写作行内关系：$\frac{\text{施动者}}{\text{真理}} \rightarrow \frac{\text{劳作}}{\text{产出}}$。

接下来发生什么，黑格尔没有说。因为事实上，黑格尔的构造里没有四个术语。

起初有主人，随后是奴隶。我在这里把奴隶称作 S_2；你们同样可以把他认同于一项他不愿放弃的享乐。恰恰因此，他最终不得不放弃它。

也就是说，他得到它的替代物——劳动；但劳动终究不是它的等价物。

于是，凭借辩证突变的安详，凭借从此刻建立、从头到尾一丝一缕穿越全程的芭蕾和小步舞，凭借文化的发展，“历史的终结”用一项知识奖励我们。

我们不把这项知识称作“完成的”——这样做自有充分理由——而把它称作“绝对的”。

有一点无可争辩：主人到头来只显现为工具，显现为伟大的戴绿帽者。

这项出色的辩证推演中绝对崇高的地方，在于它居然得到展开，而且——可以说——还成功了。因为整部作品从头到尾，例如黑格尔谈文化的地方，到处都是关于精神活动相互作用的精确观察。

我再说一次：没有什么比它更滑稽。

黑格尔告诉我们，理性的狡计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整场游戏。

“理性的狡计”当然是个极好的说法；对我们分析家来说，它依然有价值。无论是否合理，我们可以在最基础的层次追踪它，因为我们恰恰面对话语中某种极其狡黠的东西——无意识。

可是，这项狡计的顶点不在人们以为的地方。它无疑是理性的狡计，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推理者的狡计，并向它脱帽致敬。

如果在上世纪初、耶拿战役的年代，这场名叫《精神现象学》的惊人骗局真能征服任何人，这一手就算成功了。

显然，我们片刻也不能相信，自己在任何意义上接近了所谓“奴隶的上升”。没有什么比奴隶更依然是奴隶。把某种所谓知识进步归功于奴隶、归功于他的劳动，实在荒谬得非同寻常。

不过，我所谓“推理者的狡计”让我们看见一项至关重要、必须警惕的维度：如果我们指定施动者的位置——无论由谁占据——这个位置并

不总属于主人能指，因为其他能指会依次经过这里；于是问题是：什么使这个施动者行动？

这个非同寻常的循环——严格说来，围绕它旋转的东西只配用“革命”一词标记——怎样能够发生？

回到黑格尔的术语：在某个层次，劳动凭借主人诞生于世。

那么，真理究竟是什么？它在这里被写入，并带有一个问号。

是什么开创了这一切？它毕竟不是自古长存，而是从历史时代起才在那里。是什么把施动者带进游戏？

面对一个如此辉煌、耀眼的例子，人们恰恰因为它过于耀眼而不去思考、无法看见，这一点很有益。黑格尔可以说是知识话语、大学知识的崇高代表。

我们法国从来没有哲学家，只有一些四处奔走的人，一些像梅纳·德·比朗那样的小地方学会会员，还有像笛卡尔那样在欧洲游荡的人。

不过，笛卡尔也得好好读。听清他谈自己凭出身可以期待什么时的语调，就能看出他是哪类人。当然，这不妨碍他绝不是个蠢货，远非如此！

总之，在法国，大学里找不到哲学家。这一点可以算作我们的优势！而在德国，哲学家就在大学里。

我们必须看到，在大学体制的某个层次，人们能够这样想：那些可怜的小家伙、可爱的宝贝，正在进入辛苦劳作、被剥削至死的伟大时代，也就是工业时代。人们要向他们揭示这样一项真理：是他们创造历史，主人只是开场时为了让音乐响起所需的小跟班。

这项评论有其价值，我要有力强调；原因正在弗洛伊德那句话：分析关系必须 gegründet——奠基——在对真理的爱之上。

弗洛伊德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相关知识卡 普鲁士教育改革、洪堡大学与工业化

他真是满腔热情。

他也有些弱点，例如他同妻子的关系，简直不可想象！一辈子容忍这样一个 morue，真是了不得！

不过，你们要记住：如果真理应当给你们某种启发，如果你们想维持 analytische Beziehung——分析关系——它肯定不是爱。

眼下，如果真理最终使“死亡”这个能指涌现——一切迹象都表明如此——如果有什么东西给黑格尔的说法赋予全然不同的意义，那恰恰是弗洛伊德当时已经发现、并按自己的能力称作“死本能”的东西。

也就是重复中的根本性：重复不断坚持，构成被写入语言的存在之精神现实的特征。

既然真理没有其他面孔，完全不值得为它发疯！

说实话，这也不准确：真理有不只一张面孔。

对分析家而言，第一条可以遵循的准则恰恰应是保持一点怀疑，不要忽然为某项真理发疯，像在街角遇见第一张漂亮脸蛋就着迷一样。

如果弗洛伊德这项评论又伴着 das heißt auf die Anerkennung der Realität ——“也就是承认现实”——它完全可能让我们说：也许存在一种天真的实在——通常人们就是这样说——它冒充了真理。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对真理的爱”与现实承认 · 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与 Thanatos 称谓 ·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劳动与密涅瓦的猫头鹰

随后，真理经受检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因此对实在知道得更多，尤其若谈的是“认识”。

也许——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所指出的脉络——当实在被界定为：在一套象征性联结中，不可能证明真者；这一定位会给我们一个目标，某种可以衡量我们对真理之爱的尺度。

实际上，如果实在被界定为不可能，这会让我们亲手触及什么？

统治、教育、分析，以及为什么不加上“使人欲望”——这样便补足癔症者的话语定义——确实都是严格意义上不可能的操作。它们正因不可能才在那里。

它们在那里，而且支撑得极好，不断让我们追问它们的真理：这些疯狂的事情怎样发生？当我们接近它们时，它们在实在中恰恰只能被联结为不可能。

显然，充分把它们联结为不可能，正会带来一项风险、一线隐约可见的机会：它们的实在——容我这样说——或许会迸裂出来。

我们若被迫在真理的走廊与迷宫中玩耍这么久，恰恰因为有某种东西使人不能抵达。

面对这些对我们来说全新的话语，又何必惊讶？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此前没有整整四分之三个世纪可以从这个角度考察事情；不过，坐在扶手椅里，难道不是逼近不可能的最佳位置吗？

无论如何，我们仍在对真理之爱的维度里兜圈。一切恰恰表明，这项爱使我们完全从指间滑过在主人的话语层次作为实在维持的不可能性。

所以，我们必须参照分析话语幸而使我们能够隐约看见、准确联结的东西；正因如此，我必须把它联结出来。

我深信，现场有五六个人完全能够用某种方式使它移位，并让它有机会再次涌现。

我并没有说它是“阿基米德杠杆”，也没有说自己的陈述有丝毫“更新世界体系”或“更新历史思想”的企图。我只指出，分析使我们必须接纳若干东西；因偶然相遇，它们也许会对一个多少熟悉这项实践的人有所照明。

毕竟，我完全可能从未遇见柯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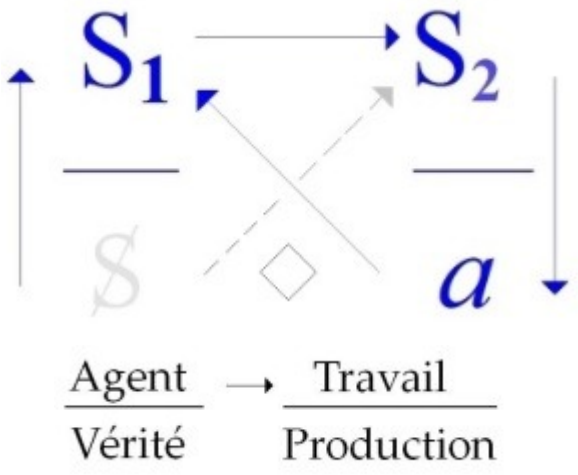
如果从未遇见柯耶夫，我很可能同某个时期所有受过教育的法国人一样，甚至不会怀疑《精神现象学》算得上一件东西。

关于不可能，分析使我们看到：妨碍我们圈定、逼近它的障碍，正是唯一或许能最终在其中引入突变的东西——赤裸的实在，没有真理，那倒不错！

可事实是：我们同实在之间有真理。

有一次，我在一阵抒情冲动中对你们说过：真理是享乐亲爱的小妹妹。

你们本该已经想起这句话；至少我希望，此刻有些人会想起来。我要在四个公式——其中两个在这里重新写出——中强调的是：



主人的话语可写作行内公式 $\frac{S_1}{\$} \rightarrow \frac{S_2}{a}$；一般位置关系为 $\frac{\text{施动者}}{\text{真理}} \rightarrow \frac{\text{劳作}}{\text{产出}}$。

第一条线上的箭头给出了方向，而这项关系始终被界定为不可能：不可能真有一个主人能这样使自己的世界运转。

如果真要亲自使人劳动，那甚至比自己劳动更累。

主人从来不这样做。

他发出一个主人能指的信号，所有人就都跑起来！

必须从这里出发。这一点极其宝贵，始终可以亲手触及。

写在第一条线上的不可能性，究竟怎样呢？真理一词所占的位置已经暗示：也许在第二条线上，我们才会真正遇到它。

可第二条线上没有一丁点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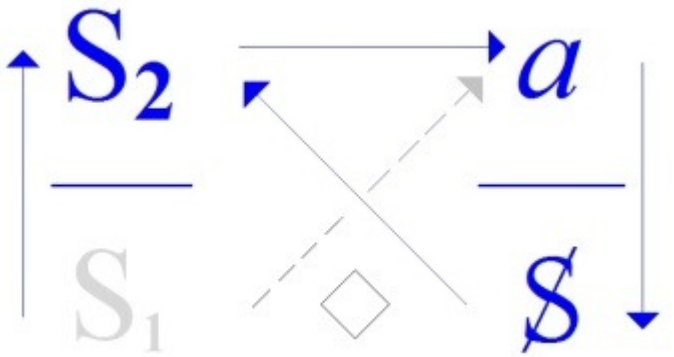
那里不仅没有沟通，严格说来，还有某种堵塞。至少在第一层次，劳动所产生的是……

这正是一个名叫马克思的人所作的发现：他赋予这个词以全部分量。劳动施用于某种我们早已知道名为“产出”的东西。关键是看清：无论什么符号、什么主人能指来到这个位置，产出同事情的真理都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可以任意作为，试着把产出同被塑造出来的需要结合；可面对人类存在以及产出同真理的关系，怎样也无法摆脱困境。

任何不可能——无论哪一种，这里调动的正是它——总会得到联结。可以肯定，如果它让我们围绕其真理屏息等待，必定有某种东西在保护它；我们把这东西称作无能性。

例如，在大学话语层次，先看这一种：



大学话语可写作行内公式 $\frac{S_2}{S_1} \rightarrow \frac{a}{\not{S}}$。

在这里，S_2 处于一种疯狂自负的位置，声称自己的产出是一个思考的存在、一个主体。可是，作为主体，他不可能在这项产出中有哪怕片刻把自己看作知识的主人。

这一点可以直接感受到，不过它当然可以追溯得更高。

主人的话语就是如此。由于黑格尔，我才允许自己预设它；因为你们将会看到，我们如今只在一种受到显著修改的形式中认识它。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项构造，甚至是重构。我今年联结的剩余享乐也是如此。我认为它很重要，把它放在开端，作为更真的支撑。

但必须警惕：它正因以这种方式得到联结而危险，它的力量来自这种联结。

只须阅读那些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就会感到，主人同奴隶的关系确实使他为难。他寻找这项关系的真理；而那三四段令人着迷的文字非常精彩：他每次试图摆脱困境，都只走向一条性质差异的道路，而且要从这项性质差异中推出奴隶的某种善。

亚里士多德不是大学教授，也不像黑格尔那样机巧狡黠。他很清楚，一说出这种主张，事情就处处滑脱。他自己既不很确定，也不十分热衷，更没有强加意见；不过他感觉到，某种能说明主奴关系动力的东西也许就在这一侧。

啊，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性别，那就真是太崇高了！假如是男人与女人，他便让人隐约看到还有一线希望。

可惜不是这样。他们性别相同，于是亚里士多德束手无策。

现在可以看清问题了：主人从奴隶劳动中获得的剩余享乐，凭什么好像理所当然？

不可思议的是，似乎没有人发现，应当从中取得的教训恰恰是：它一点也不理所当然！

伦理学问题由此忽然大量涌现：

——有《尼各马可伦理学》；

——还有写给另一位朋友的《欧德谟伦理学》[注2]；

——诸如此类的道德反思还有好几部；

——可人们始终走不出去：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项剩余享乐。

这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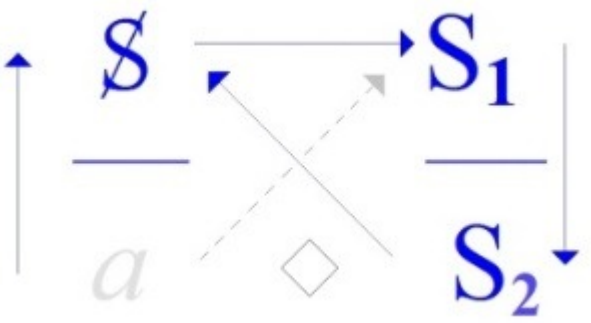
要把一个“最高善”放到世界核心，人们真得像鱼面对苹果一样进退失据。

> [注2] 亚里士多德：《欧德谟伦理学》，巴黎，Vrin 出版社，1997 年。

可是，奴隶带给我们的剩余享乐明明触手可及。

然而，整个古代思想所证明、所见证的是——黑格尔凭借奇妙的障眼法，让我们重新穿过它，直到斯多葛派被政治化的受虐主义——剩余享乐不能作为某种东西安稳地就任为主人的主体。

再看我所联结的癔症者的话语：把 $\not{S}$ 放在左上，S_1 与 S_2 放在右侧，把 a 放在真理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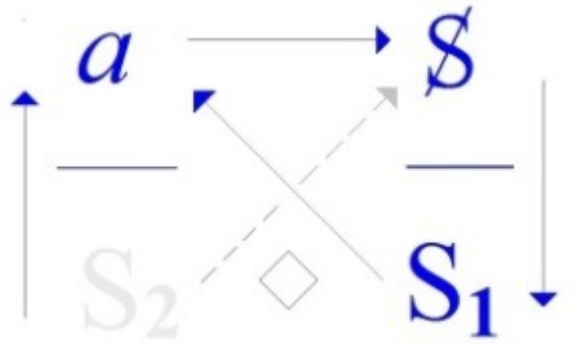
癔症者的话语可写作行内公式 $\frac{S}{a} \rightarrow \frac{S_1}{S_2}$。

这里也只有通过产出知识，癔症者的分裂、她的症状性撕裂才得到理由与动因；因为她的真理是：她必须成为对象(a)，才能被欲望。

对象(a)终究有些单薄，尽管男人们当然对此欲罢不能，甚至不敢想象还可以经过别的东西。

这是无能性掩盖最精微之不可能性的另一个标志。

最后，在分析家的话语层次……



分析家的话语可写作行内公式 $\frac{a}{S_2} \rightarrow \frac{S}{S_1}$。

奇怪的是——当然，至少到现在没人注意——若把右下项当作产出，所产出的竟然不是别的，而是主人的话语，因为来到前台的是 S_1。

也许，既然已经转过四分之三圈——正如上次离开万森时我所说——另一种风格的主人能指，或许恰恰可以从分析家的话语中涌现。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四种话语与四分之一转位

无论它是不是另一种风格，我们显然远没有到能够知道它是什么的那一天。

至少目前，我们完全无能把它同分析家位置所涉及的东西联系起来：分析家也把自己呈现为真理的诱惑，仿佛对原则上由自己所代表的东西多少有所知道。

我用 $a \rightarrow \not{S}$ 作为轴线，强调分析家位置上这项不可能性的起伏；因为分析家把自己放在代表欲望之因的位置，成为欲望之因的施动者。

四个术语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界定。我说它们是“四分之一”，意思是它们一共有四个。还有一个我没有点名；它显然无法命名，因为整个结构建立在对它的禁止上——那就是享乐。

分析带来的那一线视野、那一扇小窗、那一道目光，正是围绕享乐把我们引向一种或许富有成果的进路。

这不是思想的进路，而是行动的进路；正因如此，这一步才是革命性的。

它并不围绕主体——

——无论癔症式质询曾经多么富有成果，我等会儿会说是谁最先把它引入历史——主体作为话语施动者登场，确实产生了惊人的结果，首项成果就是科学；但一切动力的钥匙不在这里，而在于质询享乐究竟是什么。

享乐受到自然过程限制。

说实话，我们对这些自然过程一无所知。

我们只知道，自己最终把一个秩序尚可的社会所维持的舒适安逸视作自然；只不过，人人都急切地想知道："如果真的会疼，会是什么样？"由此产生施虐—受虐的执念，它构成我们可爱的性氛围的特征。

这一切完全微不足道，甚至只是次要的。

要紧的是：无论自然与否，我们之所以能够谈享乐，严格说来都同能指最初进入游戏相连。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牡蛎或海狸享乐于什么；没人会知道，因为没有能指，它的享乐与身体之间就没有距离。

在这个层次，它们同植物一样；终究，植物也许也有享乐！

这同语言最初进入游戏的形式严格相关，也就是我所谓标记、一元特征。若你们愿意赋予它意义，可以说：被标记为将死之物。请看清：只有死亡进入游戏，某种东西才取得意义。

从这项划分、从享乐与身体的分离开始——身体从此被死亡化，成为铭写的游戏，像一群由一元特征标记为宠儿的牲畜——问题才被提出。

根本不必等到主体显明自己隐藏在主人真理的位置，即 $\mathcal{S}$。

可以清楚看到，主体的分裂无疑就是附着在“真理”一词本身上的那项根本歧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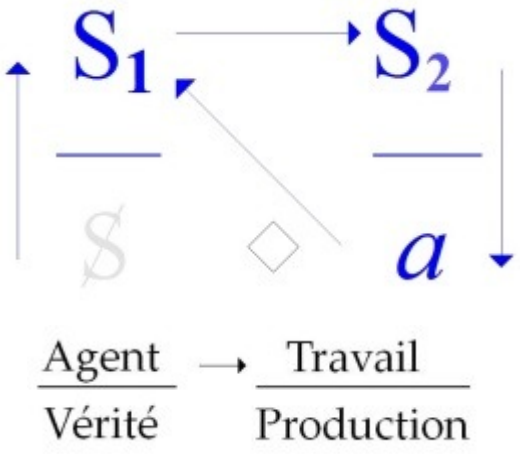
凡从语言出发在话语秩序中建立的东西，总会在一道裂口中留下某种东西。因此可以肯定：沿着话语的线索——

——我们永远只能沿着它带来的一切“有余之物”的轮廓前进；

——可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却是“不足之物”。

现在回答我开头的问题：大学话语目前发生了什么？

主人的话语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以至你们似乎很少有人能衡量它有多么稳定。原因在于：马克思证明——不过我得说，他没有凸显它的张力——产出并不叫剩余享乐，而叫剩余价值。



图式再次标出 $\frac{S_1}{\$} \rightarrow \frac{S_2}{a}$ 与 $\frac{\text{施动者}}{\text{真理}} \rightarrow \frac{\text{劳作}}{\text{产出}}$。

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某个时刻起——我们不必费力查明原因是路德、加尔文[注3]，还是热那亚附近、地中海或别处的某种船运——要点

是：从某一天开始，剩余享乐获得报价、得到记账、汇成总额；所谓资本积累从这里开始。

相对于方才我所陈述的无能性——无能把剩余享乐同主人的真理接合，即 $a \lozenge \not S$——你们是否感觉到已经前进一步？

> [注3]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ocket 版，1989 年。

我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步，也不是说它具有决定性。可这项接合的无能性忽然被抽空：剩余价值一旦并入资本，就再无问题；一切都是同质的。

我们仿佛……由于自己生活的幸福时代，我们全都畅游在价值之中！

然而，从那一刻起，真正惊人而似乎无人看见的是：无能性的乌云一旦得到通风，主人能指反倒因自身的不可能性而显得更加不可攻击。

它在哪里？怎样命名、怎样定位？若不通过其效应——当然是杀人的效应——还能怎样辨认它？

去谴责它的帝国主义吧！可怎样阻止这个小机制？

至于大学话语，必须看到：事情也许恰恰不可能在别处获得一点转动的机会。至于怎样转，我暂时保留，以后再说。

如你们所见，我说得很慢。因为：

——在大学话语层次，每次结构有所移动，对象(a)就来到那个关键位置，即多少可以容忍的剥削位置；

——对象(a)使我们可以把一点空气引入剩余享乐的功能。

——对象(a)就是排列在这里的你们所有人：对那些生下你们的人而言，曾经作为欲望之因发挥作用之物的一批流产物。精神分析教给你们的，正是必须在其中认出自己。

谁也别来烦我，说我最好提醒那些在这里或别处鼓噪的人：大资产阶级的流产物同无产阶级的流产物之间隔着一个世界！

因为，作为流产物，大资产阶级的流产物终究不必一直把自己的保温箱拖在身边！

有人妄想把自己安置在这种位置，仿佛关系一旦发生移动，这个位置忽然就会得到特殊照明、变得一览无余。

事情不应当夸张到我现在交给你们的这段小回忆：在我惯称“疯狂青春”的年月，有一位迷人的姑娘陪伴我至少两三个月。她对我说：“我是纯种无产阶级。”[笑声]

隔离永远没完。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它只会变本加厉地重新开始；没有隔离，什么也运转不了。

不过，这只是一个括号。

无论如何，对象(a)、这个活生生的小 a——

——尽管它是流产物——显明了语言效应至少在一个层次无法得到妥善安排：在产生这些语言效应的人那里。

因为没有一个孩子的出生不曾通过他那些可爱的所谓生育者参与这桩交易；而生育者卷入了话语的一切问题，背后当然也各自还有上一代。

真正需要学会质询的，正是这个层次。

如果我们想让某种东西转动——

——当然，它只能转动；上次结束时我已经充分强调。这绝不是进步主义，只因为它不可能停止转动；若不转动，就会吱嘎作响。

所以，如果我们想看清事情怎样在真正构成问题之处转动，也就是在对象(a)同某种名为“教育”的东西面对面的层次，就得问：教育真的存在过吗？

是的，当然！古人给了我们最好的见证；此后各个时代也始终有一些极其形式化的古典事物，多少仿照古人。

可是，对当下的我们，在事情实际发生的层次，在这项密切接触（osculation）[注4]之点，活生生身体留下的全部残余——这个婴儿，为什么不呢？这个拉屎的小家伙、这道目光、这声呼喊、这阵号哭，他正在吠叫——还能期待什么？

下一次，我会试着告诉你们：我所谓“文化罢工”可能意味着什么。

> [注4] Osculation：几何学术语，指一条曲线或一个曲面同另一条曲线或曲面在一点上的高阶接触。

相关知识卡 Osculation：几何学中的高阶接触

[掌声]

第13课 · 1970年6月17日

必须承认，“羞愧而死”是一种极少产生的效果。[笑声]

然而，它却是唯一的符号……我已经同你们谈过一阵子：一个能指怎样变成一个符号。它是唯一可以确知其谱系的符号，也就是说，可以确知它出自一个能指。

任何符号终究都可能受到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也就是说，一个淫秽的符号。

不妨说，有“二十幕”（vingt scènes，与“万森”Vincennes 谐音）可为例证，而且绝不是为了逗笑而上演的——所以说，“羞愧而死”。

在这里，能指的退化是确凿的；它确实由能指的一次失败所造成，即“向死而在”——就其关涉主体而言，而这“向死而在”还能关涉谁呢？——也即那张名片：“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我希望你们已经开始把这句话背熟了。这张名片永远无法平安送达，因为若要载明死亡的地址，这张名片就必须被撕破。

人们说“真丢脸”，这本应产生一门终于拼写正确的“羞耻论”（hontologie）。

与此同时，“羞愧而死”是死亡唯一的情动；它配得上——配得上什么？——配得上死亡本身。

人们对此沉默了很久。

谈论它，实际上就是打开一间密室——不是最后一间，却是唯一能让我们坦率谈论“正派之人”的密室。所谓正派（honnête），就是同荣誉（honneur）相连；这一切都以羞耻为伴。不过，正派之人恰好有此“好运”（heur）：不必提到羞耻，因为对他来说，“羞愧而死”正是不可能之事。

你们从我这里知道，“不可能”就是实在。

人们无论谈到什么都说“不至于死”，以便把一切都贬为无足轻重。这样说，正是为了抹去死亡也可以是“配得上的”这一点。

可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抹去不可能，而在于成为不可能的施动者。也就是说，死亡是可以配得上的——至少在“羞愧而死”的片刻如此，哪怕事实上并没有真的死去。

如果现在真发生了，那么这就是配得上死亡的唯一方式——这是你们的好运。

如果没有发生……

……相对于刚才的意外，这便是不幸。于是，剩给你们的就是把生命当作羞耻喝下去，因为它不值得人为它而死。

这值得我谈吗？从开口谈它的那一刻起，我刚才说的“二十幕”便只等着把它重新变成一场闹剧。

说到这里，正好是万森。据说万森的人对我说的话很满意，对我也很满意；可这不是相互的——我对万森并不十分满意。

前排固然有一位好心人试着填补空缺，扮演“万森”，但现场显然没有万森的人，或者说寥寥无几；只有几双最有资格给我记上一分的耳朵。

这当然不完全是我所期待的，尤其是在据说我的教学已经传播到万森之后。

有些时候，我会对这种空落落的场面颇为敏感。

不过，那里终究还恰好有那么一点东西，足以让我们想起一个交会点——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察觉到这段记忆——即《分钟报》（Minute）与《现代时报》（Les Temps modernes）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会点。[笑声]

我只因为它牵涉我们今天的主题才提起此事；你们马上会看到：应当怎样对待文化？

有时候，一件小事就足以划出一道亮光。只要你们想起《现代时报》曾刊登过某一份录音稿，它同《分钟报》的关系就会显得一目了然。

这时不妨试试看，十分迷人！

我做过这个实验：从两份报纸各剪下一些段落，放在某处搅混，然后抽取。我向你们保证，除了纸张的差别，你们不会那么容易认出各自的出处。

这使我们得以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我刚才提出的异议：用某种语调、某个词去触碰这些事情，会不会让闹剧把它们一并卷走？

不妨从这里出发：闹剧早已在场；或许在这道酱汁里添上一点羞耻——谁知道呢？——还能把它拦住。

总之，我配合这样一场游戏：由于我正对你们讲话，你们便听见了我。否则，倒有理由反对你们听我，因为很明显，在许多情形下，听见我会妨碍你们听懂我说的东西。

这很可惜。至少你们当中的年轻人，就我所说的这些东西而言，早就同我一样能够不靠我而说出来。为此，你们所缺的恰恰只是一点羞耻。

羞耻或许会来到你们身上。

显然，人们不可能在马蹄下找到它，更不可能在一匹“达达马”（dada）蹄下找到它。不过，正如我举过的例子，真理圈层（aléthosphère）的犁沟已经在照料你们，甚至把活生生的你们“soyousent”了；这或许足够让你们沾上一点羞耻。

请你们承认：帕斯卡与康德为什么会在你们面前扭来扭去，像两个就要成为瓦泰尔的仆人[注1]。

三个世纪以来，上面一直缺少真理。

> [注1] 弗朗索瓦・瓦泰尔（François Vatel，1631 – 1671），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的总管兼膳食总管。他在一次宴会期间因鱼货迟到而自杀。

相关知识卡 Minute 与 Les Temps modernes

好吧，这道服务终究端上来了，暖人得恰到好处，甚至还不时配上音乐，你们知道的。别再挑剔了，已经有人伺候你们；你们可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了。

你们还记得那些罐子吧？我说它们空空如也，连芥末也没有，你们还纳闷我到底在烦恼什么。那就赶紧往里面储备足够的羞耻吧，好让节日来临时不至于太缺辛辣味。

你们会对我说：“羞耻有什么好处？如果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反面，我们可不感兴趣。”

我回答：“你们的羞耻多得可以转卖。如果还不知道，就像人们说的，切一片看看吧。”

你们身上那股走了气的味道，会在每一步撞上一种烤得焦香的生之羞耻——这正是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只要稍微认真一点，你们就会发现，这种羞耻的正当理由正在于没有羞愧而死，也就是说，你们拼尽全力维持一种遭到扭曲的主人的话语：那就是大学话语。

我会对你们说：“重新黑格尔化吧。”我还会回到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Astudé、alèthosphère、lathouse 与 soyousent ・ 瓦泰尔之死与迟到的鱼

星期日，我又回头读了那本该死的小册子《精神现象学》，想看看自己上一次是否误导了你们，把你们带进了那些连我自己也拿来大快朵颐的回忆里。

结果完全没有。真叫人头晕目眩，不是吗？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卑贱意识是高贵意识的真理。这一点被抛出来，足以叫你们天旋地转。

你们越卑鄙——我当然不是说淫秽，那个问题早就不再谈了——你们越卑鄙，事情就会越顺利。

例如，这确实照亮了近期的大学改革：把所有“学分单位”装进你们的弹药袋，里面就会有一根十足魔鬼般的文化元帅杖；哪怕只是一些奖章，像牲畜评比会上的奖牌，也会把所谓的“硕士资格”（maîtrise）别在你们身上。

不得了，你们会得到一大堆！

若能因为没有羞愧而死而感到羞耻，或许会赋予事情另一种调子，让实在真正牵涉进来。

我说的是实在，而不是真理。因为正如上次已经向你们解释过的，吸吮真理的乳汁很诱人，但它有毒；它让人昏睡，而别人对你们所期待的也不过如此。

有位可爱的人听从我的推荐，读了巴尔塔萨·格拉西安的《醒悟之人》[注2]……

> [注2] 巴尔塔萨·格拉西安：《醒悟之人，或〈批判家〉》（L'Homme détrompé ou le Criticon），巴黎：Seuil，2008 年。

相关知识卡 **格拉西安《批判家》**

……你们知道，格拉西安是一位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耶稣会士；他在十七世纪初写下这部巨著。

总而言之，适合我们的世界观正是在那里诞生的：科学甚至还没有升到我们的天顶，人们便已经感觉到它正在来临。很奇怪，但事实就是如此。

对于一切真正以经验为据的历史评价，这一点甚至都应记录下来：如此适合我们的巴洛克——应当把它同现代艺术并置，无论具象与否，都是一回事——早于科学最初的步伐，或者恰好同它同时开始。

[把科学话语中的对象(a)赶出去，它又会从绘画的窗户回来……]

在《批判家》（Criticón）中——这是一部寓言，其中已经包含了《鲁滨逊漂流记》的情节；多数杰作都只是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杰作留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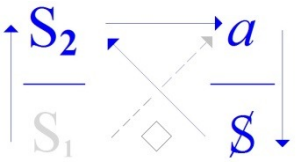
碎屑——到了讲述老年下坡路的第三部，因为全书取用的是年龄的图式，第二章中有一篇叫作《临盆的真理》。

真理正在某座只住着最纯洁者的城市里“临盆”。可当人们告诉他们“真理正经历一场分娩——一项‘孩子的工作’”时，他们仍然吓得要命，拔腿就跑。Travail d’enfant 在这里同时具有“孩子的工作”与“分娩之苦”的意思。

既然有人已经替我发现了这个说法——说实话，并不是我自己注意到的——我很奇怪为什么还要请我解释，除非提问的人没有来参加我上一次的研讨班。

我上次说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这里必须顶住。假如你们希望自己的言论具有颠覆性，就要格外小心，不要让它们在真理的道路上粘得太牢。



上一次我真正想要阐明的——这里写出的这些东西，我不可能每次都重新画——显然就是主人能指 S_1。在大学话语的位置上，它构成知识的秘密。人很容易粘上去……并被困在其中。

而我所指出的——也许你们中有些人今年只能记住这一点——是也要把焦点放在大学体制的“生产”层次。那里期待着某种生产；但为了取得一种效果，也许应当以另一种生产取代它。

关于这一点，我还是要给你们读三页，姑且作为一个阶段、一个中继；毕竟我已经把它们当作上次在你们面前所作陈述的标记。请少数已经听我试读过的人见谅。

这三页回答的是“那个有趣的比利时人”[注3]提出的一个问题。总之，他提的问题颇能留住我的注意——你们看得出来——以至于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不知情时亲口把问题授意给了他。

如果真是这样，他至少仍有一项功劳：事先做好了听懂这些问题的准备。

下面是第六问，带着一种颇为可爱的天真：“知识与真理在哪一点上……大家都知道，我曾试着说明这两种德性怎样缝合在一起……知识与真理在哪一点上彼此不相容？”

> [注3] 参见 4 月 8 日一课；拉康当时所读的文本回答了罗贝尔·乔尔金（Robert Georgin，即“那个有趣的比利时人”）的问题。这篇文字后来以《广播讲话》（Radiophonie）为题发表于 Scilicet 第 2/3 期，巴黎：Seuil，1970 年；录音见 UBUWEB。

我回答他：“按我顺口而出的说法，没有什么同真理不相容：人们在里面撒尿、咳嗽、吐痰。

“真理是一处过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处排泄场；知识同其余东西一样，都从那里排出去。

“人可以长久待在那里，甚至嗜之成癖。

“值得注意的是，我曾告诫分析家，不要以爱来标记这个他凭自己的知识与之订婚的地方。我立刻对他说：

“‘真理是不能娶的；同她没有契约，更谈不上自由结合。她什么都受不了。真理首先是诱惑，目的就是把你当傻瓜耍。要不落入圈套，就得足够强大；你可不是。’

“我就是这样对分析家说话的——那个幽灵，我呼唤他，甚至拖曳他；多年以来，我总在固定的日子、固定的时间催你们到场，顶着你们的欢闹，替你们打这样一个赌：他会听见我。

“所以，我提醒的不是你们；你们没有被真理咬上一口的风险。

“可是，谁知道呢？假如我的锻造之物活了起来，假如分析家接过我的中继——尽管我们几乎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出现——我要警告的就是他：‘一切都得从真理那里学习’，这句陈词滥调注定使任何人迷失其中。

“每个人知道其中一小段就够了，而且最好停留在那里。更好的是，他什么也别拿它来做；再没有比真理更背叛人的工具了。

“大家知道，一位分析家——不是‘那位’分析家——通常怎样脱身：他把真理的线头留给那个本来就为它烦恼的人；此人也因此真正成为他的病人，而分析家自己却根本不把它当回事。

“尽管如此，近来有些人确实把真理当成自己的事情，觉得自己同它关系更深了。

“这或许是我的影响；这种修正也许有我的一份。

“正因如此，我才‘有义务’告诫他们不要走得太远。因为我之所以取得这一效果，恰恰在于看上去没有碰它。

“可严重之处也恰恰在这里。当然，有人装作对此感到几分恐惧。这是一种拒绝，但拒绝并不排除合作；拒绝本身也可能就是一种合作。”

好吧，那些通过广播听我的人，并没有我刚才说的那种妨碍他们听懂我所说内容的障碍——也就是听到我本人。在这里，我要再往前走一步。既然我能在某种大众传媒的层次说这些话，为什么不在这里试一试呢？所以我才把这段文字读给你们。

此外，我最初四个回答所遵循的原则也许已经得到证实。这些回答曾使在场的你们大为错愕，据说在广播里却比人们以为的传播得顺利得多。这个原则也在我今天想留给你们的思路之中；毕竟，它是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当我们偶然面对广大公众，面对由某种媒介交到我们手上的群众时，何不正好按照人们所假定的、其实纯属臆测的“不胜任”程度，相应地提高水准？

为什么，为什么要降低声调？你们到底想把什么人聚拢过来？

文化的游戏，恰恰是诱使你们进入一个最终让母猫也找不到自己幼崽的体系。因此，尽管这些话在这间教室里仍然完全说得出口，我要指出，我那条把“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置于转移原则上的公式，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是它一直未被注意。

“依我所说，分析者的转移所涉及的是被假定的知识；我可没有说，分析家因此更被假定知道真理。

“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添上这个补语，对转移会是致命的。

“不过，假如理解这一点恰好会妨碍转移的效应继续保持真实，那就还是别去想它。

“有人拿转移据以运作的那一点知识，来装点我所揭露的东西；我正在细细品尝她的愤慨。

“除了那张扶手椅，她尽可以拿别的东西来填补这里；她说，假如我是对的，她已经准备把那张椅子卖掉。

“她只是因为没有守住自己的手段，才把事情弄得无路可走。

“分析家之所以站得住，仅仅在于他不必在自己的存在中同什么争执。

“那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著名‘非知识’，对分析家之所以要紧，只在于它对他而言什么也不是。

“他厌恶那种时髦做派：挖出一道影子，把它假扮成腐尸，再让自己像猎犬一样得到估价。

“他的学科使他透彻明白：实在首先并不是为了被人知道——顺便说一句，这是遏制唯心主义的唯一堤坝。

“知识添加到实在之上，正因如此，它才能把虚假带入存在，甚至让虚假多少在那里存在。

“我趁这个机会大把挥舞‘此在’（Dasein）；做这种事总得有人帮一把。

“说实在的，知识只有在自身为假的地方才操心真理。任何并非虚假的知识，都对真理毫不在意。

“当知识得到证实时，出现的只有它那令人意外的形式；而且这种意外的品味颇为可疑。借助弗洛伊德的恩典，它向我们谈的是语言，因为知识本身不过是语言的产物。政治性的切入正发生在这里。

“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人们拿哪一种知识来立法？

“当这一点被揭露时，事情可能发生改变。从另一种目光来看，知识会降为症状。

“这时真理到来。人们为真理而斗争；而这终究只从真理同实在的关系中发生。

“不过，它是否发生，远没有它产生什么那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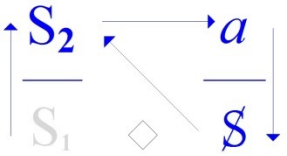
“真理效应不过是知识的一次坠落。造成生产的是这次坠落，而它很快又会被重新接收。

“至于实在，它既没有变得更坏，也没有变得更好。通常，它只是抖动一下，直到下一次危机。

“它眼下得到的好处，是重新有了光泽。这甚至可能是人们可以期待任何一场革命带来的收益：那道光泽会在真理那长久以来始终浑浊的位置上闪耀。只是，对着这道光泽，人永远只见火光，什么也看不明白。”

这就是上一次研讨班结束后的第二天，我随手丢在角落里的一段文字；显然是为你们写的，因为已经不打算把它再加到我那只小小的无线电木筏上。

必须明白，真理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什么安置到了相应的位置上。



请看这个由四个字母构成的小图式。正如我一向所说，大他者的位置当然是为真理在那里铭写而设的。

不过，这说的是言说与语言的自由运行。真理当然在那里铭写；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层次的一切都在那里铭写，包括虚假，乃至谎言——而谎言只有以真理为基础才存在。

但在这个四足图式中，语言是先决条件，所谓话语则被视为一种结构，也就是制约着其中一切可能产生之言说的东西。此处所谈的真理——这道话语的真理——所安置到相应位置上的，正是这道话语所制约的东西。

主人的话语究竟怎样维系？

这是真理功能的另一面，不是显露在外的一面，而是这样一个维度：真理在其中必然化为对某种隐藏之物所负的债。

真理圈层的犁沟划过久已荒废的天空表面。可问题在于我有一天用过的那个词；它已经把你们中不少人撩拨得直犯嘀咕，不知道我怎么了——这个词就是 lathouse。

真理是隐藏的，构成它的是隐匿（Verborgenheit）：真理的这个维度并不是我发明的。

简言之，事情使人不得不假定，真理肚子里藏着某种东西。

同我一样，你们也看得出：很早就有一些聪明人察觉，一旦那东西出来，必定十分骇人。它大概确实还是骇人的，这样放在整个景观里才更相称。

相关知识卡 Astudé、alèthosphère、lathouse 与 soyousent

当然，整套把戏也可能正在这里：那东西一旦出来，就必须显得可怕。

如果你们把时间全花在等待上，那才真的完了。

总之，不要过分撩拨 lathouse。因为投身其中，总会确保一件事——什么事？——就是我反复向你们解释的：确保那借助你们而实际成为实在之物的不可能性。假如你们把追求系在真理一边，就会愈加支撑那些不可能的权能，也就是我上一次逐一列举的统治、教育以及必要时的分析。

无论如何，就分析而言，这一点很明显。只要我稍稍接近真理，“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便会引起公愤。

至于我的那些四足小图式，今天我要请你们格外留意：它们并不是历史的转盘；事情并非必然总要通过这些位置，也并非必然总朝同一个方向转动。

它们只是请你们参照某些完全可以称作“根本函数”的东西来定位自己——这里的“函数”取数学意义。决定性的一步出现在我刚才已经指出的那个时代，涉及下列事物的共同之处：

- 伽利略迈出的第一步；
- 莱布尼茨那里积分与微分的出现；

• 以及对数的问世。

所谓函数，是某种进入实在的东西；它此前从未进入过，而它所对应的不是发现、实验、圈定、分离或提取什么，而是——

——书写两个层次的关系。

不妨用对数的产生来举例。

在一种情形下，第一种关系是加法。加法终究很直观：这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一些东西；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构成一个新的集合。

乘法终究不是同一回事。饼的增殖并不等于把饼聚拢到一起。

问题在于让这两种关系中的一种映射到另一种关系上。

对数一经发明，便借助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计算尺在世界上飞快奔驰。可不要以为它们的存在会让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继续处于它们问世前的状态。重要的正是它们的在场。

那么，S_1、S_2、a、$\not S$ 这些或多或少很卖力的小项，我告诉你们，它们可以用在极其多样的关系中；人只需熟悉它们。

例如，从一元特征出发，只要我们暂且满足于此，就可以试着质询主人能指的运作。只要把它牢靠地奠定在结构上，它便完全可用；你们还会看出，无须再添上“为纯粹威望而殊死搏斗”及其结局那整出大戏。

奴隶的位置并不具有偶然性——这同人在“自然之真”的层次追问事情时所得的结论相反。

这里有一种必然性：知识之中必定产生某种发挥主人能指功能的东西。

当然，我们免不了幻想谁最先做出了这件事，继而发现主人与奴隶来回传球的美妙景象。

但也许，那不过是一个感到羞耻的人就这样把自己推到了前面。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结的维度，并不容易提出，因为这不是人们最容易谈论的东西。

也许主人能指正是从这个洞中喷涌而出。

假如真如此，那么当我们想要颠覆主人的话语，甚至只想让它转动时，为了衡量自己必须靠近这个洞多远，以上说法也许并非毫无用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对 S_1、即主人能指的这项引入，在最细小的话语中也触手可及；界定话语可读性的正是它。

语言、言说与知识确实存在，而且这一切在新石器时代似乎已经运转起来；但我们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当时存在一个名为“阅读”的维度。

这甚至不要求已经有文字或印刷；并不是说阅读没有早已在那里，而是说它以某种回溯效应在那里。

我们阅读任何文本时，总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使它成为可读之物？这个衔接点必须到构成主人能指的东西一边去寻找。

我要请你们注意：作为文学作品，人们从来只读那些荒诞不经的东西。

它们为什么能站得住？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最近又迈出一步岔路——我可喜欢这些岔路了——读了巴尔扎克的《当代史的背面》[注4]。

那真是荒诞不经。

假如没有读过它，那么无论你们想读多少关于十九世纪初与十八世纪末的历史——也就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直呼其名吧——

> [注4]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当代史的背面》（L'Enver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收入《人间喜剧·巴黎生活场景》。

相关知识卡 巴尔扎克《当代史的背面》

——甚至可以读过马克思，你们仍会一无所知；总会有某种东西从你们手中溜走，而它只存在于那篇令人汗流浃背的故事《当代史的背面》中。

请你们去读一读。

我敢肯定，你们中没有多少人读过它；这是巴尔扎克最少有人读的作品之一。

菲利普，你读过吗？没读过？

你也没读过，看到了吧！真不可思议！去读吧！

读完后交一份作业，就像大约一百年前，我谈到《亚他利亚》第一幕第一场时，曾试着给圣安娜医院的听众布置的作业一样。

结果他们只听见了"绗缝点"。

我并不是说那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不过，它终究就是 S_1，即主人能指。

天知道他们把这个绗缝点弄成了什么！

他们甚至把它带进了《现代时报》。

是的，是《现代时报》，不是《分钟报》。

它是主人能指。借此，我要他们看清：某种东西在语言中如火药引线般蔓延时，怎样才是可读的——也就是说，它会挂接上去，形成话语。

我始终主张不存在元语言。关键恰恰在这里：在语言中，凡是我们以为属于追求"元"的东西，其实始终只是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

不过，假如有一天——这纯属假设——有人询问我对某件事情的意见，而我只从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卷入此事……必须承认，就大学而言，我的位置相当特殊；我不大可能今天就这样把它完全摊开。但如果另一些身处大学的人，出于绝非无足轻重的理由，想要颠覆自己的大学——只要参照我的那些小字母，这些理由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他们当然可以朝这样一边寻找：

——在那里，一切都穿到一根小棍上；他们可以把自己这个小 a 放上去，也可以放上其他人——那些按知识进展的本性受到支配的人。

长久以来，他们一直像展示神话一样，让我们隐约看见世上或许有某种"生活之知"（savoir-vivre）！

我不是来向你们宣讲它的。我告诉你们的是"生之羞耻"。

借助我的小图式，他们可以为学生的如下感受找到理由：学生觉得自己同谁是兄弟，这话并不算错；但不是同无产阶级，而是同亚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其实像平民；罗马平民可是些十分体面的人。

阶级斗争从一开始或许就包含这个小小的误差源：它根本不发生在主人的话语之真正辩证法的层次。阶级斗争位于认同的层次。

“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他们站在同一边。整个帝国则是外加的那些他者。

问题在于，学生为什么觉得自己同外加的那些他者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完全看不清该怎样脱身。

我想提醒他们，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生产。羞耻的生产，翻译出来就是无耻。因此，不朝这个方向走，也许不失为一种办法。为了清楚指出一个很容易写进这些小字母的问题：人生产什么？

人生产某种文化的东西；可当它被放上大学的正轨，最终生产出来的就是一篇学位论文。

这始终同主人能指有关，不仅因为论文会把某种资格授予你，还因为这里预设了：凡属这种生产，都同一个作者之名有关。在大学的层次，这套安排十分精巧。

门槛上有一套预备程序：你取得在那里发言的权利，严格条件却是从此永远被自己的论文钉住——它赋予你的名字以分量；然而，论文中的内容此后丝毫约束不了你。

再说，通常你已经满足于此。

此后，只要你让自己有了名声，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因为你已经抵达“名字”。发挥主人能指作用的正是它。

我该怎么说呢？

我不想过分看重自己做过的事情；但我正是由此想到一样近来你们不大听人谈起的东西：《Scilicet》。

我曾说，那里应当刊登不署名的文字；这终究让一些人颇感意外。

如果你们看过我在那里写的东西，就不要以为我的文字署名程度更高。

我在那里写下的，是一次痛苦经验中自行唱响的东西；这次经验恰好涉及所谓“一所学派”。

我在那里提出了一些命题，终究是为了让某种东西得以铭写；它也确实铭写了下来，还引起了几次僵直发作般的效应。

只有当我是一个作者时，署上我的名字才会有意义。

我根本不是作者。

人们读我的《文集》时，谁也不会想到要把我当作作者。

相关知识卡 Scilicet、非署名发表与布尔巴基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切都被小心限制在一份刊物内。归根结底，这份刊物的唯一意义，就是尽可能贴近我试图界定的东西，即用于质询知识的东西：分析知识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灾难？

问题正是这个。只要他们还没有全都按捺不住地想成为“作者”，问题就一直是这个。

不署名竟显得悖谬，这很奇怪。毕竟几个世纪以来，凡属正派人，至少总会装作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手稿是被别人硬抢走的；总之，仿佛有人对他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他可没指望作品问世后会收到祝贺便条。

简言之，假如对大学既定框架中大量供应、广泛传播的知识进行严肃质询，能够产生某种东西，那么在一处立下这项规则的小小庇护所——比如这里——这种东西就完全没有理由不出现。它不为抬高某位“先生”，而是为了说出某种结构上严谨的东西，无论后果如何。

它的影响可能比起初所能预料的更大。

我特意回书房找了一下……这其实不可思议，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根本没有这个需要；不过，终究可以借此重新确认年代。

像狄德罗这样的人，写出《拉莫的侄儿》后，简直像把它从口袋里掉出来一样。

另一个人把手稿带给席勒；席勒勉强知道狄德罗是谁。狄德罗此后再也没有管过这件事。

1804 年，席勒把手稿交给歌德，歌德立即将它译成德文。而直到 1891 年——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因为那本书就在我手上——我们得到的仍只是依据歌德德译本重译的法文本。歌德已经彻底忘记自己的译本一年后曾经出版，甚至可能从来都不知道……

当时正值法德之间的剧烈冲突，法国大革命等等；而歌德对这场革命性侵入也颇为反感。

总之，歌德的译本完全无人注意。我告诉你们，连歌德本人都不知道它已经出版。

但这丝毫没有妨碍黑格尔把它变成那本充满幽默的小册子的一根主脉；近来我时常援引这本小册子，也就是《精神现象学》。

相关知识卡 Scilicet、非署名发表与布尔巴基

由此可见，你们不必太担心自己产出的东西是否带着一个表明“这与你有关”的标签。因为我向你们保证，这会极大妨碍任何像样的东西出现。

哪怕只是在你们可能感兴趣的领域内，你们自然也会认为，按照学位论文的规矩，自己必须把它同作者联系起来：

- 他必定是天才，尤其当他没有说出太离谱的蠢话，而且带来了某种重要之物时——尽管那东西可能同他本人毫无关系；
- 你们绝对不得不认为，背后有一颗“思考的头脑”。

有了这一套，在一切涉及心理学的事情上，你们会长久地陷入绝境。

十分明显，在那些能够照亮事情的作品中——我不知道……比如刚才谈到的《当代史的背面》——连一丝心理学的影子也没有。

它完全是一套小小的装置，价值来自它的主人能指；换句话说，价值在于它可以被阅读。

丝毫不需要什么心理学。

最后，为了替自己开脱，我还要补充：我的《文集》遭遇了一场意外，也就是出版后立即被人阅读；不过，它终究还是一本“最滞销书”（worst-seller），这一点救了它。[笑声]

好了，总之，在这样的暑热中，我今天不再延长这番话了。这是我今年对你们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显然，许多东西仍然缺失。不过，假如把这一点说清并非徒劳——你们如此众多地来到这里，而你们的到场又如此经常令我为难，其中终究或许有一些不那么卑劣的理由，用黑格尔的话说——

显然，换成别人会说，这是一个分寸问题。

事实上，看来是：不要太多，但恰到好处。

我希望……

……说实话，假如我带来的东西并非不可理解，考虑到我在你们大多数人面前提出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不要太多，但恰到好处”也就是说：我有时让你们感到羞耻。